目　　錄

中國文學

現代主義與六０年代的臺灣女性散文 ..... 張瑞芬 1

《陳氏香譜》版本考述 ..... 劉靜敏 45

《急就篇》名稱探源 ..... 林榮森 79

論韓愈〈聽穎師彈琴〉引發的「聽琴」與「聽琵琶」之爭及其內涵 ..... 高慎濤
翟　敏 95

游移與曖昧 - 王韜《漫遊隨錄》的策略書寫與觀看之道 ..... 陳室如 107

越劇《祥林嫂》與崑劇《傷逝》 - 從魯迅小說的改編演出看兩個不同劇種的改革 ..... 陳富容 131

哲學

老子の思想 -「道」の働き ..... 張才興 149

歷史學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研究 ..... 胡志佳 179

清代台灣烏溪流域的移墾與水圳修築 ..... 陳哲三 205

政治學

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之政經分析 ..... 李文志
蕭文軒 225

國民黨苗栗縣基層專職黨工關係網絡之研究 ..... 鍾道明
黃東益 267

社會學

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 ..... 王振軒 311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ism and Taiwanese Feminine Prose in the Sixties ..... Rui-Fen Chang 1

Study of Chen's *Xiangpu* Version..... Ching-Ming Liu 45

A Tracing of the Term *Jijiupian*..... Rong-Shen Lin 79

The Dispute and True Meaning Caused by a Poem about "Listen to Grqin" and "Listen to Pipa" ..... Shen-Tao Gao Min Zhai 95

Oscillation and Ambiguity: The Strategy of Composition and the Way of Observing in "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of Carefree Travels" by Wang Tao..... Shi-Ru Chen 107

Shaohsing Opera *Shyangllin Sao* and Kunshan Opera *Depression for Passing Away*—Discussion on the two types of drama reformation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s Adapted from Luu-Shiunn's Novels..... Fu-Jung chen 131

Philosophy

The Working of Dao (道) in the Thought of *Lao-Zi* (老子) ..... Tsai-Hsin Chang 149

History

A Study on Si-Ma Yu of East Jin..... Chih-Chia Hu 179

The Reclaiming Ac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lrrigation Systems in the Wu-Xi Drainage Basin in Taiwan in the Ching Dynasty ..... Che-San Chen 205

Political Science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ailand's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 Wen-Chih Lee Wen-Hsuan Hsiao 225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Networks of KMT's Full-time Local Staff in Miao-li County ..... Tao-Ming Chung Tong-Yi Huang 267

Sociolog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Crisis Management ..... Chen-Shiuen Wang 311

Cover Design: Professor Ching-Chin Huang

封面設計：黃敬欽教授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1-43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現代主義與六０年代的臺灣女性散文

張瑞芬*

摘　要

在台灣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六０年代前後，傳統文學史對當時女性散文的表現極少著墨，當時重要女性散文家也普遍受忽視。然而她們用前衛的理念跨越書寫文類，開啟了散文書寫的新可能，恰恰呈現了女性文學於六０年代一個重要的轉折位置。

六０年代女性散文多線並行，並存在著異質的聲音與世代交替的意義。最大宗的散文寫作延續張秀亞諸人而下的抒情路線，新崛起的年輕女作家普遍為外省來臺時幼小一輩。簡宛、荊棘、陳少聰、蔣芸都因出國太早或散文寫作較晚而被忽略，丹扉、陳克環則走知性雜文專欄路線，關心時政與社會，反應女性的立場。趙雲、張菱舲、李藍在六０年代雖然並非主流，寫作時間短，作品數量亦少，然而她們結合現代主義思潮，發展出一個相對於五四新文學白話傳統的轉折。趙雲散文充滿實驗電影與小說的越位，張菱舲以詩情散文回應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李藍散文則承接了張愛玲的現代主義隔空影響。在現代主義風潮中，女作家以一種違逆主要潮流的方式作了文體實驗。這實驗當時看來似乎未稱成功，然而如今重新檢視台灣當代女性散文的發展，六０年代以現代主義作為啟蒙，開始展現了女性文學的主體性與自覺，轉變了五四跨海而來的中國性與寫實傳統，也開啟了八、九０年代眾聲喧譁的散文後現代世代的可能。

關鍵詞：女性散文、現代主義、六０年代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壹、多音交響的六０年代女性散文

一、現代主義與六０年代女性散文在文學史上的缺席

散文在六０年代，是一個保守與前衛兩股力量相互激盪的轉型期。延續五０年代以降的社會價值與寫作型態仍爲主流，內在卻已有騷動意志悄然萌生。整個臺灣，進入六０年代後，出現了作家世代差距、美學思維迥異等斷裂傾向，現代主義文學的擴張與深化，更改造了往後臺灣的美學觀念與書寫型態。[1]

傳統的十年分期文學斷代法，一般將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時期定位於六０年代。然而確切一點來說，五０年代反共文學、六０年代現代文學、七０年代鄉土文學呈現相互參差交錯的情形，並無法以十年作簡單切割。從某些觀點來看，現代主義（Modernism）與鄉土文學也並非對立面的存在，施淑拈出「現代的鄉土」一詞，江寶釵則以爲：「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一樣也是現代化的反動（anti-modernization），是針對現代化不同反應的結果」。[2]臺灣文學中，現代主義的傳入並非始於一九六０年的《現代文學》，早在五０年代，隨著「自由主義」（liberalism）學者與《自由中國》的創辦，現代主義已經開始影響臺灣。聶華苓接編的《自由中國》文藝欄上，一九五四年之後就開始出現了汪度〈醉〉、楊海晏〈兩節壓癟了的黃瓜〉、朱西甯〈再見，火車的輪聲〉、司馬中原〈一粒灰塵〉這樣的現代主義小說。[3]

誠如陳芳明〈現代主義的擴張與深化〉所言，現代主義於臺灣社會，是一場包括現代詩、現代畫、現代舞、現代音樂、現代攝影、現代劇場等，全面性的藝術運動。現代主義於六０年代影響臺灣文學，其背景與臺灣社會當時的親美文化不無關係，只是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將原本歐美現代主義對經濟發展（工業化、都市化）的反思，轉化成了知識份子對現實政治的冷感或抵拒，也象徵了臺灣當代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割離。呂正惠一九八八年〈現代主義在台灣〉指出，從文化背景來看，一九四九年跟著國民黨撤退到臺灣來的知識份子，相對於留在大陸的五四主流（亦即創立共產黨的左派文人），是逐漸式微的自由主義一系，這樣先天的體質，導致了臺灣特有的現代主義風貌。五０年代以降，隨著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的穩定，臺灣文學出現了中國五四傳統與臺灣本土傳統的雙重斷裂。

---

[1] 陳芳明，〈現代主義的擴張與深化〉，《臺灣新文學史》，第十四章，《聯合文學》，207 期（2002 年 1 月），頁 142-155。

[2] 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臺灣現代小說現象研究〉，陳義芝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臺北：聯合文學，1998 年），頁 126。施淑，〈現代的鄉土－六、七０年代臺灣文學〉，施淑《兩岸文學論集》（臺北：新地，1997 年），頁 126。

[3] 郭淑雅，《國族的魅影，自由的天梯－「自由中國」與聶華苓文學》，靜宜碩論（2001 年），頁 141-148，「文藝欄的現代主義作品」。

[4]臺灣六０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在文學傳統雙重斷裂的文化背景，與被圍堵、切割、碎裂、過濾的語言環境中，知識份子表現而爲一種對現實環境強烈的疏離感，或所謂「斷絕的，不連續的，變遷的時代感受」。[5]

在文學技巧上，「現代主義」（Modernism）基本上是一種超越論的創作觀，它挖掘內心幽黯、情慾深淵。在語言的實驗上以超現實、意識流等種種技巧，大量運用於小說、新詩及散文的創作，形成一種施淑所謂「異端的語言」。它不但抗拒官方的文藝政策與意識型態，也促使台灣當代文學開始偏離中國五四文學以降的寫實傳統。一般傳統的觀念認爲，與新詩、小說相較，六０年代臺灣散文受現代主義與西洋當代思潮影響較小，作家作品能例舉的不多。然而一九九四年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在詳論現代主義詩與小說的意涵後，已然觸及此一問題。柯慶明例舉沈臨彬的散文〈巨樹〉，說明六０年代散文事實上已模糊了「詩」與「散文」的界線。並注意到：「六０年代，對於文字的刻意講求，強調其意象性的獨立演出，強調其內容的密度與結構上的對比與繁複，亦使不少『散文』，迥異於傳統『散文』的風格…」。[6]

柯慶明此文，已注意到六０年代以降，臺灣現代散文開始迥異於傳統散文風格。所謂傳統散文風格，即是五四以來白話散文（也就是余光中所抨擊其尚未「現代」）的型態。「全盤西化」既成爲現代主義概括的定義，余光中一句「下五四的半旗」也體現了其精神與意涵。[7]關於六０年代散文的文學史定位，真正較爲突破的是一九九五年林燿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臺灣散文面目〉一文。林燿德指出，在文學史發展中，散文實不應被視爲一種邊緣文類。臺灣近半世紀散文發展，也不一定得放在五四以降的大傳統中。散文有它自己獨創的性格，與追求現代性的思想特質。林燿德更指出：「追求『現代性』，一直是台灣現代散文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巨大軸線」。他並且舉余光中的散文革新理論，和張秀亞〈創造散文新風格〉將詩與意識流小說融合散文文體的主張，說明「台灣的散文格局以源遠流長的根莖為軸，又在前衛創新的「進化」驅力之下形成轉動不已的輪輻，在台灣新文學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根本不讓於現代小說與現代詩」。[8]

---

[4]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1995 年），頁 9-15。

[5] 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臺灣現代小說現象研究〉，同前註，頁 123。呂正惠，〈現代主義在臺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1995 年），頁 9-15。

[6] 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收入《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4 年），頁 129。

[7] 引自余光中《逍遙遊》（1965 年，文星），頁 1。同書中收錄之〈剪掉散文的辮子〉等多篇文章，與《焚鶴人》（1972 年，純文學）中〈我們需要幾本書〉諸篇，皆為六０年代發表於《文星》之倡議新思潮評論。

[8] 林燿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132 期（1995 年 10 月），收入《新世代星空》（臺北：華文網，2001 年），頁 200、213，楊宗瀚編。

林燿德原以新詩創作崛起，並兼擅散文與小說。他的文學評論，主要在八０年代至九０年代，以詩論與小說評論著稱。他的所有論述，如王浩威所稱，其實都儼然有銜接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以及重寫台灣史的雄心。[9]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四九以後－臺灣新世代詩人初探》導言中，林燿德指出，一九四九年，在台灣詩壇是個重要分水嶺：「一九一八年以降成長的中國新體詩脈自此崩析為二，海峽兩岸個別發展」。[10]學者劉紀蕙對林燿德多以「新世代」、「當代」立論，解讀爲「想與前行代詩壇傳統宣稱斷裂」的方法。[11]在〈林燿德與臺灣文學的後現代取向〉中，劉紀蕙對林燿德的文學史「解構」與「重構」企圖論述甚詳。她並且稱林燿德的「後現代計畫」是對寫實主義者開戰，向現代靠攏，並重寫文學史。因此，林燿德在《觀念對話》中，批判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上海二０、三０年代現代主義新感覺派作家（如劉吶鷗）毫無討論是相當偏頗的，同時也據此提出「現代主義在中國和臺灣兩地的發展必須予以新的評估」的見解。

在〈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之前，林燿德並未寫過其他散文理論或散文評論。此文原是作爲承接他八０年代以下文學史完整論述的一部份，卻意外的提出這番頗有新意的見解，與鄭明娳教授約同時期的《現代散文縱橫論》、《現代散文類型論》諸書相互呼應，並點出了九０年代散文論述的困境與展望。

林燿德對臺灣一九四九以降散文傳統的看法，呼應了前述呂正惠的臺灣現代主義文化背景說，〈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指出，臺灣當代文學傳統事實上與五四新文學主流是斷裂的，當年隨著國民黨政權離開大陸的泰半是散文家，泰半並非主流（左傾）的重要小說家。林語堂、梁實秋在兩岸散文源流中的重鎮地位，亦絕非遷臺初期的大陸詩人紀弦、覃子豪所能比擬。林燿德的觀念是，一九四九年以降，臺灣當代散文有它自己獨創的性格，與追求現代性的思想特質，與中國當代散文成爲平行發展的兩條軸線，林燿德的臺灣當代散文史觀，與他的新詩評論觀點，就此形成了一致性。

在世紀末林燿德的登高一呼之後，相關散文研究似未見論者再深入闡述，有關六０年代以下散文如何受到現代主義精神或技巧影響的議題，討論甚少，針對女性作家的部分，陳芳明二００三年《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七章〈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稍有發揮，[12]除了重新省視張愛玲對台灣文學的影響之外，並

[9]王浩威，〈偉大的獸－林燿德文學理論的建構〉，《聯合文學》12 卷 5 期（1996 年）「林燿德紀念專集」。

[10] 林燿德，《一九四九以後－臺灣新世代詩人初探》（臺北：爾雅，1986 年），頁 5。此書評論蘇紹連、杜十三、白靈至曾淑美、陳斐雯等臺灣戰後十七位詩人。

[11]劉紀蕙，〈林燿德與臺灣文學的後現代取向〉，〈時間龍與後現代暴力書寫的問題〉，《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臺北：立緒，2000 年），頁 368-394。

[12]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七章「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聯合文學》（2003 年 2 月）。

略論張菱舲、李藍，將散文提昇到與小說、新詩並列的地位，對完整呈現六０年代文學全貌，頗有突破與助益。

臺灣六０年代現代主義，後來往下紮根，成爲通行文化符碼的一部份，[13]它的技巧與精神很難以十年分期來斬截區分。本文所謂「六０年代女性散文」一詞，只是約略的指稱，方便與同時期詩、小說等其他文類對應。西方現代主義小說，原本即著重於對內心活動的關注、人生表象與內在的混亂分歧、敘述模式的探索。既是心靈解放，也是對語言與權威的抗拒，對傳統的背叛，當時的散文和詩，也同受影響。臺灣六０年代女性散文與現代主義有否關連？有哪些重要作家與作品？對後世代有何影響？從現代到後現代，台灣當代女性散文未在創作場域或心靈探索中缺席，然而此一論題卻長久以來呈現空白的，其原因有二，一是現代主義在台灣文學傳統中的被汙名化與受誤解，二是當時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女性散文僅經過短暫實驗即隱沒文壇，未造成普遍影響，數量不多，且從極少進入文學典律如選集或教科書中。

在台灣文學發展中，七０年代鄉土寫實與本土論述崛起之後，對現代主義精神即多所貶抑。[14]六０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多被視爲「貧血」、「與現實游離」。在以「反殖民」、「反封建」與「寫實主義」爲原則的台灣文學史論述中，不只視六０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爲「異質書寫」，甚且包括三、四０年代日據時期現代主義詩學，九０年代後現代現象，也都被視爲規則之外，擾亂秩序或不道德的「負面書寫」。正如女性主義理論學者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所說，如同一種朝向共同象徵系統與文化體系的排他性，「伊底帕斯組織化與正常化」的文化症狀。[15]張愛玲之所以成爲台灣文學史的巨大「問題」，與此亦不無關係。

第二個問題，則是質與量的辯證。一個作家是否入史或形成重要美學典律，和是否持續書寫亦有關係。六０年代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女性散文家趙雲、張菱舲、李藍諸人，普遍都以小說或新詩成名，散文作品不多，創作時間平均僅數年，未能持續在文壇有其能見度，相關資料不多，在兩岸當代文學史或相關論述上均少見著錄。[16]誠如 John Guillory 所言，文學作品是否被讀者閱讀或喜愛，對它的

---

[13]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原載《文藝研究》（1988 年 7 月），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年）。

[14]邱貴芬認為，現代派文學被貶抑的主因，其實是不像寫實主義可以套到中國式的歷史敘述，如階級對峙、中西對峙裡，臺灣文學研究者不知不覺的複製了中國文學基本研究方法。邱貴芬，〈臺灣現代主義小說與現代性的時間〉，暨南大學「重寫臺灣文學史/反思女性小說史」研討會論文（2005 年 5 月 27 日）。

[15]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臺北：立緒，2000 年），頁 17。關於寫實主義對現代主義之排斥，又見林燿德《觀念對話》中，與張錯的對話〈權力架構與現代詩的發展〉（1988 年），以及林燿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1993 年）。

[16]鄭明娳於《現代散文縱橫論》首章〈中國現代散文芻論〉中，曾提及蔣芸。張健，〈六十年代的散文〉趙雲僅僅列名，「張菱舲」有一行簡介，籍貫誤為江蘇。李豐楙《中國現代散文選析》緒論，遍數各年代重要作家，於六０年代只列舉張菱舲。簡介與張健同：「張菱舲之寫〈紫浪〉，其文字意象深受現代詩的啟發，極有現代感」。

長久流傳並非關鍵，真正重要的是，它是否已納入某一種文學典律（文學史、選集）或傳統脈絡（教材）裡。[17]像較少被收入臺灣女性小說典律的六０年代吉錚、孟絲、叢甦，七０年代蔣曉雲一樣，由於處於非主流地帶，她們都曾知名一時，而後無情的被歷史遺忘。

趙雲、張菱舲、李藍，包括吉錚、孟絲、叢甦等，即令作品數量不多，在文學發展或藝術成就上仍可能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法國結構學大師傅柯（Michel Foucault）《知識的考掘》一書，曾提出所謂「知識考掘學」（archaeology）一詞，說明了棄絕正統的宗譜（geneaology）、線性的歷史觀，重視歷史演變中存在的無數縫隙（rupture; abyss），才是我們重構（或再現）歷史真相時，不可或缺的態度。[18]傅柯並且認爲，除了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外，我們也須進一步研究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人或事，「因為他們在構成一時代的話語（一作「論述」discourse）中，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文學史上隱沒的「小」女聲，可不是只有小說而已。

六０年代女性散文在文學史上定位的困難，除了「現代主義」被負面化的印象，違逆本土男性的主流價值（線性史觀），未能造成持續影響之外，可能還因爲面對散文這項文類先天的劣勢，更加被忽略與邊緣化。趙雲、張菱舲、李藍於六０年代末或七０年代初結集的散文專書，目前已幾無流通，公私立圖書館普遍亦不著著錄或收藏，增添了當前研究的難度。

從兩岸近年的臺灣文學史撰寫，來檢測六０年代或與現代主義有關的女性散文創作評述，可以見出相關敘述至今被忽略的程度。論臺灣六０年代散文，由於「散文革命」理念的提出，余光中是最容易被標舉出來的範式，其他敘述則多列舉五０年代延續而下的作家如張秀亞、琦君等。大陸學者劉登翰一九九三年主編的《台灣文學史》第十一章中，舉余光中、琦君、張秀亞、胡品清、羅蘭以概括六０年代台灣散文表現。[19]袁勇麟《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第二章論台灣，「散文革命」部分亦列舉余光中，其他大陸學者作的臺灣散文史或臺灣文學史大致所差無幾。朱壽桐一九九八年主編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臺灣部分列於第五編，其中整整五章以現代主義詩、小說和戲劇爲論述主體，未及余光中、「現代主義散文」，或女性散文議題。[20]

台灣本地的文學史，一九八七年的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關於六０年代散文部份，略提「受到西方文學重象徵、意象、感性、顛倒時空感覺的散文也出現」，

[17]Guillory ,John 1993.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Lovell,Terry1987.Consuming Fiction .London;New York:Verso.

[18]引自傅柯（Michel Foucault）撰，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1993 年）。

[19]劉登翰主編《台灣文學史》（福州：1993 年，海峽文藝）中，散文部份由徐學負責編寫，徐學另著有《台灣當代散文綜論》（福州：海峽文藝，1994 年）。

[20]朱壽桐，《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上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693-816。

[21]並條列出余光中、梁實秋、陳之藩及女作家張秀亞、葉曼、羅蘭、鍾梅音、張菱舲、胡品清、洪炎秋、葉榮鐘姓名，未及作品。一九九七年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對六０年代散文所持的負面評價，[22]亦難以補充這史論上的巨大空白。

六０年代體現現代主義精神的女性散文，除張菱舲偶被提及，趙雲、李藍、蔣芸，幾已完全被遺忘了。作爲一種邊緣的文類與性別，女性散文在男性史家的知識論述與歷史建構中是隱沒的。學者邱貴芬〈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論女性小說在台灣文學史的處境，曾爲朱天心的「政治不正確」且不爲臺灣本地文學史重視而憂心。邱貴芬指出，那些曾經在文壇產生衝擊，也曾積極介入文學塑造的作品，如今已鮮有人記得，因爲不入史，即使享有盛名和市場，「或許百年之後談台灣小說，大多數的人甚至不知道有朱天心」。[23]這項憂慮，恐怕並非虛言。六０年代寫《海那邊》、《拾鄉》、《孤雲》的吉錚；寫〈癲婦日記〉的叢甦；寫〈花旗國〉的孟絲，范銘如〈來來來，去去去－六、七０年代海外女性小說〉已爲她們的處境抱過不平。而距今不過三十年，張菱舲等人也幾乎已成了傳奇中的人物，不但文學史上極少著錄，即便近年較具聲名或典範意義的文學選集，也少見收錄她們的單篇作品。

作爲激流年代中獨特的美學範式，臺灣在六０年代所建立的文學成就，何以獨缺散文？六０年代，除了較具代表性而不致被文學史遺漏的余光中，還有哪些散文體現了現代主義的精神與技巧？如林燿德所說，散文並不能脫離文壇互動成長的激流急浪，六０年代，余光中散文外，有沒有符合現代主義精神的女性書寫？她們做了哪些散文書寫的實驗？留下什麼作品？這些作品，一方面受西化當代思潮的洗禮，一方面轉變五四跨海而來的中國性和寫實傳統，同時預示了八０、九０年代眾聲喧嘩的散文後現代世代的到來。研究六０年代受現代主義精神影響的台灣女性散文，不但有助於釐清臺灣文學史上的盲點，且能與中國當代散文發展脈絡相互對應比較。此一議題，在文本資料急速喪失的當前，無疑具有研究的迫切性。

二、六０年代女性散文的異質聲音與世代交替

在討論六０年代有哪些重要女性散文家受到現代主義精神影響時，恐怕必先釐清「六０年代散文」和「六０年代作家」的義界。本文所論「六０年代散文」，主要依寫作時間而非作家年齡來界定，指的是在六０年代書寫、發表或結集的作

[21]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誌出版，1985 年），頁 124。
[22]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1997 年），頁 154。
[23]邱貴芬，〈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年），頁 21。

品。時間上的切分，也只能大致以此爲準，不能完全精準於一九六九年底。本文以下討論的趙雲、張菱舲、李藍，由於史論甚少提及，且爲本文重點標舉的重要作家，因此所論雖以六０年代其重要性爲準，也包括她們整體寫作或其他文類的評述。

其次，散文作家的創作與新詩或小說不同，他們比較著重個人風格的延續或轉變，受某一時代思潮影響較不顯著，平均寫作時間也比較長。本文所論「六０年代作家」中，有些年齡輩份較長的作者，如羅蘭、胡品清、畢璞（周素珊）、趙淑俠寫作稍晚，遲至六０年代才加入散文文壇，小民、雪韻甚至晚至七０年代。然而她們在時代背景、作品主題與風格屬性上，必須劃歸「來臺第一代女作家」之中，並未列入本文討論。

在六０年代崛起，並延續至七０、八０年代的女性散文，除了上一世代五０年代主流的抒情散文，與本文重點欲討論的受現代主義影響的散文之外，還有兩種很難歸位的異質聲音，容易被文學史忽略。一是於六０年代崛起，未幾即出國留學，旅居異地至今的女作家，包括荊棘（朱立立）、喻麗清、蔣芸、呂大明、陳少聰、簡宛（簡初惠）等。[24]由於離臺過久，或散文結集較晚，臺灣文學史上對她們敘述不多，亦難納入某一時代或本地文學譜系討論之中。荊棘、喻麗清、呂大明、簡宛等，最晚都在七０年代初即已離臺，蔣芸與陳少聰，也都約當其時，分別前往了香港與美國。荊棘、喻麗清、呂大明、簡宛由於持續於國內出版散文集，讀者與文壇對她們較不陌生，蔣芸與陳少聰，近年已幾近爲國內文壇遺忘。

簡宛（簡初惠，1939-）爲臺北人，是本省籍女性中少見的旅美作家，一九六九年赴美獲美國教育碩士後旅居北卡羅那州至今。師大史地系畢業的她，兼寫散文、小說和童話，一九七一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葉歸何處》後，陸續有《地上的雲》、《書中日月長》、《簡宛隨筆》、《合歡》等。簡宛的散文，親切溫婉，如同趙雲一般表現爲教育家的明理與母性的寬容。《地上的雲》討論兒女成長，也流露自我肯定的意識，堪稱留學生文學佳作，討論者頗眾。[25]琦君七０年代評此書，即盛讚簡宛筆觸客觀，觀照冷靜，深得「平易樸實」佳妙。[26]

陳少聰（1941-）原籍山東，就讀東海大學英文系，六０年代末開始寫作散文與小說，後赴美得愛荷華大學英美碩士，旅美至今。陳少聰文筆冷靜犀利，彷彿能透視人內心的光影。由於出國後改習心理，並曾擔任心理治療師，陳少聰最擅長寫心理分析一類小說，〈水蓮〉即爲此中代表作。與陳少聰出現文壇與赴美時間約同的是荊棘，原名朱立立的荊棘，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南瓜〉一文刊載於

[24]荊棘、喻麗清、呂大明散文，詳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 年）。

[25]孫慶餘，〈地上為什麼不該有雲？〉，《書評書目》，47 卷（1977 年 3 月）。洪宏亮，〈讀簡宛《地上的雲》〉，《書評書目》，50 卷（1977 年 7 月）。

[26]琦君，〈那一片上升的雲－簡宛的文和人〉，《書評書目》，65 卷（1978 年 9 月）。琦君評簡宛，另有〈親情、友情、祖國情〉，收入《琦君讀書》（臺北：九歌，1987 年）。

《文星》81 期後，自臺大園藝系畢業，旋即赴美求學，她甚且並未知覺自己成爲眾所矚目的文壇新人。[27]一九八一年，荊棘以〈無著作就淘汰〉[28]重現文壇，在隱地的賞識與鼓勵下，繼續寫作，而後才有八０年代《荊棘裡的南瓜》與《異鄉的微笑》等散文集。

荊棘在大學時期，曾與余光中、張菱舲、江玲熟稔，並在《文星》上發表過詩作。[29]荊棘和陳少聰的文學，同樣萌生自六０年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氛圍，直到八０年代，才終於綻放於北美的異鄉。她們的作品體裁都介於小說與散文間，善於運用象徵，加上透視人物心理的敏銳眼光，使作品往往達到一種哲理思維的層次。和荊棘一樣，陳少聰也在八０年代才改寫散文，散文量少質精，卻魅力獨具。曾出版散文小說合集《水蓮》（後易名《無槳之舟》）、《女伶》、散文集《航向愛琴海》（1994，麥田），《有一道河從中間流過》（2006，九歌）。

六０年代末即赴港至今的蔣芸（1944-），和下文將討論的張菱舲，二人也有近似之處，同爲名門之後、從小說/詩而轉向散文，也幾乎同時隱沒文壇。蔣芸原籍江蘇，爲知名報人（曾任世界書局小說部長）趙苕狂的外孫女。蔣芸長於臺灣，就讀政大中文系時即開始投稿，早期作品散文小說兼寫，多在《中央日報》副刊、《文學季刊》或《純文學》月刊發表，[30]曾與尉天驄、陳映真合作。一九六七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屬於我的雨季》，一九六八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遲鴿小築》，同年大學畢業，赴香港擔任國泰、邵氏電影公司編劇。一九七七年去港至今，曾擔任編輯，後於香港創辦《清秀》、《精品》雜誌，亦兼寫專欄。散文集有《低眉集》、《心頭還滴著昔日的雨點》、《離家以後》、《小心眼》、《港都夜雨》、《從前月光》、《相見也無事》近二十本。

使蔣芸建立臺灣文壇聲名的，是《屬於我的雨季》和《遲鴿小築》這些早期作品。在六０年代中後期文壇，她的出現曾令人驚豔，有人甚以「超凡脫俗」、「秀逸之氣如蘭蕙，精闢之論如圭臬」來讚譽她。[31]蔣芸小說《屬於我的雨季》，透過一群青少年的迷失，找到了新生的方向，是典型受到現代主義影響的作品。《屬於我的雨季》捨棄直線敘述，改以意識流加心靈獨白的表現手法，論者評其具有現代主義技巧，卻同時展現了寫實與健康。[32]同時期散文集《遲鴿小築》書

---

[27]隱地〈荊棘「南瓜」〉（收入《隱地看小說》），當時頗為荊棘沒再繼續寫作不解與惋惜。

[28]〈無著作就淘汰〉，以本名朱立立發表於《中央日報》（1981 年 5 月 4 日），收入《荊棘裡的南瓜》（臺北：爾雅，1983 年）。

[29]荊棘〈給一個有粉紅娃娃臉的，研究微生物的朋友－For her 22nd birthday〉一詩，見《文星》84 期（1964 年 10 月）。張菱舲〈待月草〉、〈風鈴吟〉（《聽聽那寂靜》，1970 年，阿波羅）文中多次提到好友朱立立（荊棘）、江玲與余光中。江玲當時就讀師大英語系，亦為《文星》作者，著有《坑裡的太陽》。

[30]亞訓，〈心頭還滴著昔日的雨點－訪蔣芸〉，《自由日報》（1987 年 9 月 5 日）。

[31]東郭牙，〈初識蔣芸〉，《青年戰士報》（1968 年 5 月 6 日）。此文甚且認為，蔣芸已然兼有徐鍾珮、張秀亞、胡品清散文之長。

[32]黃華，〈評蔣芸《屬於我的雨季》〉，《自由青年》，37 卷，4 期（1967 年 2 月）。

寫青春心事，則是浪漫加上現代感的文字，特具一種憂傷淒迷之美。如〈遲鴿小築〉中的文字：

> 曾經在雨地裡做過長長的散步，直到心中也沾滿了雨絲，拂也拂不去的，綿綿的，一日又是一日。清晨，午後，黃昏和夜晚，每一段時光都有著一層層記憶的網；你吃力的把它抖散開來，你說，我不再記得什麼了。[33]（蔣芸〈遲鴿小築〉）

陳芳明謂蔣芸散文，「讀來具有特殊的夢幻風味」，「既深入女性內心，又抒發城市的憂傷」，[34]，指的正是她從現代主義小說幻化而來的早期散文風格。只可惜在《遲鴿小築》這本散文集之後，蔣芸離開臺灣，也逐漸失去了在台灣文壇的影響力。蔣芸後期散文幾乎都是專欄短文，全寫於香港，如《從前月光》、《相見也無事》，典型香港在地風味。如《相見也無事》中〈銅鈿眼〉言香港有如搶錢世界，〈放撇〉說耍賴哲學等。除反應香港世情人事，間雜著洛杉磯旅痕記事，其後期專欄散文集，多同時有香港清秀雜誌社與遠景出版社兩個版本，成熟俐落，洞悉人心，以日常瑣記體的方式，作成熟世故之言，頗具情性與慧心。九０年代的蔣芸，自稱喜歡短文那種「引刀成一快」的乾脆，《從前月光》的〈夜未央〉將法國礦泉水 Evian 譯成「夜未央」，用來泡龍井春茶，何等情調。有些地方甚且有張愛玲的犀利，〈情已老〉一文就這麼說：「千不該萬不該有時讀一首詩，碰巧認識那個人」。[35]

除了這些早期旅外的女作家，六０年代還有丹扉與陳克環。她們偏離抒情路線，改以理性/知性評論時事的姿態，撰寫專欄雜文，隱然形成了七０年代婦運諸人如曹又方的前驅。在時代定位與文學歸屬都相當不易的情況下，著述雖多，卻因大眾文化的暢銷通俗屬性，削弱了文字技巧的認定，也較爲文學史或一般評論所忽略。

此一時期的女性專欄雜文家不重文字的優美，而重在對時事與社會的反應，她們彰顯女性多元化寫作的意義，並且首先打破通俗與嚴肅文學的界線，普受一般大眾歡迎。以世代來說，是繼鍾梅音、葉曼而下女性專欄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即丹扉（鄭錦先，1926-）與陳克環（1926-1980）。她們的「婦人之見，鏗鏘之筆」，在七０年代中期可叵（張曉風）的幽默諷喻，曹又方或薇薇夫人鼓吹女性權益前，擔負了婦女對社會諤諤之言的重要角色。再往下，才開啓了八０年代黃碧端專欄的榮景。

---

[33]蔣芸，〈遲鴿小築〉，《遲鴿小築》（臺北：仙人掌，1968 年），頁 10。
[34]陳芳明，〈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聯合文學》（2003 年 2 月），頁 54。
[35]蔣芸，〈情已老〉，《從前月光》（臺北：遠景，1992 年），頁 137。

丹扉原籍福建仙遊縣，生於浙江省寧波縣，早年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畢業，在臺曾任記者、編輯、教師諸職。據丹扉近年受訪時表示，一九四九年原本只是搭朋友便機來臺遊玩，竟因此與家人兩岸睽隔，一別數十年。[36]丹扉出現文壇的模式，是先以通俗文學雜誌爲據地，一九六二年起，在《皇冠》雜誌撰寫雜文專欄「反舌集」，而後在《臺灣日報》寫「婦人之見」方塊。其文字機智幽默，理性平和，加以丹扉作風直率，好作中性打扮，能「言人之不敢言」，頗有個性，深受讀者歡迎，被稱爲臺灣女性專欄作家的開山祖。桂文亞亦曾稱讚她的諷喻文快人快語，頗有不讓鬚眉的雄風。[37]

比起稍長一輩的葉曼（1916-），丹扉算是新崛起的寫手，六０年代中期葉曼返國，當時也正於《婦女》雜誌撰寫專欄，丹扉的專欄雜文，一九六六年以下，陸續結集《反舌集》（1966，皇冠）、《婦人之見》（1968，平原），一九六八年而下，陸續又有《吸塵集》、《搬弄集》、《見刺集》、《伐桂集》、《往返集》、《折枝集》、《管窺集》…共計二十餘本，都是專欄雜文。至九０年代末，丹扉仍健筆不輟，於北京出版《南人北腔》、《快人快語》諸書。

與丹扉同年的陳克環，爲湖北省黃陂縣人，二人爲南京金陵女大同窗，[38]陳克環念的是英文系，一九四八年尚未畢業即輟學結婚，成了空軍飛官眷屬。陳克環初來臺時在丈夫駐地桃園擔任秘書職，一九六二年第一次投稿到徵信新聞社人間副刊，在當時的主編王鼎鈞賞識下，開始了投稿寫作的歷練。[39]初期她兼寫散文與小說，《陳克環散文集》、《陳克環小說集》（1968，大江）就是此一時期的結集。一九六八年，陳克環開始應《中華日報》主編林適存先生邀稿寫作雜文專欄，陸續結集《怒瀑集》（1970，華美）、《吐蕊集》（1076，道聲）、《風樓夜談》（1978，乾隆）、《錦繡年華》（1979，九歌）等。陳克環的雜文專欄，談文學、論交友，評時事，話制度，雖然立場稍嫌保守，並曾於鄉土文學論戰中被視爲官方立場，[40]然而大體說來，主題層面頗廣，仍屬深有見地。

六０年代崛起於散文文壇的年輕女性，普遍生於三０年代中期至四０年代中期，她們所代表的身份背景，和五０年代遷臺女作家已然有了不同。在主力作家琦君、張秀亞、艾雯之外，開始加入了來臺時幼小一輩、臺灣本土女性，甚至外地來歸的僑生，形成了六０年代女性散文多元匯集，多音交響的現象。在言論無法完全自由的時代，她們所能書寫的思想、生活與感情，比起政令緊縮的五０年

---

[36]林麗如，〈婦人之見，鏗鏘之筆－專訪丹扉女士〉，《文訊》，159 期（1999 年 1 月）。

[37]桂文亞，〈從「折枝集」談諷刺文〉，《橄欖的滋味》（臺北：皇冠，1977 年），頁 72-78。

[38]林海音，《剪影話文壇》，頁 224，曾言南京金陵女大出了好些女作家，丹扉、陳克環、邱七七等。

[39]陳克環，〈自傳〉，《陳克環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1978 年）。

[40]陳克環曾於論戰中發表〈鄉土文學不容偏狹〉並引發討論，詳見陳克環〈海內．海外〉，《第三隻眼》。董保中，〈「文人的使命」與「創作自由」－兼評陳克環的「形式與內容」〉，對陳克環將色情文藝與共黨統戰合論，並指現代畫形式重於內容，亦不表贊同。載《書評書目》45 期（1977 年），頁 4-14。

代，稍稍擴大了一些。在多元的知識背景下，開始接受社會與文化最新思潮的影響，即使當時保守的抒情美文仍爲女性散文主流，許多同質或異質的聲音，卻已如繁花綻放般悄悄出現於文壇。大要言之，新一代的女性散文家，依其背景，可別爲三：

（一）來臺女作家第一代中最幼小一輩

如張菱舲（1936-2003）、程明琤（1936）、簡宛（1939-）、李藍（1940-）、張曉風（1941-）、陳少聰（1941-）、曹又方（1942-）、 荊棘（朱立立，1942-）、蔣芸（1944-）、喻麗清（1945-）、方瑜（1945-）、鍾玲（1945-）、呂大明（1947-）等。她們的來臺，普遍都是隨家人長輩遷徙，十餘歲以下的幼齡兒童。

（二）本土女性初學寫作者

劉靜娟（1940-）、丘秀芷（1940-）、謝霜天（1943-）、白慈飄（白恣票，1945-）。她們出生成長於二戰中，多人來農家，未有都市背景或文化上的優勢。

（三）外地來歸的僑生

林文月（1933-）自上海歸臺、趙雲（1933-）則是自越南來臺就讀的僑生。她們出生成長於海外，一九四九年或稍後回到故鄉/祖國，在台灣念大學，並於大學時期進入文壇。

六０年代女性散文，新崛起者仍以外省籍青壯輩仍爲多數，歷經戰後百廢待興的生活艱難，本土女性則普遍仍在蹣跚步履中努力掙扎。本土女性多半寫作小說先於散文，由報刊發跡而非文學雜誌，能於六０年代即有名文壇的並不太多。反而是來臺時幼小的外省籍女性，優勢的文化背景（如方瑜、[41]呂大明多人，皆屬家學淵源），使她們較早步上寫作道路。而這之間，張曉風、林文月承襲中國性與古典風格，喻麗清、呂大明銜接上張秀亞的傳統，與劉靜娟、丘秀芷等散文都是崛起於六０年代中後期，並橫跨了七０至八０年代的主流作者。趙雲、張菱舲與李藍，只能算是卻違逆著五０至六０年代寫實傳統，而且曇花一現的旁支。存在時間甚短，卻在臺灣散文發展中有著技巧啓蒙與銜接文學後現代思潮的啓蒙作用。

[41]方瑜的第一本散文為與丈夫合著之《交響的跫音》（水牛，1977 年）。然而她早在六０年代中期即開始發表散文，《交響的跫音》收錄的〈開在風中的紙花〉、〈雨樹上的陽光〉、〈落榜的那天〉諸文皆是。

散文這種文類，一般的解釋是除英美散文淵源之外，另有中國晚明小品、白話章回小說的精神承繼，與新詩、小說相較，受西洋當代思潮影響較小。然而在一九九五年林燿德臺灣當代散文的「追求現代性」之說後，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也提出一個新說法。黃錦樹認爲，六０年代現代主義，其實有兩個基本型，一稱「中國性－現代主義」，另一型即爲「西化（翻譯）－現代主義」。[42]對比於後者（以小說新詩爲主）破碎支離的敘述邏輯。「西而不化」、「破中文」、「小兒麻痺」體（王文興）加「搖頭丸」體（舞鶴），六０年代的散文表現，以余光中爲首，加上張菱舲等女作家，「善性西化」的文字，加上中國的優位性，意識上向古典主義回航，無疑是趨近前者（「中國性－現代主義」）的。在二００三年〈嘗試文、美文與現代散文〉中，黃錦樹更指出，六０年代所稱的「現代散文」，事實上近似於歐洲現代文學語彙中「散文詩」。[43]等同於部分回應了余光中、張菱舲詩人散文的風格。

散文的「中國性」與「言志」（抒情）傳統，相對於小說的「他者性」（otherness）與「載道」（主題），前者有較多個人性情，後者則重社會歷史脈絡。臺灣六０年代現代散文，所移用的現代主義技巧，到底是「中國性－現代主義」，還是「西化（翻譯）－現代主義」？黃錦樹所謂「中國性－現代主義」，是否適合用來規範或說明此一時期女性散文創作的特質？

本文前已說明六０年代女性散文的異質聲音，與作者的世代交替意義，以下即針對深受顯現代主義影響的女性散文作家趙雲（1933-）、張菱舲（1936-2003）、李藍（1940-），再作深入的挖掘，並試著回應此一觀點。對三位女作家的散文，除六０年代所寫作之外，盡可能兼及其後作品或不同文類，冀能還原其整體原貌，並對文學史的完整再作添補。

貳、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女性散文三家

一、趙雲（1933-）：實驗電影與小說的越位

在《文學雜誌》停刊後，一九六０年《現代文學》隨即接續了譯介西洋文學理論及文本的使命，和一九五九年創辦的《文星》、《筆匯》、一九六六年的《文學季刊》、一九六七年的《純文學月刊》，共同推動了六０年代現代主義文學風潮。當時佛洛依德的分析學說、法國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哲學思潮，影響所及，遍及一切繪畫、音樂、舞蹈、電影及文學等各種藝術表現。內在精神

[42]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2001 年 6 月，政大中文系「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收入《謊言與真理的技藝》（臺北：麥田，2003 年），頁 5。

[43]黃錦樹，〈嘗試文、美文與現代散文〉，東吳大學「臺灣當代散文」研討會論文（2003 年 10 月），頁 5-8。

上表達孤絕、荒謬、扭曲，外在語言美學趨向解散、挑戰。在這樣的風潮之下，能將實驗電影和小說的技巧轉化或越位到散文寫作的趙雲，就是在當時一個特殊的例子。

趙雲，本名趙馥雲，與林文月同齡，原籍廣東省南海縣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於越南，歷經戰亂與貧窮，是一個從僑居地來投奔祖國文化的僑生。臺灣在她的心中的「重生」的意義，可能和從上海回歸母土臺灣的林文月不大相同。在湄公河畔，趙雲有著一個卡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現代啓示錄」一般的童年，如同「在無月無光的漫漫長夜裡」。這段可怖的童年經歷，在趙雲〈恐怖的夢魘〉一文中，有極爲真切的描述。[44]二次大戰期間，她的家鄉被日軍侵佔，而後接連而至的是越戰、越南獨立內戰。趙雲幼時曾跟父親誦讀唐詩，而後又隨一位老塾師讀滕王閣序、杜詩，後逃難到鄉間，煤油燈下讀《駱駝祥子》、魯迅、冰心、曹禺。父親早年擔任越南報館裡的總編輯和總主筆，對趙雲的文學生涯多少有著啓蒙作用。

發表於越南當地《自由太平洋月刊》的〈紫海〉一文，應是趙雲最早的一篇作品。[45]當時大約爲五０年代中期，越南局勢混亂，她身爲華文報社新聞記者，眼見著紙醉金迷的西貢和堤岸仍然城開不夜。這段經歷，在趙雲的散文〈昨日之歌〉、〈湄公河的輓歌〉、〈尚未遺忘的片斷〉諸篇中，特別有著淡淡的哀愁底色。[46]一九五七年，越南獨立，在極端的排華政策下，趙雲投奔祖國臺灣[47]，入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新聞組，並且認識了藝術系的東北流亡學生王家誠。一九五八年，王家誠（1932-）因趙雲〈星魚〉一文結緣，次年，二人於碧潭結婚，自此成就了人生、文學與藝術的圓。[48]一九六四年趙雲與丈夫王家誠即因工作關係，帶著兩個稚齡女兒王菡、王蓁遷居臺南，趙雲與王家誠二人現已於臺南師院退休，仍持續寫作不輟。

趙雲寫作文類，包括小說（《把生命放在手中》）、兒童文學（《美的小精靈》），與論述（《兒童繪畫與心智發展》）等多種。在臺寫作始於六０年代初，她的散文與小說是同步的。當時趙雲只是一個經濟困窘的師大公費生，在師大圖書館偶爾翻到《自由青年》的徵稿啓示，當時便以越南民間傳說爲題，寫了一篇

---

[44]趙雲，〈恐怖的夢魘〉，《遺落在二十世紀的夢－趙雲自選集》（臺南：供學社，2003 年）。

[45]王菡，〈雲（代序）〉，收入趙雲，《遺落在二十世紀的夢－趙雲自選集》（臺南：供學社，2003 年）。

[46]關於趙雲自述之前半生，故鄉及童年回憶，詳見〈尚未遺忘的片斷〉、〈母親的啟示〉，收入《男孩、女孩和花》（1979 年，九戢，與王家誠合著），〈湄公河的輓歌〉，收入《寄情》。

[47]趙雲曾謂「在越南出生的華裔青年，被強迫著歸化越籍。為了貫徹要做中國人的心願，也為了要追尋生命中的光」，選擇投奔臺灣。見〈昨日之歌〉，《寄情》（臺北：大地，1988 年）。

[48]趙雲生平資料，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全文檢索系統，1999 年《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文建會）亦可參考。王家誠（1932-），遼寧人，曾出版小說集《在那風沙的嶺上》，目前已於台南師範學院退休，近作《溥心畬傳》獲 92 年中山文藝創作獎。

散文〈嘆息湖〉，[49]很快就在當時的主編呂天行賞識下獲得刊登。從此她得到發表與鼓勵，開始投稿報刊雜誌，並與文壇當時盛行的存在主義接上了軌。《現代文學》、《筆匯》這些雜誌都在理論上對她產生了啓蒙。

趙雲於八０年代自述性質的〈隨緣－我的筆墨生涯〉一文，很可以說明趙雲的文學淵源與師承。趙雲曾自述：

> 當時文壇出現了一個花季；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哲學思潮，有如一陣陣醉人的薰風。沙特、卡繆和卡夫卡，把他們的哲學思想融會到文學作品裡，使我獲得很深的啟發。《筆匯》與《現代文學》，有系統地介紹世界文壇上的趨向，並經常刊登一些令人心儀的作品。我像一個在沙漠中長途跋涉的旅人，眼前乍然流動著汩汩甘泉，展開一片繁花似錦，我禁不住目眩神迷，迫不及待地吸取心靈的營養。[50]

六０年代，趙雲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散文小說合集的《沈下去的月亮》(1966)，並且是文星書店當時推出的八位新人作品之一。與張曉風《地毯的那一端》、康芸薇《這樣好的星期天》、江玲《坑裡的太陽》、劉靜娟《載走的和載不走的》、邵僩《小齒輪》、隱地《一千個世界》、舒凡《出走》諸作並列，被形容爲「一派耀眼的新綠」。《沈下去的月亮》這本淡綠色的小書，出版未幾，即因文星歇業，「進入了一個長長的休止符中」，[51]至今早已絕版。

短篇小說，無疑是趙雲的文學啓蒙，而且一出手就是成熟度很高的作品。〈隨緣—我的筆墨生涯〉中，她曾自稱：「我喜歡寫短篇小說，短篇小說的性質等於實驗電影，可以容許各種創新的表達方式，創作時，有一種自我挑戰的意味」。[52]

趙雲在六０年代臺北接收到的現代主義風潮是全面性的，這與丈夫王家誠的藝術背景不無關係。[53]同爲優秀小說家的王家誠，寫過〈精神分析學與超現實主義〉、〈現代與繪畫〉、〈生命．無盡的等待－等待果陀的精神世界〉這些論述，[54]也因此他評論起趙雲的小說時尤其精到。

六０年代從繪畫到電影的氛圍，都使趙雲的文字全面跳脫傳統，走上現代的實驗精神。一九六六年《沈下去的月亮》這部趙雲的文學處女作，以現在的眼光

---

[49]趙雲，〈人生舞台的角色扮演〉，《遺落在二十世紀的夢－趙雲自選集》（臺南：供學社，2003年），頁 154。

[50]趙雲〈隨緣－我的筆墨生涯〉，《文訊》，第 39 期（1988 年 12 月）。

[51]趙雲，〈沈下去的月亮〉對此有一自述，收入隱地編《青澀歲月－作家的第一本書》（臺北：爾雅，1980 年）。

[52]趙雲，〈隨緣－我的筆墨生涯〉，《文訊》，第 39 期（1988 年，12 月），頁 239。

[53]見趙雲《歲月流程》，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 年），頁 241-244。

[54]王家誠，《在那風沙的嶺上》（臺北：大江，1969 年）；《守著火的夜》（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 年）。

來看，仍然是一部極優秀的現代主義小說作品，其寫作時間，即與王家誠短篇小說集《在那風沙的嶺上》接近。趙雲《沈下去的月亮》的調性，在當時無疑與江玲《坑裡的太陽》接近，其中除了少數篇章如〈星魚〉、〈男孩，女孩和花〉是爲散文之外，多爲短篇小說，收錄了趙雲於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作品，分別曾發表在《中華日報》、《藝術論壇》、《聯合報》、《師專青年》、《徵信副刊》、《婦友月刊》等刊物之上。

寫作《沈下去的月亮》時，趙雲尚年輕，小說裡反映的世界就已經相當成熟與蒼涼。她寫暗巷中的妓女生涯（〈訪問〉）、湄公河畔一段悲哀的戀情（〈湄公河之戀〉）、雜技團裡的醜惡人性（〈侏儒〉）、巴黎街頭畫家破碎的夢想（〈沒有色彩的城市〉）、中年主婦青春不再的幻滅（〈那失去的〉）、婦產科醫師面對初戀情人生產時的心中魔魅（〈割裂的幻影〉），夜市中的少女徘徊橋上遇一狎邪男子的驚魂（〈沈下去的月亮〉）。趙雲六０年代小說完全體現了破碎扭曲的心靈，猶疑擺盪的人生，不確定的情愛，悲觀幻滅的希望（當時年紀輕輕就北上寫作的少女季季，《屬於十七歲的》也有著與之近似的氛圍）。然而趙雲的文字成熟度極高，使得她所傳達的異形世界不至流於矯情；意識流的技巧，甚且能恰當捕捉心靈的游離恍惚，且不作任何主題的暗示；重疊複沓的行文，往往能加速故事的節奏，並帶起戲劇性的高潮。

例如〈沈下去的月亮〉，就是這樣描寫少女被中年男子誤爲娼妓，差點被強迫拉進旅社時內心的恐慌：

> 她跑著，蛇，滿天的蛇，焚燒的夜，那些屬於都市的喧鬧和人潮，如電影鏡頭般迅速的往後退，她跑著，跑到橋上，橋上的欄杆迅速的往後退，她撫著胸口喘息……。夜仍然清涼，她撫著胸口出神，橋上的星光閃爍，冰冷而巨大的月亮搖搖晃晃的沈下去，長長的光帶在黑暗的濁流中搖曳，……。（趙雲〈沈下去的月亮〉）[55]

《沈下去的月亮》在完全顯現出趙雲早熟敏感的心靈與寫作技巧之餘，也充分預見出她無論是散文或小說創作，都迥異於寫實主義路數。在後來〈荒謬劇場〉一文中，趙雲就曾明白道出自己一貫的創作理念：

> 無論文學或藝術，我一向都不太喜歡寫實主義。因為人生已經夠平凡和瑣碎，在精神領域中，希望能海闊天空的，任想像力自由自在的馳騁。寫實的作品可能具有某種震撼心靈的力量，對我來說，卻成為想

[55]趙雲，〈沈下去的月亮〉，《沈下去的月亮》（臺北：文星，1966 年），頁 158。

像力的限制，所以，我喜歡探索一個超越時空的心靈空間。[56]（趙雲〈荒謬劇場〉）

在夢與真實之間游移，在生存與死亡間拉鋸，趙雲六０年代的小說和散文，均重視心靈內在的探索，生存與死亡的本質。表現在技巧上，接近「超現實主義」，所謂「自動語言」的寫作。重視意象的重疊，超出於日常慣用的語法，而創造出一種足以捕捉那些瞬現即滅的人類意識活動的語言。基本上她呈現的是抽象的世界，而非具象世界。趙雲七０年代結集的《把生命放在手中》中，和《沈下去的月亮》無論主題與技巧都是同一系列之作，只是篇章拉長了些，而文字更爲老到圓熟。一個馬戲團裡走鋼索的搏命者（〈把生命放在手中〉）、獨自帶著滿船幽靈在暴風雨夜航行的荷蘭船長（〈鬼船〉）、荒山上掃墓的人與一則梨園傳奇（〈無聲之城〉）、或守候未歸丈夫一生的棄婦（〈飛魚的夢〉）。[57]趙雲在小說裡，用這樣的開頭，描寫一個老婦魔魘般的夢境：

那條魚冉冉地飛著，斜張著胭脂那樣紅艷的雙翅。滿身鱗片流著細碎的淡綠色的燐光。魚瞪著一雙楞然的巨眼，嘴微微地嗡張著，她聽不到它的聲音，然而他可以感到他在說些甚麼。它就那樣地飛著，斜斜地、慢慢地，從她的頭上掠過來又掠過去，巨大的影子頭在暗青色的天幕上，她展開臂膀，但她無法捕捉得到。…那條魚飛著，忽而遠忽而近，忽而大忽而小，以一種優美的姿態盤旋，淡綠的燐光，燃燒起心坎裏的一些渴望。她急遽地滑行，伸出捉不到，永遠捉不到。（趙雲〈飛魚的夢〉）[58]

除了夢與真實之間超現實主義之間的神秘色彩，受實驗電影不同時空中交織的運鏡手法影響的，又如短篇小說〈無聲之城〉。正如王家誠所分析的，在〈無聲之城〉之中，鏡頭的運用如雙鏡頭，俯瞰、仰視、快速拉遠或推近……以及光、影、色彩、樂器幽細的聲音等等，都在嘗試著想給予讀者視覺、聽覺、感覺和觸覺多方面的效果。〈無聲之城〉一開始，鏡頭從山腰那座墳墓俯視著山腳往上蜿蜒的渺小行列，然後逐漸推近，終而看清了行列中的個人。第二段「遺落的籃子」，是從「山腳下望上去」，鏡頭隨著人群移向山腰。第三段「輓歌」，鏡頭是從遠

[56]趙雲，〈荒謬劇場〉甚且說自己看戲亦同，不喜歡看太生活化的，比較喜歡抽象舞台上的粉墨乾坤。收入《遺落在二十世紀的夢－趙雲自選集》（台南：供學社，2003），頁 146。

[57]引自趙雲，《把生命放在手中》（臺北：大江，1975 年）。

[58]趙雲，〈飛魚的夢〉，收入趙雲短篇小說集《把生命放在手中》（臺北：大江，1975 年），頁 121。此文以小說體裁，寫趙雲庶祖母的一生。在散文集《寄情》中，〈寄情〉一文對此曾有解說。

距離的全景，慢慢地搖著：山頂的霧，天空的食屍鳥，喪幡……然後快速地落在膜拜的行列中。[59]

這種飄忽傾軋的精神異狀，多線交織的敘寫手法，和無終無始的情節，對照著人的存在與價值，同時也出現在六０年代水晶〈悲憫的笑紋〉，王文興的〈日曆〉、七等生的〈放生鼠〉、〈精神病患〉和江玲的〈坑裡的太陽〉裏。只是趙雲的短篇小說寫得仍然太少，《沈下去的月亮》（1966，文星）與《把生命放在手上》（1975，大江），這兩本短篇小說集，總結了她六０年代在《皇冠》、《青溪》、《幼獅文藝》、《文藝月刊》上的所有努力。跨入七０年代，她以散文承接了一切。

在寫過如實驗電影的現代小說《沈下去的月亮》、《把生命放在手中》後，趙雲的寫作逐漸出現分水嶺。她自己形容如同「被困在高原上」。年輕時喜歡短篇小說挑戰創新的樂趣，在中年之後，卻逐漸轉向爲用平實的散文寫往事回憶或生活感懷。如果「實驗電影」可以概括她小說的風格特色，那麼，教育、哲理、智慧靈光加藝術品味便構成了她散文的基調。小說與散文，在趙雲的心裡有著不太等同的份量。趙雲曾謂，散文可「直接展示出作者的心路歷程」，在數量上，後來也超越了她的小說。到目前爲止，《沉下去的月亮》（1966，文星出版，散文小說合集）外，趙雲散文總共結集六本：

1、《零時》（1975，大地）

※集《自由青年》專欄文章而成，寫作於 1967 至 1969 之間。

2、《男孩女孩和花》（1979，九歌）

※與王家誠合著。

3、《心靈之旅》（1988，文經）

※高雄《新聞晚報》專欄。

4、《寄情》（1988，大地）

5、《歲月流程》（1996，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6、《遺落在二十世紀的夢－趙雲自選集》（2003，供學社）

這六本散文，寫作在六０年代前後的，只有《沉下去的月亮》的數篇與《零時》。然而她的所有散文作品，都符合自己小說技巧的意識流手法，與時空交織如實驗電影的情境。她的作品雖取材自自身經驗，卻往往任想像力馳騁其間，而讀者也隨之進入一個多次元的異想世界。她的散文早期在意念上受沙特存在主義影響較大，後期則把現代主義小說技巧融入散文中，表現更爲圓熟靈動，理趣兼備。就主題而言，不外三者：童年流離往事的追憶、婚姻生活與藝術美學，與教育理論加哲學思考。〈大樹與盆景〉、〈挨罵的雞〉、〈讓路給小鴨子〉、〈半

[59]王家誠在趙雲小說集《把生命放在手上》一書序文中，對趙雲早期小說的現代主義技巧剖析甚詳。

身的天使—肯尼〉[60]這些篇章，當然都是教育理論。雖然也頗有專業的洞見，但要見識她散文中的真性情與藝術美，仍在於童年往事與婚姻生活，這恐怕也是趙雲散文最不可取代的價值所在。

趙雲寫於六０年代現代主義時期的散文《零時》，從復興中華文化到兒童教育，無不措意，整體看來，論理過多，情味稍欠。〈零時〉指死亡與新生的午夜，尼采、佛洛依德加沙特，直如存在主義哲學大全；〈英雄〉是老人與海、凱撒大帝和亞歷山大；〈幸福〉則是舉格林童話，以知足爲幸福青鳥的網。直到一九七九年與丈夫王家誠合著的《男孩女孩和花》，趙雲忽然如同改變書寫策略般的，換了一副平實自道的面目。這部書，是極少數成功的夫妻合著的情味散文。兩人文章不但等量齊觀，且桴鼓相應，既有各自抒發性靈之處，又有整體的和諧性。趙雲的〈白頭偕老〉固然妙趣橫生，二個齜著白森森牙齒的假骷髏並陳在桌上，揭開了夫妻結縭多年的首章，王家誠的〈時光隧道與吊橋〉亦不遑多讓，把二人性格的南轅北轍、反常合道，發揮得淋漓盡致。接下來的〈鄉居〉、〈屬於我的晨光〉，同是美好的〈田園詩篇〉。〈男孩、女孩和一朵花〉寫戰亂人生的體悟，「在荒涼如沙漠的心中，不會有花和孩子」，展現了趙雲典型教育家與母親的溫柔與剛強。

她的散文自敘傳風格和現代主義手法，其實從《男孩女孩和花》的後半〈尚未遺忘的片斷〉即已悄然成形。《男孩女孩和花》出版於一九七九年，全書以夫妻接力寫的方式，構築出亂離時代中二人的流落與遇合。《寄情》（1988）中的〈寄情〉、〈紅塵〉、〈故鄉〉、〈昨日之歌〉、〈湄公河的輓歌〉諸篇，將此一主題，又做了深化的發揮。到了後期散文《歲月流程》的第一部分「蝶夢」更擴大深化，加上親人憶往，趙雲散文的技巧筆力，均更勝於前作。

散文集《寄情》一書，書中的〈紅塵〉，基本上和〈寄情〉一樣，都是分韻分題的寫法。〈寄情〉以「玉環」、「紅寶石」、「瓶」寫庶祖母、母親、丈夫，物件牽動著人事情緣，表白甚露。〈紅塵〉的稍勝一籌在於「冬夜」、「江湖」、「鐘聲」中，雨絲和燈光交織成一面密密的網，實景與回憶如同電影蒙太奇一般疊合起來。她可以把自己、廣場上唱歌仔戲的女人、丈夫回憶中北京天橋賣藝的女子、灰色天空中孤獨掙扎的美人風箏，用浪跡天涯統合起來；一座小小的山中教堂鐘樓，穿越時空，譜出戰爭、死亡與救贖的悲涼。沈悒的底蘊和曼妙的情采，構成絕佳的藝術質感。現代主義的時空位移、多線交叉、超現實、意識流技巧，甚至電影運鏡手法，早已穿透小說，偷渡進了趙雲的散文之中：

> 醉在香霧裡，彷彿墜進煙雨迷濛的山裡，金露花在岩壁上綴起了串串淡紫；無聲的溪流；潔白的野薑花如展翅欲飛的蝶，抖散開縷縷幽香。

[60]引自趙雲《心靈之旅》（臺北：文經，1988 年）。

> 整個軀體，似乎已變成透明而流動的霧，溶進了花香和夜色中。
>
> 深深地吸一口氣，今夜的路燈也有點醉眼朦朧。一隻流浪狗拖著牠的影子，茫無所之地走進了陰影裏。（趙雲〈紅塵〉，《寄情》）

趙雲所用的語言，基本上已不是傳統小說的語言，而是接近現代詩的小說語言。趙雲早期小說〈沈下去的月亮〉就有過這樣的描寫：「冰冷的月亮沈重的搖晃，橋上面有燈光，把人的臉孔照得像死屍一樣的燈光。」而趙雲散文裡表現超現實的語言，和小說是一樣的。她喜歡寫夜，長巷中有低沈的梆聲，微雨的路旁，街燈昏黃。在後期散文集中，也多有這樣詩化的語言：「花車輾碎了笑聲」、「無助的瞪著滿屋子凝固了的燈光」[61]、「死的氣氛、宛似章魚可佈的觸手，從每一個角落中延伸開來」[62]、「冬夜是一塊凝固的冰，月亮漠然的凍結在玄色夜空」。[63]

一九九六年的《歲月流程》，算是趙雲較晚期的散文了。其中，〈擺不脫的長巷〉如一首回憶組曲，是趙雲散文中極重要的篇章。在這篇寫她童時回憶與庶祖母的散文中，表面上說的是二個祖母的悲劇命運，事實上對照著長巷中妓女的處境。同一天空下生活著兩種女人，一種必須守候著一個男人即使他已經死去，一種則是在許多不同男人中生存下去，她們吟唱的是同一種悲歌。「一格格灰色的抽屜」，成爲一組銜接的意象語，是祖母的妝檯，是人生，也是居所。「我們那灰色的房子，是長巷中的一格抽屜，整條長巷被遺忘在一個稱作蕉風椰雨的異鄉裡」。戲台上的歌妓，唱著冷冷的哭調，「像一把很鈍的鋸，鋸著那些笑語」，趙雲〈擺不脫的長巷〉收束時的手法，離奇一如電影慢鏡頭的變化。

> 我驚奇的感到那歌妓的神情如此的熟悉，冷冷的，在一格格灰色抽屜裏，祖母以這樣的神情凝視著那男人的遺容…鈍鋸慢慢鋸著，黑衣的女人，出沒在夜中的，魅影裏那些慘白桔紅的臉，陰影逐漸逐漸膨脹，把那些褪了色的及如同面具般的慘白臉孔包容進去，一點點地溶化，隱沒。（趙雲〈擺不脫的長巷〉）

「連祖父的臉都還未見清就守寡了」的庶祖母。還不到二十歲的如花少女，背負著沉重的歲月枷鎖終老。趙雲〈飛魚的夢〉以小說筆法這樣形容：「棕色的蛾癡情的撲擊燈焰，支離破碎的翅膀，閃開一點點銀色的光澤」。等同於另一個

[61]趙雲，〈擺不脫的長巷〉，《歲月流程》，頁 23。
[62]趙雲，〈湄公河的輓歌〉，《寄情》，頁 73。
[63]趙雲，〈浪漫之必需〉，《心靈之旅》，頁 58。

母親的庶祖母，幽居終老的庶祖母，是一個黑洞洞永遠無法忘記的夢魘，正如周芬伶的〈素琴幽怨〉，一個飄忽蒼白的鬼影，在魂夢間遊蕩著。

作爲六０年代現代小說的先鋒，趙雲以後來散文的寫作，承接了現代主義時期的精神與技巧。正如七０年代以後寫《夜歌》、《攝氏 20－25 度》等散文集的季季），她也是在六０年代抓住了現代主義時期的尾聲進入文壇的。季季的散文走寫實風，完全與其早期小說的疏離冷漠不同，在季季筆下，似乎總有一個「月亮背面」的女性背影，正在做一步一步艱難的跨越。而長夜漫漫，趙雲的長巷中有低沉的梆聲，微雨的路旁，街燈昏黃，那沉下去的月亮，如同她深沉的眼眸，幽幽的凝視著永恆的歲月。

二、張菱舲（1936－2003）：余光中散文理念的實踐

在六０年代現代主義時期的女性散文中，張菱舲可稱最浪漫的一段傳奇。揉合現代詩的超現實感，迴旋曲般的音樂性，她的散文將文字的彈性、密度發揮到極致，在出版過《紫浪》、《聽，聽，那寂靜》、《琴夜》三本代表作之後，一九七０年赴美，旋即在文壇上消失了蹤影。在台灣 SARS 肆虐的二００三年春天，張菱舲以六十六之齡悄悄病逝紐約，留下了許多尚未發表的詩文。二００六年，由妹妹張菁菁整理付梓的散文集《外太空的狩獵》，就是張菱舲後期在美作品。這是另一個幽閉隱居的張愛玲，還是抽屜中留下大量詩稿，並預知自己必將傳世的艾蜜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呢？

《外太空的狩獵》集〈外太空的狩獵〉、〈自化〉、〈意象〉三篇長文，兼而有小說的趣味、迷宮的佈局，比起她早期散文，顯有進境。三篇散文的主軸隱然互相連接，道出她後期寫作的執念－對美國現代作曲家 Phlip Glass 的全心傾慕，與無盡的追尋。[64]〈自化〉、〈意象〉文字高度重疊，更形成了囈語般循環往復，如迴旋曲一樣的特殊結構。保留了她早年散文特色，更增添了內在心靈的探索，溯象徵主義與唯美主義的小溪而上，造成和弦、重唱的節奏律動效果。書末附錄的詩人張錯〈食蓮人〉一文，[65]以〈食蓮人〉喻張菱舲之遠遊未歸，並提及多年來曾欲探訪，「但總落空」。二００一年在紐約一場鄭愁予主持的詩歌討論會中，張菱舲曾端坐聽眾席上，望著台上的焦桐、陳義芝、許悔之諸人，當時認得她的人已經不多了。

---

[64]張瑞芬，〈狩獵月光－張菱舲和她的詩情散文〉，張菱舲《外太空的狩獵》序文（臺北：聯合文學，2006 年）。

[65]張錯（張振翱，1943-），〈食蓮人〉，追懷張菱舲及六０年代文壇諸友，《中央日報》（2003 年 5 月 20 日），收入《靜靜的螢河》（臺北：三民，2004 年）。六０年代中期，張菱舲正以〈食蓮〉一文作為張錯第一本詩集《過渡》序言，余光中《蓮的聯想》自序〈蓮戀蓮〉，也引用了這個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的詩作典故。

「張菱舲」這個名字再被提起時，是二００四年十一月，仍是一則傷悲紀事，著有《被遺忘的南京大屠殺》，被大陸譽爲「華裔楷模」、「人權鬥士」[66]的三十六歲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因憂鬱症飲彈自戕，轟動美國華裔社會。各種報導，都說到了「她的外祖父張鐵君是有名的政論家，她的一位姑姑是專欄作家（張菱舲）」。[67]

這則報導，事實上未盡正確，張菱舲是張純如的大姨而非姑姑。張家共五個子女，張菱舲爲長女，而下依序爲大弟錚錚、大妹盈盈、小弟彬彬、小妹菁菁，張菱舲在一九六八年〈寫給七十歲的爸爸〉一文即曾提及。[68]張純如正是張盈盈之女，也就是張菱舲的外甥女。張純如的外公（張菱舲父）爲張鐵君，[69]原爲知名報人，曾任《中華日報》總主筆，抗戰時期參加過國民政府的工作，當年曾身陷南京，親見南京大屠殺。這段家史，間接促成了華裔第二代的張純如寫作此書的動機。

說張菱舲睽違臺灣文壇三十年，倒也不盡然。她的文稿雖少，九０年代仍偶見發表於報刊。一九九一年，在初安民編輯的《聯合文學》七卷四期中，還以「重出江湖」爲標題，編者隆重以「二十多年前名揚一時的女作家張菱舲」介紹她，並推崇她的近作小說〈螺絲轉彎〉寶刀未老。在〈螺絲轉彎〉這篇寫於紐約的小說裡，我們可以見到張菱舲以寓言童話的幻設之筆寫紐約海港，文字仍淒美詩意，一如往昔：

> 整城黃昏的禮服－我著上，舒適而又安逸。長長搖曳的裙裾繞明麗的河水繞飾於裙邊上，與長髮呼應。如果有微風撩拂髮際，就會像在白晝有霧氣的某些瞬間，或午後天氣突然轉變，自清水街頭到華爾街上，輕拂的霧氣嚐起來，帶點海鹹，也帶點海洋碧草的藻味，綠綠水性透亮的綠藻，總飾我長長的髮絲以仙氣，吹起聊撥到所有忙碌的心意，如一次戲謔。[70]（張菱舲〈螺絲轉彎〉）

---

[66]張純如 1968 年生於美國，母張盈盈，父張紹進，1967 年雙雙獲哈佛博士學位。張純如研究南京大屠殺始於 1994 年，成書於 1997，曾獲《紐約時報》蟬聯 14 週暢銷榜單。張純如過世後大陸為之作雕塑紀念，父母亦為她成立了「張純如紀念基金會」。

[67]引自《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 年 12 月 7 日），及其他相關網路報導。

[68]張菱舲，〈寫給七十歲的爸爸〉，1968 年寫，收入《聽，聽，那寂靜》（臺北：阿波羅，1970 年），頁 54。

[69]張鐵君著有《今儒學的心物論》、《今儒學的伐交論》、《今儒學的理欲論》、《今儒學的太極論》、《革命的原理與戰略》、《國父思想概要》。1972 年且由阿波羅出版過《蓬然夢覺錄》。

[70]張菱舲，〈螺絲轉彎〉，《聯合文學》，7 卷，4 期（1991 年 2 月），頁 122-129。原稿以英文作於 1982，中文定稿作於 1988。作者後記說明，「螺絲轉彎」是她滿周歲時，家住南方的清溝灣螺絲轉彎村。此文記紐約風景甚美，曾被《紐約時報》畫成插圖刊載。

張菱舲對水、漩渦、海浪、長髮、月光意象之執念，從早期散文到九０年代新作，依然層疊往復，內在結構精整，一如往昔。她的文字，完全不是白話口語的平易，而是充滿節奏感、意象式的詩語言。一九九四年〈朔望〉這篇抒情詩一般的美文，像與〈螺絲轉彎〉文字呼應，更加發揮得淋漓盡致：

> 霧昇起來，捲過海灣，掀起默然，像春天那樣揮灑我的長髮。…已枯萎了的月亮，清瞿的星辰，Rader 永夜的海洋裡，漸濛漸稠的波浪。現代的荒涼與夢魅，古典的美與深邃。 現代的美，古典的枯萎。永夜延續，白晝燃燼。整座島嶼的深情，兩個世紀的美。我撩起 Philip Glass 樂音，晾在月光中，晾在我長長的髮絲之間，那裡，大西洋的水族在其間流浪，追逐星辰。（張菱舲〈朔望〉）[71]

一九九一年，張菱舲還曾爲旅居紐約高齡九十二的父親張鐵君新書《國父理則學釋義》寫序。[72]一九九四年，張菱舲寫的英文詩，被國會圖書館的詩歌圖書室選入詩選，並由專家朗誦錄音保存。[73]在九０年代前後，張菱舲發表的詩文另如〈一束樂音－爲美國現代作曲家斐立普・格那斯作〉（《聯合報》1988.1.8）、〈獻給九十歲的父親－亦爲 Philip Glass 及天下所有多情的父親作〉（《中央日報》1988.7.19）、〈自然而然〉（《中華日報》1992.11.23）、〈畫旅〉（《幼獅文藝》1990.5 月）、〈畫舞－記俄國天鵝湖芭蕾的古典現代畫意〉（《幼獅文藝》1994.6 月）、〈朔望〉（《幼獅文藝》1994.11 月）、〈悲丑〉（《世界日報》副刊）2002.6.16）。張菱舲近年的未刊稿亦多，詩作〈天地蜉蝣〉、〈船歌〉、〈氣象〉、〈綸音〉均作於二０００年至二００二年間，精美已極，兼有讖語悲情，尤其令人感喟。[74]

張菱舲創作上真正的空窗期，約爲一九七０年赴美至一九八七年間，整整十七年，完全呈現停頓狀態。在一九七０年去美的飛機上，她還寫就一篇情文俱美的〈雲行於「七四七」弦上〉，一九八七年後，才再度恢復寫作，承接著寫了一〈浩浩然三千里滑弦〉。[75]在六０年代臺灣文壇創作量曾經豐沛的她，到底經歷了創作或人生上的什麼困頓，遂成爲一個無人能解的謎。二０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一封張菱舲具名親筆書寫的短函上，曾作了如下的自我簡介。這很可能是

---

[71]張菱舲，〈朔望〉，《幼獅文藝》（1994 年 11 月）。

[72]見《中華日報》，1991 年 4 月 18 日報導。

[73]見《中華日報》副刊，1994 年 2 月 1 日報導。

[74]張菱舲在美創作之未刊詩稿與文稿甚多，多寫於九０年代，目前正由妹妹張菁菁整理，並預計出版中。

[75]〈雲行於「七四七」弦上〉寫於 1970 年 8 月，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1 年 3 月 10 日）〈浩浩然三千里滑弦〉，載於《聯合報》（1987 年 11 月 16 日）。

張菱舲去世前三個月，回顧一生，所寫的最後小傳與第一手資料，在說明她的文字風格上頗爲重要，今全文具錄如下：

> 我一生的黃金時期，自然是二十一歲剛進臺北中華日報初為藝術記者，並承『文星』出版社蕭孟能先生兩次親自來看我，出版了我第一本抒情散文短篇小說集《紫浪》的六０年代。一九七０年八月二十日足履美國土地，為駐紐約特約記者後，在艱苦奮鬥之中，終於能以英文發表詩作，也算一次小小的勝利了！
>
> 在紐約近三十三年來，東山再起發表詩文的一九八七年前後，曾寫下並發表了許多篇章，也以中文以詩的形式寫作，而仍以續寫我詩情抒情的散文為己任。但忽然發現生命已在餘燼之中，逐漸熄滅之際，我最後的盼望是：我多情知音的讀者與評論者，能予我『抒情散文家詩人』的肯定。
>
> 當我終於安息於父母身旁的那一天，仰望宇宙洪荒悠悠絕望裡，我曾仍然保持著愛與希望。[76]

張菱舲希望自己能稱爲「抒情散文家詩人」，而她也的確是的。余光中於六０年代的散文革新，主張散文應兼具質料、密度與彈性，張菱舲在六０年代，就出入於音樂、舞蹈等不同藝術間，以優美的散文作了承接。當時相應於現代主義的散文革命，發端於余光中寫於一九六三年的一篇文章〈《左手的繆思》後記〉。余光中所謂的「現代散文」，其實就是對比於五四白話文的革新。在這篇小文中，余光中提出了「我們有沒有現代散文？」、「我們的散文有沒有足夠的彈性和密度？我們的散文家們有沒有提煉出至精至純的句法和與眾迥異的字彙？」這些質疑。他並且以「有聲，有色，有光；應該有木簫的甜味，釜形大銅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樣的光譜」，形容他心中「現代散文」的形貌。一九六五年的散文集《逍遙遊》後記，余光中又「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對散文革命作了第二波說明。

彈性、密度之說，和同時發表於《文星》的〈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桴鼓相應，都是一九六三年（余光中歷經兩次新詩論戰之後）的事[77]。《逍遙遊》作爲余光中繼《左手的繆思》之後的第二本散文集，等於是用創作詮釋了自己的主張，

---

[76]此份張菱舲親筆函，資料兩頁，由張菁菁自海外親自郵寄提供，收入張菱舲《外太空的狩獵》。

[77]余光中參與的兩次新詩論戰，一是 1959 年面對言曦（邱楠）的質疑，一是 1961 年面對洛夫的「天狼星論戰」，相關現代詩論戰部分，並見《掌上雨》（臺北：文星，1964 年）。

同時也承接了他對現代詩傳統與現代兼具的理想。這段文字中，也可以見到余光中所謂速度、密度、彈性的文字，並未完全西化，仍然兼顧了中國性的特質。從他很偏愛的〈鬼雨〉、〈莎誕夜〉、〈塔〉諸作，可以看出他在聲音、氣味、顏色、節奏、質感（或許再加上典故）的講究，的確踐履了自己的理念。一九六九年，詩人白萩於〈《天空象徵》後記〉，主張白話文是青澀而不成熟的，只達到表意的程度，缺少詩的飛躍性。「我們需要以各種方法去扭曲、捶打、拉長、壓擠、碾碎我們的語言，試試我們所賴以思考賴以表達的語言，能承受到何種程度」[78]，此即發揮余光中之說而來。現代散文的革新在六０年代，因應時代全面性的去舊佈新而被提出，相應的好作品，除余光中本人之外，仍甚寂寥。張菱舲的散文，在詮解余光中散文的理念上，應是一項有力的說明。

張菱舲原籍雲南省昆明市，生於一九三六年，爲家中長女，原名「粼粼」，後易爲「菱舲」，早期筆名「菱子」、「圈圈」皆緣此而來。以年代論，與徐薏藍、程明琤同年，是來臺第一代女作家年幼一輩。生於南京，歷經鄉下躲警報與戰亂的童年，與家人一路逃難，歷經桂林、柳州、貴陽、廣州，而後至香港、台灣。張菱舲稱，「到達台灣那一年，我已經十二歲」[79]。交錯的記憶裏，時時有揮之不去的夢魘與恐懼。疾病與死亡，猶如生命中最大的陰影，一直籠罩著她。如〈紫浪〉這一篇自敘傳中篇小說裡，[80]稻草墩，皂角樹林，和四月間蠶豆花掀起的紫色波浪，與墳坑裏露出雙腳的死人，共同構築了張菱舲童年的惡夢。

文山高中畢業後，張菱舲就讀淡水英專，未幾即輟學擔任報社記者。在第一本書《紫浪》自序中，她自稱在困惑的十七歲裏，曾一度醉心浪漫主義，「夢遊在浪漫主義薔薇色的氣氛裡」，找尋一種「典型」。後來使她躍出泥沼的，是「現代詩，後來是現代畫，現代音樂，和所有的現代藝術」。張菱舲稱自己是「從詩與音樂藝術世界，找到美感以消去現實醜陋的一面」，「以散文的形式，詩的語言，與現代的變化創新」，寫下龐大的篇章。[81]一九六四年，張菱舲並曾是皇冠簽約的基本作家十四位之一，當時這十四位，包括司馬中原、朱西甯、聶華苓、華嚴、張菱舲、瓊瑤、段彩華、季季……等。次年季季與楊蔚於皇冠諸友見證下，於宜蘭北勢溪鷺鷥潭舉行婚禮，[82]張菱舲正是女儐相。一九六五年皇冠同人於臺北近郊情人谷野營，張菱舲〈那夜在谷底燃燼〉以淒美迷離的文字，描述了當時情景：

---

[78]白萩，〈自語〉，（《天空象徵》後記），《現代詩散論》（臺北：三民，1972 年），頁 87-88。

[79]引自張菱舲《紫浪》（1963 年，文星）自序。

[80]〈紫浪〉，是張菱舲少見的中篇小說，寫成於 1963 年，發表於《文星》，後收入《紫浪》（臺北：文星，1963 年）。此書列於文星叢刊之十八，為小說散文合集。此書並獲 1968 年救國團優秀社會青年的「青年作家獎」。

[81]張菱舲，〈自然而然〉，《中華日報》（1992 年 11 月 23 日）。

[82]季季，〈鷺鷥潭已經沒有了〉，《印刻文學生活誌》（2004 年 4 月）。

> 他們聽到一卷長髮的漩渦裡有春天的聲音，在沿著結於髮邊的淺紫緞帶溢出來…獨坐河畔，聽你吟班強生的抒情詩緩緩從水裡流淌，飲盈盈眼波的句子，小情人神話的窗口流過月光的句子…赤雙足嘩嘩划風，將夜踢入河裡，河水凝固，凝住短暫，凝住永恆，凝不住那夜聽貝殼裡愛琴海柔柔的潮音。（張菱舲〈那夜在谷底燃燼〉）[83]

余光中於六０年代，曾稱美張菱舲對傳統的句法最具抵抗力，也頗受現代詩和現代畫的影響。在爲張菱舲《聽，聽，那寂靜》所作的序言中，余光中指張菱舲散文是一種新散文體，「生動而且灑脫，無論在句法、節奏、意象，或詞彙各方面，都予人一種創新的感覺。而最大的特點是，對於文字的彈性，發揮到甚高的程度，便於作各種新的試驗。也就是說，抽象和具體的界限被打破了，而文字的功能，遂呈多樣化。」對她的評價是相當高的。

張菱舲的散文棄絕寫實傳統，打破抽象和具象的界限，以〈那夜在谷底燃燼〉來看，「赤雙足嘩嘩划風，將夜踢入河裡」，已經與詩句無別，「彈性」、「密度」甚高。這種散文的現代風格，在同輩女作家之中並不多見。然而張菱舲的文字，也有過不成熟的青澀期。她最早的創作多爲短篇小說，據《紫浪》所收錄，約始於一九五八年〈流浪者〉、〈金雀花〉，其次是一九五九年的〈黃昏的狩獵〉、〈哦哦，戲已經完了－懷念一位異國歌手〉、〈一粒微塵〉、〈逝去的瞬間〉、〈尖屋頂下的喜劇〉諸篇。早期小說甚且帶有一些過於歐化的句型，例如〈黃昏的狩獵〉寫一個鄉野傳說的捉姦情事，文字明顯冗贅，且西化得頗「惡性」：

> 老頭溜進秦家後門的那天黃昏，炎熱已經退去，天空是深藍的，有橘色的雲，那個漂亮的，強壯的，愉快而輕浮的年青人的妒嫉的妻子，帶著老跛子來到河谷，…。（張菱舲〈黃昏的狩獵〉）[84]

然而，這樣西化而夾纏不清的文字，在她稍後的散文中便極爲少見。一九五九年從淡水英專休學後，張菱舲即擔任《中華日報》執行編輯與藝術文教記者，直到一九七０年赴美，共達十一年之久。出入於畫廊、演奏會與文學會場之中，訓練出張菱舲即席寫作的快手與捷才，在《琴夜》一書序言中，張菱舲即自稱即使在車站中，將稿紙貼在窗玻璃上寫，一樣可以完成。整個六０年代，張菱舲在臺北文壇以「美與靈性」的組合令人驚豔。據詩人張錯〈食蓮人〉回憶，當時張菱舲主編的「華副」幾乎每日都有詩作，推動現代詩不遺餘力，張菱舲對文學藝術與畫家動態報導甚多，由於文字優美，藝術氣息濃厚，即使是報導也如一篇篇

---

[83]張菱舲，〈那夜在谷底燃燼〉，《聽，聽，那寂靜》，頁 8。此文與〈待月草〉曾收入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新文學大系 1949-1976》「散文卷二」。

[84]張菱舲，〈黃昏的狩獵〉，《紫浪》，頁 61。

抒情散文。張菱舲昔日記者同事朱小燕也曾於〈紫浪中的菱舲〉，回憶張菱舲當時玉立亭亭的風采：「她秀髮披肩，上面繫了一枚黃色蝴蝶結，身上穿件黃色迷你洋裝，修長的身段修長的腿，舉手投足間，散發出一份少女的清純」。[85]

六０年代初，由於結識當時主編《文星》的余光中，張菱舲的作品開始在《文星》發表，由於余光中與社長蕭孟能的關係，她的書都與《文星》結下不解之緣。《紫浪》固然是由文星出版社出版，《聽，聽，那寂靜》、《琴夜》亦然。「阿波羅」，即「文星」的音譯。在張菱舲出國前，所有作品原預計三冊結集，而後《行吟的時光》因故未能付梓。這三本六０年代散文，再加上近日結集出版的遺作《外太空的狩獵》，總計四本：

1、《紫浪》（1963，文星）散文/小說合集

＊此書〈流浪者〉、〈黃昏的狩獵〉、〈紫浪諸篇〉爲小說，其餘十八篇均爲散文。

2、《聽，聽，那寂靜》（1970，阿波羅）

＊此書副題爲「菱舲散文集之一」，書前爲余光中序文，後記爲林懷民所寫。作者自序云：「西行前夕，爲三本書序」

3、《琴夜》（1971，阿波羅）

＊此書副題爲「菱舲散文集之二」，書前作者作序，時已在紐約。

4、《外太空的狩獵》（2006，聯合文學）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聽，聽，那寂靜》這本散文集的作者自序，副題作「西行前夕，爲三本書序」，除以上二書，曾有一本《行吟的時光》標明爲「菱舲散文集之三」。這本書據作者自稱，是一本詩情談畫散文，之後卻因故未能出版。《聽，聽，那寂靜》序言文情俱美，除了對以往十一年來報社記者生涯的難捨，對昔日好友朱立立（荊棘）、江玲、余光中的懸念，還有去國的決絕心情。正如張菱舲散文一貫的朦朧恍惚，迷離於夢境與真實之間的情境。出國前夕的心情，她寫道：「春日已過，夏日，蜜蜂將雲遊去了。我必須壓滅輕浮的嚮往，去登臨我的月亮。無風無雨，穩住億萬兆噸的靜寂，無生無死，一片淨土，有若磐石。」夏日、月光與沈重的寂靜，她的文字中永遠充滿著隱喻與象徵。

張菱舲的散文，從《紫浪》起，就有循環往復，如迴旋曲一樣的特殊結構。〈止於春天〉[86]一文即爲典型。在注滿春日的城市漫步，「一個老太婆在叫賣春天，叫賣著一盆盆孤寂的春天」；坐在博物館台階上看蓮池，「滿池塘的睡蓮葉片在下面，滿裙兜的風掀著頭髮，我坐在此，像一尊被塑成的快樂王子，無望的望著那個亮柔光的窗子，等待著燕子…」。植物，蓮花，春天，王子/燕子（希望/絕望，無望的望著）等意象不斷重覆，直到曲終。層層疊疊，如蓮的千指，

[85]朱小燕，〈紫浪中的菱舲〉，《臺灣新生報》（1993 年 7 月 22 日），後易名〈張菱舲的紫浪，充滿童心與美感〉，《世界周刊》（1993 年 8 月 15 日）。

[86]張菱舲〈止於春天〉一篇寫於 1963 年，先收入《紫浪》，後時隔七年，又收錄於《聽，聽，那寂靜》中，足見此文對張菱舲而言，頗具特殊意義。

握不住一個夏天。無怪乎當時就讀政大的小友林懷民，對張菱舲的評語是「不常寫快樂的作家」，從來「不告訴讀者完整的故事」。她只盛一盤朦朦朧朧的夢給你。很柔、很淡、很美的「秋水中倒映的一抹昏黃的光」。[87]

收錄於張菱舲第二本散文集《聽，聽，那寂靜》中的〈聽啊寂靜〉，[88]也是這種迴旋曲式的代表作。結合了詩的抽象、畫的顏彩、以及層層疊疊的精密結構，構成了如長篇組詩的高密度，以及高度象徵的意涵。秋葉，月光，蔚藍海水，詞語間互相衝突的張力，共同構築了這篇林懷民所謂「超現實意味很濃」的意識流散文：

> 傾聽這如死的靜，聽到太平洋正漲潮，藍藍的海水在蒸發成藍藍的月光瀉下來，要淹沒這世界。地面流滿了月光，變得很滑，從大使館出來時，差點跌了一跤。幾片貧血的楓葉，很奢侈的點綴著秋。油彩分屍了那幅畫，陰冷的在藝術館牆上抽象著，風駕女巫的掃帚掃過去，將黑燃起，紅澆冷，橙黃微微哭泣著，哭得非常抽象。
>
> 踩過月光流溼的地面，立於霓紅廣告燈座之下，仰面向數噸虹光，傾聽著數噸寂靜，等待它隕落，等待它墜下來。（張菱舲〈聽啊寂靜〉）

月光流淌，虹光數噸，張菱舲文字充滿反差的張力，與詩的晦澀象徵。在張菱舲的散文中，「月光」如同一個鬼魅的陰影，總是尾隨不去，她甚至用「流著砒霜的冰涼」[89]形容月光。讓人想起張愛玲那「藍陰陰的月亮」，「有著靜靜的殺機」。在余光中大約同時期的詩集《蓮的聯想》中，夏夜、月光和蓮池，作爲重要意象，均曾多次出現。「涉過杜布西淺而冷的月光」、「長長的街道斟滿了月光」、「任月光漂去街的下游」、「用這樣乾淨的麥管吸月光/涼涼的月光/有點薄荷味的月光」、「你泳過多少哩的月光」，以及「去夏已死，去夏的月光/是已經潑翻的牛奶」。[90]對比於新古典時期講求東方精神的余光中，張菱舲當時的文字，正如同女詩人羅英的詩，充滿了冒險的勇氣，與無窮的可能。

以藝術成就來說，除余光中外，張菱舲在六０年代同輩作家中最稱體現現代詩的精神，在她早期散文中，以《聽，聽，那寂靜》最爲貼近她的內在心靈，且最能總結她的超現實散文實驗。最早的《紫浪》，小說之外的十八篇散文，如〈下午的書房〉、〈十六歲趣事〉等多有自傳的意味。較晚的《琴夜》，是一九六九

---

[87]林懷民，〈再讀張菱舲後記〉，收入張菱舲《聽，聽，那寂靜》書末。

[88]張菱舲〈聽啊寂靜〉一文，寫作時間為 1964 年 11 月，是年荊棘、江玲諸好友去美，11 月，余光中亦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出國講學。此文洋溢著濃濃的傷情與愁緒，與同書中的〈風鈴吟〉頗可互為呼應。

[89]張菱舲，〈風鈴吟〉，《聽，聽，那寂靜》，頁 73-74。

[90]引自余光中詩集《蓮的聯想》（臺北：文星，1964 年），頁 19、40、43、49、96、121。

年間採訪各音樂、舞蹈表演的報導，除了少數篇章如〈牧歌〉訪馬思聰，〈把明天送到彼岸〉訪黃友棣爲長文之外，都是篇幅短小的方塊文章，每篇約僅千把字左右。

在《琴夜》中，張菱舲文字之簡潔、標題之精美，幾乎已到了無可增刪一字的程度。如〈雨中有株紅菱〉、〈有朵鬱金香黑而冷〉、〈月光流過典雅〉、〈琴音鏗然〉、〈有神話升起〉、〈越過冬天〉……等。在〈神話夜〉一文中，她以「芭蕾的魔趾，點開五個美得令人欲泣的夜晚，神話的夜，昨晚第一夜」，這樣作芭蕾舞天鵝湖表演的開場，簡直是文字的仙女棒，令人目瞪口呆的文字魔術。這，或許就是余光中所說「一種奇幻的光」，明滅閃爍於字裡行間，「撒鹽於燭，會噴出七色的火花」吧！張菱舲後期在美寫了許多精彩樂評與英文詩，文字明顯比《琴夜》長得多，近期在妹妹張菁菁的整理下，可望陸續發表結集。

在早期《聽，聽，那寂靜》中，張菱舲就有「風從栗樹滴落風聲，刺栗子落下來，擊碎夢」、「聆滿夜星語，淋滿夜星雨」、「過往如複眼分裂我」[91]這樣的句子。類似羅英（1940-）的超現實新詩實驗，卻加上了散文的質感、結構、聲音和顏色光影，對余光中「有聲、有色、有光」、「交響樂的指揮杖」作了完美實踐。張菱舲的散文，形塑於六０年代，成了六０年代現代散文一則最美的傳奇，也是女性散文家在現代主義時期最亮眼的表現。那筆落風神的蓮池仙子，已然隱沒在歲月無邊且巨大的沈寂之下，而她後期的遺作精彩紛呈，勢必將再一次令讀者驚豔。

張菱舲是遠赴異鄉的食蓮人，這美麗的名字也使人有蓮的聯想，像清涼琉璃中擎一支熾烈的紅焰，在一九九二年〈自然而然〉一文中，張菱舲這樣自述寫作於她的意義：

> 我的真我，就是我創作的文學！我以那樣的定力超越了我自己的悲劇性，『以藝術的悲劇超越了生命的悲劇』。超越了一切。[92]

三、李藍（1940-）：張愛玲的現代主義隔空影響

在六０年代，除了學院派以《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爲據地推動的文學革新之外，有一項重視心理幽黯及潛意識的書書寫美學，隨著張愛玲作品的再版來到臺灣，那就是三０年代以來受城市現代主義影響的海派小說，以及和張愛玲文學同時的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日本文壇上稱「新感覺派」的作品。

由於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推崇，六０年代以後張愛玲被引介到臺灣而聲名大噪，影響所及，致有「張派」一系。四０年代活躍於上海的張愛玲，她

[91]引自張菱舲〈碎夜〉、〈蟬蛻〉二文，收入《聽，聽，那寂靜》，頁 90、100。
[92]張菱舲，〈自然而然〉，《中華日報》（1992 年 11 月 23 日）。

一方面受狎邪體舊式通俗小說如《海上花》、《啼笑因緣》的影響，一方面又從西方哲學和文學上得到啓發。在聖瑪麗亞女中和港大唸書時，James Hilton 的《失去的地平線》（The Lost Horizon），以及 S. Maugham（毛姆），A. Huxley（赫胥黎）等人的小說，對她都有過某種程度的啓蒙。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愛玲的現代性，事實上她所表現的文本性格（textuality）不但是都會的，菁英式的，而且是非常中國的。在散文表現上來看，張愛玲接受西方現代主義的精神，卻以純正優異的中文作表達。她不特別凸顯性別／政治議題，反而著重知性與感性的融合，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直觀美學。這種傾向，在學者張誦聖來看，其實較接近一種右翼的思想模式，具有懷舊傾向，並且重新定義了女性特質。這也因此可以解釋，爲什麼八０年代張派的「閨秀作家」如蔣曉雲、袁瓊瓊、朱天文，多來自眷村第二代。[93]

從中國性以及懷舊情結來定位張愛玲在臺灣的位置時，女作家李藍的座標因此驟然浮現。在受張愛玲散文影響的系譜，如洪素麗、李黎、袁瓊瓊、周芬伶、張讓、戴文采）裡[94]，一九四０年出生的李藍，年齡堪稱最長。與她同年或稍晚的女性散文作者，如劉靜娟、羅英、丘秀芷，乃至張曉風、陳少聰，她們的散文都沒有襲自張愛玲影響的語言特質。而李藍離所謂八０年代以下洪素麗、李黎、戴文采的「仿張」體散文，大約還有十來年的差距。

李藍本名楊楚萍，安徽省合肥縣人。一九四０年生於湖北的她，記憶中的童年，是硝煙炮火的嘉陵江畔，躲警報，在苦栗子林裡揀拾雨後灰色的小菌。南京下關碼頭冬日的風裏，看大人們搶上搶下的把行李運送上船[95]。小說集《沒有故鄉的人》序言裡，她形容在串聯著眼淚、野蠻、侮辱的歲月中，「我們恰恰是擠在這道上的過客」。失鄉流浪的歲月中，他們如同「沒有棲止的，流浪在風雨中飢餓的蛾」。

如果不計入散文寫作風格，文學史上論李藍，恐怕要把她歸入反共鄉野小說家裡。六０年代到七０年代間，她以《小樓》、《綠鄉》、《短歌》、《沒有故鄉的人》、《哭泣的沙漠》、《黑鄉》多部小說奠定了聲名。一九七０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黑鄉》，甚且得到第四屆國軍文藝獎，與曾經得過此一獎項的張放《荒煙》、段彩華《三馬入峪》、趙玉明《咆哮大地》、桑品載《勇士們》並列一時

[93]張誦聖，〈袁瓊瓊與八０年代臺灣女性作家的「張愛玲熱」〉、〈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年）。

[94]張愛玲的散文，在四０年代的上海和蘇青被並置合觀，具有都會女性的獨立觀點。六０年代以後，隨著《流言》、《張看》的再版，有許多女作家散文頗受影響。

[95]李藍，〈故鄉之外－代序〉，收入《沒有故鄉的人》（臺北：水牛，1967 年）。趙雲有一短篇小說亦名〈沒有故鄉的人〉，寫越南華人為正義殞命事，載於《幼獅文藝》（1968 年 1 月），收入隱地編《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軍中文藝與反共文學的典型。[96]《黑鄉》，是一個共產黨清算農村的悲慘故事。被劃歸中上農的趙老爹一家家破人亡，而副書記劉毅青（出身地主家庭，爲劃清界限不惜活埋爹娘），驚覺甫下鄉的工作領導柳碩夫竟是離家二十載的大哥劉碩青。看穿黨的殘暴本質後，劉毅青幡然悔悟，私縱人犯，終至手足相殘，大哥劉碩青血染雪地，只留下風的哀嚎和一片慘白的冷寂肅殺。和張漱菡、徐薏藍等名門閨秀書寫的那種離亂愛情完全不同，在李藍小說裡，寫實手法反芻著她的中國山村經驗，總是落後傳統的山鄉，掙扎的人性，胡琴啞啞的盪在冬風裏，屏脊上一片白霜，黑巷子口，不時有一兩隻野狗冷不妨的竄出來，尖刺刺的嚎叫著，把夜給戳出了一個洞，叫人聽了全身發毛。[97]

李藍年幼隨父母來臺，童年在南部鄉下度過，對故鄉（〈南歸〉一文中的「T鎮」），「並無一點留戀與牽掛」。她的寫作開始得很早，十八歲，一九六三年便於亞洲文學出版社發表第一部小說《哀樂人間》。李藍師範學校畢業後，放棄了當老師的職業，與父親決裂，到臺北專業寫作。李藍《在中國的夜》裡〈那一點點蝕去的歲月〉一文，有這段慘淡歲月的詳實敘述。一九六五年李藍與作家桑品載結婚，[98]她的許多小說都是在敝陋的小屋，拮据的經濟情況下勉力完成的。

相較於小說，李藍的散文成書稍晚，且產量不多，連小說／散文合集亦計入，亦僅二本：

1、《在中國的夜》（1972，晨鐘）。

2、《青春就是這樣》（1974，華欣文化中心）。

※散文／小說合集。

《在中國的夜》一書，大約結集了李藍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年之間的散文創作，她在書前自序中自言，寫散文初時是無心插柳：「開始的時候，是由於某些情緒的發抒，情感的執著與人間世相裏一些偶然的發現」，「完全是即興的，想不到竟也得到一些彩聲」。李藍的小說，如文前所述，主要集中於六０年代，她的寫作風格，除了一九七六年改變風格的小說《紅唇》[99]外，與其說受有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不如說略略近似司馬中原、大荒一路的鄉野傳奇寫實派。到了七０年代，她的小說寫作漸漸減少，反而寫起散文來，而且是一種帶有荒涼頹廢現代

[96]詳見《中華民國七十一年文藝季文藝座談實錄》，「歷屆文學得獎作品」（臺北：文建會出版，1983 年），頁 530-532。李藍後來改變風格的《紅唇》（1976 年），藉外遇疑雲寫微妙的心理角力與嫉妒情結，則不在此列。

[97]李藍，《沒有故鄉的人》（臺北：水牛，1967 年），頁 9。

[98]桑品載（1939－），筆名司陽，浙江人，十一歲隨軍來台，著名小說家與編輯。桑品載，〈李藍，我的家主婆〉，《純文學月刊》，8 卷 6 號（1970 年）。

[99]李藍《紅唇》（1974 年）一書，寫作稍晚於《凌晨兩點鐘》，為一長篇小說。據筆者手上版本，封底內頁作「沈臨彬封面設計，永裕印刷廠」，並註明郵政劃撥楊楚萍帳戶，似為自印本。書中主角程炳照，懷疑妻子紅杏出牆，與多年好友唯農之間有許多微妙的心理角力與嫉妒情結，全書窺探人性幽微，頗有現代主義之餘風。蕭毅虹，〈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初評李藍「紅唇」的主題〉，《哲學與文化》，3 卷、3 期（1976 年）。

美學的散文。「夏天的夜晚，清空是冰藍色的，上面浮著小而白的月亮，像冰塊……」，這樣惘惘的威脅，和荒涼的心情，竟和這本散文集的書名《在中國的夜》一起，讓人想到活躍於四０年代上海的張愛玲。

張愛玲有一篇名爲〈中國的日夜〉的小文，原附在一九四四年小說集《傳奇》書末，其中〈落葉的愛〉一詩，已成了許多人慣引的典故。那「金焦的手掌／小心覆著個小黑影……秋陽裡的／水門汀地上，靜靜睡在一起，它和它的愛」，把情愛糾結的紅塵作了令人驚悚的詮釋。走在亮晃晃的冬陽裏，上小菜場提回「沈重累贅的一日三餐」，「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彷彿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沈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

> 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國土。亂紛紛都是自己人；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補釘的彩雲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興晒著太陽去買回來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譙樓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沈。沉到底。……中國，到底。（張愛玲〈中國的日夜〉）[100]

如果我們引用前文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101]中所指出：「中國性－現代主義」此一觀念，不難明白在現代主義美學中，某些作家是襲取它的內在精神（荒蕪、扭曲、孤絕），而非語言實驗（意識流、文類交融）的。李藍很可能就是一例。而且，遍閱張愛玲小說及散文譜中受影響的作者，很少在敘述方法上歐化/西化，反而是更向中國性—一種傳統、精純、張力飽滿的文字靠攏。在情感氛圍上，則偏向表達對舊傳統與傳統中國的眷戀與悵惘，邱貴芬所謂一方面撫慰「失落中國」的挫折，一方面延續「想像中國」的慾望。[102]

張愛玲的散文，又有一點極爲特殊，那就是聲音、顏色、氣味、感官的交替置換，遠遠超出了一般「擬人」、「擬象」的高度，放棄看得見的技巧，而訴諸一種「直觀美學」。在張愛玲《流言》中的〈談畫〉、〈談跳舞〉、〈談音樂〉、〈忘不了的畫〉中，一再搬演這樣的語言幻術，而以〈更衣記〉爲其集大成之作。「似腳非腳的金蓮抱歉的輕輕踏在地上」、「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牆－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裡發掘出來的甬道」、「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

[100]引自皇冠版，1968 年《張愛玲小說集》，頁 506。

[101]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政大中文系「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2001 年 6 月，收入《謊言與真理的技藝》（臺北：麥田，2003 年）。

[102]邱貴芬，〈從張愛玲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建構〉，《仲介台灣‧女人》（臺北：元尊，1997 年），頁 24。

李藍的〈在中國的夜〉，在內涵和文字上，都是張愛玲四０年代上海時期〈中國的日夜〉的承接。李藍寫靜夜中野台戲、平劇、小販的聲音，荒涼戰亂的年代裏，有一種「狡黠的魅力」，一股「悽美而古老的蒼涼感」、「模糊又明亮」。文武場穿著灰藍罩衫，有種「忍氣吞聲和無可如何」；賣粽子的老人軟綿綿拉長的唱腔：「湖州－－粽子」，兩個字拉得老長，「似乎懷著冤屈，從亙古到如今」。在用字的創新，和意象的張力上，李藍〈在中國的夜〉比起張愛玲，簡直不遑多讓。

> 小時候第一樁討厭的事，就是不得不跟在大人後頭，走到鑼鼓喧騰的場子裏去看戲，那樣子拼命似地敲敲打打，彷彿把整個空氣裏的分子，都要鼓動起來，它能把人帶到一種無可抵抗的激流裏去。
>
> 場子裏的空氣就猝然潮濕起來，潮濕得像一陣劈頭蓋臉而來躲都躲不及的雷雨，鑼鼓和胡琴喧嘩著，聲勢奪人地要刻意把人們一勁兒地往一個地方趕，轟隆隆從四方八面擁來，叫你逃避得了。
>
> 悽清荒涼，直逼到人的心底去，千迴百轉的唱腔和立辨忠奸的臉譜，前者是民族的聲音，後者是歷史的歸納。平劇裏頭有許多象徵的東西，不像西洋歌劇直接得像是臉對臉。尤其是那種奇怪的唱腔，幽幽的像夜路上一盞燈火，美得悽惻。平劇裏的青衣和旦角，又是那樣美艷得懾人，那樣地悽絕。（李藍〈在中國的夜〉）[103]

這樣的相似程度，例如李藍《在中國的夜》中另一篇散文〈另一個天空，另一種雲〉：

> 在這靜寂的夜裏，窗外是一簇簇閃開的電燈的亮光，遙遠的火車嘶鳴，計程車穿刺過去的碎裂聲，對過洋樓裏交疊的人影和笑語，洗牌的聲音炒豆子似地鏟過去鏟過去。都市的夜，有點像下遲班回家的小舞女，倦怠、慵懶，脂粉剝落。

〈油紙燈籠及其他〉中：

> 那圓大的落日，趕著往樹梢下頭沉下去，更沉下去……它看起來是安穩、平和、遲緩而友愛的，像古老的中國，像沒有戰爭的年月，幾十

[103] 李藍，〈在中國的夜〉，《在中國的夜》（臺北：晨鐘，1972 年），頁 5-12。

> 年和一天沒有兩權。緩慢而溫靜，如老屋裏照進來一方斜斜的太陽；太陽光裏那些浮動而微細溫暖的灰塵。

又如李藍〈廢城記〉形容臺南：「像是洗褪了色的陰丹士林大掛子，灰撲撲的，洗得發了毛，又老像是瞌睡不醒」。都是極爲酷肖張愛玲的。

李藍散文之神似張愛玲，原因可能是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環境，她自己倒是不曾在文章中透露任何張愛玲之於她的關係。六０年代中期，張愛玲著作在台灣由皇冠重印，當時的李藍二十餘歲，在臺北專事寫作，其受影響，或與作品閱讀有關。寫小說的人，有時事隔多年，才把真實的一面在散文中示人。例如「聶傳慶」之於張子靜，「川嫦」之於張愛玲的堂姊，在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尤其是視爲自傳的〈私語〉中，處處可以見到真實生活中小說的模特兒。李藍〈沒有故鄉的人〉中的混血兒蓓姬．蘇和流落巴黎街頭的杜丹薇，正是〈那一點點蝕去的歲月〉中的蘇珊嗎？那時候，年輕的李藍寄居在台大附近窄小的公寓學生宿舍中，認識了父母不詳的混血女孩蘇珊，「她有一頭栗色的髮，那髮從中挑開來，披垂到臉頰上，用那一雙澄藍而悲哀的眸子瞪人，像法國某一個時期畫家筆下畫的小妓女的神色－絕望、哀愁，但卻美麗。」。

真實生活中的李藍，想必有過絕望、哀愁而美麗的年輕歲月。她曾在《在中國的夜》〈那條遙遠的河〉中描述道，祖父是前清秀才，母親飽經戰亂的憂患，有著勞瘁的一生與早夭的戀情，父親則是「沈浸在線裝書」中，「有種凝冷的肅殺氣，但也是蒼涼寂寞的」。在一個大年夜後，李藍終與父親決裂，一個人坐車回到台北住處。夜晚九點，李藍文中的形容，讓人想起張愛玲逃離父親後，在母親住處「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

李藍〈那一點點蝕去的歲月〉（《在中國的夜》）這樣描述她絕望的心情：

> 街上的公車和計程車和神色倉惶的人來來往往地織著，幾乎沒有聲息，是被一個轟轟的大聲息包裹住了。這個大而厚實的城市在我眼前，但卻距離我老遠，彷彿我是站在一幅圖畫前面。整個天地是一個球形的藍瓷瓦缽，上面灰藍的一色天體是個蓋，把這黑實的深藍色缽子給密密地合上了，那蠕動的人群，車輛，那一串串明滅的燈光，是缽裏跳動的精靈，牠們在缽裏自成一體，也是一個悠久亙古的世界。[104]

[104]相同的例子，又如李藍〈某種感覺〉（《青春就是這樣》），剖腹生產時，「手術室是大而陰涼的，有古墓的清幽與靜謐」，張愛玲〈私語〉一文也形容老宅子「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的翻版。

李藍之神似張愛玲，修辭上明顯有承繼的痕跡，尤其是聲音、氣味的直觀與描摩。以當下的感官去接近理性世界，標榜「是真女子，非好女子」，展現一種強調差異的獨特女性人格美。[105]後來學張愛玲散文的女作家，如袁瓊瓊、蘇偉貞、戴文采，無不將此「女性的」（Female）直觀美學發揮得淋漓盡致。李藍最典型的「仿張」體代表作，應算是〈色之鄉〉[106]和〈我們看花去〉[107]兩篇文章。她形容新芽嫩枝的綠，「碰一碰就會哭起來似的」，枝子上乍乍伸出來的淡綠，「擠眉弄眼的」，松樹有種「世故氣」，「卻有一種奇異的尊嚴感」。

在〈色之鄉〉一文中，李藍巧妙的以散文體裁，結合了張愛玲小說中「繡在屏風上的鳥」的意象和「兩片長胭脂夾住瓊瑤鼻」的伶人描寫，詮釋花光與色相：

> 有一種桃紅，卻是紅得悽美，紅得冷艷。古時候深宅大院高樓秀閣裏女人頭上的飾花，小姐頰上兩片長胭脂，怕都是這種悽艷的寂寞紅罷？她們本身也就是那飾花和胭脂，終年寂寂地被收在四方匣子裏，前面是院子，後面是廚房，嚴嚴地把她給封牢了。感覺上，永遠在枕上聽見那惱人的夜漏，永遠是悽其的冷雨秋風。她甚至出了嫁，做了母親，那紅依然是寂寂的，悽艷的...隨著年月，它一點一點褪了色，仍然是收在匣子裏，沒人知道她—一個美麗的死蝴蝶的標本。（李藍〈色之鄉〉）

李藍〈我們看花去〉：「開得不好的菊花，尤其邋遢喪氣，髒兮兮的，像沒有洗乾淨的絨線衫」，「水仙花養在水盂缽子裏，清水底下墊著黑的白的石子兒。汪在石上的一層水，浮著奇異的光，像愛人目光交接時的那雙眸子。水仙這種花，彷彿只是一種象徵，那花是鬼魂……」情境亦像極張愛玲。李藍除了外在色相的描摩襲自張愛玲之外，有一處提及自己熟讀張愛玲小說。在《青春就是這樣》〈某種感覺〉中，走在書攤旁，又買下一本張愛玲小說坐下翻看，剎時覺得，張愛玲筆下的人物，竟然活生生如在眼前。

> 那麼熟悉的一些人，米堯晶、敦鳳、白流蘇、葛薇龍、聶傳慶，一個個都走到跟前來，打我身旁擦過。也許那十路公共汽車上走下來穿西裝的兩兄弟，就是振保和篤保，還有變了鬼又脫胎到這世上來的曹七巧，依然是「瘦骨臉兒，朱口細牙，小山眉毛」，她坐在大而黑的轎車裏，仍然枷著她那把金鎖。（李藍〈某種感覺〉）

---

[105]周芬伶，《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第 4 卷（臺北：元尊，1999 年）。

[106]李藍，〈色之鄉〉，收入《在中國的夜》，頁 145-155，也收入《青春就是這樣》之中，足見李藍對此文的偏愛。

[107]李藍，〈我們看花去〉，《青春就是這樣》（臺北：華欣，1974 年），頁 3-8。

李藍對張愛玲的承襲，在台灣文學史至少代表兩種意義，一是現代主義（中國性－現代主義）美學的隔空影響，二是女性獨特的「空間」意涵的發揮。從後殖民論述的角度看三０年代上海的女性，事實上「新女性」的符號系統中，力現身體的美麗與性感背後，是爲了取悅男人。[108]也正因這一點，蘇青和張愛玲的「真女人」作風，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蘇青語）的「叛逆書寫」，成爲殊異於傳統的現象。其次，空間的概念，取代直線的時間，「在文學上的重要性其實是現代主義的具體化」。[109]張愛玲筆下的靜態空間（門、窗、房間...），例如〈桂花蒸阿小悲秋〉，從高樓後陽台望出去，連天也背過臉去了，「城市成了曠野」；〈留情〉中焦急的電話鈴聲，迴盪在清冷的房間中。張愛玲事實上把空間加以延伸，並轉換詮釋，成爲心理和時間的借喻（trope）。類似這種手法，如李藍〈那一點點蝕去的歲月〉以「整個天地是一個球形的藍瓷瓦缽」以喻絕望，頗得其真傳。李藍於七０年代中期以後即赴美定居，羈旅異鄉，於臺灣文壇上再也沒有其他著作。這樣的遺憾，真也有張愛玲的些許投影。

參、結語

現代主義（Modernism 作爲一種西方反工業文明的文學運動與美學標準，五０年代開始「橫的移植」到台灣，成熟於六０年代，七０年代與鄉土/寫實分裂成鮮明對比的兩方，對台灣半世紀以來的文學書寫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然而邱貴芬教授近來於〈臺灣現代主義小說與現代性的時間〉也指出，現代主義文學在亞洲各地皆有其區域特性的變奏。臺灣的現代派文學，也有其「在地性」，其背後有相當複雜的時空因素，不是單一的「西化」或「抗拒政治高壓」即可解釋。這種多元化的關注，也應當使我們注意到，現代主義文學影響的不同文類差異與表現。

現代主義作爲一種超越論的創作觀，它挖掘內心幽黯、情慾深淵，在語言的實驗上，超現實、意識流等種種技巧，大量運用於小說、新詩及散文的創作之上，促使臺灣當代文學開始偏離中國五四文學以降的抒情傳統。一般傳統的觀念認爲，中國當代散文除英美散文淵源之外，另有中國晚明小品、白話章回小說等縱的繼承，與新詩、小說相較，受西洋當代思潮影響較小。其實在臺灣全面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六０年代，女性散文的表現恰恰呈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位置。她們用

[108] 史書美指出，中國現代女性的「現代性」，與西方殖民主義關係密切。〈1939 年的上海女性－從後殖民論述的角度看中國現代性之「現代性」〉，《聯合文學》，10 卷、7 期（1994 年 5 月）。

[109] 蔣翔華，〈張愛玲小說中的現代手法－試析空間〉，《聯合文學》，10 卷、7 期（1994 年 5 月）。

語言的實驗勇敢的改寫了散文的書寫身分與版圖，跨越書寫文類（詩/散文或小說/散文），開啓了散文書寫的新可能。

六０年代女性散文，其實是多線並行，並存在著異質的聲音與世代交替的意義。新崛起的年輕女作家普遍仍以外省來臺時幼小一輩者爲多。最大宗的散文寫作仍是延續張秀亞諸人而下的抒情散文，簡宛、荊棘、陳少聰、蔣芸都因出國較早或散文寫作亦晚，而較被忽略；丹扉、陳克環則走知性雜文專欄路線，關心時政與社會，反應女性的多元立場，較不以文字藝術性聞名。

六０年代的趙雲、張菱舲、李藍散文，雖然非稱主流，寫作時間較短，作品數量亦不多，卻能結合現代主義思潮，作出重要貢獻，她們的文本，於臺灣散文發展上是一個相對於五四新文學白話傳統的轉折。趙雲散文充滿實驗電影與小說的越位，張菱舲以詩情散文回應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李藍散文則承接了張愛玲的現代主義隔空影響。三人的文壇與人生際遇皆不同，所相同的，是她們反逆潮流的書寫與努力。在所有的文類都在講究邊緣性（marginality）和顛覆性（subversion）的時候，從現代到後現代，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其實從未在創作場域或心靈探索中缺席。

六０年代受現代主義直接與間接影響的女性散文，趙雲、張菱舲、李藍，趙雲技巧上由於由小說轉化而來，較爲接近當時現代派小說在文體或文字上扭曲變形的特質，張菱舲、李藍文字則屬「善性西化」，加上中國的優位性，意識上向古典主義回航，似乎較趨近黃錦樹所謂「中國性－現代主義」。無論如何，經過這樣的轉折與重鑄，如陳芳明所謂，以「橫的移植」姿態進來臺灣的現代主義，某種程度上也帶來散文加心靈的解放。從六０年代趙雲、張菱舲、李藍，到頗有女性自覺意識的蔣芸、丹扉、陳克環，七０年代吹起曹又方、張曉風的變奏，到八０年代「撒豆成兵，點鐵成金」的文字精靈簡媜的出現，都在「她們的文學」中，揉合了現代主義以降最富挑戰性的語言實驗與前衛精神。

詩人白萩曾在〈對「現代」的看法〉一文，引龐德（Ezra Pound）和艾略特（T.S.Eliot）之說，認爲時間與文化都具有一種「積續性」（Duration），「現代」包括對過去的一種清晰吸納，而此種吸納又包括著和現代同時並存的一種序列。[110]「現代主義」本身的意義不止於一種運動的狂熱，而是揭示了自古典、浪漫、象徵以來，一直隱藏和支持各運動成功的重要存在因素。中國新文學的白話散文傳統移至臺灣後，在六０年代現代主義風潮中，女作家以一種違逆主要潮流的方式作了文體實驗。這實驗當時看來似乎未稱成功，然而如今重新檢視文學史，她們的作品卻是重要的前驅，證實了散文此一文類的現代性開展過程。

被遺忘的，並不一定不重要。簡媜在《天涯海角》中曾說：「一部歷史，往往就是一部流浪史。我們是否真可以找到一種高度，足以放眼八荒九垓又能審視自己這卑微的存在？」是心靈解放，也是對權威的抗拒、傳統的背叛。臺灣當代

[110]白萩，〈對「現代」的看法〉，《現代詩散論》（臺北：三民，1972 年），頁 34-35。

女性散文在六０年代，以現代主義作爲啓蒙，開始展現了女性文學的主體性與自覺，轉變了五四跨海而來的中國性與寫實傳統，也開展了八、九０年代眾聲喧譁的散文後現代世代的可能。

參考文獻

一、重要作品文本

李　藍，《在中國的夜》，臺北：晨鐘，1972 年。
李　藍，《青春就是這樣》，臺北：華欣文化中心，1974 年。
張菱舲，《紫浪》，臺北：文星，1963 年。
張菱舲，《聽，聽，那寂靜》，臺北：阿波羅，1970 年。
張菱舲，《琴夜》，臺北：阿波羅，1971 年。
張菱舲，《外太空的狩獵》，臺北：聯合文學，2006 年。
趙　雲，《零時》，臺北：大地，1975 年。
趙　雲，《男孩女孩和花》，臺北：九歌，1979 年。
趙　雲，《心靈之旅》，臺北：文經，1988 年。
趙　雲，《寄情》，臺北：大地，1988 年。
趙　雲，《歲月流程》，臺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 年。
趙　雲，《遺落在二十世紀的夢－趙雲自選集》，台南：供學社，2003 年。

二、單篇論文

王浩威，〈偉大的獸－林燿德文學理論的建構〉，《聯合文學》，12 卷 5 期，1996 年。
史書美，〈一九三九年的上海女性－從後殖民論述的角度看中國現代性之「現代性」〉，《聯合文學》，10 卷 7 期，1994 年 5 月。
白　萩，〈自語〉，（《天空象徵》後記），《現代詩散論》，臺北：三民，1972 年。
白　萩，〈對「現代」的看法〉，《現代詩散論》，臺北：三民，1972 年。
朱小燕，〈紫浪中的菱舲〉，《臺灣新生報》，1993 年 7 月 22 日。
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臺灣現代小說現象研究〉，陳義芝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臺北：聯合文學，1998 年。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1995 年。
林燿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132 期，1995 年 10 月。
林麗如，〈婦人之見，鏗鏘之筆－專訪丹扉女士〉，《文訊》，159 期，1999 年 1 月。
邱貴芬，〈從張愛玲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建構，《仲介台灣‧女人》，臺北：元尊，1997 年。

邱貴芬，〈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年。
邱貴芬，〈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年。
邱貴芬，〈臺灣現代主義小說與現代性的時間〉，暨南大學「重寫臺灣文學史/反思女性小說史」研討會論文，2005 年 5 月 27 日。
施　淑，〈現代的鄉土－六、七０年代臺灣文學〉，施淑《兩岸文學論集》，臺北：新地，1997 年。
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收入《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4 年。
張瑞芬，〈狩獵月光－張菱舲和她的詩情散文〉，張菱舲《外太空的狩獵》序言，臺北：聯合文學，2006 年。
張誦聖，〈袁瓊瓊與八０年代台灣女性作家的「張愛玲熱」〉、〈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年。
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原載《文藝研究》（1988 年 7 月），張誦聖《文化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年。
張　錯，〈食蓮人〉，《中央日報》，2003 年 5 月 20 日，收入《靜靜的螢河》，臺北：三民，2004 年。
陳芳明，〈現代主義的擴張與深化〉，《聯合文學》，207 期，2002 年 1 月。
黃　華，〈評蔣芸《屬於我的雨季》〉，《自由青年》，37:4，1967 年 2 月。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2001 年 6 月政大中文系「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收入《謊言與真理的技藝》，臺北：麥田，2003 年。
黃錦樹，〈嘗試文、美文與現代散文〉，東吳大學「臺灣當代散文」研討會論文，2003 年 10 月。
董保中，〈「文人的使命」與「創作自由」－兼評陳克環的「形式與內容」〉，《書評書目》，45 期，1977 年。
趙　雲，〈隨緣—我的筆墨生涯〉，《文訊》，第 39 期，1988 年 12 月。
趙　雲，〈荒謬劇場〉，《遺落在二十世紀的夢－趙雲自選集》，臺南：供學社，2003 年。
劉紀蕙，〈林燿德與臺灣文學的後現代取向〉，《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臺北：立緒，2000 年。
劉紀蕙，〈時間龍與後現代暴力書寫的問題〉，《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臺北：立緒，2000 年。
蔣翔華，〈張愛玲小說中的現代手法－試析空間〉，《聯合文學》，10 卷 7 期，1994 年 5 月。

三、專書

王家誠，《在那風沙的嶺上》，臺北：大江，1969 年。
王家誠，《守著火的夜》，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 年。
朱壽桐，《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上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余光中，《掌上雨》，臺北：文星，1964 年。
余光中，《蓮的聯想》，臺北：文星，1964 年。
余光中，《逍遙遊》，臺北：1965 年，文星。
周芬伶，《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臺北：元尊，1999 年。
林燿德，《一九四九以後－臺灣新世代詩人初探》，臺北：爾雅，1986 年。
邱貴芬，《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臺北：女書文化，2001 年。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年。
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 年。
郭淑雅，《國族的魅影，自由的天梯－「自由中國」與聶華苓文學》，靜宜碩論，2001 年。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1997 年。
黃錦樹，《謊言與真理的技藝》，臺北：麥田，2003 年。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誌出版，1985 年。
劉登翰，《台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1993 年。
鄭明娳，《現代散文縱橫論》，臺北：長安，1986 年。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43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Modernism and Taiwanese Feminine Prose in the Sixties

Rui-Fen Chang[*]

Abstract

In the sixties when modernism was impacting Taiwan expansively, feminine prose was rarely mentioned by traditional literature history, and key female writers were also ignored. However, with their avant-garde concepts, the female prose writers leaped over various literature genres, launched new possibility of prose writing, and eventually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for feminine literature in the 60's.

Feminine prose in the 60's was characterized by coexisting; i.e. heterogeneous voices and meanings of generation transformation coexisted. Following the soft feeling track from popular writers such as Chang Shou-Ya, the young female writers were mostly the second generations immig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Due to going abroad too early or beginning to write prose at a later stage, writers such as Chien Wan, Jing Ji, Chen Shau Tsung and Chiang Yun were neglected. Dan Fei and Chen Ko Hwan followed the road of journalism for knowledge of variety, caring about 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sponse to the female posture. Nevertheless, Chao Yun, Chang Ling Ling and Lee Lan developed a turning point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by contrast to the "May-Fourth new literature revolution" although their works were not so man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Chao Yun’s prose was filled with an overriding spirit between experimental movies and novels, while Chang Ling Ling’s prose responded Yu Kwang Chung’s new ideas of prose with poem-styled feelings. Moreover, Lee Lan’s prose appeared to be sequenced by space-isolated modernism from Chang Ai Ling. Under the waves of sweeping modernism, these female writers eventually conducted literature styling experiments by ways against the mainstream styles.

Keywords: modernism, feminine prose, the sixties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45-78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陳氏香譜》版本考述

劉靜敏*

摘　要

香的功能廣泛，從清神、避瘴、除臭、醒腦等實用的功能到嗅覺、氣味品評，乃至鼻觀先參的精神層次。宋代發展出雅俗共賞的用香文化，《陳氏香譜》記載民間普遍用香情形，如：日常生活使用的印篆、凝和、佩薰、塗傅等香方，香藥的收儲、香品、香茶、香珠等脩製方法，無一不備；同時也收錄文人雅士以香為題，或藉香吟詠寄情的詩文，如李琳所言：「韋應物掃地焚香，燕寢為之凝清;黃魯直隱几炷香，靈臺為之空湛。」

宋代用香的蓬勃發展，紀錄用香及其相關事物之專書蔚為風潮。《四庫總目提要》對《陳氏香譜》評語是：「集沈立、洪芻以下十一家之香譜彙成一書。」認為是宋代眾香譜集大成者。

《陳氏香譜》自元代刊刻以來，歷經傳抄與重雕，今傳各本均有優劣與缺失，主要有四庫本之《陳氏香譜》四卷與適園叢書、鐵琴銅劍樓收藏之《新纂香譜》二卷抄本。因傳統用香之研究者不多，未見對《陳氏香譜》的版本探討。本篇之作，除論述各版本流傳情形，也以四庫本之《陳氏香譜》為底本，適園叢書本之《新纂香譜》為輔、參之明代《香乘》校勘，期能得到較為完善的本子，作為後續研究之用。

關鍵詞：陳敬、香譜、新纂香譜、版本、香文化

*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壹、《陳氏香譜》撰寫與初刻年代

陳敬所撰《香譜》是一部紀錄日常生活用香與器用之譜錄類書籍。今所見另有：《陳氏香譜》、《新纂香譜》等名稱。

此譜應標明爲陳氏《香譜》亦或《陳氏香譜》？爲本文首要闡述之問題。

《香譜》爲便宜通稱。宋代因香藥譜錄發展迅速，多以各家姓氏爲名，稱某家或某氏香譜，諸如沈立《香譜》又稱「沈氏香譜」，洪芻《香譜》又稱「洪氏香譜」等等以姓氏區別撰者。見明代周嘉胄撰《香乘》一書，卷末「附諸譜序」，有：「葉氏香錄序、顏氏香史序、洪氏香譜序、陳氏香譜序」等。[1]又，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五引用明代益藩刻書爲：「崇禎庚辰，十三年，刻宋陳敬《香譜》四卷……」。[2]

清代官方編書，所輯此譜書名亦混淆不別，稱《香譜》者，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云：「《香譜》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陳敬撰」，清高宗《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百八十一記：「陳敬《香譜》四卷」、《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有：「《陳氏香譜》四卷」。

因此，從書籍形式來判別題寫書名地方，通常爲：書籤、內封、卷首大題、版心等處。[3]由於陳敬之書以單行本通行者僅題爲《新纂香譜》二卷，故略去書籤與內封。版心題爲《陳氏香譜》者，如：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清抄本《新纂香譜》，其版心題爲「陳氏香譜卷第一」；《四庫全書》之版心亦是。其次，《四庫全書》卷首第二行頂格題「陳氏香譜卷一」，次行低十三格題「宋陳敬撰」；又序文部份，有熊朋來序，四庫本亦稱爲「陳氏香譜原序」。[4]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適園叢書本《新纂香譜》卷首所附熊朋來序文亦稱：「河南陳氏香譜原序」。

從前述之版心、卷首大題、序文等，皆稱陳敬專書爲《陳氏香譜》。

至於《新纂香譜》之名稱始於何時？

據清人著錄中，錢曾（1629-1701）所撰《述古堂書目》與《讀書敏求記》兩書中，已見書名差異。如：《述古堂書目》敘述爲：「陳敬《香譜》四卷本，內府元人抄本」；但錢氏於《讀書敏求記》卷二則將此譜兩名稱並置，稱：

---

1 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579-581。

2 葉德輝，《書林清話》（長沙：岳麓書社，2000 年），卷 5，頁 99。

3 陳正宏等，《古籍版本鑑定概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頁 232-234。

4 陳敬，《陳氏香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40。

> 《陳氏香譜》四卷。《新纂香譜》，河南陳敬子中編次，內府元人鈔本。……[5]

從著錄資料來看，錢曾是今見最早稱呼《新纂香譜》者，但書中未說明《新纂香譜》卷次。簡言之，清初已有《新纂香譜》之稱。

其後翟鏞（1794-1875）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便直接稱爲：「《新纂香譜》二卷宋陳敬撰」[6]；清末民初張鈞衡編《適園藏書志》亦著錄爲：「《新纂香譜》二卷」。

爲了敘述方便，援用宋人稱某氏香譜之特點，若有陳敬之名，稱爲陳敬《香譜》亦可；但若冠以陳氏，則應爲題爲《陳氏香譜》較佳，指此譜即爲陳敬所撰之專書。故本文據《四庫全書》以《陳氏香譜》爲名（以下簡稱陳譜），用以分別二卷殘本之《新纂香譜》。

《陳氏香譜》由陳敬撰寫編輯，刊刻於其子陳浩卿之手。陳敬，史無傳，仕履不詳。從四庫本《陳氏香譜》卷首標題下題：「宋陳敬撰」；又《新纂香譜》卷首有：「河南陳敬子中編次」。知陳敬爲河南人，字子中。[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此云：「敬字子中，河南人，其仕履未詳，首有至治壬戌熊朋來序，亦不載敬之本末。」[8]見熊朋來序云：

> 河南《陳氏香譜》自子中至浩卿再世乃脫稿，凡採洪顏沈葉諸譜具在，此編集其大成矣……。浩卿過彭蠡，以其譜視釣者熊朋來俾為序，釣者驚曰：豈其乏使而及我子再世，成譜亦不易，……至於自熏知見抑存乎其人，遂長揖謝客鼓棹去，客追錄為香譜序，至治壬戌蘭秋彭蠡釣徒熊朋來序。[9]

李琳序則云：

> ……汴陳浩卿於清江，出其先君中齋公所輯《香譜》。……至治壬戌夏五長沙梅花溪道人李琳書。[10]

---

[5] 錢曾撰、章鈺補輯，《讀書敏求記校證》（《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卷 2，頁 331。

[6] 翟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據清光緒二十四年自刻本，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卷 2，頁 906-907。

[7] 見王梓材、馮雲濠撰，《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卷 49，有：「陳敬，蜀人」，頁 1970。又《元詩選》癸集庚下云：「陳敬號白雲，山陰人」。但以上皆非《陳氏香譜》之作者。

[8] 《陳氏香譜》，頁 239。

[9] 《陳氏香譜》，頁 241。

[10] 《香乘》，卷 28，「附諸譜序」之《陳氏香譜》序又李琳序，頁 581。

熊朋來、李琳兩序指出，《陳氏香譜》成書於陳敬之子浩卿，爲序之至治壬戌（二年，1322）時陳敬已卒，僅可推測陳敬活動時間約在南宋末至元之時。

因此，著錄記載上除前述稱：陳敬爲宋人之外，亦有判定陳敬爲元人之記載，見清乾隆三十七年編輯四庫時，據〈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書目〉爲：「《香譜》四卷元陳敬編。一本。」[11]即是范氏天一閣依據熊朋來序文年代而定陳敬爲元人。

再試從交遊情形可否提供陳敬事蹟的線索，熊朋來、李琳爲之作序的原因爲何？

熊朋來（1246-1323），字與可，自號彭蠡釣徒，又號天慵，豫章（今江西豐城）人。

熊朋來爲宋度宗咸淳甲戌（1274）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任而宋亡。元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用之，尤重進士，然朋來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授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12]

對於熊朋來之爲人處世，《元史》有傳云：「朋來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自以得其意。」[13]元人吳澄（1249-1333）爲其撰寫墓表云：

> 先生宋咸淳甲戌進士第四人也，授從事郎寶慶府判官，不及仕而國運終。常人壯歲取高科輒沾沾自喜，得之未幾而旋廢必怏怏自失。先生不然，當其得也，不也為加；及其廢也，不也為損，處之裕如於是，識趣過人遠矣。……胸懷灑落，態度寬和，聞風者造門，人人如煦春陽飲醇酎而去，莫不貌敬心服，有所詢諮，懇懇開示不倦。……[14]

熊氏個性如此，寬容大度，往來士子求教受業不絕，爲東南大儒；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也視之漠如。

從《陳氏香譜》原序觀之，陳敬與浩卿並未與熊朋來有所深交，僅如序所言：「浩卿過彭蠡，以其譜視釣者熊朋來俾爲序，釣者驚曰：豈其乏使而及我子再世，成譜亦不易……。至於自熏知見抑存乎其人，遂長揖謝客鼓棹去，客追錄爲香譜序……。」陳浩卿以其父所輯《香譜》求見於當時聞名儒者熊朋來，朋來以成譜

---

[11]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引自楊家駱，《四庫大辭典并附七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 年），頁 111。

[12]虞集，〈熊先生墓誌銘〉，《國朝文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卷 54，頁 591-592。

[13]宋濂，《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卷 190，「儒學二」，頁 4336。

[14]吳澄，〈前進士豫章熊先生墓表〉，《吳文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71，頁 683-684。

不易的立場鼓勵之並作序，至治壬戌年七月熊朋來寫下序後，隔年癸亥五月去世，年七十八。

另一篇序文撰寫者李琳，今傳《陳氏香譜》與《新纂香譜》皆未見其序，惟保留於明周嘉胄《香乘》卷二十八「附諸譜序」之《陳氏香譜》又李琳序。[15]

李琳，號梅溪，長沙人，咸淳十年進士，事蹟不詳。《全宋詞》存詞：〈平韻滿江紅（題宜春臺）〉、〈木蘭花慢（汴京）〉、〈六么慢（京中清明）〉等。[16]從李琳序題：「至治壬戌夏五長沙梅花溪道人李琳書」等語，得知又號梅花溪道人。

耐人尋味之處是從序文觀之，熊朋來與李琳與陳氏父子並無往來深交。熊朋來是在：「浩卿過彭蠡，以其譜視釣者熊朋來俾爲序」；李琳則謂：「汴陳浩卿於清江，出其先君中齋公所輯香譜」。或是基於對宋朝的眷念，邀集前朝進士撰寫序文。因爲熊、李兩人均爲宋咸淳十年進士，是宋代最後一次科考所取進士；且當時均在江西，朋來在彭蠡，即今之江西省北境鄱陽湖一帶；琳在江西清江。時間上，李琳題序時間是至治（1322）壬戌夏五（月），而熊朋來略晚，爲壬戌蘭秋（陰曆七月）。

從熊、李兩序文得知，《陳氏香譜》成書於陳敬之子浩卿，初刻於元至治二年。不過若據此直接稱陳譜爲元人著作，[17]又非全是。因陳敬據以所輯的十一家香譜幾爲宋代著作，且陳敬例歸爲宋人，此亦《四庫全書》將此譜列爲宋人著作之因。

貳、《陳氏香譜》知見傳本

《陳氏香譜》於元至治二年始刻，明朱祐檳輯《清媚合譜》將《香譜》四卷編入，崇禎庚辰（十三年，1640）益府重雕，所用陳譜即爲元至治壬戌刻本。次年，崇禎十四年，周嘉胄廣輯陳譜，撰寫《香乘》。因此，《陳氏香譜》與宋代洪、顏、沈、葉諸家《香譜》皆收錄於《香乘》中。

清初錢曾《述古堂藏書目》藏有：「陳敬《香譜》四卷，內府元人抄本」，又《讀書敏求記》有：「《陳氏香譜》四卷。《新纂香譜》，河南陳敬子中編次，內府元人鈔本。」清初似尚有元人抄本傳世。民國初年張鈞衡將《新纂香譜》二卷刻入適園叢書中，認爲此譜即《讀書敏求記》所著錄。清嘉道之時，翟氏銅琴鐵劍樓亦藏有《新纂香譜》二卷抄本。

---

[15]《香乘》，卷 28，頁 581。

[16]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78 年），頁 3418。

[17]章鈺案語：「元志以有熊朋來序列入元代。」見《讀書敏求記校證》，記校二之中「陳氏香譜」條，頁 331。又有「《香譜》四卷，元陳敬編」，見〈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書目〉，《四庫採進書目》，頁 111。

因之，從著錄中得知《陳氏香譜》在清初已有四卷本與《新纂香譜》二卷殘本兩系統。以下就四卷本與二卷殘本流傳經過與今所知見傳本析論之。

一、《陳氏香譜》四卷知見傳本

四卷本的《陳氏香譜》從熊朋來與李琳元至治壬戌年序（1322）得知，元至治二年成書，同年鋟版刊刻。其後明崇禎十三年（1640）江西益藩重雕此本。見清葉德輝（1864-1927）《書林清話》卷五「明時諸藩府刻書之盛」條云：

> 益府，明崇禎庚辰十三年刻宋陳敬《香譜》四卷，據元至治壬戌刻本重雕。[18]

益府即是益藩，藩國建在建昌府（今江西南城縣）原荊親王故址，所轄爲今江西撫州地區。因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封藩王制度，分封諸子於各地，用以加強對地方的控制，鞏固朱家王朝。而在分封藩王時，除土地、財帛之外，往往賞賜善本書籍。流風所及，宗室諸藩多刻書、聚書，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於諸藩」之說，如葉德輝所說：「惟諸藩時有佳刻，以其時被賜之書，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藩邸王孫又頗好學故也。……」據此，明末益府翻刻此版，當來自內府善本重雕，而追溯此譜入益府，自第一代朱祐檳即收藏之。

益藩王系，第一代爲明憲宗第四子益端王朱祐檳（？～1539），[19]從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受封爲益王，弘治八年（1495）到任，嘉靖十八年（1539）去世，謚爲端，稱益端王。其族直至清順治二年（1645）爲清兵攻陷南昌止，共傳七世七王。《明史》對朱祐檳愛民重士，倡導節儉，評價頗高，謂：「性儉約，巾服澣至再，日一素食，好書史，愛民重士，無所侵擾。嘉靖十八年薨。」其後繼益藩諸王也能以刻書爲尚。

朱祐檳喜好書史，號涵素道人。據《叢書目錄拾遺》卷三《清媚合譜》下題：「明河南益王涵素道人編。崇禎十三年刊本。《香譜》四卷，《茶譜》十二卷……」《茶譜》十二卷下並注曰：「採輯論茶之作，是書可謂富矣」。[20]將之對照明末益府崇禎庚辰十三年所刊刻的內容：

---

[18]《書林清話》，卷 5，「明時諸藩府刻書之盛」條，頁 99。

[19]見《新校本明史》，卷 119，為：「益端王祐檳，憲宗第六子，弘治八年之藩建昌故荊邸也。」，頁 3641。又據〈江西南城出土益端王壙誌〉，《文物》第 3 期（1973 年），江西南城出土益端王壙誌作：「王諱祐檳，憲宗皇帝第四子」，頁 3641、3644。故依據壙誌益端王朱祐檳為憲宗第四子。

[20]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國學集要》三編十種，臺北市：文海出版社，1968 年），卷 3，頁 110。

> 益府。……。崇禎庚辰十三年刻宋陳敬《香譜》四卷，據元至治壬戌刻本重雕。《茶譜》十二卷，內分二十一種：唐陸羽《茶經》上中下三卷，全卷之一二三。唐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全卷之四。宋蔡襄《茶錄》一卷，全卷之五。宋朱子安《東溪試茶錄》一卷，全卷之六。吳文錫《茶略》一卷，內有孫大綬《茶賦》上下卷，全卷之七。末有「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一行，當是據宋本重刻。明屠本畯《茗笈》上下篇一卷，全卷之八。《香水清供錄》一卷，全卷之九。曹士謨《茶事拾遺》一卷，全卷之十。《續集古今茶譜》五種，內：宋黃儒《品茶要錄》一卷，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一卷，宋趙汝礪《北苑別錄》一卷，宋沈括《本朝茶錄》一卷，彰郡程百二《品茶要錄補》一卷，全卷之十一。《續集古今茶譜》六種，內：明許次紓《茶疏》一卷，明陸樹聲《茶寮記》七類一卷，明田崇衡《煮泉小品》一卷，明馮可賓《岕茶箋》一卷，明屠隆《茶箋》一卷，黃龍德《茶說》一卷，全卷之十二。……[21]

所得到答案是新的發現，上述益府重雕的陳敬《香譜》四卷與《茶譜》十二卷二十一種即是《叢書目錄拾遺》所載益王涵素道人所輯《清媚合譜》。這個意外收穫也得知《清媚合譜》的詳細書目內容。又據近人萬國鼎考證，朱祐檳採輯論茶之《茶譜》十二卷，撰於嘉靖八年（1529）前後，[22]陳敬《香譜》四卷至遲於此時編入《清媚合譜》。因此，四卷本的陳譜在明代一直爲益府所珍藏。

益府《陳氏香譜》重雕刊刻的次年，即崇禎十四年（1641），周嘉胄《香乘》成書，其內容已經大量引用《陳氏香譜》，見卷二十八「附諸譜序」周嘉胄自注云：

> 河南陳氏曾合四譜為書後二編，為陳序者併為，余纂建勳諸序，彙此以存異代同心之契。[23]

清代錢曾（1629-1701）述古堂藏書爲一時之冠，《述古堂藏書目》卷四有此譜記載：

> 陳敬《香譜》四卷，內府元人抄本。[24]

---

[21]《書林清話》，卷 5，頁 99。

[22]轉引自阮浩耕等，《中國古代茶葉全書》（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 年）「存目茶書」，頁 612。

[23]《香乘》，卷 28，頁 579。

[24]錢曾，《述古堂藏書目》（《粵雅堂叢書》，據清咸豐三年刻本，臺北：華文出版社，1965 年），卷 4，頁 4023。

錢曾對此譜的評價頗高，《讀書敏求記》記載最詳：

> 《陳氏香譜》四卷。《新纂香譜》，河南陳敬子中編次，內府元人鈔本。凡古今香品、香異、諸家修製、印篆、凝和、佩薰、塗傅等香，及餅、煤、器、珠、藥、茶，以至事類、傳、序、說、銘、頌、賦、詩，莫不網羅搜討，一一具載。熊朋來序之云：《陳氏香譜》自子中至浩卿再世乃脫稿，可謂集大成矣。古人命筆雖小道，不敢聊爾成書。今人偶撮一二零斷香譜，刊入類書中，沾沾誇詡，真不滿鬻香長者一笑也。書館琴窗、蕭晨良夜，靜對此譜，如燒大象藏香一丸，興光網雲，覆甘露味國，爾時鼻觀先參者為何如也。[25]

從章鈺（1864-1934）補輯《讀書敏求記校證》於「元人鈔本」下案語：「此書有萬曆文房奇書本，崇禎十三年益府據元至治壬戌刻本重雕本。」[26]故可據此得知萬曆時尚有文房奇書本流傳。

其後，莫友芝（1811-1871）《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九著錄：

> 《香譜》四卷，宋陳敬撰，路氏有抄本。[27]

路氏即爲路慎莊，字子端，號小洲，今陝西周至人，好古學之藏書家，清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入翰林院，後以諫官淮陽道。陳譜於清道光時期有路氏抄本，惜今未見。

邵懿辰（1810-1861）撰《增訂四庫簡目標注》謂：「《香譜》四卷宋陳敬撰，路有鈔本」，邵章（1872-1953）《續錄》則增補「適園叢書本」。[28]《適園叢書本》爲張鈞衡（1872-1927）於民初編輯刻入《新纂香譜》二卷殘本。

清乾隆時期官方編輯《四庫全書》收入《陳氏香譜》，其提要謂：

> 《香譜》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陳敬撰，敬字子中，河南人，其仕履未詳，首有至治壬戌熊朋來序，亦不載敬之本末。是書凡集沈立洪芻以下十一家之香譜彙為一書，徵引既繁，不免以博為長，稍踰限

[25]見《讀書敏求記校證》，頁 331-333。
[26]《讀書敏求記校證》，頁 331。
[27]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書目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頁 351。
[28]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497。

> 制，……。然十一家之譜，今不盡傳，敬能薈萃群言，為之總匯，佚文遺事，多賴以傳，要於考證，不為無益也。[29]

爲了更進一步明瞭四庫本的《陳氏香譜》四卷出自何處，遍查《四庫採進書目》中有關〈江蘇二次進呈書目〉中均未見有此譜；而〈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書目〉則有記載：

> 《香譜》四卷元陳敬編。一本。[30]

范懋柱（約 1718-1788）爲明代著名藏書家范欽之八世孫。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間，兵部右侍郎范欽在浙江寧波東的月湖之西建立天一閣。范欽因好書而各處蒐集，除購藏之外，又向其他藏書家借書抄錄，藏書高達七萬餘卷，後成爲明清時期浙江地區重要的藏書樓。

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懋柱應詔進呈天一閣藏書六百餘種，以供朝廷編輯《四庫全書》。《陳氏香譜》四卷原屬天一閣舊藏寫本，浙江巡撫三寶在奏章中說的非常詳細，其〈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記載：「《香譜》四卷（天一閣寫本）元河南陳敬編」。[31]且此譜見於〈四庫全書孤本書目表〉著錄，即《四庫全書》僅此一譜。[32]

據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兩者有所出入，陳譜出自范氏天一閣，江蘇巡撫採進本之說，爲誤。

《陳氏香譜》四卷本知見版本，今有臺北故宮博物院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前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之提要，次爲元至治壬戌（二年，1322）熊朋來〈陳氏香譜原序〉。每半葉八行，行約二十一字，小字雙行。

另一九七三年臺灣商務印書館依據文淵閣抄本影印出版之《四庫全書珍本》，內容與行款悉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同。

二、《新纂香譜》二卷知見傳本

《新纂香譜》之名，初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云：「《陳氏香譜》四卷。《新纂香譜》，河南陳敬子中編次，內府元人鈔本。」

《陳氏香譜》在流傳過程中，爲何有另有《新纂香譜》之名？今從內容中可以發現元至治年初刻之後，在傳鈔過程有補入、刪除的現象。

---

[29]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頁 239-240。

[30]〈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書目〉，《四庫採進書目》，引自楊家駱，《四庫大辭典并附七種》（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頁 111。

[31]楊家駱，《四庫大辭典并附七種》，附錄二〈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頁 269。

[32]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1975 年），頁 169。

首先，二卷本之《新纂香譜》，有元代天歷（歷爲誤，應爲曆）二年（1329）紀年號，見卷二有附圖，旁注「大衍篆圖」：

> 凡合印篆香末，不用箋乳降真等……鄒象潭見授此圖。象潭名繼隆，字紹南，豫章人也。宦寓澧之慈利，好古博雅，工詩能文，善於易賢士，大夫多推重之，其詠篆香續刻後集。天歷（案：應為曆）二年歲次己巳良月朔旦中齋居士書。[33]

天曆二年爲元文宗年號，據李琳序有「汴陳浩卿於清江，出其先君子中齋公所輯香譜」等語。從時間上，李琳成序爲至治二年（1322），「先君中齋公」表明陳敬已逝，因此元天曆二年的中齋居士，另有其人，並非陳敬。

其次，《新纂香譜》卷下「印篆諸香」香方之下，小字注文爲：「新增」、「新」、「補」等字，如：

「新增」有：「水浮印香」。

「新」有：日用供佛濕香、龍涎香（速香）、小龍涎香（錦紋大黃）、香毬。

「補」有：壓香、清遠香、內府龍涎香、清神濕香、黃太史清真香、龍涎香（沉香）、智月龍涎香、古龍涎香、小龍涎香（沉香）、華蓋香、芬積香、四和香等。

根據《新纂香譜》「集會諸家香譜目錄」所引十一家香譜或陳氏其他引用書目中，均未出現與「新增」、「新」、「補」等字之書目？此種現象，與陳元靚《事林廣記》經元、明傳抄、翻刻，有所增改情形非常類似，胡道靜云：

> ……至順刻本，前集部分保留了一個目錄，這個目錄在逐類的細目下，凡是新增益的東西，都用白文標記「增附」或「新增」字樣。……

又從書名觀之：

> 至順刻本題《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日本翻刻泰定本題《重編羣書類要事林廣記》、明永樂刻本題同至元刻本、成化刻本題同至順刻本。所稱「新編」、「增新」、「增類」、「重編」，也都表明了對陳氏原本有所增益、改定。[34]

---

[33]陳敬，《新纂香譜》（《叢書集成續編》第 8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卷之二，頁 712。另見《香乘》，卷 22，大衍篆圖稱「大衍篆香圖」，鄒象潭作「鄒象渾」，「澧之慈利」，作「豐之慈利」，頁 529。

[34]胡道靜，〈1693 年中華書局影本前言〉，《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附錄，頁 560。

據前例，除「新增」、「新」、「補」等字可能爲後人添補；《新纂香譜》題「新纂」兩字亦說明此譜內容有後人增益現象。表明《新纂香譜》是經過增益、改定而成。

《陳氏香譜》，今流通二卷殘本多以《新纂香譜》稱之。今所見版本有兩種：鐵琴銅劍樓鈔本與《適園叢書》本。

（一）鐵琴銅劍樓鈔本

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收入《新纂香譜》二卷爲舊鈔本。[35]

瞿氏鐵琴銅劍樓爲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藏書始於瞿紹基（1772-1836），字厚培，別字蔭棠，江蘇常熟人。翟氏收書時間約在嘉道之際，時值稽瑞樓、愛日精廬、及吳門黃氏士禮居藏書先後廢散，江南故家所儲往往散出，得書頗多。[36]其書室初名「恬裕齋」，歷十年，積十萬餘卷，多宋、元善本。

瞿紹基之子瞿鏞（1794-1846），字子雍，歲貢生，繼承先志，蒐求益勤，好金石文字，曾得鐵琴一張、銅劍一把，因別稱其樓爲「鐵琴銅劍樓」。咸豐十年（1860）戰亂，瞿鏞之子瞿秉淵、秉濬攜書外出避難，輾轉分藏，略有散亡。其後經歷多年訪求補購，又延請管禮耕、王頌蔚、葉昌熾等學者校補重訂藏書目，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印成《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二十四卷，收書一千二百餘種。瞿氏第四代傳人翟啓甲（1873-1940）於抗日戰爭時期，將藏書運往上海，妥善安置。今鐵琴銅劍樓藏書多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鐵琴銅劍樓所藏《新纂香譜》，此鈔本來源十分清楚，謂：

> 宋陳敬撰，原書四卷，此存卷一卷二……舊為文瑞樓藏本，從小玲瓏山館馬氏假得傳鈔者，當時已非全帙矣。……卷首有文瑞樓藏書記朱記。[37]

從翟鏞此段紀錄得知，鐵琴銅劍樓所藏《新纂香譜》爲殘卷，僅存卷一、二。原係文瑞樓舊藏。文瑞樓爲清康熙時桐鄉人金檀之室名，今有《文瑞樓藏書目錄》，檢閱後並未見《香譜》之著錄。[38]又謂文瑞樓抄錄自小玲瓏山館馬氏。小山玲瓏山館爲清雍正揚州馬曰璐（1701-1761）之室名，與兄馬曰琯（1688-1755），時稱「揚州二馬」。小玲瓏山館內建有叢書樓，藏書百櫥，積十餘萬卷。

---

[35]翟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四）（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卷 16，頁 906-907。

[36]見喬衍琯，〈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讀後記〉，《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影》（臺北：廣文書局，1970 年），頁 2。

[37]《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頁 906-907。

[38]金檀，《文瑞樓藏書目錄》（《書目五編》據《讀畫齋叢書》本，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

鐵琴銅劍樓藏所藏《新纂香譜》鈔本，俱爲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有，藏有二部。[39]

其一，鐵琴銅劍樓影鈔本，或稱翟本。版式爲每半葉九行，二十字，單魚尾，左右雙欄，抄本紙印紅格，版心上有書名、卷次，如：「陳氏香譜卷第一」，下刻有：「海虞翟氏鐵琴銅劍樓影鈔本」，左側邊欄外下方有：「臣翟啓甲呈進」等字。[40]

從「海虞翟氏鐵琴銅劍樓影鈔本」、「臣翟啓甲呈進」等字得知，此本是宣統三年（1911）翟啓甲任浙江補用同知，爲當時京師圖書館正監督繆荃孫所進呈的五十種書籍，其中子部抄本十二種，便有「《新纂香譜》二卷」。[41]

其抄錄緣由，在〈學部爲送翟氏書籍抄本五十種咨京師圖書館文〉中紀錄甚詳。緣自張之洞掌管學部，設立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前身），兩江總督端方建議購藏翟氏藏書，見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學部議購書設備圖書館」條下注云：

> 江南創建圖書館，既購致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庋之館中。陸氏皕宋樓為日本以重金輦載而去；翟氏鐵琴銅劍樓書亦有覬覦者。江督忠敏公端方議購翟氏書供京師圖書館庋藏。公屬竭力圖之，翟氏未允……。[42]

由於翟啓甲藏書甚謹，未允購書，乃由徵購改爲「酌量呈獻」儲之圖書館。宣統元年（1909）五月京師圖書館監督繆荃孫，就翟氏書目詳加選擇，從其中外間較少流傳的孤本或舊鈔本摘出七十一種，囑翟啓甲精抄，並益以舊刊本二十九種，足成百種，俟抄畢後一併呈進。啓甲趕覓寫生不成，僅得五十種於宣統三年呈交監督繆解儲京館，並就其抄錄經過，稟稱：

> 悉照原本體例，敬謹影鈔。原書中間有魯魚，實難另覓善本校對，但地處偏隅，寫手極少，而進呈之文件，又不敢草率從事。兩年以來僅得半數……爰將抄成之三十七種，暨元明及汲古閣等舊刊本十三種，合成五十種，一律裝訂完備，隨開書目，詳細注明影本圖章，呈交監督繆解儲京館，一面咨部查考。其餘一半，再當添覓寫生，趕速辦理，一俟完竣，隨時呈進。……[43]

---

[39]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子部譜錄類，頁 1374。

[40]陳敬，《新纂香譜》，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鐵琴銅劍樓影鈔本，A02747。

[41]見〈學部為送翟氏書籍抄本五十種咨京師圖書館文〉，《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附：書目抄單」，頁 139。

[42]胡鈞，《張文襄公（之洞）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卷 6，頁 263-264。

[43]〈學部為送翟氏書籍抄本五十種咨京師圖書館文〉，頁 138-139。

翟氏雖奉命繼續辦理，但因民國創建，其餘五十種遂未行。

其二，爲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稱之清抄本《新纂香譜》，二冊，十行二十字無格，存二卷一、二。[44]。見清抄本，卷首扉葉有不知撰者手書雍正庚戌（即雍正八年，1730）題識，云：

> 《新纂香譜》，河南陳敬，子中編次，內府元人鈔本。凡古今香品、香異、修製、印篆、凝和、佩薰、塗傅等香，及餅、煤、珠、藥、茶，以至事類、傳、序、銘、說、頌、賦、詩，莫不網羅搜討一具載，錢尊王讀書敏求記云云。原書四卷，此從維揚馬氏借得尚缺後二卷，何時更求別本足之，庶幾珠連璧合，不亦稱藝林中一快事耶。雍正庚戌冬至前一日識。

題識下鈐印：「家住錢塘東復東」白文長方印。次頁「河南陳氏香譜序」下鈐：「稽瑞樓」、「北京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文瑞樓藏書印」等印。

值得注意是此本鈐有「稽瑞樓」白文長方印。稽瑞樓爲清陳揆（1780-1825）之藏書樓名，位於常熟。據《稽瑞樓藏書目錄》卷四記有：「《陳氏香譜》二卷舊鈔殘本二冊」[45]此鈔本確爲稽瑞樓舊藏。又有「文瑞樓藏書印」朱文長方印、「銅琴鐵劍樓」白文長方印，此本流傳有緒，即是《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稱舊鈔本。

關於卷首扉葉雍正八年不知撰者手書題識的作者問題，除了《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記：「舊爲文瑞樓藏本，從小玲瓏山館馬氏假得傳鈔者，當時已非全帙矣……」。又此題識時間與金檀於康、雍時期，注校書籍或假歸手鈔頗多。見《嘉興府志》卷六十一〈桐鄉文苑〉云：

> 金檀，字星軺，諸生。經史圖籍靡不遍覽，好聚書，遇善本雖重價不吝，或假歸手鈔。積數十年，收藏之富，甲於一邑。嘗校刊貝清江、程巽隱詩文集行世。所著有文瑞樓集、消暑偶錄。[46]

另見楊蟠〈文瑞樓書目序〉有金檀於康熙己亥（五十八年，1719）校刊《貝清江集》四十卷、《程巽隱集》四卷。[47]又於雍正六年（1728）輯注明代高啓

---

[44]陳敬，《新纂香譜》，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清抄本，06873。

[45]陳揆，《稽瑞樓藏書目錄》（《書目五編》，據《滂喜齋叢書》本，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卷 4，頁 232。

[46]許瑤光等，《浙江省嘉興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5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卷 61，頁 1811。

[47]楊蟠，〈文瑞樓書目序〉，《文瑞樓藏書目》（《書目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頁 1。

（1336-1374）之《青邱詩集》並爲之序。[48]推測得知《新纂香譜》雍正八年題識應爲文瑞樓金檀所撰。

故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新纂香譜》二卷之清抄本，實爲鐵琴銅劍樓所藏舊鈔本，翟本則爲翟啓甲於宣統三年據原本體例影鈔進呈。

（二）《適園叢書》本

清吳興烏程人張鈞衡（1872-1927）於民國初年輯刊《適園叢書》，收入《新纂香譜》二卷。據《適園藏書志》記：

> 《新纂香譜》二卷傳鈔本。宋陳敬撰，敬字子中，河南人。原書四卷，此存卷一卷二，為香品、香異、修製、印篆、凝和諸類。有熊朋來序，洪氏《香譜》序、顏氏《香譜》序、葉氏《香錄》。《敏求記》著錄即此本。今刻入適園叢書。[49]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本一部，書中鈐有「莛圃收藏」朱文長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等。[50]「莛圃」爲張鈞衡子乃熊（1891-1942）字，寓居上海，搜書亦勤，其《莛圃善本書目》卷五亦載有此譜，云：「《香譜》四卷，元陳敬編，鈔本，四冊，校。」。[51]故知此本即《適園藏書志》卷七所著錄者，爲張氏所珍藏。

此傳鈔本，全幅高二四•一公分，寬十五•六公分，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不定。有目錄，卷首首行頂格題「新纂香譜卷第一」，次行低七格題「河南陳敬子中編次」，卷末有尾題。卷首收錄有：至治壬戌二年熊朋來河南陳氏香譜序、洪氏香譜序、雲龕居士顏氏香史序、紹興二十一年葉庭珪之葉氏香譜序。序後有「集會諸家香譜目錄」與《新纂香譜》目錄。內容爲：卷之一香品、卷之二印篆諸香、凝和諸香。卷首扉葉如前述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清抄本，亦有不知撰者手書雍正庚戌（即雍正八年，1730）題識，說明此本亦出自維揚馬氏。[52]

仔細觀察比較鐵琴銅劍樓清抄本與《適園叢書》本，兩本雍正八年題識的書法結體與章法十分相似，應爲同一來源影鈔。惟其後「陳氏香譜原序」之書法差異性較爲明顯，但無格、行數、字數等俱同。

---

[48]高啟，《青邱詩集注》（《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年），金檀序。

[49]張鈞衡，《適園藏書志》（《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8 年），卷 7，頁 355-356。

[50]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臺北：國家圖書館編印，1998 年），頁 51。

[51]張乃熊，《莛圃善本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69 年），卷 5 上，頁 126。

[52]陳敬，《新纂香譜》，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善本，06853。

此外，《適園叢書》本《新纂香譜》卷末又附張鈞衡丁巳年（民國六年，1917）跋，如下：

> 《新纂香譜》二卷，宋陳敬撰，案陳敬字子中，河南人，其仕履未詳。原本四卷，此存卷一、卷二為：香品、香異、修製、印篆、凝和諸類。……是書所采沈立之洪駒父《香譜》、武岡公庫《香譜》、張子敬《續香譜》、潛齋《香譜拾遺》、顏持約《香史》、葉庭珪《香錄》、《是齋售用錄》、《溫氏雜記》各種，有熊朋來序。今洪氏《香譜》已非其舊，餘皆不傳，為此尚具崖略，存一書以存眾書，則是本足貴也。尚存顧（顧：應為顏之誤）氏《香史》、葉氏《香譜》兩序歲次強圉大荒落如月，吳興張鈞衡跋。[53]

《新纂香譜》二卷均以傳抄本流傳，皆從小玲瓏山館馬氏所藏內府元人鈔本所出之一、二卷殘本。其後鐵琴銅劍樓藏有清抄本與宣統三年影鈔本，《適園叢書》亦有傳抄。此本今以《適園叢書》本流通較廣，《叢書集成續編》據《適園叢書》排印本最常見。

參、《陳氏香譜》與《新纂香譜》之輯校

四庫本《陳氏香譜》在流傳刊刻的過程，有將注明香方出處之小注刪去之現象，而《新纂香譜》附有印篆插圖也未見於四庫本中。可以證明小注被刪除的實例，如陳譜卷二有：「清遠香局方」條目[54]，此處是將原爲小注「局方」兩字衍入條目中，而保留下來。此「清遠香」出自「局方」，即《新纂香譜》「集會諸家目錄」中的《局方》第十卷。

《陳氏香譜》原四卷，《新纂香譜》僅存二卷，經刪削增衍如何見其原貌？然有明代周嘉胄《香乘》依據陳敬所撰《香譜》廣輯而成，仍保留小注說明出處與印篆附圖，並可作爲《新纂香譜》缺後二卷之憾。故今取《陳氏香譜》四庫本爲底本，適園叢書《新纂香譜》二卷本爲輔，佐以明末周嘉胄撰《香乘》四庫本。三譜相較，補充陳譜所缺，期得一較爲完善本子，作爲後續研究。

以明代周嘉胄《香乘》佐校之原因，有二：第一，《香乘》爲今最早引用陳譜資料者，其論及宋代洪、顏、沈、葉四氏《香譜》內容，實則取自陳譜。第二，周嘉胄編輯《香乘》所見陳譜與今傳四卷本不同，且內容與《新纂香譜》較爲相近，又能補充《新纂香譜》缺後二卷之憾。

---

[53]陳敬，《新纂香譜》（《叢書集成續編》第 8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頁 733。
[54]《陳氏香譜》，頁 278。

周嘉胄（1582-1658/61），字江左，揚州人，撰《香乘》於明崇禎辛巳（十四年，1641）刊成，提要謂：「此書初纂於萬曆戊午止一十三卷，李維禎爲作序，後自病其疏略，續輯爲二十八卷，以崇禎辛巳刊成」。[55]

得知《香乘》一書初稿爲萬曆戊午（四十六年，1618），全書刊成於崇禎十四年，分次完成。見周嘉胄自序提及：

> 少時嘗為此書鳩集一十三卷，時欲命梓，殊歉卦漏，乃復窮搜遍輯，積有年月通得二十八卷。嗣後次第獲覩洪、顏、沈、葉四氏香譜，每譜卷帙寥寥，似未賅博，然又皆脩合香方過半，且四氏所纂，互相重複，至如：幽蘭、木蘭等賦於譜無關。經余所採，通不多則，而辯論經審，葉氏居優，其脩合諸方，時有資焉。……[56]

周嘉胄自序雖云：「嗣後次第獲覩洪、顏、沈、葉四氏香譜，每譜卷帙寥寥，似未賅博，…」實則此四譜是來自於《陳氏香譜》書後二編。見同書卷二十八「附諸譜序」自注云：

> 河南陳氏曾合四譜為書後二編，為陳序者併為，余纂建勳諸序，彙此以存異代同心之契。[57]

換言之，周嘉胄提及所見之洪、顏、沈、葉四譜，是《陳氏香譜》書後二編所附，並非四譜原書；且據明清各家著錄中未見提及沈立《香譜》、顏持約《香史》等譜，佚失已久。故《香乘》所引宋之洪、顏、沈、葉四譜，皆輯自陳譜而來。證之《香乘》內容，所輯宋代眾家香譜內容確皆抄錄陳譜，周氏加以細分另立標題、重新排次。若去除周嘉胄新增之金、元、明等資料，以及將無法確定爲陳譜所出之資料剔除，應較能完整還原陳譜原貌。

據此，《新纂香譜》與《香乘》對陳譜可資補充之處，主要有四項：序文、集會諸家香譜目錄、「凝和、佩熏、塗傅」諸香之香方注文出處、印篆諸香附圖等。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序文

四庫本《陳氏香譜》除四庫提要之外，僅有至治二年熊朋來「陳氏香譜原序」，無目錄。

---

[55]《香乘》，提要，頁 352。
[56]《香乘》，周嘉胄序，頁 350。
[57]《香乘》，卷 28，頁 579。

《新纂香譜》卷首有雍正庚戌（即雍正八年，1730）之題識，次爲至治二年熊朋來「河南陳氏香譜序」與不具名「洪氏香譜序」、雲龕居士「顏氏香譜序」、紹興二十一年葉庭珪「葉氏香譜序」等三篇。《香乘》則多出「李琳序」一篇。

其一，不具名的「洪氏香譜序」云：

> 《書》稱：至治馨香，明德惟馨，反是則曰腥聞在上，傳之（《香乘》：以）芝蘭之室、鮑魚之肆，為善惡之辨。《離騷》以蘭、蕙、杜蘅為君子；糞壤、蕭艾為小人。君子澡雪其身，熏祓以道義，有無窮之聞，予（《香乘》：余）之譜亦是意云。

從「集會諸家香譜目錄」得知，此爲洪芻駒父之《香譜》序。此序未見於今傳之洪芻《香譜》一書中，可據此補入洪譜中。

其二，雲龕居士「顏氏香史序」：

> 焚香之法，不見於三代。漢唐之（《香乘》：衣）冠之儒稍稍用之。然返魂飛氣出于道家，栴檀、伽羅盛于緇廬。名之奇者，則有燕尾、雞舌、龍涎、鳳腦；品之異者，則有紅、藍、赤檀、白茅、青桂；其貴重者則有水沈、雄麝；其幽遠則有石葉、木蜜。百濯之珍、罽賓、月支之貢（《香乘》：貴），泛泛如濆珠霧不可勝計。然多出于尚怪之士，未可皆信其有無。彼欲刳凡剔俗，其合和窨造自有佳處。惟深得三昧，乃盡其妙。因探（《香乘》：採）古今熏脩之法釐為二（《香乘》：六）編，以其敘香之行事，故曰：史香（《香乘》：香史）。不徒為熏潔也，五臟惟脾喜香以養，鼻通神觀而去尤疾焉。然黃冠皁（《香乘》：緇）衣之師久習靈壇之供，錦韝紈袴之子，少耽洞房之樂，觀是書也，不為無補云耳（《香乘》無「云耳」）。雲龕居士序。

顏氏即是顏博文，字持約，德州（今山東陵縣）人，徽宗政和八年（1118）進士，欽宗靖康二年（1127），爲秘書省著作郎，金人陷汴，充張邦昌事務官，於高宗紹興二年（1132），責果州別駕，永不敘用。顏博文與撰寫《香譜》之洪芻均在靖康之時失節而免官。《畫史會要》稱其：「長於水墨，作人物筆法位置如李伯時，又善墨梅。」[58]

又《陳氏香譜》卷四收錄顏博文〈雞舌香賦〉一篇、〈覓香〉詩一首，俱未見他書收錄，可作爲顏博文詩文輯軼之用。

其三，「葉氏香譜序」：

---

[58]朱謀垔，《畫史會要》（《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 2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卷 2，葉十七。

> 古者無香，燔柴炳蕭尚氣臭而已。故香之字雖載于經，而非今之所謂香也。至漢以來，外域入貢，香之名始見于百家傳記，而南蕃之香獨後出焉。世亦罕能盡知（《香乘》作：世亦罕知不能盡之）。余於泉州職事實兼舶司。因蕃商之至，訊（《香乘》作：詢）究本末，錄之以廣異聞，亦君子恥一物不知之意。紹興二十一年左朝請大夫知泉州軍州事葉庭珪序。

葉氏爲葉庭珪（一作廷珪），字嗣忠，號翠巖，甌寧（今福建建甌）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進士，除武邑丞，轉知德興縣。高宗紹興中知福清縣，後召爲太常寺丞，遷兵部郎中，議與秦檜忤，紹興十八年（1148），以左朝請大夫知泉州軍州，後移漳州，奉祠歸。庭珪喜讀書，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讀，則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海錄碎事」。今有《海錄碎事》二十二卷。又據《宋史・藝文志》卷二百五撰有：《南蕃香錄》一卷。《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二百二十九有「《南蕃香錄》一卷。陳氏曰：泉州葉庭珪撰」[59]，今佚。

葉庭珪從紹興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任泉州軍州事，長達四年。泉州瀕海利於貿香之蕃舶往來，自北宋即是重要的貿易港口，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設泉州市舶司與域外各國通商。《宋史・食貨志》卷一百八十六記載：「太宗時，置榷署於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60]南宋時期更依賴泉州港與域外貿易，吳自牧《夢粱錄》便稱：「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61]

陳譜卷一「香品」諸條目，引葉庭珪語眾多。

其四，至治二年李琳序，此序僅見《香乘》卷二十八「附諸譜序」中。李琳序云：

> 韋應物掃地焚香，燕寢為之凝清;黃魯直隱几炷香，靈臺為之空湛。從來韻人勝士爐霏晝牧、道心純淨，法應如是。汴陳浩卿於清江，出其先君中齋公所輯《香譜》。如銖熏初褪縹緲，願香悟韋郎於白傅之香山，識涪翁於黃仙之叱石，是譜之香遠矣。浩卿卓然肯構，能使書香不斷。經傳之雅馥芳韶、騷選之靚腓初曙，方遺家譜可也。袖中后山瓣香，亦當詢龍象法筵、拈起超方迴向。至治壬戌夏五長沙梅花溪道人李琳書。

---

[59]馬端臨，《文獻通考》（《歷代經籍考》，臺北：新興書局，1959 年），頁 1832。

[60]《新校本宋史》〈食貨志〉，卷 186，「互市舶法」條，頁 4559。

[61]吳自牧，《夢粱錄》（《宋史資料萃編》第四輯，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卷 12，「江海船艦」條，頁 323。

二、集會諸家香譜目錄

《新纂香譜》序後附「集會諸家香譜目錄」爲：

> 沈立之《香譜》、洪駒父《香譜》、武岡公庫《香譜》、張子敬《續香譜》、潛齋《香譜拾遺》、顏持約《香史》、葉庭珪《香錄》、《局方》第十卷、《是齋售用錄》、《溫氏雜記》、《事林廣記》。

「集會諸家香譜目錄」之重要性，僅存於《新纂香譜》一書中，且以上計十一種書目，皆是陳敬撰寫此譜時所引用的資料，見證宋代香藥之興榮繁盛。雖號稱諸家《香譜》，實則內容廣泛，遍及醫書藥典、紀錄生活日用之類書、農書、筆記雜抄等。惟今存者僅有：洪芻《香譜》，以及屬於類書之陳元靚《事林廣記》和方書《局方》第十卷，即《太平惠民局方》。而葉庭珪《香錄》，今存者稱《名香譜》。

另，沈立《香譜》、張子敬《續香譜》、潛齋《香譜拾遺》、顏持約《香史》、武岡公庫《香譜》、《是齋售用錄》、《溫氏雜記》等，皆佚失不傳。

《是齋售用》一書見於《宋史・藝文志》卷二百五農家類，著錄有：「《是齋售用》一卷」。[62]

《溫氏雜錄》，即溫子皮所撰，其人事蹟不詳。《陳氏香譜》卷一有引溫子皮語，計：「乳香」、「安息香」、「龍涎香」、「甲香」、「南方花」五條。內容以辨別香品之真僞及驗試經驗、花香熏香方法等，是對香實際應用後的心得，充分反映宋人對香的辨識成就。

「乳香」條，有「溫子皮云：廣州蕃藥多僞者，僞乳香以白膠香攪糟爲之，但燒之煙散多，此僞者是也。真乳香與茯苓共嚼則成水。又云：「　山石乳香，玲瓏而有蜂窩者爲真，每熱之，次熱沉檀之屬，則香氣爲乳香，煙置定難散者是，否則白膠香也。」

「安息香」條：「溫子皮云：辨真安息香，每燒之以厚紙覆其上，香透者是，否則僞也。」

「龍涎香」條：「溫子皮云:真龍涎燒之置杯水於側，則煙入水；假者則散，嘗試之有驗。」

「甲香」條：「溫子皮云：正甲香本是海螺壓子也，唯廣南來者其色青黃，長三寸，河中府者只闊寸餘，嘉州亦有，如錢樣大，於木上磨令熱即投釀酒中，自然相近者是也。若合香偶無甲香則以鱟殼代之，其勢力與中香均尾尤好。」

---

[62]《新校本宋史》，〈藝文志〉，卷 205，「農家類」，頁 5205。

「南方花」條：「溫子皮云：素馨末利，摘下花蕊香纔過，即以酒噀之復香。凡是生香蒸過爲佳，每四時遇花之香者，皆次次蒸之，如：梅花、瑞香、酴醾、密友、梔子、末利、木犀及橙橘花之類，皆可蒸，他日熱之則群花之香畢備。」

今佚失「眾香譜」中，成書最早爲北宋沈立《香譜》。沈譜見之宋元文獻著錄，如：鄭樵（1104-1162）《通志》卷六十六〈食貨・器用〉著錄：「香譜四卷沈立撰」[63]，尤袤（1127-1194）《遂初堂書目・譜錄類》有「沈氏香譜」未言明卷次。另據元脫脫（1313-1355）《宋史・藝文志》：沈立《香譜》一卷。史載沈立《香譜》有四卷與一卷之別，若與晚出的洪芻《香譜》二卷相較，周紫芝認爲洪譜所集香事勝於沈譜，故沈譜理應爲一卷本。且洪譜出而沈譜失，周紫芝（1082-1155）〈書洪駒父香譜後〉云：「曆陽沈諫議家，昔號藏書最多者，今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爲盡得諸家所載香事矣。以今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二三也。……」[64]

沈立（1007-1078），《宋史》卷三三三有傳，字立之，曆陽（今安徽和縣）人，仁宗天聖間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嘉祐中，爲淮南轉運副使，遷京西北路轉運使。加集賢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爲江、淮、兩浙、荊、湖六路制置發運使。事蹟詳見〈右諫議大夫沈公神道碑〉[65]。

沈譜雖佚，《陳氏香譜》尚保留部分面貌。如：據《新纂香譜》卷一「百刻香篆」條，沈立云：

> ……。昔嘗撰《香譜》序百刻香印未甚詳，廣德吳正仲製其篆刻并香法，見貺較之頗精審，非雅才妙思，孰能至是，因刻於石傳諸好事者。熙寧甲寅歲仲春二日右諫議大夫知宣城郡沈立題。

據此段可得知沈立撰寫《香譜》的時間應略早於神宗熙寧甲寅（七年，1074）。

又依《陳氏香譜》注文出處，輯出沈譜，在「脩製諸香」有：「飛樟腦、龍腦、檀香、煅炭、窖香」等五條；從《新纂香譜》輯佚出自沈譜有：「印篆香」二條，「凝和香」香方二十四條、《香乘》則輯出沈譜「凝和香」五條、「佩熏香」一條、熏香用「香餅」、「香煤」各一條。

這些資料提供認識北宋時期的用香文化，如脩製諸香中的飛樟腦、龍腦、檀香等三種香藥，透過撿、選、炮、炙、炒、煅、煨、蒸、飛等一定程序的處理方式。據此，北宋沈立紀錄了香藥的完整脩製過程，而且依用途不同，作爲凝和、印篆或佩熏等一應俱全。

---

[63]鄭樵，《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63 年），卷 66〈食貨・器用〉，頁 784。

[64]周紫芝，〈書洪駒父香譜後〉，《太倉梯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頁 480。

[65]楊傑，《無為集》（《四庫全書珍本・五集》，第 2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 年），卷 12，葉八-十三。

而專門用作香炭者，要其氣味純淨，「煅炭」云：

> 凡合香用炭不拘黑白，重（《香乘》作熏）煆作火　於密器冷定，一則去炭中生薪，一則去炭中雜穢之氣。

香炭的作用，作爲引燃香之用，故不能有生薪味與雜穢氣，以免影響香味散發。從此得知北宋用香之事發展繁複後，便出現類似香炭功能，熏香專用的「香餅」、「香煤」。

至於從陳譜中引用沈譜之「窨香」談的是香藥的收儲，云：

> 香非一體，濕者易和，燥者難調；輕軟者燃速，重實者化遲，以火鍊結之，則走洩其氣，故必用淨器拭極乾貯窨，蜜（《香乘》作：令密）掘地藏之，則香性粗入不復離解。新和香必須窨，貴其燥濕得宜也。每約香多少貯以不津瓷器蠟紙封於靜室屋中，掘地窗深三、五寸，月餘逐旋取出其尤　氹也。沈譜。

「集會諸家目錄」中特別值得一提是：武岡公庫《香譜》，爲宋代地方公使庫爲香藥儲銷立譜，是理解地方官營香藥史料的重要線索。

武岡公庫《香譜》，今雖佚。但從《新纂香譜》輯出武岡公庫《香譜》所屬「凝和香」香方十條，《香乘》輯出「凝和香」香方十一條、「佩熏香」七條、「塗傅香」一條。

武岡，爲荊湖南路邵州之武岡縣（即今之湖南武岡），崇寧五年（1106）升爲武岡軍。[66]宋代行政劃分爲路、州（府、軍、監）、縣三級制。州、府、軍、監爲同級行政組織，衝要之處設「軍」，礦州設「監」，一般之地設「州」。

由於宋代的「軍」，多設於軍事重地，且多數非農業生產地帶，所以常由中央政府般（頒）發香藥，以博糴軍糧或其地附近的特產如絲絹等。此外，中央政府也將儲藏的香藥，分赴各州軍出賣，以增加財源。[67]

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六榷易條：

> 景德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司言請河北轉運司有輸　入官者，准便糴粟麥例給八分緡錢、二分象牙香藥，其廣信、安肅、北平粟麥悉以香藥博糴。時邊城頗乏兵食，有司請下轉運司經度之……，因命祠

[66]《新校本宋史》，〈地理志〉，卷 88，「荊湖南路」條：「南路，州七：潭、衡、道、永、邵、郴、全，軍一：武岡，……」，頁 2189。又「武岡軍，崇寧五年，以邵州武岡縣升為軍。……」，頁 2201。

[67]《宋代香藥貿易史》，頁 266。

部郎中樂和乘驛與轉運使同為規畫。還奏，請以香藥博買，遂從其議。出內帑香藥二十萬貫往彼供給。[68]

武岡軍位居荊湖南路衝要，「與湖北、廣西鄰壤，爲極邊之地」[69]，中央向例發給州軍香藥以備博易米糧軍需，且武岡設有「榷貨務」，簡稱爲「務」，掌理香藥買賣。[70]

公庫，即公使庫簡稱。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七「公使庫」條云：「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71]公使庫爲地方官營機構，公使庫刊刻書籍稱之「公使庫本」[72]，官營酒坊所釀之酒稱爲「公庫酒」或「公使庫酒」。[73]

如前所述，因武岡公庫有管理香藥儲銷之責，用香藥博易米糧作爲軍需，加之香藥種類繁雜，價格不一，武岡公庫爲紀錄其管理之香藥儲存、交易而發行武岡公庫《香譜》以備所需。

又從《陳氏香譜》所記錄香方，除武岡公庫《香譜》之外，宋代其他區域公庫亦有各自香藥香方流傳，如：「定州公庫印香」、「和州公庫印香」、「滁州公庫天花香」等。

「集會諸家香譜目錄」中今存的《香譜》中，以洪駒父《香譜》，即洪芻《香譜》最爲周全。

洪芻字駒父，建昌人（今江西南康），紹聖元年（1904）進士，爲江西詩派重要人物，生於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靖康中官至諫議大夫，高宗建炎二(1128)年九月流放沙門島後卒。

洪芻之舅爲宋代文豪黃庭堅，舅侄關係十分特別。黃庭堅的母親李夫人與洪芻的祖母同爲姐妹，洪芻的父親洪民師又娶庭堅之妹，這種親上加親的關係，使

---

[68]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139 冊，〈食貨三六〉，頁 5434。

[69]《新校本宋史》，〈蠻夷傳〉，卷 494，頁 14192。

[70]見《宋代香藥貿易史》，轉引《宋會要輯稿・食貨》，十五至十七商稅條記載：「荊湖南路邵州有：在城及武岡、白沙三務。」，頁 285。

[71]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甲集，卷 17，「公使庫」，頁 397。

[72]沈括，《夢溪筆談校證》(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序跋第一「津逮秘書本夢溪筆談識二」，毛晉云：「余閱范文穆公志云：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蘇郡，始大脩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頁 1092。

[73]程大昌《續演繁錄》（《百部叢書集成》，據《學津討源》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卷 6：「今人謂公庫酒為兵廚酒，言公庫之酒因犒軍而醞也。」，葉二。另見《宋史・食貨志》，卷 185 云：「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酤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頁 4521。

得兩家的淵源深厚。加之洪芻幼年雙親早逝，教養工作由祖母，即黃庭堅姨母李氏親力爲之。李氏出身於江西望族，與黃庭堅的母親爲姐妹，兄弟中以御史中丞李常（公擇）最爲有名。黃山谷爲紀念其妹撰寫〈毀壁序〉云：

> 夫人黃氏先大夫之長女……太夫人為家世堙替，持孤女托以夫人歸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甚文，有權智如士大夫。[74]

《南康府志・洪朋傳》亦云：「幼孤，受業於祖母文成君李氏，手不釋書，落筆成文，尤長於詩」。[75]文成君即文城君，《南康府志》作「文成君」。

洪芻《香譜》是今僅存北宋時期《香譜》書籍，南宋高宗紹興年間已廣爲流傳，分別成書於紹興二十一年與二十二年的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和周紫芝（1082-1155）《太倉稊米集》俱著錄此譜。周紫芝〈書洪駒父香譜後〉推重洪譜在沈譜之上，謂：「歷陽沈諫議家，昔號藏書最多者，今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爲盡得諸家所載香事矣。以今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76]

今此譜流傳之版本，至少有十三種之多，有一卷與二卷之別。常見通行之一卷本《香譜》爲《説郛》百卷本，二卷本《香譜》爲《百川學海》本。[77]

其次，葉庭珪《香錄》，應爲《宋史・藝文志》所記之《南蕃香錄》簡稱。今已佚。但今所見名爲葉氏《名香譜》一卷，收錄於《香豔叢書》、《說郛》本卷九十八。此譜無序，僅著錄名香五十四品。[78]又今存葉氏所撰《海錄碎事》卷六「香門」記載二十七條香事、香方，[79]與《名香譜》之內容亦不同。

從《陳氏香譜》所引葉庭珪之文，與今存《名香譜》、《海錄碎事・香門》相校，三者內容迥異。因之，《陳氏香譜》所引葉庭珪文，可資輯軼。

「集會諸家香譜目錄」中，最具代表性的醫方書，莫過於《局方》第十卷。

《局方》第十卷爲何？《新纂香譜》中有小注「局方」者，有清遠香、清心降真香等二條。又據《香乘》引陳譜之佩熏香第四十二條：「熏衣芬積香」小注文爲「和劑」兩字。

---

[74]見盛元纂修，《南康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據清同治十一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卷 21，〈藝文・文徵〉，黃庭堅〈毀壁序〉，頁 513。

[75]《南康府志》，卷 16，〈人物・宋〉，頁 401。

[76]見周紫芝，〈書洪駒父香譜後〉，《太倉梯米集》，頁 480。

[77]劉靜敏，〈宋洪芻及其《香譜》之研究〉，《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台中：逢甲大學，2006 年），第 12 期，頁 96。

[78]葉庭珪，《名香譜》（《叢書集成續編》第 86 冊，據《香豔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頁 681-683。

[79]葉庭珪，《海錄碎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卷 6，香門，頁 245-246。

由於宋之前醫方多禁閉不傳，宋代設官醫局頒行公佈成藥處方配本，爲「局方」之始，最早名爲《太醫局方》爲宋太醫局所編。徽宗崇寧間（1102-1106），藥局擬定製劑規範，改稱《和劑局方》。大觀時（1107-1110）醫官陳承、裴宗元、陳師文加以校正，成五卷二十一門、收二七九方。南渡後，紹興十八年（1148）藥局改「太平惠民局」，《和劑局方》改爲《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後又經寶慶、淳祐，陸續增補而爲十卷，即今通行之陳師文《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80]

今傳《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大量使用香藥製成圓、湯、散等，如：麝香天麻圓、龍腦天麻煎、乳香沒藥圓（卷之一）、蘇合香圓、安息香圓、烏沉湯、沉香降氣湯（卷之二）……等不勝枚舉，但未見前述出自《局方》之清遠香、清心降真香、熏衣芬積香等香方。不過從楊守敬（1839-1915） 在日本時所集書影，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刻之《留真譜初編》，其中收錄元大德八年余志安勤有堂刻本《增註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卷之十則有「清遠香」。[81]

陳敬引《局方》顯示宋代方藥流行，香藥普遍爲民間所用之現象。

三、「凝和、佩熏、塗傅」諸香之香方注文出處

《陳氏香譜》卷二、三之「凝和諸香」採錄各種合香配方。依據陳敬引書方式，皆以小字注明出處，惟四庫本陳譜「凝和諸香」大部分未見出處小注。其卷三、四之佩薰、塗傅等香出處，亦闕如。今據《新纂香譜》與《香乘》可以輯校其引文出處。

以《新纂香譜》卷二爲例，如：

香方小字注明「沈」字，出自於沈立《香譜》，有：龍麝印香（夾箋香）、丁公美香篆、蘇州王氏幃中香、蘇內翰貧衙香、錢塘僧日休衙香、金粟衙香、衙香（紫檀）、神仙合香、邢太尉韻勝清遠香、濕香（檀香）、清真香（沉香）、清妙香（沉香）、王將明太宰龍涎香、亞里木吃蘭脾龍涎香、龍涎香（丁香）、古龍涎香（好沉香）、吳侍郎龍津香、宣和內府降真香、江南李主煎沉、芬積香（丁香皮）、夾箋香（夾箋香）、壽陽公主梅花香、梅花香（玄參）、梅花香（甘松）、梅英香（沉香）等，共二十五條。

注明「洪」字，係出自於洪芻《香譜》，有：供佛印香（箋香）、寶篆香、唐化度寺衙香、雍文徹郎中衙香、延安郡公蕊香、供佛濕香、寶毬香等七條。

注明「武」字，爲來自武岡公庫《香譜》，有：衙香（茅香）、嬰香、久窖濕香、丁晉公清真香、清神香（青木香）、楊吉老龍涎香、小芬積香（箋香）、藏春香、梅花香（沉香）、梅蕊香等，十條。

---

[80]陳師文等，《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臺北：旋風出版社，1975 年）。

[81]楊守敬，《留真譜初編》（《書目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第 8 冊，醫部，頁 700。

出自《神仙傳》，有：道香。

注明「售用錄」小字，爲引自《是齋售用錄》，有：宣和貴妃王氏金香、馮仲柔假篤褥香、馮仲柔四和香等三條。

出自《局方》第十卷，則注「局方」，有：清遠香（甘松十兩）、清心降真香等二條。

後經新增、補入者。有小注「補」字，共有：壓香、清遠香（甘松一兩）、內府龍涎香、清神濕香（芎鬚）、黃太史清真香、龍涎香（沉香）、智月龍涎香、古龍涎香（沉香）、小龍涎香（沉香）、華蓋香、芬積香（沉香）、四和香（檀香）等十二條。

另有注明「新增」有：水浮印香；「新」字，有：清遠香（甘松四兩）、日月供佛濕香（乳香）、龍涎香（速香）、小龍涎香（錦紋大黃）、香毬等六條。

又以《香乘》爲例，周嘉胄特意將陳譜之「凝和諸香」依香方配伍不同細分成：「法和眾妙香」與「凝合花香」兩種。卷十四至卷十七爲「法和眾妙香」，四卷，計一六二條。卷十八「凝合花香」，一卷，計六十九條，總計二三一條。其中絕大部分係抄錄自陳譜，屬於周嘉胄新增者不多。而陳譜僅卷二、三之「凝和諸香」，便高達二二三條，且其中龍涎香（紫檀）、嵩州副宮李元老笑梅香、笑蘭香、春消息（丁香）、金龜香燈、金龜延壽香等六種香方，《香乘》未錄。

可資補入陳譜者，爲《香乘》卷十八之「笑梅香（沉香）」，《香乘》有小字注明「武」，係出自武岡公庫《香譜》。

此外，陳譜將以「香附子」爲主之配方「道香」條目誤爲「金粟衙香」，今據《香乘》與《新纂香譜》更正。並另依《新纂香譜》之「金粟衙香（梅蠟香）」增補之。

至於香方名稱互異者有：

陳譜、《新纂香譜》：「後蜀孟主衙香」，《香乘》則稱：「花蕊夫人衙香」。

陳譜、《新纂香譜》爲：「開元幃中香」，《香乘》題爲：「楊貴妃幃中香」。

陳譜：「宣和貴妃黃氏金香」。據《香乘》、《新纂香譜》改爲：「宣和貴妃王氏金香」。

陳譜：「僧會深溫香」、「供佛溫香」。據《香乘》、《新纂香譜》爲「僧會深溼香」、「供佛濕香」。

陳譜：「楊古老龍涎香」，據《香乘》、《新纂香譜》爲「楊吉老龍涎香」。

依據《香乘》與《新纂香譜》參校後，陳譜之「凝和諸香」，可補入「金粟衙香（梅蠟香）」、「笑梅香（沉香）」兩方。

四、印篆諸香附圖

書籍中附載插圖，有助於讀者對敘述內容的直接理解。圖書即是圖與書的合稱，文不足以圖補之，圖不足以文敘之。鄭樵在《通志・圖譜略・索象篇》便對古代圖文形式有「左圖右史」之稱。[82]

適園叢書本《新纂香譜》卷二收錄印篆香圖十六幅，是今所見最早的印篆香圖。雖然其中「大衍篆圖」，有「鄒象潭見授此圖……。天歷（案：曆）二年歲次己巳良月朔旦中齋居士書」[83]元代天曆二年（1329）紀年號較陳譜刊刻之至治二年（1322）略晚，後人增補的情形明顯。但據《新纂香譜》補入《陳氏香譜》所缺的印篆香圖亦可作爲參考之用。

所謂印篆即是印香，也稱香篆。印篆諸香是將多種香藥焙研搗製成粉末狀，依香方比例調配合製成，多置放於木刻的範上脫出各種樣式字形或圖案，所謂「鏤木以爲之，以範香塵爲篆文」[84]。焚燒印篆香時，從一端開始慢燃，最後便留下有字形圖案的灰燼痕跡，形成美麗的圖案。從《新纂香譜》所附印篆香圖觀之，有綿延不絕的萬壽字，或可據以計算時間、分別節氣。

印香之始，據《陳氏香譜》卷二「五香夜刻（誤，應作五夜香刻）」條記載：「熙寧癸丑歲大旱，夏秋泉冬愆南井泉枯竭，民用艱險，時待次梅谿始作百刻香印，以準昏曉，又增置五夜香刻如左。」[85]此條是依據沈立〈宣州石刻〉所稱，因乾旱無法用水秤漏來計時，故於熙寧癸丑（六年，1073）因而發明以香計時，這是宋代獨特用法。

因此，依據合香粉末種類與印篆模印出各式圖形，計算出燃燒時間的長短，便可以計時。有燃燒一晝夜或終日不歇者，也可依據季節時序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印篆香方，如《新纂香譜》卷二「五更印刻」依節氣使用：「上印最長，自小雪後、大雪、冬至、小寒後單用。其次有甲、乙、丙、丁、四印並兩刻用。中印最平，自驚蟄後至春分後單用，秋分同。其前後有戊已印各一，並單用。末印最短，自芒種前及夏至小暑後單用。其前有庚辛、壬癸印並兩刻用。」

「五更印刻」下有小注「十三」字樣，應是表明有十三幅印篆香圖，《新纂香譜》中有不知名小印篆香圖十二幅，當缺一幅。其次，分別有：大衍篆（香）圖二幅、不具名大印篆香圖二幅等，連同上述十二幅，共計有圖十六幅。

---

[82]鄭樵，《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63 年），卷第 72〈圖譜略〉索象篇，頁 837。

[83]陳敬，《新纂香譜》（《叢書集成續編》第 8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卷之二，頁 712。另見《香乘》，卷 22，大衍篆圖稱「大衍篆香圖」，鄒象潭作「鄒象渾」，「澧之慈利」，作「豐之慈利」，頁 529。

[84]洪芻，《香譜》（《百部叢書集成》，據《百川學海》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卷下，「香篆」條：「鏤木以為之，以範香塵為篆文，燃於飲席或佛像前，往往有至二、三尺徑者。」，葉五。

[85]《陳氏香譜》，卷 2，「五夜香刻」條，頁 267。

四庫本《香乘》卷二十二則有：「五夜香刻（宣州石刻）、百刻香印、五更印刻」三香方，并圖二十一幅，分爲：大衍篆香圖（一幅）、百刻篆香圖（一幅）、五夜篆香圖（十三幅）、福慶香篆（一幅）、壽徵香篆（一幅）、長春篆香圖（一幅）、延壽篆香圖（一幅）、萬壽篆香圖（一幅）、內府篆香圖（一幅）等。

據《香乘》補輯，從兩者所著錄相同圖形的印篆香圖，可以得知在《新纂香譜》不具名的印篆香圖，依據《香乘》：「五更印刻」之圖稱爲「五夜篆香圖」，並補入一幅，共十三幅。其餘分別定名爲：大衍篆香圖、百刻香篆圖、萬壽篆香圖、內府篆香圖等，共計十七幅。

肆、結論

本文從《陳氏香譜》之著錄與他譜輯校所得，期望能梳理出《陳氏香譜》在流傳過程與今知見傳本優劣。

自清初，《陳氏香譜》便有四卷本與二卷殘本流傳。從陳敬編纂，成於其子陳浩卿之《陳氏香譜》始刻於元至治二年（1322）。四卷本的《陳氏香譜》約在嘉靖八年（1529）前後，明益王朱祐檳編入所輯《清媚合譜》中，且益府於崇禎十三（1640）年據元至治壬戌刻本重雕。依章鈺校證《讀書敏求記》明代萬曆年間陳譜另有《文房奇書》本，但今未見。

今所見四卷本爲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天一閣范懋柱進呈《陳氏香譜》四卷寫本，編入《四庫全書》中，即是今通行之四庫本。

另一《新纂香譜》二卷殘本，存卷一、二。《新纂香譜》之名，始見清初錢曾藏書，其《讀書敏求記》謂內府元人鈔本。從今本內容觀之，除新增有元天曆二年（1329）之百刻篆香圖外，其餘諸多香方有：「補」、「新增」、「新」等小字注文，又改題「新纂」兩字，皆說明此譜經後人增益。清代至民國著錄流傳者有嘉道時期鐵琴銅劍樓舊鈔本、宣統三年影鈔本，民國初年適園叢書本，以及道光年間路氏鈔本，路本今未見。今以《適園叢書》本流通較廣，《叢書集成續編》據《適園叢書》排印本最常見。

探究過程中意外得知《清媚合譜》中的《香譜》四卷即是《陳氏香譜》，並且從益府崇禎十三年重雕本得知《清媚合譜》詳細書目。又總目提要謂《陳氏香譜》爲江蘇巡撫採進本，但從採進書目中得知，原屬范欽天一閣舊藏寫本。這兩個發現對於深入研究陳譜在明代的流傳過程都有相當的助益。

此外也嘗試解決一些問題，今所見三部《新纂香譜》鈔本，皆是傳抄自清雍正時期揚州馬曰璐之小玲瓏山館，卷首扉葉也都有雍正八年（1730）不知撰者手書題識，從說明此本爲內府元人鈔本，從維揚馬氏借得尚缺二卷云云。本文從題識時間、流傳經過，認爲題識作者應是文瑞樓之金檀。

在輯校部分，《新纂香譜》優點有四，可補充《陳氏香譜》之闕漏。一是有：「洪芻香譜序、顏氏香史序、葉氏香譜序」三家序，皆他書未見。次有「集會諸家香譜目錄」，紀錄宋代十一家與香有關之專書，涵括官方編輯的武岡公庫《香譜》、類書、醫方與文人雜抄筆記，說明宋代香藥興盛之況。三有香方出處之注文，注明香方原始出處，可供輯佚；四有印篆香之插圖，詳細說明印篆香方之圖形，以及宋代分節氣以香計時之特色。

此外，也藉由成書於明末崇禎十四年（1641），周嘉胄所撰《香乘》，因廣輯《陳氏香譜》，故《新纂香譜》所缺三、四卷，可藉《香乘》佐校之。

清初錢曾對《陳氏香譜》之評價爲：「凡古今香品、香異、諸家修製、印篆凝和、佩薰、塗傅等香，及餅、煤、器、珠、藥、茶，以至事類、傳、序、說、銘、頌、賦、詩莫不網羅搜討，一一具載。」說明內容徵引廣泛，但亦如四庫館臣所說：「故所載頗泛濫無律」、「……至於經傳中字句偶涉而實非龍涎、迷迭之比。如卷首引《左傳》黍稷馨香等語，寥寥數則，以爲溯源經傳，殊爲無謂。……至於本出經典之事，乃往往掛漏，爲鬱金香載《說文》之說，而《周禮》鬱人條下，鄭康成之註，顧獨遺之，則又舉遠而略近矣。」

《陳氏香譜》之缺點，確實是「徵引既繁，不免以浩博爲長，稍踰限制」，不過也因徵引既繁，而保留許多今已散佚的史料。

綜觀之，《陳氏香譜》之價值爲：

其一，雖小道亦大有可觀。焚香乃小道，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謂：「古人命筆雖小道，不感聊爾成書。……書館琴窗，蕭晨良夜，靜對此譜，如燒大象藏香一丸，興光網雲，覆甘露味國，爾時鼻觀先參者爲何如也。」香之功能除作爲日常生活的清神、除穢、辟邪等之外；文人透過香，抒情吟詠；宗教藉由香鼻觀悟道，香是連接生活與精神層面的重要載體。

《陳氏香譜》確實反映精神與生活的多種層面，除了收錄與香有關的文人創作，更確實紀錄宋代社會用香概況，香藥醫方普及，並提供日常使用的香藥配製、收藏等等方法，乃至於官方香藥販賣交易，見證宋代豐富用香文化。

其二，輯佚之用。《陳氏香譜》彙集宋代十一家香譜，今多佚失，所存者亦非原貌。如四庫提要云：「然十一家之譜，今不盡傳，敬能薈萃群言，爲之總匯，佚文遺事，多賴以傳，要於考證，不爲無益也。」

今佚之沈立《香譜》、武岡公庫《香譜》、張子敬《續香譜》、潛齋《香譜拾遺》、顏博文《香史》等，從譜中尚得見部分原貌。而《陳氏香譜》所引葉庭珪等語，今存葉氏著作《名香譜》與《海錄碎事》俱未見；又如：宋代顏博文之〈雞舌香賦〉、〈覓香詩〉，溫子皮之《溫氏雜記》等雖已佚失，但仍保存在《陳氏香譜》中。

其三，如實記錄宋至元初社會用香情形。《陳氏香譜》紀錄香品產地、特徵、用香方法，可資考證宋代香事，並可與當代詩文相呼應。如：蘇軾〈印香詩〉詩

題：「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等，得知熏香有專用的香盤。見《陳氏香譜》卷三「香盤」條云：「用深中者以沸湯瀉中，令其氣蓊鬱，然後置爐其上，使香易著物。」

又如：楊廷秀〈焚香詩〉：「琢瓷作鼎碧於水，削銀爲葉輕如紙。不文不武火力均，閉閣下簾風不起。……」從《陳氏香譜》引自《香史》的「焚香」條，如實說明焚香注意事項：「焚香必於深房曲室，矮卓置爐與人膝平，火上設銀葉或雲母，製如盤形以之襯香，香不及火自然舒慢，無煙燥氣。香史。」此條說明宋人對於焚香之講究，在無風靜室中燃香，以銀葉隔火熏香追求無煙燥味、自然幽遠的香味。

本文因文獻侷限，對於《陳氏香譜》四卷本在何時被刪削及缺漏情形，范氏天一閣據何本抄寫陳譜，以及維楊馬氏小玲瓏山館的《新纂香譜》從何而來等等，都存有疑點；但藉由《新纂香譜》與《香乘》之校勘與補入，《陳氏香譜》四卷本應有較爲周全的面貌。

參考文獻

一、古籍

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

朱謀垔，《畫史會要》，《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 2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吳　澄，《吳文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吳自牧，《夢粱錄》，《宋史資料萃編》第四輯，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沈　括，《夢溪筆談校證》，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

宋　濂，《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金　檀，《文瑞樓藏書目錄》，《書目五編》據《讀畫齋叢書》本，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

周紫芝，《太倉梯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

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

洪　芻，《香譜》，《百川學海》，民國 16 年據武進陶氏覆宋咸淳左圭原刻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葉庭珪，《名香譜》，《叢書集成續編》第 86 冊，據《香豔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

葉庭珪，《海錄碎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徐　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

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書目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

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國學集要》第 26 集，臺北市：文海出版社，1968 年。

馬端臨，《文獻通考》，《歷代經籍考》，臺北：新興書局，1959 年。

陳　敬，《陳氏香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陳　敬，《新纂香譜》，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鐵琴銅劍樓影鈔本，A02747。

陳　敬，《新纂香譜》，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清抄本，06873。
陳　敬，《新纂香譜》，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善本，適園叢書鈔本，06853。
陳　敬，《新纂香譜》，《適園叢書》第 12 集，民國六年烏埕張氏刊本。
陳　敬，《新纂香譜》，《叢書集成續編》第 86 冊，據民國六年烏埕張氏刊本影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陳　敬，《新纂香譜》，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第 13 集，原刻影印《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
陳師文，《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臺北：旋風出版社，1975 年。
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陳　揆，《稽瑞樓藏書目錄》，《書目五編》，據《滂喜齋叢書》本，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
盛元纂修，《南康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據清同治十一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
脫　脫，《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張廷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薛福成，《天一閣存見書目》，臺北：古亭書屋印行，1970 年。
葉德輝，《書林清話》，長沙：岳麓書社，2000 年。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書目續編》，臺北：廣文書局，1968 年。
張乃熊，《菰圃善本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69 年。
程大昌，《續演繁錄》，《百部叢書集成》，據《學津討源》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楊　傑，《無爲集》，《四庫全書珍本・五集》，第 2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 年。
楊守敬，《留真譜初編》，《書目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
蘇天爵，《國朝文類》，《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
鄭　樵，《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63 年。
翟　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據清光緒二十四年自刻本，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
翟　鏞，《鐵琴銅劍樓藏藏宋元書目》，《書目類編》第 31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年。
翟啓甲，《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書目四編》，臺北：廣文書局，1970 年。
翟鳳起，《盧山錢尊王藏書目錄彙編》，《書目續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年。
錢曾撰，管庭芬輯，章鈺補輯，《讀書敏求記校證》，《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

錢　曾，《述古堂藏書目》，《粵雅堂叢書》，據清咸豐三年刻本，臺北：華文出版社，1965 年。

二、專書

不著編人，《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書目類編》第 19、20 冊，臺北：成文書局，1978 年。
王國良、王秋桂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臺北：明文書局，1986 年。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1987 年。
阮浩耕等，《中國古代茶葉全書》，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 年。
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林天蔚，《宋代香藥貿易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6 年。
林申清，《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
高　啓，《青邱詩集注》，《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年。
胡　鈞，《張文襄公（之洞）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78 年。
許瑤光修，吳仰賢等纂，《浙江省嘉興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5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
陳正宏、梁穎編，《古籍印本鑒定概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臺北：國家圖書館編印，1998 年。
湯　絢，《清初藏家錢曾研究》，臺北：漢美圖書，1991 年。
楊家駱，《四庫大辭典并並附七種》，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
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1975 年。
蔡佩玲，《范氏天一閣研究》，臺北：漢美圖書，1991 年。
駱兆平，《新編天一閣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藍文欽，《鐵琴銅劍樓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1991 年。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45-78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Study of Chen's *Xiangpu* Version

Ching-Ming Liu[*]

Abstract

The usage of Xiang is very broad, and its practical functions range from clearing the head and mind, scaring the devil away, deodorizing, appraising smell, to appreciating aromas at the spiritual level. In the Song Dynasty a Xiang culture was developed and appreciated by people of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According to *Chen's Xiangpu*, Xiang was widely used in daily life, such as the inkpad of the stamp, an accessory of clothing, and anointment. The storage of the Xiang substances and the production methods of Xiang products, such as Xiang teas and Xiang beads, were very complete. In the meantime, *Chen's Xiangpu* also collected the poems on the topic of Xiang which were recited and written by some scholars and refined person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Xiang culture, books on the use of Xiang and other related things became popular. As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 comments, *Chen's Xiangpu* collected about eleven Xiangpus produced after Shen Li, Hong Chu. This Xiangpu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Xiangpu of all the Xiangpus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Yuan Dynasty, *Chen's Xiangpu* was reproduced by copying and recarving. The remaining copies we have found today are of both good and bad quality. Each copy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The four volumes of *Chen's Xiangpu* of Si Ku Ben, and the two volumes of *Shin Tsuan's New Xiangpu c*ollected by Tie Chin Tong Jian Lo of Shih Yuan Book Collection are the main versions widely used. Till now only very few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traditional usage of Xiang, and the study on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lics, Feng Chia University.

Chen's Xiangpu has not been done yet. Besides elaborating on the wide spread of various copies of Xiangpu,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Chen's Xiangpu* of Si Ku Ben with *Shin Tsuan's New Xiangpu* of Shih Yuan Book Collection as a supplementary source, and with *Xiang Cheng* in the Ming Dynasty as a reference, in order to obtain a complete version that can be used for successive research.

Keywords: Chen Jing, Xiangpu, *Shin Tsuan's New Xiangpu*, version, Xiang culture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79-93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急就篇》名稱探源

林榮森*

摘　要

《急就》為我國古代重要童蒙之書，最初是提供作為小黃門及學童識字之用，但其名稱卻無一定，有稱《急就章》；也有稱《急就篇》；亦有但稱《急就》者，實有釐清之必要。

史游初作《急就》之時，並非以章草書體書寫，而是以漢代流行字體隸書寫成，因此在當時《急就》一書與「章」字並無任何瓜葛，故難依托章草之名而稱其為《急就章》。

據研究發現，西漢時期即使有章草在民間通行，此種書體亦僅稱為「隸草」，至於「章草」之名則是在魏晉以後才出現，目的是為了和「今草」作一區別，是以，史游作《急就》時，實未有「章草」一詞，所以《急就》稱「章」的說法，就更難成立了。

如就古代書籍篇目體例來看，「篇」的位階高於「章」，一章僅六十字上下，合數章始能成一篇，而《急就》全文二千餘字，如稱其為章，似不合目錄學規範。綜括言之，史游《急就》祖本應稱「篇」。至於稱《急就章》者，乃是「章草」一詞出現以後的事了。

關鍵詞：史游、章草、急就、急就篇、急就章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壹、前言

有關《急就》一書，究應稱「篇」或「章」，向來沒有定論。大體而言，文字學界多以《急就篇》稱之，而書法學界則習慣將之稱爲《急就章》，但終究未對該二名稱作清楚之界定，所以長久以來，有謂「篇」者，亦有謂「章」者，亦有但稱《急就》者。今審閱《四庫全書》[1]則載爲《急就篇》，然在《四庫總目提要》[2]中，則語多撲朔，迷離難明，其曰「急就篇或有篇字或無篇字，初無一定，隋志作急就章一卷，……今本每節之首，俱有章第幾字，知急就章乃其本名，或稱急就篇，或但稱急就，乃偶然異文也」。《四庫總目提要》既說《急就章》乃其本名，但又云「或稱急就篇，或但稱急就」，顯然《提要》撰者對該書名稱仍是一知半解，在他看來，《急就》既可稱「章」，也可稱「篇」，甚至逕稱《急就》亦無不可，這種名稱上的差別，不過是「偶然異文也」。但問題是，古代許多字書爲何就不能篇章互稱，譬如《倉頡》、《爰歷》、《博學》、《凡將》諸書，均統稱爲篇，從未見有稱章者也，何獨《急就》能享有二種名稱，怎不令人感到好奇？

是以，本文將就《急就》一書之內容、作用、成書年代、書體以及「篇」「章」之異等方面進行研析探討，以期追索出該書之正確原稱。

貳、《急就》背景概述

《急就》乃西漢史游所撰，內容以七言爲主，雜以三言、四言的雜言體韻文，取篇首「急就」二字作爲篇名。起首五句「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開宗明義道出本書是一本將常用詞語按門類編排的速成識字課本。

《急就》一詞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3]，據該書第三十卷文藝略小學家載「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漢志所謂小學，即童子啓蒙之書，所列自《史籀篇》以下，凡十家四十五篇，都是童蒙識字之書。故漢志小學家敘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另崔寔〈四民月令〉云「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學，學五經（謂十五以上至二十也）。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謂

---

1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二一七小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無出版年月），頁 223-1~223-61。

2 清・乾隆敕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41・經部四十一・小學類二》（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國學要籍叢刊，無出版年月），頁 230。

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第 30 卷》（台北：洪氏出版社，無出版年月），頁 1720。

九歲以上，十四以下。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4]。可知成童入太學讀五經，而幼童入小學讀篇章，此之篇章，乃指《三倉》、《六甲》、《九九》、《急就》之書。

史游爲漢元帝時黃門令。黃門，是禁門黃闥內給事的宦官，這是承秦而來的官制，屬少府，掌管山海地澤之稅以奉養，爲天子私府，也就是侍候天子對宮中服御諸物衣飾寶貨珍膳日用的記載；山海地澤貢給的登記抄錄，同時也做傳遞侍候奔走內廷雜役的工作。而黃門令是黃門中的單位主管，在其手下做事的宦官，年齡大小不一，一般稱之爲小黃門。史游編撰《急就》的目的，就是提供那些小黃門在宮內從事登載抄寫時，如遇物名不知怎麼寫，或姓字不瞭解，便可依其類別參閱《急就》之字，以便順利完成工作。所以一開頭就說「急就奇觚與眾異」，「急就」者，急學即見成就也，因此這是編撰給小黃門認姓氏和識物名的書，由於小黃門絕大多數是出身貧困，自幼閹割，也就不可能有什麼學識可言，不論年齡大小，率皆識字不多，該等程度和幼童本無二致，所以《急就》也可當作他們初步識字的啓蒙之書。同樣的，《急就》自然也能在宮中教那些王侯子弟，逐步推廣開來之後，於是確立了它作爲童蒙書籍的歷史地位。

《急就》的內容，主要分姓氏名字、器用百物、政治職官三類，將有關常用詞語編成韻書，以便學童記誦，這種考量，和《千字文》等字書出於駢體是一樣的。其在第一部分列舉了一百三十二個姓；第二部分是器用百物的常用詞；第三部分是有關政治職官方面的知識。可說是漢代留存至今唯一完整的識字課本，歷來傳寫者代有其人。據清代孫星衍《急就章考異并序》云：

> 歷代傳摹《急就》，漢有張芝。（《書斷》云：張芝字伯英。韋誕云：其草書《急就章》皆一筆而成。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為真，皆草書。而伯英書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崔瑗。（《清河書畫舫》：似道家藏名蹟，有崔瑗臨史游《急就章》。）魏有鍾繇……。吳有皇象……。晉有衛夫人、王羲之。……索靖。……後魏有崔浩。……唐有陸柬之。……宋有太宗御書。……黃庭堅、李仁甫、朱文公皆有刻本。……元有鄧文元。明有宋克、俞和。[5]

由此可知，史游以後傳抄《急就》者不乏其人，而他們幾乎清一色是用草體書寫，韋誕說張芝所寫的《急就》「皆一筆而成」，所指應爲今草，世謂張芝多

---

[4] 轉引自于大成，《急就篇研究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6 月初版），頁 1。

[5] 清・孫星衍，〈急就章考異序并注〉收於《急就篇・附錄》，（湖南：岳麓書社，1989 年 1 月 1 刷），頁 381-385。

作章草，然依韋誕所言，其書《急就》顯與章草有別，因章草的體勢是字字獨立，楷法而草寫，實難寫出連綿跌宕的一筆書。除此而外孫氏所列其他名家的《急就》，想必都是用章草寫成。

參、《急就》的書體與篇名之關係

《急就》出於史游之手，向來少有爭議，但究竟他所作的《急就》是以何種書體寫成，實不無釐清之必要，因爲當時如係以章草書寫，那麼勉強附會「章」字，或許還有些道理，但如果史游作此《急就》不是以章草爲之，則將其稱爲「急就章」，便無法找到依附的理由。

按張懷瓘《書斷》云「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史游即章草之祖也」[6]，自此以後，學者都依張懷瓘之言，認爲章草乃史游所創，或直指《急就》爲章草字體。事實上，漢代確實已有草書流傳，據許慎《說文解字序》載「漢興有草書」[7]。由於許慎是東漢人，所以他的說法應爲可信，不過他所謂「漢代」就有草書，到底是指東漢或西漢，則未予言明，然而即便是西漢，也未必表示史游作《急就》就是以草書（章草）書寫。

因爲所謂「章草」，據《書斷》所載：

> 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兼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
> 此乃存字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連急就，因草創之意，謂之草書。[8]

可見「章草」是由隸書發展而來，也就是將隸書速度化，求其簡便，用以赴急，目的是強化書寫效率，使之更便捷。于大成先生說「是一種解散隸體而粗書的苟取簡易的字體。……起先必然是由於感到隸書正寫太慢，故簡省其筆畫，又爲求行筆快捷，故使數筆相連而不分，這就成爲草書了。這種草書，是由隸書變來的，所以仍保有隸筆的特徵」[9]。由此不難看出，章草可算是隸書的「草寫體」，而在漢代未有印刷術之時，這種草寫體雖可視爲民間文字書寫的普遍趨勢，但終究上不了抬面，因爲它的目的是爲了「苟取簡易」，節省書寫時間而已，至於具有

---

[6] 張懷瓘，《書斷》，收於《歷代書法論文選》（台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48-149。

[7] 許慎，《說文解字序》，收於《漢魏六朝書畫論》（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3 刷），頁 17。

[8] 同註 6，頁 148。

[9] 于大成，《急就篇研究序》，頁 6。

官方色彩或較正式的文字內容，則大多還是以隸書書寫，此可證諸目前所見之各種漢代石刻，幾乎清一色爲隸書字體，如果章草在當時已躍昇書體主流，那麼漢碑依理也可用章草來寫，就像南北朝時期，書體已發展爲楷書，所以摩崖造像等刻石，遂以當時最流行的書體—魏碑進行呈現。由此可知，漢代雖已有草書，但並非文字書寫之主流書體。

史游作《急就》，其作用是爲提供小黃門識字及工作上查閱之用，而小黃門在識字不多的情況下，連隸書那樣的「正體字」，若欲辨識恐怕都還有困難，更遑論以「書寫體」書成的章草，如何能作爲童蒙識字之書？于大成先生說：

> 急就篇是漢時童子誦習之書，漢時鈔寫流傳，自然是用當時流行的隸書，事實上，今天吾人所能看到的漢人急就篇墨跡，也無一而非隸書鈔寫的。這種鈔本，以今日之所知，羅振玉流沙墜簡有六簡，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二編有二簡，又鄒氏適廬舊藏一殘塼，書篇首至「誠」字共三行，皆隸書也。[10]

于氏見識甚廣，在他所見的幾種漢簡中，都是以隸書寫成，他又說：

> 凡將、急就等書敘述在「始造隸書」以下，可知那些書都是用隸書來書寫的，蓋非如此則幼童無法誦習，這跟我們今天的小學課本必用楷書，道理是一樣的。[11]

這番精闢的見解，的確合乎常理，既然《急就》是用來作爲學童（或小黃門）認識文字的基礎，當然是以漢時最通行的書體書寫，方屬合理，此在任何時代、任一地區均是不變的律則，正如于氏所舉「小學課本必用楷書」，豈有小學課本用草書的道理。又如學習英文，初時也是學印刷體，等到一定程度後再學書寫體，否則豈不本末倒置，倒行逆施乎？啓功在其〈急就篇傳本考〉一文中也說：

> （王愔云：）一似史游為作草書始撰此文，懷璧復執其說，謂史游即章草之祖。惟倉頡正字，當非簡墮之體，而縱任奔逸，豈可以教童蒙。[12]

---

[10]同前註，頁 4。

[11]同註 9，頁 4。

[12]啟功，〈急就篇傳本考〉，收於《啟功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7 月 1 刷），頁 2。

啓功的看法和于大成的見解如出一轍，他也是認爲史游所作《急就》如係「縱任奔逸」，是無法作爲學童識字的教材，況且證諸《倉頡篇》的文字，也是使用具有標準意涵的正體字，當非「簡墮之體」，所以史游《急就》爲章草之說，是不爲啓功所接受的。同時他更進一步指出「近世西陲出土漢人木簡，其中《急就》諸簡，皆是隸書」[13]。他說明了其所見到的漢簡《急就》，都是隸書字體，如果史游的《急就》是用章草書寫，則那些漢簡《急就》多少會保留部分痕跡。足證一般對字書的內容大多採取比較嚴謹莊重的態度，所以他們還是用漢代的主流書體—隸書進行傳抄。至於《急就》後來爲何會變成章草字體，啓功也有大膽的臆測，他說：

> 漢人所傳，或有二種，隸書本所以便童蒙之誦習，草書本則兼資以識草體，抑或有人欲集草字於一編，藉《急就》之文，以為貫索，惟亦不出兩漢之世。[14]

漢代是各種字體勃興之季，草書雖非當時的「國字正體」，但在民間潛滋暗長，則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史游之後，有人刻意以章草抄寫《急就》，使其流傳於識字階層，或嘗試藉字書的內容，完成章草的篇章，裨便隸草兩相對照，是極其可能之事，此與智永書寫真草《千字文》的心態和用意，洵屬異曲而同工。

由前所論各點來看，史游所作《急就》應非章章，則張懷瓘引王愔的話說史游創草書之論，也自然禁不起檢驗。既然《急就》非由章草寫成，那麼稱《急就章》的「章」便失去了著力點，而無得附會了。

肆、由章草的產生來看《急就》篇名問題

既然章草非史游所創，則章草究係起於何時，實有追索之必要。設若章草的起源早在史游之前，其寫作《急就》時，以章草書之，亦非不可能之事；但章草的創發及使用如於史游之後，而硬是穿鑿史游《急就》是以章草書寫之論，便已不攻自破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先從章草的產生開始說起，秦漢之際，書者以草率的筆意書寫隸書，目的是爲了增強寫字的速度，提高書寫效率，此在近現代出土簡牘中已獲得證實，但那只是隸書的「草寫體」，不能算是合格的章草，因爲那些「隸草」中不見得都具備章草的要素和特徵，宋黃伯思謂「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15]，並非所有的草書都稱「章草」，它必須保留

[13]同前註。
[14]同註 12。
[15]宋．黃伯思，《東觀餘論．第一帝王書》（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4 年 8 月初版）。

隸書的波磔，亦即「存隸梗概」，才能稱之爲章草，所以劉延濤將章草界定爲「隸草」與「今草」之間的一種草法[16]。由此觀之，章草經由隸草的衍化，到具備相當的形式，必然得花上一定時間，因此在史游的年代，即使已經有了草書，也未必是章草。史游生卒年雖不詳，但史載其爲漢元帝時人，而漢元帝爲西元前四八—前三三年，史游寫《急就》是在他擔任黃門令期間，也就是在元帝在位之時，然據啓功引《玉海．急就篇》羅願跋云「自東漢杜度、張芝善稿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爲章草」[17]。另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謂「杜度所寫，諸家著錄從無及之者」[18]。而張懷瓘《書斷》則云「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魏文帝亦令劉廙通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後世謂之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焉[19]。具見章草最早著錄乃自杜度、張芝之時，惟此二人已是東漢時人，其與史游年代已相去甚遠。至於《東觀餘論．記與劉無言論書》中說「劉憲卸史壽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陝西發地，得木簡一瓮，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爾[20]。雖然他所見木簡爲章草，但其成書年代是在永初二年，當爲西元一〇八年，又在杜、張之後，所以從現有資料考察，章草的發現，最早應自杜度和張芝開始，而史游生存的年代，應該還未有成熟的章草出現。

前文提到，章草名稱的由來可能得自於奏章，此文牽涉到章草語源問題，亦即章草的名稱究竟所從何來，關於這一命題，歷來也有多種不同說法，茲臚述如下，以明梗概：

一、由章奏得名

章草因奏章而得名，除前引張懷瓘《書斷》持此說外，卓君庸在其纂輯的《章草考》中，也羅列了數條與張氏觀點相同的資料，且看：

> 章草，言可以通奏章耳（宋．黃涪翁〈跋諸帖〉）
>
> 章草書，章者奏也，謂可以入奏章也（法書本象）
>
> 黃魯直跋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日知錄）

[16]劉延濤，《草書通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修訂版），頁 15。
[17]同註 12，頁 2。
[18]同註 15。
[19]同註 6，頁 148。
[20]同註 15。

> 魏志劉廙傳，轉王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啟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日知錄）[21]

另外黃庭堅也認爲「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22]

二、由漢章帝書得名

有關章草因漢章書而得名之說，在《章草考》中僅列一條，謂「漢章帝始有章草名」[23]。然據查，張彥遠也有相關文字，他說「章草本漢章帝書也」，而蔡希綜也說「章草興於漢章帝」[24]。

三、因漢章帝愛好得名

持此觀點者，主要是認爲由於漢章帝喜好章草的字體，因而得到「章」草之名，以往贊成這種說法的，有《章草考》中所舉的三項：

> 章草書，齊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唐韋續纂五十六種書）

> 千文曰杜稿鍾隸，杜名度一作操，齊相，善草書，掣波循利，創質蓄怒，章帝貴其跡，詔上章表用，故號章草（淵鑑類函）

> 章草傳自漢章帝，或以為杜操崔瑗崔寔工草書，章帝令上章，亦作草字，故曰章草（秦中學台石刻急就章跋語）[25]

除此三項外，黃伯思《東觀餘論》也提到「章草當在草書前，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26]。以上所稱漢章帝喜愛章草，都和杜操等人有關，想必是前後因襲，同出一轍。

---

[21]所引各條具見卓君庸纂輯，《章草考》（北京：大慈商店，1930 年 3 月初版），頁 5。
[22]黃庭堅此語係轉引自劉延濤，《草書通論》，頁 10。
[23]同註 21，頁 4。
[24]有關張彥遠及蔡希綜之說，均引自劉延濤，《草書通論》，頁 10。
[25]所引各條具見卓君庸纂輯，《章草考》，頁 4-6。
[26]同註 15。

四、由《急就章》得名

章草名稱的由來，古來眾說紛紜，當然也有認爲是由《急就章》而得名，《章草考》引〈書畫跋跋〉說「章草名當即由託始急就章耳」[27]。另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云「正因游作是書以所變草法書之，後人以其出於急就章，遂名章草耳」[28]。

五、因章程書得名

前面四種章草得名的說法，都是來自於古人，但今人劉延濤則認爲該四種說法都不正確，他以爲章草之名是得自「章程書」，依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所釋，章程書係「傳秘書、教小學者也」[29]。劉延濤引韋續的話說「八分，魏鍾繇謂之章程書」[30]。「章程書」即是八分，也就是隸書，古代稱之爲「楷法」。

前述五種章草得名之說中，僅有第四種認爲係得自《急就章》，但後人大都不以爲然。劉延濤即認爲這是誤信章草爲史游創作所致，同時他對草書的起源有極其詳盡的敘述，因此他否定了此一說法。啓功也認爲，「章草者，字體之名也。急就章者書之篇章名也。章草得名之由，眾說多歧。或謂由於書寫《急就章》者，亦無確據。即使果然，字體名亦不足以代書篇名也。後世竟或有以章草二字代稱《急就章》，則誤矣」[31]。所以若將章草和《急就》混在一起，是錯誤的講法，況且如依啓功和于大成等人之見，章草的名稱亦非在章草字體形成之時即有，而是在今草盛行以後，爲了和今草作一區別，才將帶有波磔的早期草書稱爲「章草」。如此一來，不論從章草的起源或其名稱來看，都不可能和史游《急就》扯上關係，而《急就》稱「章」者，應該是後來的事。

伍、自「篇」「章」之別探索《急就》本稱

篇、章的使用，在歸類上屬目錄學的範疇，但在古代目錄書的體制中，並未直接就「篇」和「章」進行明確的劃分。以現代來說，書籍的編目大抵分「編」、「卷」、「篇」、「章」、「節」等，但古代書籍的目錄則沒有一定的規則，有時但稱「卷」，有時則稱「篇」，有時也稱「冊」。錢存訓《書於竹帛》中說「一

[27]見卓君庸纂輯，《章草考》，頁 5。
[28]清・乾隆敕撰，《四庫全書總目》（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年月不詳），頁 230。
[29]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收於《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44。
[30]引自劉延濤，《草書通論》，頁 12。
[31]同註 12，頁 28。

根竹簡通稱爲『簡』，常載有一行直書的文字。字較多時，書寫於數簡，編連一處，乃稱之爲『冊』。長篇文字的內容成爲一個單位時稱之爲『篇』。『冊』表示一種文件較小的形體單位，『篇』則用於較長的內容單位。一篇可能含有數冊」[32]。他是將書的內容分成三個層次，「簡」的單位最小，「冊」居中，「篇」最大。于大成在〈篇與卷〉一文中說「所謂篇，是具有篇題，內容起訖完整，自成一單位的文字；所謂卷，是得名於帛或簡冊抄完後捲起來的形式，……。若一篇文字在兩千字上下，則一篇恰可抄成一卷」[33]。余嘉錫也說「古之經典，書於簡策，而編之以韋若絲，名之爲篇。簡策厚重，不能過多，一書既分若干篇，則各爲之名，題之篇首，以爲識別」[34]。由此可見，「篇」是具有一個完整內容和段落，自成單元的文字，並且題上篇名，目的是作爲識別之用，方便讀者檢索閱讀。但前開各家所論，均僅涉及「篇」的定義，未對「章」進行說明。

經查閱《中文大辭典》記載「書也，簡冊也，書卷也，積書若干章謂之篇」[35]。另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中也說「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36]。在這兩項資料裡，明白標示出「篇」是由「章」累積而來，亦即在文章篇幅上，「篇」的規模大於「章」。

討論至此，雖然已可初步釐清「篇」和「章」的區別，但仍然無法對《急就》的篇名作確切的論定，因爲《急就》就其字數來看，可以算是一篇長文，也可看成是一本小書，如果把它當成一篇文章，則稱「篇」並無不當；但如果把它當成一本小書，則能否稱「篇」，便不無斟酌之餘地。因此這個問題可再藉由和《急就》時代相近且形式作用相同的其他字書來尋求解答。許慎《說文解字・序》言「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37]。這段話是在說明秦始皇時代李斯等三人各作一篇字書，以作爲學童識字的啓蒙教材，而事實上，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頒定「書同文」的政策，是以小篆當作標準字體，所以李斯等人所寫的字書，也具有「統一文字」的範本意味，藉此來通行全國，因此是用當時的主流字體—篆書書寫，但很明顯地，它們所用的書名，都稱之爲「篇」，這恐怕是古代書名使用的習慣，或甚至可以說是古代童蒙書籍名稱用法上的慣例，此一風氣一

[32]錢存訓，《書於竹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 4 月第 1 刷），頁 86。
[33]于大成，〈篇與卷〉，收於《文字文學文化》（台北：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 6 月），頁 68。
[34]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香港：中華書局，1986 年 4 月港 1 版），頁 26。
[35]林尹、高明主編《中文大辭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5 年 5 月 7 版），頁 59。
[36]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 9 月台 3 版），頁 27。
[37]同註 7，頁 12。

直到漢代仍沿用此習，據《漢書・藝文志》所載，漢成帝時李長曾作《元尚篇》[38]，也是提供學童識字之書。

至於前述李斯等人的作品，書名稱之爲「篇」，但內容又如何分類呢？《漢書・藝文志》載「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39]。這裡更進一步說明該三篇的內容被地方書師予以分成若干章，且以六十字爲一章，可見這時期的書籍體例爲「篇」下有「章」。質言之，「章」和「篇」有著篇幅規模上的差異，積數章乃成一篇。于大成說：

> 小學書以六十字為一章，是漢代的通例，合若干章而為一篇，故稱篇章。然合三蒼而斷以六十字為一章，乃漢時閭里書師所授，三蒼原本固不如是。其所以必以六十字為一章者，其例蓋本於六甲篇。[40]

他解釋爲何要斷六十字爲一章，原來是依循《六甲篇》的體例，他接著又說：

> 六甲篇在羅振玉流沙墜簡卷一小學術數方技書中，收有三簡，以十天干、十二地支組為干支表，凡一百二十字，分為六十組，代表六十日。此六十組分作六行……。每行十組，二十字，代表十日，寫於一簡之上，一簡稱為一篇……。小學書多寫觚，一面二十字，一觚三面，則可得六十字，故斷六十字為一章，以其一觚之量恰足以容納之也。[41]

漢人之所以斷六十字爲一章，主要是把字寫在觚上，一觚有三個面，每一面可寫二十字，於是一觚可寫六十字，以此斷爲一章。《急就》開首就說「第一急就奇觚與眾異」，《急就》確實是寫在「觚」上，李均明說「此觚內容與傳世本《急就篇》第一章合，『第一』顯然指第一章合，觚之每面二十一字，三面凡六十三字，正合一章字數」[42]，李氏所言「第一」是否爲第一章，雖無確切的證據，但他說一觚每面有二十一字，和于大成的講法看似稍有出入，因爲古人寫字多不界格，一行下來，約以二十字爲譜，然字體難免有大小之差，或某些筆劃長短、伸縮所致，故有時二十字，有時二十一字，是正常的現象，因此顏師古在《急就篇注敘》中就以此種斷章法，將《急就》分爲三十二章[43]，自此以後，學者大多

[38]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第 30 卷》（台北：洪氏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詳），頁 1721。
[39]同前註。
[40]同註 9，頁 18。
[41]同前註。
[42]李均明，《古代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 版），頁 143。
[43]顏師古，《急就篇注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 7 月初版）。

沿襲此一說法。因此，《漢書・藝文志》稱史游所作的《急就》爲「篇」，而不稱《急就章》，確實是有根據的。

陸、結語

綜前所述，史游作《急就》時，是爲了供作小黃門識字及查閱之用，其使用的字體當爲漢時具有官方色彩的隸書，且在史游年代，章草應未發展到成熟階段，即便民間已有具有章草雛型的隸草通行，也仍然還未有「章草」之名稱，「章草」之名其實是晉唐以後，爲了和「今草」作一區別，才出現的名詞，故在西漢時期，《急就》沒有稱「章」的理由。

同時當我們對古代字書篇目體例作一考索之後，也發現秦漢之際的字書，絕大多數是以「篇」作爲書名，而「章」則是「篇」中的單元，積若干章始成一篇，因此「篇」和「章」不能混爲一談。可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急就》可稱「篇」也可稱「章」的說法並不正確，當然，於此也不能對《四庫提要》的撰者有太多的苛責，因爲他也是看到古人有稱《急就篇》，也有人稱《急就章》，或逕稱《急就》，所以他是就歷來的各種異稱略作說明罷了，然而，就是因爲《急就》一直沒有確切的定稱，導致甚至有人認爲章草的名稱是因《急就章》而來，這樣的混淆容易倒因爲果，況且即如《漢書・藝文志》雖明載爲《急就篇》，卻無人可以證明其言無誤，是以本文希冀透過系統化的推衍，爲《急就篇》的原始名稱作一釐清，找出事實真相，實乃寫作本文之區區微意也。

參考文獻

于大成，〈急就篇研究序〉，收於張麗生著《急就篇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6 月初版。

于大成，〈篇與卷〉，收於《文字文學文化》，台北：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 6 月。

史游撰，顏師古注《急就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 7 月初版。

史游撰，《急就篇》，湖南：岳麓書社，1989 年 1 月 1 版 1 刷。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香港：中華書局，1975 年 4 月港 1 版。

李均明，《古代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 刷。

卓君庸，《章草考》，北京：大慈商店，1930 年 3 月初版。

林尹、高明主編，《中文大辭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5 年 5 月 7 版。

林文寶，《歷代啓蒙教材初探》，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7 年 4 月初版。

高二適，《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台北：華正書局，1984 年 2 月初版。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 9 月台 3 版。

張懷瓘，《書斷》，收於《歷代書法論文選》，台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版。

啓　功，〈急就篇傳本考〉，收於《啓功叢稿 · 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7 月 1 刷。

許　慎，〈說文解字序〉，收於《漢魏六朝書畫論》，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3 刷。

黃伯思，《東觀餘論》，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4 年 8 月初版。

漢 · 班固撰，唐 · 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 · 第三十卷》，台北市：洪氏出版社。

劉延濤，《草書通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修訂版。

錢存訓，《書於竹帛》，上海書店，2002 年 4 月 1 刷。

顧炎武，《日知錄》，華山文藝出版社，1990 年 8 月 1 刷。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79-93 , No. 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A Tracing of the Term *Jijiupian*

Rong-Shen Lin *

Abstract

Jijiu (the Hastily-Written) w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ing book for the very young at the old time. Served first as a word-recognition book for pre-school pupils or young beginners, it was titled more than one. Some called it *Jijiupian* (the Hastily-Written Chapter); some called it *Jijiuzhang* (the Hastily-Written Volume); others, simply *Jijiu* (the-Hastily-Written). A job to clarify the titles of the book is thus seen by many as necessary.

When Shi-You first wrote the book, he did not write it in Zhangcaoshu (semi-cursive style or the writing script); instead, he wrote it in the popular Lishu (official script or clerical script). Therefore,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hat the book was titled *Jijiuzhang* because it was written in Zhangcao.

According to studies, the term "Zhangcao" did not appear until Wei or Jin Dynasty. Even if this writing script was already commonly practiced among the civilian at the West-Han, it was called "Licao" (the clerical grass script),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term "Jincao" (contemporary grass script). In a word, "Jijiuzhang" wouldn't have been the correct term to use since when Shi-You wrote *Jijiu*, the term "Zhangcao" had not yet heard.

Examined again by ancient book category and classification, the two thousand word work *Jijiu* was too long to be called "zhang" (chapter) since several "zhangs" (a sixty-word piece) made a "pian" (volume). In summary, it should have been the term "pian" (volume) which was originally applied to Shi-You's book *Jijiu* (the

* Part-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Hastily written) while the term “Jijiuzhang”(the hastily written chapter) was a term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term “zhangcao” (semi-cursive script).

Keywords: Zhangcao, Shi-You, Jijiu, Jijiupian, Jijiuzhang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95-106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論韓愈〈聽穎師彈琴〉引發的「聽琴」與「聽琵琶」之爭及其內涵

高慎濤*　翟敏**

摘　要

韓愈〈聽穎師彈琴〉是唐代描寫音樂的著名詩篇，它與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賀的〈李憑箜篌引〉被並稱為描寫音樂的「三絕」。韓愈在這首詩歌中充分運用了形象思維手法，將抽象的、無形的音樂感受形象化、具象化，賦予音樂的音色、旋律、節奏等以鮮明形象、可感化色彩，成功地描寫了傾聽音樂時變化動蕩的心理感受，歷來為人稱道。及至宋初卻對其中所彈奏樂器產生了爭論，圍繞「聽琴」與「聽琵琶」遂產生了一樁公案，自宋至清爭論不休，流波餘韻波及至今。令人惋惜是的是，今人仍只是著眼於孰是孰非的爭論，盲目地贊成一方或反對一方，而對產生此爭執的個中原因並不能洞曉。本文在梳理歷史上「聽琴」與「聽琵琶」爭論的基礎上，重新審視歐陽修「自是聽琵琶詩」（〈歐陽公論琴詩〉）一語的本來含義，並緊扣宋初儒學復興背景及其影響下的「崇雅斥鄭」音樂觀，以期還原這一事件的本來面目。

關鍵詞：〈聽穎師彈琴〉、聽琴說、聽琵琶說、內涵

* 西安工程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 陝西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古代音樂文獻研究生。

壹、歐蘇對話引發公案——琴與琵琶爭論首末

韓愈〈聽穎師彈琴〉是唐代描寫音樂的著名詩篇，它與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賀的〈李憑箜篌引〉被並稱爲描寫音樂的「三絕」。韓愈在這首詩歌中充分運用了形象思維手法，將抽象的、無形的音樂感受形象化、具象化，賦予音樂的音色、旋律、節奏等以鮮明形象、可感化色彩，成功地描寫了傾聽音樂時變化動蕩的心理感受，歷來爲人稱道。及至宋初卻對其中所彈奏樂器產生了爭論，圍繞「聽琴」與「聽琵琶」遂產生了一樁公案，自宋至清爭論不休，流波餘韻波及至今。後世對〈聽穎師彈琴〉中所用樂器之爭，實肇自宋代歐陽修與蘇軾的一段對話，此段對話見於蘇軾的〈歐陽公論琴詩〉，東坡曰：

>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戰場。」此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予以此詩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餘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雲：「大弦春暖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為恨。[1]

引文中所提及蘇軾之詩收於《蘇軾詩集》卷八，名爲〈聽賢師琴〉。從蘇軾退而作的態度及所作之詩看，他是同意歐陽修對自己觀點的修正的，這一點可以從宋人胡仔記載蘇軾作〈聽賢師琴〉的情況中得以印證，胡仔曰：

> 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取退之〈聽賢師琴〉稍加檃括，使就聲律，為〈水調歌頭〉以遣之。其序雲：「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餘深然之。」[2]

東坡在爲章質夫家歌妓所作歌詞的序中，以「深然之」明確表示同意歐陽修關於對〈聽穎師彈琴〉的評價。清人王文誥在〈聽賢師琴〉後有案語曰：「永叔詆爲琵琶，公此詩因永叔而發，而昌黎詩由是傳爲口舌，至今屈抑莫申，無有敢正之者。」[3]許顗《彥周詩話》曰：「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之後，後生隨

---

[1]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版），卷 71，〈雜書琴事·歐陽公論琴詩〉，頁 2243-2244。

[2]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版），卷 16，〈韓吏部上〉，頁 105。

[3] 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版），頁 382。

例云云。」[4]可見有關「聽琴」與「聽琵琶」之爭實源於歐、蘇此次對話。自歐公發端，東坡附合之後，有關〈聽穎師彈琴〉中所及樂器的爭論便眾說紛紜，「屈抑莫申」，但概括起來不外「聽琴說」與「琵琶說」兩端。

歐公評韓昌黎〈琴詩〉爲聽琵琶詩，此議雖有「眾生隨例」，反對者亦不在少數，略晚於東坡的宋僧義海就是持「聽琴說」的有力辯護者。蔡絛《西清詩話》載：

> 三吳僧義海，朱文濟孫，以琴世其業，聲滿天下。歐陽文忠公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穎師琴〉公曰：「此只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烏能而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5]

義海對韓愈琴詩一一分析，認爲只有琴聲方能如是。接著又對持琵琶說看法的蘇軾進行了批評：

> 東坡詞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弦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概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為知言。[6]

義海在這裏對蘇軾〈聽賢師琴〉明顯含有貶意，意思是說蘇軾於琴所知泛泛，非精於琴者。那麼於琴爲外行的東坡所評韓愈詩非琴的觀點，也就不可信以爲真。義海的觀點在宋代影響極大，取得了很多人支持。宋人胡仔曰：「觀此，則二公（歐蘇）皆以此詩爲聽琵琶矣。今《西清詩話》所載義海辨證此詩，復曲折能道其趣，爲是真聽琴詩。世有深於琴者，必能辨之矣。」[7]以義海爲是而以歐、蘇爲非。吳曾在《能改齋漫錄》卷五〈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條亦引《西清詩話》，並曰：「餘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8]他雖在這裏同意義海的「聽琴說」，但對義海的琴學造詣卻有所保留；他對《西清詩話》所引義海

---

[4] 載[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版），頁 392。

[5] 載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頁 192-193。

[6] 《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頁 193。

[7] 《苕溪漁隱叢話》，卷 16，〈韓吏部上〉，詳見注 2。

[8]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年版），頁 123。

批評東坡〈聽賢師琴〉的觀點即表示了反對，並引《史記》、《管子》、《晉書》爲據，駁斥義海、《西清詩話》的「寡陋」、「妄說」。宋人許顗《彥周詩話》也不同意歐蘇觀點，他諮詢善琴者後得出韓愈琴詩所描寫「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順下聲也。雲「此數聲最難工」，並表示「少爲退之雪冤。」[9]（《能改齋漫錄》卷五記此爲晁無咎見善琴者雲。）此外宋人樓鑰《攻媿集》，宋人王楙《野客叢談》，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都持類似觀點。

兩派中持琵琶說者也不在少數，許顗《彥周詩話》中有「後生隨例」之語，。清人王文誥謂歐陽永叔「琵琶說」後，「至今屈仰莫申，無有敢正之者」，可見至清代依然莫衷一是。但依筆者所見，主張「聽琵琶」的明顯少於「聽琴」一派，目前資料所見僅有一家。明人張萱在《疑耀》中說：

> 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為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為琴為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為譏評耳。餘有亡妾善琴，亦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僧海非精於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如昌黎詩，兒女相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下分寸，失輒千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冰炭置腸，亦惟聽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令人之至於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非知音者，即穎師亦非善琴矣。[10]

張萱妻善琵琶，現場操器按之，皆與永叔所言合拍。此辨看起來雖不乏證據，但影響較小。

此段歷史糾紛沿及至今，持「聽琴說」者明顯占優，且有成爲定論之勢，今人查阜西〈歐陽修論聽琴詩之失與聽琴詩之得〉[11]指出歐陽修所說爲誤。「聽琴說」基本已爲大家接受。到此仿佛可以結案了，然而有關此段歷史紛爭尚有許多被理解與被誤解之處。

---

[9] 載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版），頁 392-393。

[10]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6（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版），頁 283。

[11] 油印本，文見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 年版），頁 703。

貳、歐陽修「自是聽琵琶」一語的被理解與誤解

如明人張萱所言，〈聽穎師彈琴〉對琴音的描寫，看似的確類似琵琶。其中一些語句非常像唐人白居易描寫聽琵琶的名篇〈琵琶行〉。如「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似〈琵琶行〉「小弦切切如私語」，「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似〈琵琶行〉「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詩中樂器音調躁急，波動較大，與起伏較平和的琴曲殊不相類。不過琴曲雖以平和爲主，但也有雄壯起伏者，如〈霹靂引〉之類，斷不可據此判聽琴爲非。結合查阜西先生論斷，筆者也認爲韓愈〈聽穎師彈琴〉中所涉樂器當爲琴，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申述理由如下：

一、昌黎此詩明確標明是聽彈琴曲

昌黎一代大儒，知識淵博。斷不至於出錯至此。考昌黎集中有十幾首琴詩，可見他對琴這一樂器不會陌生，不至於琴和琵琶不分。另外同時代的李賀亦有〈聽穎師琴歌〉，可證穎師確實爲善談琴者。

二、琴曲中確實有雄壯之曲

沈佺期的琴曲歌辭〈霹靂引〉是以琴曲〈霹靂引〉爲題來寫此曲的一首詩。是「雄」象的生動而鮮明的具體寫照，如「電耀耀兮龍躍，雷闐闐兮雨冥。氣嗚唅以會雅，態欻翕以橫生。有如驅千旗，制五兵，截荒虺，斬長鯨。」「此曲有雷電交加風雨相會，驅旗揮劍之勢，而令聽者有發立之感。」[12]唐人寫琴詩句中激昂的還如：「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李白〈聽蜀僧濬談琴〉[13]），「忽揮素爪畫七弦，蒼崖劈裂迸碎泉。」（李宣古〈聽蜀道士琴歌〉[14]）「一彈猛雨隨手來，再彈白雪連天起。」（韋莊〈贈峨眉山彈琴李處士〉[15]）

---

[12] 參李祥霆〈論唐代古琴演奏美學及音樂思想〉，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第 3 期（1995 年），頁 85。又見《唐代古琴演奏美學及音樂思想研究》（臺北文化建設委員會，1993 年版）之《琴聲十三象》部分。

[13]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1 版），卷 183，頁 1868。本文所引唐詩俱依此版本。

[14] 《全唐詩》，卷 552，頁 6393。

[15] 《全唐詩》，卷 700，頁 8053。

三、義海琴學水準高遠，所斷甚有道理

義海與朱文濟、釋夷中一脈相承，以琴知名，又讀書能文，意韻蕭然，得於聲外。（參沈括《補筆談》[16]）前引《西清詩話》也稱義海爲：「朱文濟孫，以琴世其業，聲滿天下。」[17]

四、韓詩中所寫符合琴曲結構

韓詩中顯然可能看出首二句爲一式，第三、四亦共一式，第五句復首二句式，第六句復第三四句式，第七句爲首二句之變奏，第八句爲三四句之強烈發展，皆琴之章法。[18]

五、韓詩中所寫符合古琴演奏手法

古琴七弦十三徽，有散音、泛音和走手音三種基本指法，各種指法都有其特有的音色效果。散音是古琴七根弦本身所發出的音，用右手撥空弦而發音，其特點是深沉渾厚，成爲琴曲雄健的根基，如同大地般堅實，如「勇士赴戰場」之喻。所謂泛音，即左手觸弦如蜻蜓點水，右手同時彈出之音。其音清脆高遠，有時若隱若現，輕盈活潑，如天外之聲，如「浮雲柳絮無根蒂」之喻。「走手音」是古琴演奏中常用手法，它能使音逐漸弱化，其由實而虛的張力方向，造成超逸、脫出之勢，給人趨於深遠、無限之感，正如詩中所描寫：「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

以上我們澄清了〈聽穎師彈琴〉中的樂器的確爲琴，持聽琴說者正是基於坐實演奏樂器爲琴還是爲琵琶這點上，來理解歐陽修評此詩的「固是聽琵琶」一語。可以說，持聽琴說力主彈奏樂器爲琴無疑是理解正確的。但同時他們對歐公此話的本來涵義並未深究。歐公明知所談爲琴，不過以爲所描寫不符合他所欣賞的和平淡泊之中正之音，倒似繁聲促節的琵琶，故而以「固是聽琵琶詩」一語譏之，意爲此乃琴之下者，非大雅之音，其著眼點乃在風格水準。從這個意義上講，「聽琴說」者又是對歐陽修評語的誤解和冤枉，在爲韓愈雪冤的同時又錯責前賢。宋代是中國文化的極盛階段，宋人集文人、官僚、學者三位於一體，琴、棋、書、畫多有精通，試想，以歐陽修的學識，又怎能犯琴與琵琶不分之誤？其評語自是別有深義。舉證分析如下：

---

[16]見《〈夢溪筆談〉音樂部分注釋》（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 年版），頁 12。

[17]見《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頁 192。

[18]參查阜西〈歐陽修論聽琴之失與聽琴之得〉，同前注 11。查氏所論，有學者認為有附會之疑，但所言亦可備一家之說。

1、歐陽修不可能無視韓愈詩題所標「彈琴」二字，況有李賀同題詩爲佐證。

2、歐陽修精通彈琴和聽琴，焉能不識琴？歐陽修在〈送楊寘序〉中自言嘗有幽憂之疾，不能治。後退而閒居，學琴于友人孫道滋，久而樂之，竟治其疾。[19]他不但會彈琴，而且更擅長聽琴，他〈贈無爲軍李道士〉說；「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習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20]「在意」、「在心」之語非深于琴道中人不能道得。據歐陽修記載，他家中藏有三張名琴：一爲張越琴，一爲樓則琴，一爲雷氏琴。「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餘兼有之。」[21]他不但會彈，亦會賞，還是收藏家。其號「六一居士」中即有「一張琴」。

3、蘇軾於琴學亦十分精通，亦不能無故附合永叔。蘇軾集中有名的琴詩如〈舟中聽大人彈琴〉、〈聽賢師琴〉、〈聽僧昭素琴》、〈題沈君琴》、〈破琴詩〉，另外還有記琴的〈琴書雜事〉，作銘的〈文與可琴銘〉等。他的琴學造詣非一般人可比，絕不會犯上述之低級錯誤。

韓愈不會將琵琶誤作琴，歐、蘇也不絕會將琴與琵琶不分，上舉理由是爲鐵證。那事實又是如何？事實上只能是對歐公「固是聽琵琶」這句話進行了誤讀。如上所述，歐蘇乃是著眼於對彈者水準與琴曲應有風格而立論。舉唐代一類似評語便可立見分曉：

> 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于簾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22]

於頔明明令客談琴，其嫂豈能不知？她「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的評語絕非指彈奏樂器爲箏或琵琶，乃是指所彈琴曲「絕無琴韻」而言，是站在自己欣賞立場對琴曲風格及演奏者技藝的評價。這與歐陽修評韓詩描寫的琴曲是語似意同，二而爲一的相似事情。僅舉此一例即可給歐、蘇雪冤。爲了進一步證實我理解的正確性，茲再舉蘇軾一例。蘇軾〈舟中聽大人彈琴〉記述了了嘉祐年間隨父親在舟中聽其彈琴之事。在這篇詩中他說：

> 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23]

---

[19]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版），頁 628-629。

[20]同注 19，頁 59。

[21]《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版），卷 13〈三琴記〉。

[22]唐・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年版），卷下，頁 59。

[23]《蘇軾詩集》，卷 1，頁 12。

「反」通「返」；「鏗鏘」指新聲唯求悅耳，《禮記・樂記》：「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24]蘇軾在這批評琴曲全無古意，新曲強求鏗鏘，微音淡曲全被拋棄，以至數聲浮脆猶如笙簧之音。東坡這裏的「笙簧」之言也並不是指在吹奏笙簧，而是對脫離古曲之道的琴曲的諷刺。舉此二例，足見歐陽修「自是聽琵琶詩」一語的真實含義。

歐陽修緣何會有此譏諷之語？這涉及到歐蘇心目中的琴學觀，也即什麼樣的形式、韻味才算得上琴韻本色。簡單說來就是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崇雅斥正」的琴學觀。

三、「崇雅斥鄭」的儒家音樂觀——解讀爭執之鑰

宋代士人普遍關注政治，積極參與社會。王禹偁〈謫居感事〉自稱：「兼磨斷佞劍，擬樹直言旗」，歐陽修〈鎮陽讀書〉也以「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而自豪。宋人強烈的淑世情懷是唐人所無法企及的。這種淑世精神同樣在反映在文學中。北宋熙寧黨爭期間，政治觀點大有不同，但文論中的淑世情懷卻別無二致，不管是新黨還是舊黨都主實用性。如司馬列光嘗言：「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于有用而不貴於無用。」王安石曰：「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歐、蘇也不例外，他們雖然不否定文學的審美性，但也同樣強調文學的實用功能。歐陽修雲：「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蘇軾曰：「詩皆有爲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25]與此相適應，宋代儒學復興，自宋初三先生，孫復、石介、胡瑗提倡以來，至真宗、仁宗朝儒學高漲。孫復、石介等以儒家正統自居，大力提倡自韓愈以來的道統說，突出孔孟之道的地位。在宋代士人的淑世精神及儒學背景影響下，古琴音樂審美觀中滲透進了強烈的儒家禮樂觀。《論語・泰伯》曰：「興于詩，立于禮，成於樂。」[26]樂在儒家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它的主要功用不在於悅人之耳，而在於促成自身修養的完成。因此樂和禮是緊密聯繫的。儒家的禮樂觀包括兩方面意思：一是要用「禮」來統帥「樂」。這種「樂」不是其他的「樂」，而是能夠爲「禮」服務的「樂」；二是要用「禮樂」來反對其他非禮之「樂」，如鄭衛之音等。[27]

第一個方面是強調樂的實用性，這正是傳統詩教觀的反映。能夠爲禮服務的樂當然要雅正純樸、中正和平，反之則只能蕩人心神，無益於人格的修養。歐陽修〈送楊寘序〉雲：「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淳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

[24]錢玄等注譯，《禮記》（長沙：嶽麓書社，2001 年版），頁 519。
[25]詳參《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頁 16-17。
[26]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版），頁 104。
[27]有關「禮樂」觀參蔣孔陽，〈評孔丘的「正樂」思想〉，載《儒家美學思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版），頁 281。

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28]歐陽修雖曰琴可有悲愁感慨，但更欣賞和平之音，明確表示他所追求的是古之「淳古淡泊」，「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主張以琴「平其心以養其疾。」蘇軾琴學思想與歐陽修一脈相承，他堅持儒家的中和之美。在〈聽僧昭素琴〉中說：「至和無攫醳，至平無按抑。」「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29]主張「至和」、「至平」之美，並以此認爲戴安道心存不平，故其鼓琴不如阮千里之達。[30]第二個方面是強調正統性地位的問題。宋人在復興儒學時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提倡「道統」，標傍儒家的正統地位。他們把這個正統追溯至堯、舜、禹、湯、武、周公、孔子，並以接續者自居。強調正統自然就要排斥他統，反映於音樂中即崇正斥邪。歐蘇軾還把歐公尚雅崇正的正統思想明確化，他在〈舟中聽大人彈琴〉中感歎曰：「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已忘。」[31]批評琴曲的「數聲浮脆」。欣賞雅正純樸、中正和平之音，這正是傳統詩教觀的反映。但若不符合琴曲應有的本色之韻，縱然談得再好，哪怕是人心爲之感動，也不算作本色琴曲。歐陽修和蘇軾正是立足於他們賞平和之音、厭繁聲鄭衛的「崇雅斥鄭」的本色音樂觀上，來審視韓詩的描寫以及穎師的所彈。

明此兩點以後讓我們再次審視歐、蘇評韓詩這一事件。韓詩本不涉及樂器之爭，歐陽修評論也不包含爭琴與爭琵琶之戰，不過是批評韓愈所聽琴曲非應有之風格而已。韓愈琴詩從文學描寫來看，是非常成功的，歐陽修也承認「此詩固奇麗」，而問題也正出在「奇麗」上。韓詩以奇麗語句所描寫的動蕩漾變化的琴音，調急而躁，不符合以禮節樂、以樂成禮的儒家傳統。另外韓詩所描寫的繁音促節之聲並非平淡清樂的太古之音，而是時俗之新聲，在儒者看來屬於鄭衛邪音。儒家自來主張不偏不倚的中和，主張怨而不怒、和而不淫的平淡，琴曲審美也一直以此爲正。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中唐時代，琴曲中的太古之音已漸不被人欣賞，白居易〈廢琴〉中說：「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以至於古琴「廢棄來已久」，「縱彈人不聽」。[32]南宋真德秀讀歐陽修〈送楊寘序〉感慨不已，他記載南宋時情況說：「其後官於都城，以琴來謁者甚眾，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誇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33]此雖說南宋情況，也可反窺北宋時太古平淡之音受冷落的形勢。由此可見，自中唐至宋，大家好今而厭古，所欣賞的琴曲是繁音促節的鄭衛之音、時興之音，而不太喜愛起伏強弱變化不大的太古

[28]《歐陽修全集》，頁 629。
[29]《蘇軾詩集》，卷 12，頁 576。
[30]載《蘇軾文集》，卷 71，〈雜書琴事·歐陽公論琴詩〉，頁 2243-2244。
[31]《蘇軾詩集》，卷 1，頁 12。
[32]《全唐詩》，卷 424，頁 4656。
[33]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版），卷 27，〈贈蕭長夫序〉（上海：商務印書館輯，1919 年版），頁 420。

遺音。在這種古音被拋置的形勢下，以道統接續人自居，力主淡和之音的歐、蘇二公又怎能不發出「自是聽琵琶詩」的批評？歐公之議不外乎本著樂本乎政的政教觀來爭取淡泊之雅音的正統地位。

肆、結論

這段歷史糾紛到此算是略有眉目。本來非常簡單的一句評語，後人卻囿於雅俗之爭而曲解成一段公案。其實清代蔣文勳在其《琴學粹言・琴詩論》中曾略微表達出對歐陽修評韓詩一語的正確理解，他引于頔嫂聽琴的評語，認爲「琴之下者未嘗非琵琶聲也？」[34]不過他沒有移之於歐公身上，也沒有詳細說明。他極力想爲歐陽修辯護，把即將明晰的論斷一語帶過，別出心裁地認爲韓愈〈聽穎師彈琴〉意在貶黜穎師，以「無以冰炭置我腸」爲貶語，以至「推手遽止之」，以此證明歐陽修所論非虛。結果又使事情回到了擁歐還是倒歐的簡單論爭上。

結合韓詩及其身世、審美觀點等，我認爲蔣文勳的韓愈斥穎師論斷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從詩歌所描寫來看明顯透出對琴藝高超的讚賞，如果是反對的話何以「濕衣淚滂滂」？詩中寫琴聲由高滑低而用「躋攀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的比喻，可能是這種情境觸發了詩人的身世之感。此詩作於元和十一年 (816)因受讒言被降爲右庶子以後。由琴聲而聯想到自己的失勢遭遇，原是很自然的。其「推手遽止之」，並非因貶黜而爲，實是引起了他的共鳴。復次，中唐時代古音殘缺，備受冷落，這從同時代詩人白居易的〈廢琴〉中可見一斑。喜好新聲是一時趨勢，韓愈也是如此亦大有可能。再次，就韓愈文學風格來論，他喜好雄奇，自己的創作亦復如是。並且他的文論主「不平則鳴」說，已突破了儒家的不怨不怒的中和。以雄奇的創作傾向和「不平則鳴」的主張來看，他欣賞較動蕩變化的琴曲更爲合理。此段公案歷經如此長的時間而沒有理清，我認爲有兩點重要原因：一是對歐陽修評語的誤解。這種誤解有時可能是有意誤讀。二是諸家在爭論中缺乏公正態度。各家都急於爲其中一派辯護，總是力圖打倒一方。這種袒護態度導致即使洞察了真相也不說破，甚至要故意進行誤讀。實際上只要抓緊歐、蘇「崇正斥邪」、「崇雅斥鄭」的音樂觀，糾紛自然迎刃可解。

「崇雅斥鄭」的音樂觀是中國傳統政教思想在古琴音樂美學中的反映，盲目地以此爲標準必然會抹殺琴曲風格的多樣性，不利於音樂樣式的創新和發展。

[34]見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頁 698-700。

參考文獻

中文資料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版。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年版。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版。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版。
明・張萱，《疑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6，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版。
唐・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年版。
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版。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版。
《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1 版。
《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版。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版。
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版。
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 年版。
錢玄等注譯，《禮記》，長沙：嶽麓書社，2001 年版。

期刊論文

李祥霆，〈論唐代古琴演奏美學及音樂思想〉，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 年第 3 期。
蔣孔陽，〈評孔丘的「正樂」思想〉，載《儒家美學思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版。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95-106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Dispute and True Meaning Caused by a Poem about "Listen to Guqin" and "Listen to Pipa"

Shen-Tao Gao [*] *Min Zhai*[**]

Abstract

Hanyu's *Listening to the Qin Music Played by Monk Ying* is a famous Tang Dynasty poem, and traditionally known for its vivid and concrete description of the tone, melody and rhythm of music and the successful picturing of the listeners' up and down feelings while listening. Since Song Dynasty, scholars have been argued whether the musical instrument in the poem was Guqin or Pipa. It was a pity to blindly hold one argument without a thorough study. This paper tries to base on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ry and music backgrounds to give the poem its original face.

Keywords: *Listening to the Qin Music Played by Monk Ying*, listen to Guqin, listen to Pipa, true meaning

[*] Lecturer, Humanities Institute of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Graduate student , Music Department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107-129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游移與曖昧－王韜《漫遊隨錄》的策略書寫與觀看之道

陳室如*

摘　要

王韜為中國近代化運動改革先驅，他於流亡香港期間展開了一趟破天荒的歐陸之旅（1867-1870），也成為晚清跨出國門的旅者先驅。這趟歐洲之行，是中國文化知識菁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對歐洲的實地考察，也為西方世界傳遞了更真實的中國形象。

王韜的旅歐遊記《漫遊隨錄》卻於遊歐後約二十年（1887 年）方於上海《申報》館發行的《點石齋畫報》上連載刊出。這部個人回憶錄的遊記出版形式反映當時上海社會的特殊文化生態，書中重組的記憶內容，也成為王韜推銷改革理念的策略運用。

特殊的時代背景與人生際遇，使得王韜的觀看之道始終無法擺脫既定框架，於中心與邊緣間擺盪不休；在觀看／被觀看的權力交換遊戲間，王韜也從他者眼中性別錯置的誤讀形象重新反思自我、認識自我。

關鍵詞：王韜、遊記、書寫策略、《漫遊隨錄》、觀看之道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講師。

壹、前言－先行者的回憶錄

> 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覺知－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1]

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分，王韜（1828-1897）[2]卻正因爲曲折複雜的流亡歷程，展開了一趟自由的歐陸之旅，也使他在對位的體驗過程中，順利度過了原本可能難以接受、跨越的現代性裂變。

在十九世紀中國的眾多知識分子中，王韜可說是頗具影響力之前瞻性人物。羅香林便指出王韜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

> 無王氏於同光之際，致力於中西文化之交流與變法自強之論議，斯未必即有光緒中葉以還，康梁諸氏變法維新之運動也。無晚清以還國父孫中山之鼓吹民權與建立民國，亦未必即有四十年來中國之所謂民主與科學之新文化運動也。[3]

比起九十年代後期的康有爲、梁啓超等人而言，王韜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開啓了之後一連串的改革運動。

習慣了扮演開啓者的先導角色，王韜也以前所未見的私人旅行方式走向世界，爲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旅人開啓嶄新扉頁。1867 年他受香港英華書院的院長

---

[1] 美・艾得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作、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9。

[2] 王韜長年羈留上海、香港，與西洋傳教士相友善，足跡更遠涉英、法、日本等，雖絕緣於仕途，卻針對中國與世界局勢檢討時弊，提出種種富強改革的具體方案，生平經歷大致如下：
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原名利賓，改名瀚，後改名韜，字仲弢，一字紫詮，晚號弢園老人。王韜出身於塾師家庭，18 歲考上秀才，科舉失利後，為負擔家計，21 歲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ter H .Medhurst）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任編輯，歷十三年，撰有《西學圖說》、《泰西著述考》等書。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官員，獻攻打上海之策，事發後被清政府通緝，1862 年避居香港，協助英國人理雅各（James Legge）將《尚書》、《春秋左氏傳》等古籍譯成英文。1873 年與黃平甫在香港集資創立中華印務總局，出版《普法戰紀》等書。1874 年創辦《迴圈日報》，任主筆，撰寫政論，宣傳變法自強，為中國早期的政論家。1879 年曾至日本訪問，1884 年獲李鴻章默許，始得返回上海，並為《申報》撰寫論說。1885 年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1897 年 5 月病逝於上海，年 69 歲。

[3]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年），頁 86。

理雅各（James Leege，1815-1917）之邀，從香港出發前往蘇格蘭，直到 1870 年下旬，才結束旅程返回香港，此段期間，王韜居住於理雅各愛丁堡家中協助翻譯中國經典，並遊覽英國著名景點。

不論從出洋的時間先後、旅行時間長短或從事的工作屬性來看，王韜的這趟歐陸之旅，確可譽爲「破天荒」之舉，[4]也難怪他會自傲於自己是「先路之導」的創始者角色：

> 余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先路之導，捷足之登，無論學士大夫無有至者，即文人勝流亦復絕跡。[5]《漫遊隨錄圖記．自序》

從中國走向世界這一角度來說，王韜的歐洲之行是中國文化知識菁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對歐洲的實地考察；從世界瞭解中國這一角度來說，王韜的歐洲之行更是一項歷史壯舉，以一個中國文化的活載體，向西方社會傳遞了更爲真實的中國信息。

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來看，鴉片戰爭後、甲午之戰以前，王韜以一介布衣文士的身份在英國停留長達二十八月佐譯五經，能夠走出國門，接觸、研究西方文物制度，以當時來說誠屬難得。是時中國仍處於大動亂之中，而英國卻已是西方文明中心，英國的科技、社會制度，亦使其深受震撼。

王韜的歐遊記行《漫遊隨錄》早經公認爲近代文化史中的重量型著作，它與歷任大清欽差錄出使日記或官方檔案普遍存在的制式生硬之病大相逕庭，其旅行方式不但更爲貼近異地生活，也跳脫外在的器物表象而引發了更爲內在的民情、制度層面等相關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漫遊隨錄》刊行的時間，是在作者遊歐後約二十年（1887 年），方於上海《申報》館發行的通俗刊物《點石齋畫報》上按月以一文一圖的篇幅刊出，嚴格說來，《漫遊隨錄》幾乎是一部作家晚年追想廿年前西土壯遊的回憶錄。[6]

王韜於中國近代化運動的貢獻與主張，歷來已多有研究。《漫遊隨錄》一書除了是王韜遊泰西的實錄記述之外，亦是其生平思想的重要材料，藉由此書，也可肯定這趟泰西之旅在王韜的生命史上確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意義。[7]

---

[4] 當時比王韜更早踏上歐陸的僅有斌椿父子一行人，斌椿父子的歐陸之行雖早於王韜一年，但身份為總理衙門官派，且在英國官方色彩濃厚的赫德（Sir Robert Hart）督率之下，限制頗多，又由於遊歷國家太多，且前後只有五個多月的時間，斌椿一行對所經之國也只能作走馬觀花式的浮泛瞭解。

[5]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2。

[6]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 卷、9 期（2006 年 2 月），頁 9。

[7] 王韜遊歐之前，對西學的態度是排拒的，即使礙於現實接受部分西學，也是迫不得已的。早年王韜世界觀亦較為狹隘，認為自己迫於生活，傭書上海一事耿耿於懷，「逐臭海濱，為西人傭

然而，本文並不打算針對這些定論再加論述。王韜在歐遊後二十載才開始刊行《漫遊隨錄》的做法令人納悶，與當時不易取得的官方外交檔案相較之下，《漫遊隨錄》的內容爲國人呈現了更爲真實的域外圖像。相隔二十年後才出版的回憶記行，反映出何種書寫策略與市場需求？在流亡的行旅生活中，他又是如何從看／被看的過程中，產生複雜多變的對位覺知？除了新鮮獵奇的泰西資訊外，與王韜的傳奇生涯對照之下，這些問題都是《漫遊隨錄》所衍生出的多重閱讀意涵。

本文即欲以此爲關注焦點，除了探討王韜於《漫遊隨錄》中所運用的書寫策略與出版概況，再針對書中所展現的視角轉換與引伸思考作進一步探究，試圖以不同角度切入，以期對《漫遊隨錄》一書有更深入的解讀方式。

貳、書寫策略－記憶重組後的再現與推銷

王韜在《漫遊隨錄．自序》中曾明言此書的出版動機：

> 蓋古人編詩，往往一官一集，於宦遊轍跡之所經，輒低迴俯仰而弗敢忘，誠以佳景當前而易忽，事後回思，如追亡逋，非有詩詞以記之，圖詠以傳之，直付之飄風塵跡、夢幻泡影而已，不大可惜哉。此余《漫遊隨錄》之所作由也。[8]《漫遊隨錄圖記．自序》

> 朋儔過從，與談海外遊蹤，輒為神往，咸曰：「何不詮次前後情事匯為一編，以佐談屑、擴異觀，俾作宗少文之臥遊，不亦可乎？」適有精於繪事者許為染翰，遂以付之，都為圖八十幅，記附其後，而名之曰《漫遊隨錄》，非敢與三君子抗衡也，亦非敢藉以問世也，不過聊以自娛而已。[9]《漫遊隨錄圖記．自序》

從序中所述看來，寫作遊記的原因僅是爲了單純自娛，爲當初的旅行留下一些文字記錄。

書，計非得已，然捨此無可適者」。當時國人對外國人多鄙之為夷，使王韜迭有「徒跼天腑地於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的羞慚。常感「垂翅之鵬，不能奮飛，伏櫪之馬，已無遠志」。參見清・王韜，〈再寄孫惕菴〉，《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卷 2，頁 22、清・王韜著、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咸豐八年 10 月 4 日，頁 34。清・王韜，〈上江翼雲師〉，《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卷 2，頁 8。海外遊歷使他對西方文明經歷了從鄙夷到讚賞，進而主張師法的思想歷程，從而使他成為中國近史上站在時代前列的人物，對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社會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8]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

[9]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3。

然而，如果對照王韜的生命歷程與當時《漫遊隨錄》的出版背景來看，可以發現，該書的出版，除了個人的創作動機之外，其實是在市場需求與個人聲望的雙重加溫效果之下，進而問世的策略性文化商品。

長年流亡在外的王韜，1884 年得到李鴻章的默許回到上海後，已陸續於當時的流行刊物《點石齋畫報》上連載仿聊齋體的小說作品《淞隱漫錄》，並受到一定的歡迎程度。[10]

自 1884 年王韜返滬以來，不論是其隨感作品、推崇文友著作、各界文人讚頌王韜著作的詩歌……等皆佔據《申報》不少篇幅，[11]而王韜亦與當時報界人士來往密切，活躍於上海文壇。

刊載《漫遊隨錄》的《點石齋畫報》則是以不同於傳統純文字的圖像形式，於光緒十年四月（1884 年）創刊於上海，尊聞閣主人已於序中說明其創刊動機：

> 爰倩精於繪事者，則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月出三次，次凡八帧，俾樂觀新聞者有以考證其事。[12]

每月上中下旬各出報一次，隨《申報》一同派送，亦單獨售賣，其創報宗旨，主要以繪圖傳播時事新聞，藉由圖像其所達成知識普及、新知推廣等目的，數量上至少保持在萬份至二萬份之間，銷售網遍及全國。[13]中國知識分子以至下層人士，獲得海內外時事要聞，創新發明，海外風俗民情，除同時代《申報》、《萬國公報》外，《點石齋畫報》當爲第三個重要來源。[14]

《漫遊隨錄》所欲書寫的泰西記行即與《點石齋畫報》所蒐羅的「新奇可喜之事」類型相似；就出版商的利益考量而言，《淞隱漫錄》極受歡迎，假使能繼續推出暢銷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必可招攬一定人氣，且王韜本身的文壇盛名與傳奇性經歷更爲作品宣傳的一大利器。就王韜本身而言，也可利用大眾媒體與通俗讀物出版作品獲得稿酬，對出版商與作者本身而言，可說是相得益彰。

---

[10]點石齋書局之後將出版過的《淞隱漫錄圖說》十二卷推出新版，之後還有寶文閣書莊出版石印本，將之易名為《後聊齋誌異圖說初集》再次發售，可見其於連載結束後仍受到讀者歡迎。參見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 卷，9 期（2006 年 2 月），頁 23。

[11]同上註，頁 22。

[12]《點石齋畫報》，初集，甲冊版記及尊聞閣主人序。轉引自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傳播之圖說形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30-231。

[13]魯迅在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二日，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也提到《點石齋畫報》的巨大影響力：「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時務』－這名稱在那時就如現代之所謂『新學』－的人們的耳目。前幾年又翻印了，叫作吳友如墨寶。」參見魯迅，《魯迅全集》；《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頁 278-279。由再翻印的事實看來，《點石齋畫報》不但於當時受到歡迎，即便到了民國時代尚有一定的讀者市場。

[14]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傳播之圖說形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78-279。

自 1887 年 10 月起直至 1889 年 2 月，王韜的《漫遊隨錄》便一直連載於《點石齋畫報》，第 127 期刊登到 177 期結束，共刊載五十篇圖文。[15]就現實考量而言，這一系列的行旅回憶除了揭示圖像形式已成爲當時上海的另一種閱讀形式外，也說明了作家與出版商共同合作的市場機制下，文化產物所實際運轉的催生過程。

以圖像補充說明時事，的確更能滿足讀者對於域外生活的想像，然而，儘管《點石齋畫報》一開始便強調「畫報」之作用在於「蓋取各館新聞事蹟之穎異者或新出一器，或乍見一物，皆爲繪圖綴說以徵閱者之信。而中國則未之前聞。」[16]，然而，雖強調以「徵實」爲主要目標，但畫家多半仍憑想像構圖，未曾具有真正的遊覽經歷，因此，圖像補充固有其傳神生動的優點所在，但卻也有悖離事實、極爲荒謬之處。例如圖一「博物大院」插圖，王韜描寫其於倫敦博物院所見之犀牛與鯨魚：「有犀牛一，大異尋常，云是開闢初生之物。有一鯨魚，其巨幾蔽屋數十椽，長約二百餘尺」，[17]《點石齋畫報》插圖所呈現的景觀，卻是一頭與犀牛樣貌相去甚遠的牛以及一尾佈滿鱗片的大魚，兩者皆擺設在半開放式的圍籬空間內。

以現今標準看來，當然令人覺得荒謬可笑，然而，這樣的圖像卻是配合著王韜的遊記書寫同時呈現於報上，文字與圖像的搭配固然能開發更爲寬廣的閱讀群眾，不過，畫家與文字創作者的隔閡落差，卻也是另一個出版問題所在。十九世紀末期的大多數讀者或許尚無足夠見解能判別圖像謬誤之處，但這種商業策略運作下所導致的知識誤植，卻也呈現了當時上海文化市場閱讀生態所隱藏的問題層面。

其次，在文體方面，由於發表場地以報紙爲主，我們也可以發現，王韜在遊記散文的書寫亦作了新的嘗試。他多半直接描繪奇異動人的西方風情，且於描繪過程中穿插大量的政治性議論，如對英法兩國的政治、法律、工業、軍事、文化等觀感，直接的個人政論表達，已突破中國古代傳統遊記散文寓情於景、寓理於

[15]王韜曾於〈自序〉稱「適有精於繪事者許為染翰，遂以付之，都為圖八十幅，記附其後，而名之曰《漫遊隨錄》」。據此，如果一圖一文，當有八十篇，然八十篇本的《漫遊隨錄》未見印出。今存此書的最早印本，即申報館附屬點石齋書局石印的《漫遊隨錄圖記》，共三卷五十篇，截至光緒十五年，未見有《漫遊隨錄圖記》開印或發售的消息。至光緒十七年（1891 年）上海著易堂刊印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收入《漫遊隨錄》，不分卷，無〈自序〉，每篇均無題，並頗多刪節，也缺末一篇〈屢開盛宴〉，況且文字悉據點石齋本。由此可見，點石齋本《漫遊隨錄圖記》當印於光緒十六年（1890 年），《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即據點石齋本節錄排印。參見王稼句〈前記〉，收錄於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7。

[16]《點石齋畫報》，初集，甲冊版記及尊聞閣主人序。轉引自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傳播之圖說形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30-231。

[17]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87。據鍾叔河校正，「長二百餘尺」應為「二百餘丈」之誤。

遊之傳統模式，反而更近似於一種論辯文體，表面上看來處處寫異國奇觀，實際上卻藉此反省中國的現實與現代性未來，突破遊記散文的傳統侷限。[18]

Lauren F.Pfiser 便以作品本身爲關注焦點，認爲王韜的旅行回憶書寫，其實擁有更直接的推銷目的：

> 我們可以對王韜的《漫遊隨錄》有另一種更為批判性的閱讀方式，把它視為一個改革派意識型態者透過重組過往的旅程，來向大眾「推銷」某些觀念。找出王韜在 1880 年代中撰寫這份似乎是「個人」旅遊記錄的目的，是一件很有啟發性的工作。[19]

至於王韜究竟在書中推銷了何種觀念？Lauren F.Pfiser 在文中沒有進一步論述，只藉由柯文（Paul A. Cohen）所發現的一個有關年期上錯誤，提醒讀者應以略微批判的角度來看待這份第一身的傳記。[20]

從〈自序〉上來看，王韜的書寫動機並沒有太過特別之處，然而，事隔二十年後的回憶重組，與旅程剛結束時的心境反應自然大不相同，王韜雖未明言，但倘若結合時事發展與王韜的生命歷程來看，可以發現，《漫遊隨錄》的書寫，並非只是是單純的回憶感發與行旅記述，王韜是藉由記憶的耙梳過程進一步印證自己的個人理念。

以王韜對火車的描寫爲例，第一次實際搭乘火車，迅速的便捷性讓王韜極爲震撼：

> 自海口馬賽里至法京巴黎斯，計程一千八百餘里，為時不過七八，輪車之迅捷真如飆飛電邁矣。[21]《漫遊隨錄圖記卷一・道經法境》

---

[18]中國的遊記散文往往是作者遊覽山水亭台的記錄，要求直接刻畫作者對於山川風光的體驗，寓情於景、寓理於遊，特別講究將哲理性議論隱藏於豐富而生動的景物描繪之中。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系列辨識其突出代表。王韜大膽突破此種遊記形式，嘗試直接以議論入遊記，賦予其新的文體活力，這種寫作方式，也影響了後來如梁啟超的遊記作品如《夏威夷遊記》、《新大陸遊記》等。參見王一川，〈王韜－中國最早的現代性問題思想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62。

[19]Lauren F.Pfiser 著、尹凱榮譯，〈王韜與理雅各對新儒家憂患意識的回應〉，收錄於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年），頁 129。

[20]柯文指出，理雅各及王韜是在回香港途中於巴黎拜訪了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這是王韜自己在其他地方談及有關是次事件的記載中可以清楚看到的；但王韜在《漫遊隨錄》的敘述中把這次事件視作到達英國前之旅途的一部份，故此並不是與理雅各一起。參見（美）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48。張海林也注意到了這個錯誤：「王韜《漫遊隨錄》卷二，頁 87 說他與儒蓮見面於他赴英途中，但據王韜《弢園尺牘》卷 7〈與法國儒蓮學士〉、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 11〈法國儒蓮傳〉等考證，兩人見面時間應是 1870 年，王韜返程之時。」參見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21。

[21]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58。

之後在英國倫敦結識了一位賣酒女子的父親，此人乃「司理輪車鐵路者」，藉由談話過程，王韜對英國鐵路的發展歷史也有更詳細的認識：

> 英國初創輪車，國人莫不騰謗，蜂起阻撓，謂舉國牧御由此廢業，妨民孔多豈知輪車既興，貿易更盛，商旅絡繹於途，輪車不及之處，濟以馬車，輪車獲利尤在載貨，貨多則生理大、利息倍，稅課亦增，實為裕國富民之道。國中苟有變亂，聞報調兵，朝發而夕至，有如疾風之掃葉，兵行速而軍需省，無過輪車者。苟無輪車，征夫騎行，時虞盜劫。自建鐵路後，人行萬里，無意外之警，即有急務，頃刻可達。[22]《漫遊隨錄圖記卷一・製造精奇》

對照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王韜雖是在太平天國之亂平定（1864 年）後的第一年來到歐洲，但中國境內仍有流竄山東、河南、江蘇與湖北的捻亂，以及肆虐西北、西南的回亂，這些民亂直至 1873 年才獲得控制，[23]

呂文翠便認爲王韜在文中提到有關英國政府靠輪車評定民亂的部分，「有提供清廷政府借鑑來政治表態，撇清自己與民亂的嫌疑，洗刷當年畫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而遭通緝的罪名」；也與當時李鴻章推動鐵路修築的現代化政策相互呼應，具有「間接誘導庶民大眾接受先進國家業已普及的新興交通工具，與世界思維接軌的意義」。[24]

Lauren F.Pfiser 與呂文翠所提到的觀點可說不謀而合，統整兩人的論點，王韜正是以臨場感受的親身體驗，在作品中重現對西方科技的推崇，並結合時事，推動現代化改革理念。

同樣的觀念推銷也可在《漫遊隨錄》其他部分中找到。例如他回憶當時參觀愛丁堡書院的過程，對於英國教育制度有更爲深刻的體認：

> （書院）所考非止一材一藝已也，曆算、兵法、天文、地理、書畫、音樂，又有專習各國語言文字者，如此庶非囿於一隅者可比。故英國學問之士，俱有實際其所習武備文藝均可實際見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25]《漫遊隨錄圖記卷二・遊博物院》

---

[22]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06-107。

[23]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105-12。

[24]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 卷，9 期（2006 年 2 月），頁 35-36。

[25]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17。

注意到英國注重科學文化的教育體制，這也與他在結束歐陸之遊、回國之後大力提倡格致之學的教育理念相互呼應。

早在寫作《漫遊隨錄》之前，王韜便已提出教育改革思想，主張廢八股、改科舉、廣泛設立新式學校，改以實學，他主張的實學內容則爲：

> 至於所考試者，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詞章之學，曰輿圖，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辯論時事，曰直言極諫。凡區十科，不論何途以進，皆得取之為士，試之以官。[26]

主張以實學取士的構想，雖仍包含傳統經史的教育模式，但強調格致之新式科學教育已有基本理念萌發。

以 Lauren F.Pfiser 所提出的「觀念推銷」論點來看，結束歐洲之行的王韜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刺激之後，進而調整自我認知，提倡不同以往的教育理念。[27]之後在寫作遊記的回憶過程中，再現當年體驗情境，並予以肯定其制度層面。這種書寫策略，的確是一種個人理念的推銷手法，在介紹新事物的過程中，參與了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也與王韜的改革理念有所結合，相互交融。

正因爲《漫遊隨錄》的特殊出版方式，使得這部遊記的書寫，在回憶旅行的過程中，也添加了多種更爲複雜的其他因素。在當時上海的文化消費市場中，圖像與文字的結合、作者與出版商的經濟考量，營造出一部具有獨特個人意識與風格的旅行書，發表場地與作者魅力的相互運作，造就更爲熱門的消費市場與暢銷盛況，《漫遊隨錄》的書寫與出版無疑是一種策略性的文化商業遊戲。

而經過一定程度的人生歷練後，從域外生活回到域內，再於域內審視過往的域外生活時，疆界消融，孰先孰後的分別已不再清晰明顯。早年提倡的改革理念以不同形式出現，化爲重現旅行的文字。

以這兩個觀點來看王韜的《漫遊隨錄》，的確可以將這部遊記的書寫與出版，視爲一種策略性的運用，旅行記憶重組之後，向讀者推銷新鮮獵奇的域外生活、也順勢推銷提倡已久的諸多改革理念。

---

[26]清・王韜，〈變法自強中〉，《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2002 年），頁 31。從 1874 年到 1884 年 10 年間，王韜在《循環日報》上以每日一篇社論的頻度，大量發表政論文章，系統宣揚變法思想，聲名因而大著。〈變法自強中〉便於此段期間發表，早於《漫遊隨錄》所發表的 1887 年。

[27]在歐陸之旅前，王韜對於西方科技仍是抱持著相當排斥的態度，認為沈迷西方精巧事物是玩物喪志之事：「鐘表測時固精於銅壺沙漏諸法，然一器之精者，幾費至百餘金，貧者力不能購，玩物喪志，安事此為。其他奇技淫巧，概為無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韜謂此數者，即中國不行，亦不足為病。」參見清・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卷 4，頁 5。

參、觀看之道－從邊緣到中心的游移擺盪

在探討《漫遊隨錄》一書所呈現的觀看之道前，我們必須對王韜的特殊境遇有進一步探討，方能更清楚瞭解爲何在旅行回憶的書寫中，作者會呈現出游移的視角轉換。

生於江南、長在上海、中年時飽受西式教育、中年後避地香港英國。自三十四歲至六十二歲，人生最精華的而立至耳順的年華皆在域外度過。正因爲這種特殊的人生際遇，使得王韜得以用更開闊的眼光來觀看當時中國在世界的位置，也提出許多更爲先進的改革理念。

早年科舉失利的結果，其實已暗喻了王韜與權力核心的遠離，在上海接觸了西方文明後，處於傳統價值與新觀念的衝擊之下，更讓他開始成爲游離於中西兩大文明之間的「中間人」，[28]之後被迫選擇的海外逃亡生活，並沒有讓他找到適當的寄託，個人的不幸、國家的恥辱、東西文化認同的困惑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反而使他成爲一種「離開傳統堤岸跳入陌生海洋而又一時沒有找到彼岸依歸的『畸零人』」。[29]」猶如近代的「流亡知識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王韜也可以說是社會上的一個邊緣人（marginal man）。[30]

悖離了中國傳統士人讀書報國、進而在仕途上有所發揮的理想途徑，身爲游離於核心外緣的中間人與畸零人，即便王韜曾多次表明自己對旅行的喜好：

> 生平有酷癖，安得幾兩蠟屐，遍天下名山也哉。[31]《漫遊隨錄卷一・登山延眺》

> 余年未壯，即喜讀域外諸書，而興宗慤乘風破浪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風俗奇異，輒為神往，惟以老母在堂，不敢作汗漫遊。[32]《漫遊隨錄卷一・香海羈蹤》

---

[28]柯文（Paul A.Cohen）對這群中間人有過精闢描述：「他們許多都曾深受儒學經典訓練，取得秀才資格，而又起碼部分是因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現所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而來到上海的。作為個人而言，他們頗不尋常，甚或有些古怪，有時才華橫溢。就整體而言，他們代表了中國大地上一種新的社會現象－條約口岸知識分子他們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他們在中華世界的邊緣活動。起初，他們的工作對中國主流中的種種事件似乎幾無影響，但最終他們所提出的東西卻與中國的實際需要逐漸吻合。直到這時，他們才漸次得到一定的社會和自尊。」美・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6。

[29]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

[30]汪榮祖，〈王韜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收錄於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年），頁 40。

[31]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3。

[32]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32。

然而，當這趟出乎意料的「汗漫之遊」終能付諸實現時，在書寫及回憶的過程，卻可以從作品中屢屢讀到他的沈重鄉愁與深沈遺憾：

> 嗚呼！余少時亦嘗有志於用世，嗟勝年之不再，憫時事之日非，常欲投筆請纓，荷戈殺賊，以上報國家。用我無人，卒以讒去，蹈海旅粵，惟事讀書，終日弦歌，聲出金石，亦無有心人過而問焉者。今日羈身餘數萬里之外，去家益遠，而心彌悲已。[33]《漫遊隨錄圖記卷二・倫敦小憩》

可見在王韜的傳統認知裡，無法實踐「荷戈殺賊，以上報國家」的責任與使命，仍是人生一大憾事。

類似的思鄉情緒，在王韜所感而作的詩句中更是明顯可見。例如他在收到倫敦畫館所繪的影像後，即作兩絕句：

> 九萬滄溟擲此身，誰憐海外一逋臣。形容不覺隨年改，面目翻嫌非我真。尚戴頭顱思報國，猶餘肝膽肯輸人。昂藏七尺終何用，空對斜曛獨愴神。
>
> 安得空山證宿因，避人無地且依人。有生已受形骸累，到死難忘骨肉親。
>
> 異國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風塵。可憐獨立蒼茫裡，撫卷聊看現在身。[34]《漫遊隨錄圖記卷二・倫敦小憩》

抑或在遊覽蘇格蘭杜拉的名園盛景後所觸發之感：

> 嗟予窮厄世所棄，胸貯萬斛憂愁煎。山靈出奇為娛悅，令以文字相雕鐫。我鄉豈無好山水，乃來遠域窮搜研。昨日家書至海舶，艙波隔絕殊可憐。因涉名區念故國，何時歸隱江南邊。[35]《漫遊隨錄圖記卷二・暢遊靈囿》

---

[33]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81。
[34]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81。
[35]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10。

這些思鄉感念、抒發個人情懷的文字，皆可令人感受到，王韜雖多次表明自己對於這趟泰西之旅的驕傲與自豪。[36]但無法扼抑的鄉愁與知識分子的使命感還是時時提醒著他。

也正因爲如此，當王韜在描寫自己所接觸的西方科技時，常常是抱持著與中國相互參看的對照態度。例如當他描寫自己在愛丁堡見識到英國印書技術之進步與發達時，立即興起見賢思齊之感：

> 其中男女作工者約一千五百餘人，各有所司，勤於厥職，澆字鑄版，印刷裝訂，無不純以機器行事。其澆字蓋用化學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數千百字，聯邦教士江君曾行之於上海。其鑄版則先搗細土作模，而以排就字板印其上，後澆以鉛，筆畫清晰，即印萬本一不稍訛，此誠足以補活字板之所不逮。苟中國能仿而為之，則書籍之富可甲天下，而鐫刻手民，咸束手而無所得食矣。[37]《漫遊隨錄圖記卷二・蘇京瑣記》

或記敘與西方人士的對談過程，也在不經意中顯示對國家時事的關心與期許。例如他在海耳與英國商人們的聊天內容：

> 詢余中國商務中以何項為巨擘，余答以絲、茶而外鴉片為大宗，然絲、茶有益於外邦，而鴉片實為中國之漏卮，當設何法以除之？皆無以應。中有勞愛先生者，獨侃侃而談曰：「嗣後當糾二三同志設一公會，必先禁印度栽種鴉粟而後可。」余撫掌稱善。[38]《漫遊隨錄圖記卷三・重至英倫》

或在愛丁堡遊博物院時，見一几以礦煤琢成，因而好奇與司院者的問答過程：

> 司院者皆一一指示，且曰：「聞今中國山東境內，其山礦產金甚多，苟掘取之，國家可以致奇富，足用增課，於兵食國餉兩有所濟，惜官民皆疑以為多事也。」[39]《漫遊隨錄圖記卷二・遊博物院》

---

[36]除了自序中提到自己是「先路之導」的角色外，在登覽杜拉盛景、書寫完有關鄉愁的詩句之後，王韜還是不忘在文末強調：「噫，余處境雖厄，而遊覽之奇、山水之勝、詩文之娛、朋友之緣，亦足以豪，幾忘其身之在海外也。」

[37]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20。

[38]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52。

[39]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19。

前者藉由對禁嬰粟之舉的稱許，表達了對中國鴉片之毒的痛恨以及國家弊病的針砭；後者藉由博物館司院者對中國煤礦無法加以開墾的惋惜，暗示了國家資源的浪費。

由上述所舉之例可以發現，王韜對他者的觀看之道，其實背負了許多沈重的責任。即便逃亡在外，還是無法與自己的原鄉徹底切割，以致於在接受新事物的衝擊時，本能的第一個反應，還是與自己的故鄉作一比較對照，進而在觀看的角度中，強化了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流亡的鄉愁，在新鮮獵奇的異國事物中未曾淡化，整趟旅程之中，不論從外在器物或內在制度的參與體認，自始至終，中國傳統士人教育所賦予的責任感並未卸下，王韜念茲在茲的，還是一種「以天下爲己任」的道德責任，在觀看西方文明的進步之際，同時也反照了自己對於中國文明的省思與刺激。

這種情境或許可與本文在一開始便提及的對位覺知來解釋。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40]因爲流亡者同時可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從不以孤立的方式來看事情。新國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他聯想到舊國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識上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觀念或經驗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因而使得二者有時以新穎、不可預測的方式出現。[41]

這種愛國愛鄉之情，在他經過新加坡的停留中，有著更明顯的闡述：

> 新嘉坡古名息力，華人之貿易往來者不下十餘萬，多有自明代來此購田園、長子孫者，雖居處已二百餘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歲時祭祀仍用漢臘，亦足見我中朝帝德之長涵、皇威之遠播矣。聞前時斌京卿椿持節過此，曾有頂帽補服前來謁見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樂，有可知已。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臨其地，宣揚恩惠，憑藉聲靈，俾其心悅誠服，歸而向我，樂為我用，豈非於海外樹一屏藩哉。[42]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王韜即注意到海外華僑問題，且認爲新加坡即使爲大清王朝的棄民，卻仍有愛國愛鄉之情，建議設立外交代表予以聯絡保護。在泰西之

[40]美・艾得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作、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86-87。

[41]同上註，頁 86-87、97-98。

[42]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43。

旅的前段時期，王韜對於外族的觀看之道，似乎仍跳脫不出傳統以中國爲中心的宗藩體制。[43]

流亡歐洲的同時，王韜在感知體驗新事物的歷程，比起一般旅人而言，有著不同的複雜層次。在自我與他者的接觸中，除了訝異於西方科技文明的進步之外，在新舊國度與自我身份的轉換思考之中，除了一貫的家國之悲與見賢思齊之感外，面對可能永遠無法回去更無法截然切割的故國，王韜在調整自我認知的過程也就更爲曲折難解，這也使得他在重述當年面臨西方新事物時的觀看之道時，有著比一般旅人更爲游移曖昧的多重視角。

然而，就觀看的行爲而言，觀看是一種先於語言的存在，也正因爲觀看方才確立了我們在周圍世界的位置，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深受知識與信仰的影響。觀看後不久，我們也可意識到別人也能觀看我們。他人的視線與我們的結合，使我們能確信自己置身於這可觀看的世界之中。[44]

在《漫遊隨錄》中，我們可以看到王韜以旅人之眼觀看西方新事物，也以自我的審美觀與價值評斷，爲陌生的他者作註解。例如他搭船前往英國途中，在開羅見到蒙面婦女時，便作如是描述：

> 肌膚已漸作黃色，面目亦無異人處，惟多以白布遮面，僅露雙眼，睒睒向人，狀殊可怖。[45]《漫遊隨錄圖記卷一・改羅小駐》

對於陌生的蒙面婦女，王韜以「狀殊可怖」四字形容，說明了他對於不熟悉事物的刻板評斷。同樣的，在異域觀看他者的王韜，同時也成爲他者所觀看的對象，例如他行經法國時，十六七歲的法國少女，「貌比花嫣，眼同波媚，見余自

---

[43]同樣的感觸，在《漫遊隨錄》中也曾再次出現：「按東南洋諸小國，列於職方，歲時朝貢，以備共球。自明中葉至今，盡為歐洲列國所分踞，視為東來之要道，蠶食鯨吞，幾無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予偶與備德言之，亦為欷噓不置，為言此間如新嘉坡等處亦有藩王，即古之君於其國者，為英官所節制，僅擁虛位、食廩祿而已。嗚呼！盛衰無常，可勝嘆哉。」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49。美國漢學大師費正清曾經針對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對世界的總體認識作了一番分析：「在對外關係方面，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家與社會仍然認為自己是東亞文明的中心。他和周圍非中國人關係設定是假定以中國為中心的優越感這一神話為前提的。中國這個國家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於中國舞台之巔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早期的歷史學家就提出了同心圓式的等級理論，據認為，地理距離越大的外圍蠻夷與皇帝的關係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樣，他們仍得臣屬於皇帝。和中國皇帝只能保持藩屬關係這種觀念雖然不時受到重創，但一直延續了下來。」參見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33-34。王韜在《漫遊隨錄》中雖不再以此種態度看待西方文明，然而，對於東南亞諸國的觀看之道，卻仍未跳脫傳統的夷夏之分。

[44]（英）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戴行鉞譯，《觀看之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2。

[45]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55。

中華至，咸來問訊，因余衣服麗都，嘖嘖稱羨，幾欲解而觀之。」[46]、在英國鄉間時，更造成「男婦聚觀者塞途，隨其後者輒數千百人，嘖嘖嘆異，巡丁恐其驚遠客也，輒隨地彈壓。」之盛況。[47]

當時中西交通尚不發達，黃皮膚、黑頭髮的王韜出現於歐洲境內，自然也為這些歐洲居民帶來不小衝擊。因此，在王韜體驗西方各式新事物、觀看他者、評論他者的同時，其實自己也成了被眾多他者們觀看的對象，法國少女欲解其衣而觀之的舉動、英國民眾沿途圍觀的好奇，正說明了這種特殊的交流方式。

而這種「觀看／被觀看」的權力移轉，可以從傅柯（Michel Foucault）對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the Panopticon）所做的分析來加以說明。

根據傅柯的說法，全景敞視建築即透過觀視的運用，成為一種權力運作的機制。「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一體的機器：在環形邊緣（囚室），人會被徹底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由於被囚者處於有意識的、持續的可見狀態，因此權力便能自動地發揮作用。由此可知，囚者（被觀看者）是權力加諸的對象，而監視者（觀看者）位處權力的出發點，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就很清楚了。旅行者本來是來「觀」光，卻成為「被觀」的對象，這就暗示著權力關係的倒轉。[48]

旅人不再是純粹的觀看者，在觀看他者的同時，也成了被觀看的對象。王韜在旅行過程中，體驗到了這種權力關係的倒轉。《漫遊隨錄》一書中所呈現最為奇特且意義深刻的被觀看經驗，則是透過英國小孩的童稚眼光加以詮釋：

> 西國儒者率短襦窄袖，余獨以博帶寬袍行於市，北境童稚未睹華人者輒指目之曰：「此載尼禮地也。」或曰：「否，詹五威孚耳。」英方言呼中國曰載尼；其曰禮地者，華言婦人也；其曰威孚者，華言妻也。時詹五未去，故有是說。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識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鬚眉，蒙以巾幗，誰實辨之？迷離撲朔，擲身滄波，托足異國，不為雄飛，甘為雌伏，聽此童言，詎非終身之讖語哉。[49]《漫遊隨錄圖記卷二・遊亨得利》

載尼即 Chinese、禮地即 Lady、威孚為 Wife 之意。英國孩童誤以為穿著寬袍的王韜為女子，因而稱呼他為 Chinese Lady，或誤認他為華人詹五[50]之妻。這

[46]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58。
[47]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23。
[48]賴維菁，〈帝國與遊記－以三部維多利亞時期作品為例〉，《中外文學》，26 卷、4 期（1997 年 9 月），頁 78。
[49]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31。
[50]詹五為安徽長人，身高六尺餘，原旅居上海，職業為墨工，後因突出的身高被西人視為「奇貨」，帶著他與歐洲身高未滿三尺的侏儒遊歷西方各國，滿載而歸。參見清・葛元煦：《滬遊雜記》，

種性別錯置的觀看方式，也使得王韜不得不發出深沈感慨，即便在《漫遊隨錄》中王韜已不再以一般中國傳統男尊女卑的絕對標準來看待西方女性。[51]然而，當一旦自己被誤認爲是東方女性時，卻依然覺得深受衝擊，再回顧自己生平所爲，未盡到報效國家之責，更有愧於原本上天賦予的堂堂男兒之身。

透過他者的眼中，王韜在被觀看的過程中，反而得以更清楚反思自我，進而以不同的角度審視我、瞭解自我。他者所呈現的觀看形象可能是經過扭曲、誤解的，然而，對被觀看的旅人而言，在反覆印證的過程之中，卻可以透過觀看位置與權力的互換，重新認識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自我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當英國孩童以扭曲的性別錯置解讀陌生的他者形象時，王韜在遊覽博物院的過程中，也意外驚見了西方人眼中另一種不同的中國人形象：

> 甫入門，即見有華人男女各一侍立門側，若司閽然，男則衣冠翎頂，女則盛服朝裙。余驚詢何人，以林文忠公對。蓋焚煙啟釁雖屬始於林，而因此得通商五口，皆其功也，故立像以紀其始。[52]《漫遊隨錄圖記卷二・遊覽瑣陳》

禁鴉片而引發戰爭的林則徐，卻因同時開啓了通商五口的貿易功勞，因而在英國蠟像館中也被製像存念。「衣冠翎頂、盛服朝裙」的標準裝扮，說明了英人眼中的中國官員形象。對蠟像館而言，此二尊人像或許僅是新奇收藏品的一部份；但對王韜而言，在陌生異域驚見熟悉的臉孔面容，卻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刺激。

當王韜被英國孩童以女子形象觀看時，蠟像館裡頭的林則徐，卻是因爲不同的理由被存像留念。從《漫遊隨錄》中，我們無從得知在當時英人是以何種眼光來看待這尊華人蠟像，然而，身爲同一個遙遠國家的象徵符碼，在陌生異地所呈現的華人形象對比，卻是有著無比寬闊的解讀空間。

在旅行中同時扮演著「觀看者／被觀看者」角色的王韜，以沈重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書寫了游移視角下所呈現的異國風情與旅人心聲；在被觀看的權力倒轉遊戲中，王韜也得以透過他者眼中所呈現的東方形象，重新省視自我。即便身爲

收錄於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丁丑年（1877 年）至丁酉年（1897 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頁 84。王韜赴蘇格蘭時（1876 年），詹五與其妻已先抵達英國，且聲名大噪。

[51]王韜在《漫遊隨錄》中，對於西方男女平等的情形多有描述，且對於旅途中所接觸的西方女子亦多加讚賞：「名媛幼婦即於初見之頃，亦不相避，食則并席，出則同車，觥籌相酬，履舄交錯，不以為嫌也。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潔其心，秉德懷貞，知書守禮，其謹嚴自好，固又毫不可以犯干也。」王韜在英國停留期間所接觸的西方女子，幾乎都是以聰慧典雅的美好形象出現：「壁滿有妹約媚梨，在法京為女塾師，教女弟子以英國語言文字。一夕以盛設茶會，特延余至塾中。女弟子長者凡二十餘人，年皆十六七，無不明慧秀整，秋菊春蘭，各極極妙」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19、74

[52]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99。

一個游離於邊緣地區的中間人與畸零人，在放逐的流亡生活中，王韜卻始終未曾脫離傳統的核心價值與士人責任，《漫遊隨錄》中的異地風情與文明形象，也在未曾偏離的視角游移中以某種固定方式呈現。

肆、結語－持續前進的書寫旅行

> 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則仍繫乎人而已。夫天道無私，終歸乎一。由今日而觀，其分則同而異；由他日而視，其合則異而同。前聖不云乎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請一言以決之，曰其道大同。[53]《漫遊隨錄圖記卷二・倫敦小憩》

結束於牛津大學的演講後，王韜面對學生詢問孔子之道與泰西天道的不同處時，已經逐漸走出原本狹隘的夷夏論與天朝觀，以更寬廣的態度來看待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位置，從器物層面延伸到思想層面，坦然接受中西思想的不同表現形式。此處所言的「大同」，也早已不同於儒家傳統觀念所言「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

作爲新型知識分子，生活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交融的時代，出入、徘徊於中西兩種文化之間，其知識結構上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記，也深受近代西方文化的濡染，王韜的文化認同也帶有「強烈的游移性、曖昧性與矛盾性」。[54]正因爲如此，在考慮王韜的世界觀時，尤應注意不要將其過於系統化，不要將其實本來就含糊不清乃至前後矛盾的東西硬要劃一。[55]

多數研究者將王韜的這趟歐陸之遊視爲其思想轉折的重要指標，但柯文卻提出不同看法：

> 王韜的旅遊並未使他對西方的看法發生激烈變化，因為這種變化在他離港之前便已發生。[56]

王韜對西方的看法，與他的世界觀發展一樣，都是在漸進中逐漸發生變化，無法爲旅行作爲分水嶺將其截然劃分。不過，實際感受西方生活的具體經驗，也

---

[53]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80-81。
[54]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 52 期（1999 年 4 月），頁 30。
[55]美・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82。
[56]同上註，頁 48。

使得他在十九世紀後期的一片改革聲浪中，擁有更獨特的位置與更廣闊的批評視野。

遊歐後二十年，王韜於《點石齋畫報》上以連載方式發表當年這趟旅行的遊記作品－《漫遊隨錄》。結合圖像與讀者喜好而問世的出版背景，也說明了當年上海的閱讀生態，《漫遊隨錄》成了市場機制運作下作家與出版商共同合作而產生的文化商品。在鼓吹變法改革理念之餘，《漫遊隨錄》的書寫也成了王韜結合時事、推銷個人理念的一種策略，藉由重組記憶、再現西方的闡述過程，遊記亦成爲個人改革理念的推銷手法之一。

身爲流亡的知識分子，王韜對西方世界所抱持的觀看之道，也帶有著與故國無法割捨的雙重視角。在觀看他者的同時，中國士大夫的傳統認知依然存在，時時提醒他以一種沈重的責任感去看待異域、反思故國。然而，在觀看他者的同時，王韜也成爲被觀看的角色，透過他者眼中所呈現性別錯置的扭曲形象，王韜在角色互換的過程中，也重新認識一個陌生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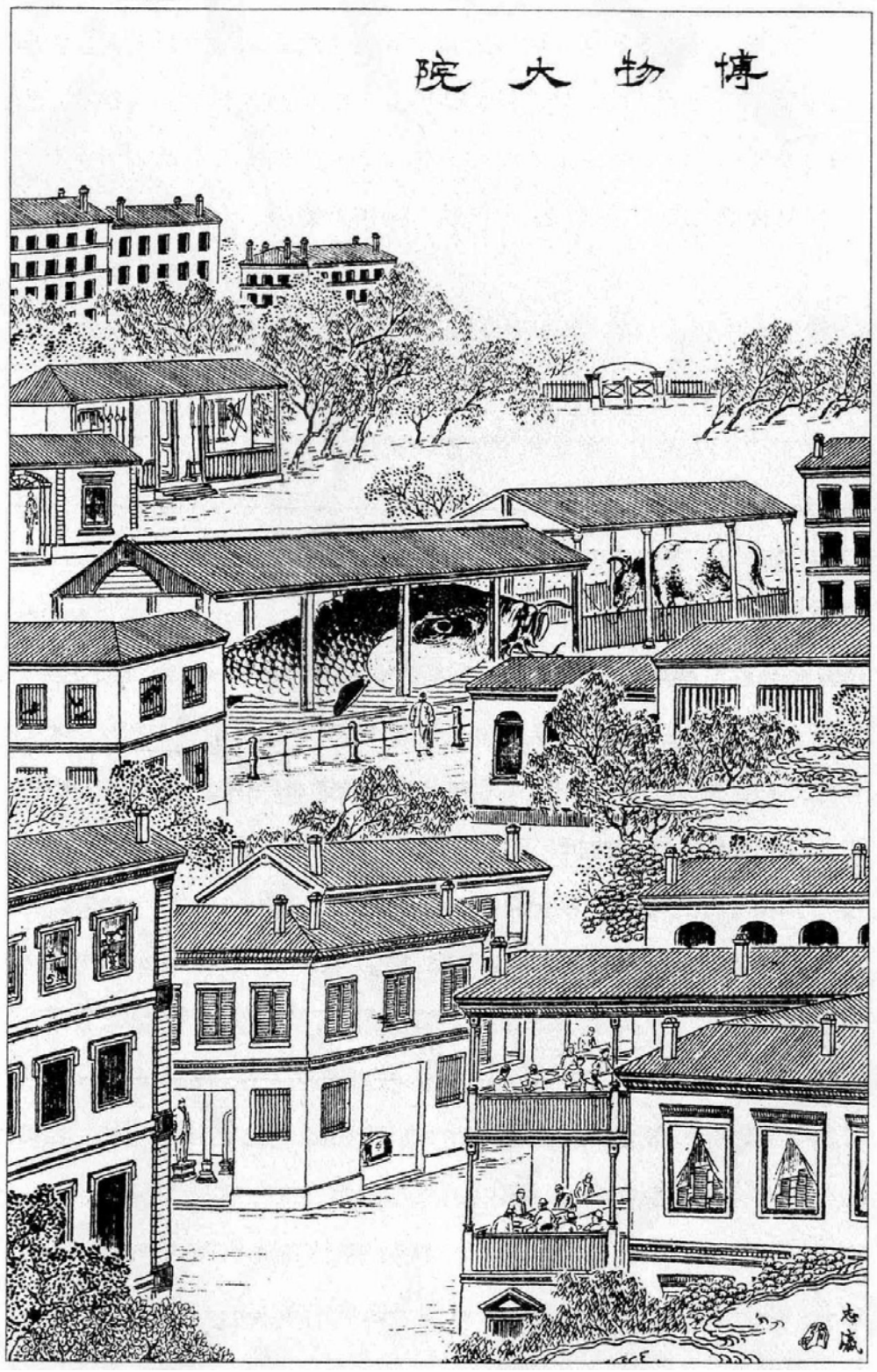
對於這趟跨越疆界的旅程，王韜自己仍是抱持著肯定且自豪的看法：

> 茲已歸自歐洲，縱橫三萬里，周歷四五國，泰西汗漫之遊，足以供其眺覽；極北蒼涼之境，足以蕩其胸襟。飆車電馭，逐日而馳；火艦風輪，衝波其上。所見奇技異巧，殆不可以僂指數。[57]

在當被迫選擇離開故鄉的流亡生活中，卻意外經歷了難得的人生際遇，得以跨出國門、體驗西方文明，除了新鮮獵奇的文化刺激外，更擁有開拓眼界、蕩其胸襟的收穫。重新回到當時的出版環境與時代背景來審視這趟旅行的重新書寫，可以發現，透過回憶的重組與耙梳，當年的歐陸之旅仍以另一種形式在文字中持續進行延展，正因爲如此，《漫遊隨錄》所呈現的域外圖像與旅者省思，也具有比同時代類似作品更爲深刻的意義。

[57]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卷 8，頁 5。

圖一



參考文獻

專書

美・艾得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作、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美・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

英・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戴行鉞譯，《觀看之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清・王韜，《漫遊隨錄》，收錄於（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丁丑年（1877 年）至丁酉年（1897 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

清・王韜著，陳尚凡、任光亮校點，《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清・王韜，《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

清・王韜著，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2002 年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清・葛元煦，《滬遊雜記》，收錄於（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丁丑年（1877 年）至丁酉年（1897 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林啓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年。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魯　迅，《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年。

期刊論文

王一川，〈王韜－中國最早的現代性問題思想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9 年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58-66。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 卷 9 期，2006 年 2 月，頁 5-47。

張　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 52 期，1999 年 4 月，頁 29-39。

賴維菁，〈帝國與遊記—以三部維多利亞時期作品爲例〉，《中外文學》，26卷 4 期，1997 年 9 月，頁 70-82。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07-129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Oscillation and Ambiguity：
The Strategy of Composition and the Way of Observing in “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of Carefree Travels” by Wang Tao

Shi-Ru Chen[*]

Abstract

Wang Tao, who was the reformation forerunner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movement, took his first and unique travel to the Continent（1867-1870） after he was exiled to Hong Kong .The unique travel let him become the Late Qing forerunner of overseas travels. He was the first Chinese intellectual who could not only study Europe through his real experiences of staying in Europe, but also bring the true image of China to the West.

In 1887, Wang Tao serialized his travelogue "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of Carefree Travels" in *The Dianshizhai Illustrated Journal* issued by Shanghai Shen Newspaper, twenty years after his travel. The publication form of this travelogue—memoirs of an individual—reflected not only the special culture of Shanghai but also the employment of some strategy to promote his concepts of reformation.

Living in a special age, Wang Tao experienced both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turns in life. He always observed things within a framework, vacillating between the

[*] Part-time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enter and the ed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observing and being observed, Wang Tao reexamined himself from others' misunderstanding of his sex.

Keywords：Wang Tao, travelogue, writing tactic, "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of Carefree Travels," "the Way of Observing"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131-148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越劇《祥林嫂》與崑劇《傷逝》
—從魯迅小說的改編演出看兩個不同劇種的改革

陳富容*

摘　要

戲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它融合唱腔與身段，借以傳達文學的意境，是一種極美的藝術形式。這種傳統藝術，於元代正式形成，歷經明清兩朝而達於極盛。發展至今，中國戲曲正面臨了一種傳統與現代的接軌及試煉。如何用傳統的藝術形式表達嶄新的文學意境，是現代戲曲工作者亟欲追尋的一個答案。

在中國各種傳統戲曲尋求新路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即它們紛紛選擇了魯迅小說，做為試煉的舞台。如越劇的《祥林嫂》、京劇的《阿 Q 正傳》、曲劇的《阿 Q 與孔乙己》及最近演出的崑劇《傷逝》等，都是各劇種中第一次嘗試將中國現代小說搬上舞台的作品。可以說他們都選擇了魯迅小說，做為他們戲曲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也因此使得魯迅小說，成為中國傳統戲曲與現代文學融合的重要推手，故其演出現象，格外值得觀察。

故本文根據劇種特色與歷史，及其演出作品的內涵，選擇了可以互相借鑑的越劇《祥林嫂》與崑劇《傷逝》兩部作品，希望透過分析與比較，能更深入了解傳統戲曲的革新之路，與現代文學的舞台呈現。

關鍵詞：越劇、崑劇、魯迅小說、祥林嫂、傷逝

*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壹、前言

崑劇是一個具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劇種[1]，它有完整的程式，委婉的唱腔，令人盪氣迴腸。相對而言，越劇則是一個年輕的劇種，從真正形成至今，還不到一百年。但它的唱腔優美，與崑劇幾乎不分軒輊，互有高下，也各自擁有一批死忠的戲迷。

而如果就改編演出現代戲而言，則越劇的腳步，便走在崑劇之先。尤其是在改編魯迅的作品上，越劇更是早了崑劇足足半個世紀以上。越劇《祥林嫂》早在 1946 年時，便由袁雪芬帶領產生，至今歷經多次改良，不論是內容或演出形式，皆已十分完善，是爲越劇經典劇目之一。相對於越劇《祥林嫂》，崑劇《傷逝》則彷若初生嬰孩，2003 年 2 月中旬始哇哇的誕生在上海的戲劇舞台上[2]。就此而言，則崑劇又較越劇年輕了許多。

所以我認爲，越劇《祥林嫂》與崑劇《傷逝》，可以互相借鑒，作出有益的討論，歸納出魯迅小說與戲曲劇種之間的適應性問題，即如何爲魯迅小說創造一種好看的戲曲形式，和爲戲曲改編魯迅小說找尋一條可行之路，讓一向被視爲現代小說經典的魯迅作品，也能以戲曲的方式演出，而成爲另一種形式的經典。

本文之研究，以 1978 年越劇《祥林嫂》的電影演出版，及 2003 年崑劇《傷逝》的舞台演出版爲標本，進行比較討論。基於版本考量，本文僅以情節編排、人物塑造及唱詞、身段等因素作討論，暫不及於舞台美術與場次變換等問題。

貳、魯迅小說與當代戲曲

魯迅小說，誠如上述，已是中國現代小說的經典，而其中所刻畫的無數人物，已然成爲中國人心目中的典型。在中國，魯迅研究已成爲一門「顯學」，而這種風氣延伸到海外，他的小說目前已被翻釋成數十種的文字，傳遍世界各國，使全世界的人都能注視到這位中國近代知名的文壇巨星。就是這種無可取代的重要性，讓無數的藝術工作者，躍躍欲試，想透過各種形式爲魯迅發聲，使其能永久的保留在每一個人心中。

一般說來，改編經典並不容易，「忠於原著」便是經常被提出的要求。對魯迅小說而言，要「忠於原著」，其困難程度又更甚於其他作品。因爲魯迅先生的小說，通常具有相當特別的格式，有時甚至根本沒有具體完整的故事情節，而其內涵之深刻，則又往往超越於形式之上，一般人讀魯迅的小說，經常需要再三反覆，方能真正了解其意涵。所以欲透過其他形式來表達魯迅作品，第一改編者本

---

[1] 此處以崑山腔的正式成立，即由魏良輔開始改革崑山腔前後的嘉靖（1522-1566）年間算起。見張庚、郭漢城著，《中國戲曲通史》（二）（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79 年），頁 55。

[2] 根據《上海戲劇》，2003 年第 2 期報導，演出地點是上海藝術中心。

人需能真正透徹，如果是通過戲戲形式，則不但改編者，就連導演、演員都必需對原著有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辦到，而且要能技巧性的轉換二種不同的藝術形式，更非容易之事，由此可見其困難的程度。

而改編戲劇中最特別的，莫過於以戲曲形式來演出了。與其他戲劇形式相較，中國戲曲的程式運用，則更形成其與魯迅作品融合的另一種挑戰。如何利用程式來傳達魯迅小說中的人物情感、故事意境，對中國戲曲而言，都是一種極大的考驗。

但儘管改編的困難重重，仍有不少的戲曲愛好者，毅然的選擇了魯迅小說作爲其嘗試改編現代小說作品的第一步。知名的有如越劇的《祥林嫂》、京劇的《阿 Q 正傳》[3]、曲劇的《阿 Q 與孔乙己》及最近演出的崑劇《傷逝》等，[4]都是各劇種中第一次嘗試將中國現代小說搬上舞台的作品。可以說他們都選擇了魯迅小說，做爲他們戲曲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尤其是越劇對魯迅小說更是情有獨鍾，在袁雪芬第一次以《祥林嫂》成功的改編演出後，上一世紀末，茅威濤女士亦選擇魯迅小說《孔乙己》，作爲越劇又一次改革的嘗試之作，[5]使魯迅小說再度成爲越劇改革的推手。

在這幾部改編作品中，有些是選擇「忠於原著」，以儘量不改變原著故事情節爲基礎而改編的，如越劇《祥林嫂》、京劇《阿 Q 正傳》、崑劇《傷逝》三劇；有些則是結合兩部以上的作品，但儘量保持其中人物精神形象者，如曲劇《阿 Q 與孔乙己》、越劇《孔乙己》（亦融合《阿 Q 正傳》與《孔乙己》兩部小說）二劇。普遍而言，觀眾對於前者的討論，多半集中於「藝術形式」對於原著精神的體現，及各劇種爲體現原著精神所作的形式改革；而對於後者的討論，則多半集中在改編者的身上，對改編故事情節的安排及人物形象的表現，有比較分歧的意見。

關於改編戲曲是否應該「忠於原著」，完全體現原著精神的問題，其實見仁見智，各有利弊。通常作品能夠雀屏中選，被人拿來改編演出，多半是因爲它已具有崇高的知名度，且廣受歡迎，在這種情況下，忠實讀者對於原著存有一定的尊崇，自然期待看到作品被徹底體現於戲劇舞台上，對於不符合原著精神或使之面目全非的作品，必定多所非議。但如果爲了「忠於原著」，而無法充分表現其劇種特色，創造引人入勝的情節，展現優美的歌舞形式，則亦難以吸引觀眾。畢竟對一般觀眾而言，戲劇的精彩程度（如其情節是否高潮迭起、人物塑造成功與

---

[3] 復興劇團的《阿 Q 正傳》是以京劇為基礎，但如王師安祈所言：「『臺味兒』音樂語言的加入，大大減弱了『京劇』的純度，……使之「朝向『跨劇種』，甚至『跨古典與現代』的形態趨近。」（同前註，頁 130）所以實際上已非單一的劇種，在此將其視為京劇的改革。

[4] 越劇《祥林嫂》，由南薇改編，於 1946 年上海越劇團首演；京劇《阿 Q 正傳》，由習志淦改編，於 1996 年 5 月台灣復興劇團首演；曲劇《阿 Q 與孔乙己》，由陳涌泉改編，於 1996 年河南省曲劇團首演；崑劇《傷逝》，由張靜改編，於 2003 年上海崑劇團首演。

[5] 越劇《孔乙己》，由張正鈞改編，於 1999 年浙江小百花越劇團首演。

否、歌舞表演是否好看等等），才是他看戲的重點，而不會考慮其是否體現原著精神的，有時觀眾甚至是樂於看見別出新意的情節發展。故而當原著的部分情節不利表演時，則改編者便可能會屈就舞台，捨棄原來的故事情節，追求一種更爲普遍的趣味。

所以如何改編，端看於改編者與劇團的訴求，及其對藝術形式的熟捻與運用自如的能力。我認爲如果劇作能夠在大原則下不偏離原著，又能利用故事情節，適當的加入必要元素，創造表演空間，展現其劇種的藝術特色，便是當代戲曲改編現代題材的「雙贏」政策，也才是能夠被普遍接受的成功改編。

故筆者本文便在此一標準下，選擇以越劇《祥林嫂》及崑劇《傷逝》這兩部在「忠於原著」之原則下改編的戲曲作品，來檢視它們表現魯迅作品的能力，及其利用魯迅小說爲劇種尋找新路的過程與結果。

參、戲曲《祥林嫂》《傷逝》與原著題材的適應性

《祝福》（即《祥林嫂》）與《傷逝》，都是魯迅用以反映舊社會體制的真實悲劇。在兩部小說中，魯迅同樣的敘述兩位封建時代的女性，在婚姻不自由的情況下悲慘的境遇。其中令人動容的悲劇情節，幾乎是集中在兩位女主角的痛苦遭遇之上[6]。閱讀兩位女主角（祥林嫂與子君）的一生，使人有一種化不開的愁悶，感情爲之鬱結。

這兩部小說，都是魯迅《彷徨》時期的作品，前者寫於 1924 年 2 月，後者寫於 1925 年 10 月，創作時間非常接近，心理基調也有部分的雷同。大陸學者閻慶生曾分析魯迅的創作心理說：

> 如果說《吶喊》給讀者帶來的是精神的震韻和亢奮，那麼《彷徨》給讀者帶來的，則更多的是低迴不已和在沈思中的探求。……在看似沖淡的外表下，深沈地鳴奏著悲痛激憤之音。[7]

這正是我們在閱讀《祝福》與《傷逝》時，心靈的震動。所以如果想要以戲曲形式再次展現魯迅精神，則這樣的心理基礎便不可不把握。以下便從此一角度切入，檢驗這兩部戲曲與魯迅原著題材的適應性。

---

[6] 學者對於《傷逝》的討論有時也集中在涓生的身上，畢竟涓生的「悔恨」使故事有被敘述的可能。大陸學者陳嬌華說：「顯然，涓生是魯迅一系列精神特徵及反抗絕望人生哲學的主要體現者和承擔者。相對說來，子君則成了一個空洞的符號，沒有負載多少實質性意義的東西，他只不過充當了涓生精神、心理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道具。」，〈從另一種視角解讀《傷逝》〉，《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50-55。雖然如此，但子君之由對愛情充滿希望和勇氣，及其最後失望而沈默，終至於死的形象變化，方是令一洒同情之淚的關鍵所在。

[7] 見閻慶生，《魯迅創作心理論》（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41。

一、從「敘述體」到「代言體」

在《祝福》與《傷逝》這兩部小說中，魯迅同樣創造了一個敘述者的角色，讓他看見這一切，做最真實的描述。不同的是，《祝福》中的「我」，幾乎是一個完全的局外人，但在最後對祥林嫂有致命的一擊；而《傷逝》中的「我」（即涓生），則是悲劇故事的製造者，捏拿著女主角的悲慘命運。這兩部作品皆是「敘事體」的小說，如何轉換爲「代言體」的戲劇，考驗著改編者的智慧。

由於「敘述」可以是跳躍的，想到什麼說什麼，不一定要有成串的情節發展。而如果敘述的本身又是透過故事中的某一人物輸出時，則其看待事情的角度，便可能無法全然等於其他劇中人物真實情感了。所以在改編過程中，如何使原先零散的故事完整，而被敘述的對象，又當如何在戲劇中「主動」的傳達情感，都是改編戲劇中最難克服的部分。

從這個角度看來，《祥林嫂》與《傷逝》有著不同的處理手法。越劇《祥林嫂》幾乎完全揚棄了「我」的敘事角度，讓故事直接的進行，僅在最終的幕後合唱中，隱約的表達了「我」的議論和同情。而崑劇《傷逝》中的「我」，則以回憶的姿態出現，直接將自己化爲回憶中的故事主角，讓情節說話，「我」便在回憶中跳脫了敘事者的角色。

乍看之下，在形式的保留上，《傷逝》似乎較《祥林嫂》更忠於原著，但其實並不全然。因爲在《祝福》中，「我」僅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其所敘故事，不摻雜個人私情，較能接近於真實，所以越劇《祥林嫂》按照「我」所敘述的故事梗概，直接演來，並不覺牴牾。而《傷逝》中的涓生，是旁觀者，也是當事者，崑劇舞台上保留回憶形式，讓人感覺這還是涓生的角度，不是其他人物的直接情感，是比較妥當的安排。雖然如此，在演出時，回憶中子君之主客觀問題，仍是容易混淆，難以克服的部分。

所以不論是戲曲《祥林嫂》或《傷逝》，其進入劇情中心的形式選擇，筆者以爲都是合宜的。但其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是，當戲曲中喪失了這個敘事的「我」，讓故事直接呈現時，原來「虛幻的客體」成爲「真實的主體」，被敘述者在舞台上主動演出，他的心理活動和語言，都將實實的展現，其中必然與原小說有著一定的落差。而從這一個角度看來，《傷逝》的演出負擔，似乎較《祥林嫂》來的沈重。

套一句中國老話：「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雖然在兩部小說中，敘述者都多少懷著懺悔的心理來看故事中的女主人翁，但其分量卻不大相同。《祝福》中的「我」，雖然因爲無法解除祥林嫂的疑慮，拯救其痛苦的靈魂，而帶著些許的愧疚，但絕非祥林嫂命運的主導者；而《傷逝》中的涓生，卻大大的牽引了子君的命運，是他開啓了子君對自由婚姻的嚮往，也是他極力掙脫子君的依賴，使其無助而走上絕路，可以說是他主導了子君的悲劇命運。所以敘述時的情感不同，

角度自然也不相同，《祝福》中的「我」，可以是超然的旁觀者，而《傷逝》中的「我」，則只能是落寞的當局者了。故呈現的結果是，《祝福》中的祥林嫂，可以不受牽絆的表現自我，而《傷逝》中的子君，則僅是涓生悔恨心理下的投影。

所以對戲曲的改編而言，感情負擔較輕的情況下所描述出來的「祥林嫂」，是比在主角複雜情愫下所敘述出來的「子君」，更容易塑造舞台形象的。因爲祥林嫂只需是那個遭受傳統思想箝制，無法跳脫命運掌控的可憐女人，便容易引起觀眾共鳴，也不致違背魯迅的原意。而子君則需是涓生心中懺悔的對象，又需是舞台上擁有自我血肉的故事主角，所以如何在舞台上創造一個真實的子君，又能表現小說中涓生描述的子君，是將《傷逝》搬上舞台的一大挑戰。

二、從「小說情節」到「舞台情境」

舞台情境的營造，在《祥林嫂》一劇而言，其成就早已是普受肯定的。但在追求舞台效果的觀念主導下，越劇《祥林嫂》在形成之初，也曾經有過一些悖離原著的改編，如祥林嫂與牛少爺的戀愛及其砍門檻的經過。這些情節都在一次次的演出試驗中，逐漸的淡出舞台，不再受人青睞，如今我們所見的《祥林嫂》，故事情節與魯迅原著，十有八九是吻合的。編劇巧妙的利用旁人的敘述，排列出整個故事的情節，按照先後搬上舞台。雖然在小說中敘述的時機或前或後，沒有一定的順序，編劇卻條理分明的鋪排出其發展的脈絡，使觀眾一目了然。

其間偶有穿插幾段祥林嫂心情的獨唱，也都是在情節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如聽完柳媽那段陰司分鋸的敘述之後，祥林嫂「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著大黑圈」[8]，可見其一夜憂思恐懼，輾轉難眠。越劇中在此安排其唱道「……剛才柳媽一番話，原來我罪孽有這般深。我人世不見天堂路，陰世倒有地獄門。」[9]這樣的唱段，加強了悲苦情調，也是想當然爾的過程。還有最後祥林嫂被趕出魯門時，她將一生的遭遇，從頭敘述，並唱出她對命運、靈魂的疑惑[10]，祥林嫂心中最後的疑問與悲苦，在這個唱段中適切的表達出來了，不枝不蔓，恰到好處。

而且基於舞台演出的時間限制，編劇非但沒有丟棄原有的情節，反而將許多段落結合，加快故事的節奏，意外的增強了其悲劇效果，在短暫的演出中，賺人熱淚。如把賀老六的死與阿毛被狼銜的情節，安排在同一天，劇情發展的合情合

---

8 魯迅著，《魯迅小說合集》（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168。

9 越劇《祥林嫂》之祥林嫂唱詞，1978 年上海越劇院演出，上海電影製片廠供版。

10 同註 9。祥林嫂唱：「剋夫剋子命運蹇，啊呀命呀！命呀！命好命苦由誰定？怎麼你不著，又看不見，為什麼割不斷，總牽連啊！為什麼你緊跟隨，總難改變！我爲了贖罪去捐門檻，花去我工錢十二千，人說道，天大的罪孽都可贖啦，卻爲何，我的罪孽仍舊沒有輕半點？啊呀！輕半點。……我只有搥頭問蒼天。（白）『魂靈究竟有沒有？』『地獄到底有沒有……死了的一家人還能再見面嗎？……告訴我……快告訴我……』」。

理，而祥林嫂的悲慘遭遇，更令人感覺無以復加；另外，把祥林嫂捐好門檻的情節，安排在祝福禮被趕出魯門的前一刻，其喜悲的對照，更讓觀眾感覺世間的無情與祥林嫂的悲哀。

若強欲分辨其間差異，則祥林嫂接受賀老六的一段過程，可說是戲曲編劇別出新意的創造。小說中對於祥林嫂從抗拒到接受老六的過程，並沒有多加描述，只在最後與柳媽的談話中道出：「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11]使人隱約感受到祥林嫂是在老六的武力脅迫下，不得已就範的。但越劇《祥林嫂》中，欲刻畫的賀老六，除了「有的是力氣，會做活」[12]外，還有「心地善良」[13]的特質，老六的形象因此更爲豐富，兩個人的感情基礎亦更形牢固，舞台的表演也更加好看了。

所以不論在情節的鋪排、意境的營造與人物的刻畫上，越劇《祥林嫂》的改編，都能夠體現原著精神且兼顧舞台的可看性，令人不覺觀之而神往。

相對而言，崑劇《傷逝》與魯迅小說的貼合，便不如此理所當然了，觀眾需自己用一點力去兜合它。

我們需承認導演以舞台燈光與大提琴伴奏當背景的現代技巧運用，的確鋪陳出一種和小說《傷逝》同調的悵惘氣氛。但是仔細觀看其演出，卻隱約感覺悵惘的內容似乎與小說並不十分吻合。

首先，在崑劇舞台上，編劇安排涓生「故地重遊」，但這「故地」究竟爲何？是婚前涓生獨居的會館，還是婚後兩人同居的吉兆胡同？從「這紫藤分明依舊」[14]的唱詞及求婚的情景中，彷彿感覺涓生所謂的「故地」是指前者，但由後來二人同居，子君與房東的明爭暗鬥，又推斷其應爲吉兆胡同。在此編劇似乎將其簡化了，以二者爲一。

從舞台的手法上看來，這並無不可，但如此一來，便有無法解釋涓生心理的矛盾了。在小說中，涓生對於自己和子君同居於吉兆胡同的那一段記憶，是不堪回首的，他甚至希望這一切沒有發生過[15]，所以對於吉兆胡同這個處所，他是亟欲逃開的，他道：

---

[11]同註 8，頁 167。

[12]同註 8，頁 163。

[13]同註 9。

[14]《傷逝》首幕之幕後伴唱，2003 年上海崑劇院演出。

[15]「深夜中獨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樣，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同註 8，頁 256。

> 我要離開吉兆胡同，在這裏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我想，只要離開這裏，子君便如還在我的身邊；至少，也如還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意表地訪我，像住在會館時候似的。[16]

所以涓生留戀的是婚前的光景，而不願碰觸的是婚後那一年的生活。不同的場景，投射出來的心理基調，也是截然不同的，不當相提並論。

而戲曲與小說之間最大的落差，如前所述，應是在於戲曲中子君「主觀表述」與小說中涓生對她的「客觀描述」兩者之間了。在小說中，由於《傷逝》是以第一人稱男性化敘述視角來敘述，也因此使得子君的心理、意識及精神等，幾近成了「空白之頁」或是成了男性臆想化的產物，所以子君只能給人一種「家庭女性」或「金絲鳥」的模糊印象，對於她的心緒、情思，人生體驗，她的痛苦或歡欣等等一無所知，沒有申訴也沒有自辯。[17]這樣的形象，幾乎是平面的。在小說中我們感受到子君的悲苦，從不透過她的言語，而是經由她的沈默。這樣的黯然，使人們對她的心理充滿想像，而她的悲哀也有了挖掘更深的可能。

但舞台上所創造的子君，卻因欲豐富其表演，而展現了她喋喋不休的一面。編劇刻意截取兩人有可能對話的場景，經由二人的互動，推展情節，但「空白」卻被抹滅了。所以縱然表演的場景大致並不悖離原著，但在內容情味上，卻已大不相同了。

在舞台上我們看到的是，涓生向子君求婚的場景，和子君不斷複習這言語的片段，還有最後編劇利用它來鋪展愛情起變化的安排。但卻看不到那個由「大無畏」（兩人一同尋找處所時）而「怯弱」（涓生被辭退時）而「頹唐」（飼養的油雞被吃掉時）的子君，也感受不到當涓生說出「我已經不愛你」時，她那種「只有沈默，她的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瞬間便又蘇生，眼裏也發了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飢渴中尋求著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迴避著我的眼。」[18]的心理變化。同樣的，涓生那種「嫌惡」（對於子君的識見逐漸淺薄，書也不看了）、「自私」（逃開家庭，自己躲到圖書館中取暖和求取清靜）的表情，及其曾經三次「想到子君的死」和最後面對子君離去前所留下的「鹽、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及幾十枚銅元」[19]時，驚覺自己「卑怯」的形象，也是舞台上難以尋覓的。失掉了這些無對話的空白，不覺的削弱了子君與涓生的形象，也沖淡了作者營造出來的悲劇氣氛。

---

[16]同註 8，頁 273。
[17]同註 6，頁 54。
[18]同註 8，頁 270。
[19]同註 8，頁 272。

崑劇《傷逝》雖然保留了回憶的形式，卻失去了敘述的角色，甚至連這個原先敘述者的獨白都很少，這樣的劇情鋪排，成爲它無法表現原著豐厚情感的一大缺憾。

但整體而言，其劇情發展，仍然是抓住主軸的。在舞台上我們依然可見那與傳統對抗、忠於愛情的子君，也可以看到那迷失悵惘、空虛悔恨的涓生，更感受到那生活摧逼與愛情消逝的悲哀。正如專家所說：

> 當然它的內容意思都有所改變，但給人感覺還是很親切，還是魯迅的作品，魯迅很多小說裏的議論和抒情，一些很精彩的思想，都能在唱詞中得到體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認為是比較成功的作品。[20]

崑劇《傷逝》雖然在塑造人物，及內容情味上的掌握，不如原著豐厚，但它努力維持原汁原味，使演出不致於變調的堅持，基本上是有成效的。

肆、戲曲《祥林嫂》《傷逝》的創作局限與突破

越劇《祥林嫂》與崑劇《傷逝》，在體現原著精神的基礎上，各自展現了不同的實驗成果。而這個結果，除了導源於改編者的思想與原著敘事模式的限制外，有時劇種的特質與傳統，也是它在改編現代小說題材時的一大考量，故此越劇和崑劇，各有其不同的困難需要突破。

就越劇而言，《祥林嫂》的首次創作，發生於 1946 年，此時越劇的歷史，僅有四十年之久，嚴格說起來，是還在成形的階段中。在這種情況下演出現代劇，其表演的規範少，但相對的，可用的資源也少。相反的，崑劇是一個具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老劇種，在不斷的琢磨試煉中，早已形成一套顛撲不破的戲曲程式，在此時演出《傷逝》，它可供借鑑的資源多，但相對的，表演規範也自然不可少了。

另外，從兩齣劇目的演出歷史看來，《祥林嫂》的演出經驗及成熟度，則是遠遠超越於《傷逝》之上。最早出現的越劇《祥林嫂》創作於 1946 年，正當袁雪芬積極改革越劇之時。由於她對小說《祝福》中所描述的紹興風土有深切的共鳴，更有感於祥林嫂的悲慘遭遇，故而決定以之爲其一系列改革的劇目之一。在改革中，袁雪芬確立了劇團的編導制度，同時在演出的音樂、身段、舞台美術上，都有令人一新耳目的創舉。這種勇於嘗試的精神，讓《祥林嫂》一劇的演出，獲得空前的成功，越劇也從此進入它的鼎盛時期。

但越劇的藝術工作者，並不以此自滿，仍然在一次一次的演出中，不斷的改良、修正，從故事情節、音樂程式到身段動作、腳色行當，皆能精益求精，別出

[20]〈尋找今天的「傳統」—記實驗崑劇《傷逝》〉，影音資料，《東方戲劇大舞台》。

新意。所以從 1946 年首次創作，歷經多次改良，到 1978 年由上海越劇院所製作的電影，已是越劇的經典之作了。

相對於越劇《祥林嫂》，崑劇《傷逝》的改編背景，則薄弱許多。首先，它是由一位大四學生張靜所改編，在〈尋找今天的「傳統」—記實驗崑劇《傷逝》〉訪談記錄中，她真實的敘說其創作動機：

> 我最初在看魯迅作品的時候，首先是感動，因為感動才會有創作的衝動，想把它表現出來，然後就去尋找一種形式。我覺得崑劇和魯迅作品，在某一個程度上有一種契合。這種契合可能是在文化品格上的一種契合，也就是說因為魯迅是一種經典，而崑劇又是另外一種經典，我們試圖用一種經典去融合另外一種經典，我想，這可能是他們兩者之間最大的一個契合點。[21]

由此可知，改編劇本的產生，並非源於編劇對劇種改革的使命感，而是出自於她想表現魯迅作品的創作衝動，而崑劇正巧契合了她心目中《傷逝》的藝術特質。

但不可否認的，編劇的確展現了她的創作才華，讓《傷逝》有了搬上崑劇舞台的可能。這個劇本很快的獲得上海崑劇院的青睞，在一種改革的熱情下，選擇了小劇場的形式，作爲實驗的第一步。從訪談資料看來，參與這部戲曲的工作者，幾乎都是一些年輕的崑劇藝術家，導演和編劇甚至原先並非十分熟諳崑劇藝術。在這種情況之下的演出，其實驗精神令人佩服，但其稚嫩的程度，也是不可諱言的。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劇種對於魯迅小說的改編演出，各有其不同的局限與背景。以下我們便根據劇種的特色，來檢驗它們的改革成果。

一、音樂之呈現

首先，從音樂談起。越劇音樂結構則屬於「板腔體」，曲詞是以七字或十字寫成的詩讚形式。剛開始僅有「四工唱書調」與「哀哀調」這兩種粗草的唱腔，伴奏也只用尺板與小鼓等簡單的樂器。後來逐漸吸收其它曲藝的優點，不但發展出豐富的曲調，也加入了多種形式的樂器。

其中從 1942 年開始，由袁雪芬帶領下的越劇改革，可說爲越劇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由於風格獨具，有別於傳統越劇，一般稱之爲「新越劇」。在袁雪芬領導下的越劇，在腔調上的改革，有許多重大的突破，不但創新曲調，也

[21] 同註 20，張靜口述。

改變了整個樂團的結構。而《祥林嫂》的音樂運用，則是她一連串革新運動上，重要的指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祥林嫂》將探索中的音樂曲調，成功的編入曲詞，在舞台上展演，彷彿宣告著改革中的越劇腔調，已經邁向成功的階段。若仔細比對《祥林嫂》的唱詞與魯迅原著，不難發現二者的語言運用極其相似，《祥林嫂》的越劇演出，甚至可以整句套用魯迅原詞，這一點是我們在崑劇《傷逝》中看不到的。觀賞《祥林嫂》的唱段，的確使我們實實的感受到—這是魯迅先生的作品。不僅如此，就連音樂的節奏、情調，都能貼合於故事情境，而且美妙動聽。可見越劇的音樂改革，已經使它跨越傳統的橫溝，能爲現代題材發聲了。

《祥林嫂》音樂創作的成功，並非一蹴而就，它是經過專業的作曲家，不斷的試驗、改良而成的。根據周來達先生的敘述，劉如曾先生曾經六次修改《祥林嫂》的音樂，甚至到臨死前，仍然提出可能的修改意見。[22]可見其用心之深刻，故能創造出《祥林嫂》優美動人且表現力十足的音樂。

而這些音樂上的改革，不僅是針對唱腔，就連整個伴奏樂隊所用的樂器，也有所調整。他們配合身段動作的改革「嘗試著把鑼鼓僅僅用在對某些必要場面的氣氛渲染起輔助性的伴奏上，有的戲則根本不用鑼鼓。」[23]而且嘗試用一些西洋交響樂的樂器伴奏，來作整場的配樂。這些改革，在當時都是十分新穎的，有開風氣之先的帶頭作用。

而崑劇的音樂運用，屬於曲牌聯套體的結構，簡稱「曲牌體」，分九宮十三調，各宮調的曲情互異。演出時，按照劇情選擇適合宮調，但允許有犯調和集曲的彈性，以求擴大音樂表現力。配合其歌唱技巧的要求，創造出一種「柔婉細膩、流利悠遠」的音樂特色。

崑劇《傷逝》的唱段，基本上是按照這種曲牌體的規律填詞的，如它將南曲小石調【漁燈兒】套的前三支【漁燈兒】【錦漁燈】【錦上花】連用，又使用北曲正宮調【脫布衫】簡套（即【脫布衫】【小梁州】【么篇】三支曲子連用），有如小型「套曲」或「組曲」；另外亦有兩支曲子連用者，如南曲的【忒忒令】【園林好】連用，及北曲的【鬥鵪鶉】【小上樓】連用等。[24]這些都是作者盡量依照傳統的範例填詞，以求保留崑劇原味。

在唸白的部分，則幾乎完全依照傳統的運腔模式，除了現代時空中與房東的幾段簡短對白是用普通話外，在過去的時空中，男女主角仍然是唸韻白，藉此營造出一種崑味十足的情調。而男主角黎安（演出涓生）在小生真假嗓發聲問題上，由於考慮至在現代戲中，用假嗓顯得不夠諧調，故揉合了崑曲大官生的唱法，提

[22]周來達著，〈緬懷您，戲曲音樂大師劉如曾〉，《戲文》，第 4 期（2001 年），頁 49-51。
[23]見胡導，〈論袁雪芬戲劇觀〉，《藝術百家》，第 1 期（1994 年），頁 10-19。
[24]張啟豐著，〈身在小劇場中，聞笛—實驗崑劇《傷逝》初看〉，《兩岸實驗劇場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中華民國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基金會，2003 年 11 月），單行本頁 5。

高了用真聲的比例，以增加人物的真實感，但基本上仍然不脫離傳統行當的運腔特色。[25]《傷逝》演員對於調合傳統與現代的努力，使人深深的感受。

在伴奏樂器的使用上，亦如同《祥林嫂》，加入西洋樂器一大提琴，而且讓演奏者居於舞台上明顯的位置，藉此突出男主角在「傷逝」過程中，那種淒清落寞的感受，並創造出一種「不和崑劇相牴觸的『意韻』」[26]。這項構思，雖然無法獲得一致的認同，但就其實驗的角度而言，卻是一項有意義的嘗試。

所以從戲曲音樂的角度檢驗，越劇《祥林嫂》著力於改革，請來專業的音樂家爲它量身訂作完整的音樂程式，使正在發展過程中的越劇音樂，更具敘述性與生活化的特色，有利於表現現代題材。崑劇《傷逝》則大量的保留了傳統，不論是在演唱或唸白上，表演起來仍然崑味十足，體現了它高度的文學性與抒情性的唱腔特色，但也使它在表現現代題材時，較受限制。相形之下，《傷逝》之傳統包袱沈重及缺乏專業製作，或許就是它在推展劇情，與塑造人物形象，不及《祥林嫂》流暢與豐厚的一大原因吧！但它儘量的保留優良傳統，使人感受到那是實實的崑劇演出，創造出一種與現代題材不太牴觸的表演方式，是值得肯定的。

二、身段之展演

另外，能展現劇種特色的，還有身段的表演。一般認爲，戲曲的表演特點，即在於其載歌載舞的藝術形式。所以除了歌唱之外，身段程式在舞台上的運用，也是中國戲曲演出現代題材的一大考驗。

從這方面而論，越劇是一個年輕的劇種，故其舞台表演比較沒有負擔。所以它大膽的嘗試在演出中，減弱了傳統程式化的寫意性質，以話劇式的寫實動作取而代之，藉此增強它們的幻覺性及真實感，以適應幻覺性的舞台時空及近似生活真實的寫實舞台。[27]但他們也意識到這是戲曲，不是電影或話劇，其唱、唸、做、舞的表演，還是應當具有一定的寫意性。所以請來崑劇老藝人鄭傳鑑、方傳芸等，指導演員的身段表演，爲他們設計出「既有生活素材依據因而帶幻覺感而又合乎戲曲表演「手、眼、身、法、步」的美學創作規律」[28]，使其表演不脫戲曲載歌載舞的藝術形式。所以我們在電影越劇《祥林嫂》中看到的身段動作，雖是寫實大於寫意，但仍具歌舞演故事的戲曲特性。

相對於越劇，崑劇的古老性及其身段程式之規範，則不得不成爲其演出上的重要考量。

---

[25]同註 20，黎安口述。
[26]同註 20，錢正口述。
[27]同註 26。
[28]同註 27。

崑劇之表演藝術精緻，堪稱各劇種之冠，也是各劇種的取經之源。但也因爲崑劇擁有如此豐厚、優良的表演藝術，使《傷逝》的舞台演出，更加戰戰兢兢。因爲如果要把古老的戲劇程式，一成不變的用在現代舞台上，是難以諧調的；但如果丟棄傳統，則更難以被承認。所以崑劇的年輕演員，在演出《傷逝》一劇時，顯得十分辛苦與費心。就如黎安便將傳統小生的水袖表演，巧妙的以現代戲中可能出現的圍巾代替，用它來表現人物的喜懼及浪漫、纏綿。[29]這樣的演出設計，十分具有智慧，不僅適用於現代舞台，而且能使古老的舞蹈動作在此產生作用。

不僅是圍巾的運用，其它還有像跪步、摔僵屍，及丑角一些逗趣性質的表演，也都是這群年輕的崑劇藝術家「把老師們這麼多年教他們的東西，他們拼命的在一個個抽出來，抽出來後揉碎了以後，一個個塞進去。」[30]的成果，其用力之痕，清晰可見。所以崑劇《傷逝》在舞台的身段表演上，雖然也加入了不少話劇的寫實動作，但他們儘量的保持崑劇身段的寫意，有傳承，也有開創，其實驗的成果是可以留下典型的。

所以越劇《祥林嫂》與崑劇《傷逝》二者，對忠於魯迅「原著精神」的表現不同，在保存劇種特質的認知也不同，但它們卻都成功的利用劇種特質，來創造一個擁有劇種獨特風格的劇目，留下了值得典藏的範本。

伍、結論

時代是不斷流動的，美好的藝術傳統，也可能因爲時空的變異，不再受人青睞。所以改革的呼聲相應而出，這是中國傳統戲曲需要嚴肅面對的課題。一個不動如山的劇種，雖然可能成爲典型，但卻未必能爲時代大眾所接受，而終究難逃成爲「活化石」或「遺跡」的命運。

越劇與崑劇勇於嘗試，接受改革的呼喚，在音樂、身段、舞台美術等戲曲元素上，跨出嶄新的步伐。雖然改革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批評與苛責，但革新總在「似」與「非」[31]的嘗試中得到啓示，進而成爲傳統。所以勇於改革，才有發現新傳統的可能，爲自己創造生存之道。

越劇的大膽改革，使它在改編演出《祥林嫂》一劇時，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可以製作出貼合於魯迅原著的戲曲作品，也創造了優良的傳統。而其間經過半個世紀的精益求精，使得今日的《祥林嫂》，更具可看性。相較之下，崑劇的改革

---

[29]同註 20，黎安口述。

[30]同註 20，岳美緹口述。

[31]參見周來達，〈現代戲中「似、非」程式性音樂現象透析〉一文，《音樂探索》，第 1 期（2003 年），頁 28-36。文中曾談到，在戲曲音樂的改造過程中，不免摻入「似傳統音樂」與「非傳統音樂」的元素，而當這種音樂被承認擁有該劇種特色時，即有可能躍升為該劇種的傳統音樂。我認為不僅音樂如此，就連身段程式與舞台美術，也是應該是這樣的。

雖然保守拘謹，努力維持優良傳統，但也開啓了一扇望向未來的窗，或許五十年後的《傷逝》，在不斷改良的過程中，也能像《祥林嫂》一樣，具有經典的價值。

越劇《祥林嫂》與崑劇《傷逝》的實驗精神，終將決定它們在各自的劇種發展史上，擁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也爲各自劇種在改革之路上，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

陸、參考書目

一、書籍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戲曲志・江蘇卷、上海卷、浙江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2-1999 年。

王安祈，《當代戲曲》，台北：三民書局，2002 年

王秋桂主編，《中國地方戲曲叢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1995 年。

吳新雷主編，《中國昆劇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2002 年。

李漢飛主編，《中國戲曲劇種手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 年。

周祥鈺、鄒金生合編，《九宮大成南北譜》，收錄於《善本戲曲叢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洪惟助主編，《崑曲辭典》，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2 年。

高義龍，《越劇史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年。

高義龍、李梅雲編，《越劇藝術》，上海：上海聲像出版社，1993 年。

張成濂、張建森編輯，《中國戲曲劇種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 年。

張　庚、郭漢城著，《中國戲曲通史》，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79 年。

張　庚，《戲曲藝術論》，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7 年。

鄭懷興，《戲曲編劇理論與實踐》，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魯　迅，楊義編，《魯迅作品精華》，第 1 卷【小說集】，1998 年。

魯　迅，《魯迅小說合集》，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

閻慶生，《魯迅創作心理論》，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二、期刊論文

《上海戲劇》，第 2 期 2003 年。

周來達，〈現代戲中「似、非」程式性音樂現象透析〉，《音樂探索》，2003 年第 1 期，頁 28-36。

周來達，〈緬懷您，戲曲音樂大師劉如曾〉，《戲文》，2001 年第 4 期，頁 49-51。

邵柏靈，〈試論魯迅筆下的兩位女性形象—祥林嫂與子君之比較〉，《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第 18 卷，2002 年，頁 7-9。

侯耀忠，〈走向永恒的解讀 評大型悲喜曲劇《阿 Q 与孔乙己》〉，《中國戲劇》，2002 年第 3 期，頁 27-29。

胡　導，〈論袁雪芬戲劇觀〉，《藝術百家》，1994 年第 1 期，頁 10-19。

張啓豐，〈身在小劇場中，聞笛—實驗崑劇《傷逝》初看〉，《兩岸實驗劇場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中華民國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基金會，2003 年 11 月，會議單行本。

陳嬌華，〈從另一種視角解讀《傷逝》〉，《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學報》，2001 年 9 月，第 18 卷第 3 期，頁 50-55。

廖　奔，〈從魯迅作品意象到越劇《孔乙己》〉，《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 年第 3 期，頁 53-57。

盧時俊，〈新越劇的歷史功勛—四十年代越劇改革〉，《戲文》，1994 年第 1 期，頁 39-43。

三、影音資料

〈尋找今天的「傳統」—記實驗崑劇《傷逝》〉，《東方戲劇大舞台》，2003 年。

崑劇實驗小劇場《傷逝》，2003 年上海崑劇院演出。

電影越劇《祥林嫂》，1978 年上海越劇院演出，上海電影製片廠供版。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31-148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Shaohsing Opera *Shyangllin Sao* and Kunshan Opera *Depression for Passing Away*—Discussion on the two types of drama reformation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s Adapted from Luu-Shiunn's Novels

Fu-Jung Chen *

Abstract

Chinese opera has been one of the valuable properti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lending tunes and figures, the opera, as a wonderful form of art, elevates the audience to a spiritual level. This traditional art was formed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both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Now, it is facing an inevitable test of mix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orms. Therefore, some modern Chinese dramatists are eager for a resolution to this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various kind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rama, I have found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that Luu-Shiunn's novels were widely chosen as testing materials, such as *Shyang-Lin Sao*, a Shaohsing opera, *Ah-Kui's Biography*, a Peking opera, *Ah-Kui and Koong Yill-Jii*, a Song opera, and *Depression for Passing Away*, a Kunshan opera, which were performed on the stage recently. All of them are the first works displaying the combination of modern

* Part-time Lecturer, Yu Da College of Business.

Chinese novels and traditional drama on the stage. Apparently, Luu-Shiunn's novel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ilestone of dramatic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performance of his works is worth our observation.

The article, thus, discusses and compares *Shyang-Lin Sao*, a Shaohsing opera, and *Depression for Passing Away*, a Kunshan opera, in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ind of opera, their history, and the stage performances, so that we can comprehend more deeply about the future re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Keywords: Shaohsing opera, Kunshan opera, Luu-Shiunn's novels, blessing, depression for passing away.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149-178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老子の思想－「道」の働き

張才興*

摘　要

『老子』における「道」は、形のない、音のない、そして実物のないものと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ところで、「道」は古から今まで続ける不変なものであって、その存在と非存在の両方の状態を含め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の「道」は見ることも、聞くことも、手にふれることもできない、惚恍として有るが如く無きが如く、その存在は無状の状・無物の象という状態である。こういう状態は、人間の感覚・知覚による把握を超越するものの意。つまり、「道」の形象が人間の主観が認識する対象になり得ないものを言う。「道」の働きは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し、その要諦は「無為」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無為」とは、本来が「無作為」であることから知られるように、実際は何も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それは「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それなら、人もこの「道」の原理を基づいて無為を持することにより、事情をも成就できるのである。老子によって、無為が大為となる、無用が大用となる、無治が至治となる、不争が至争となるのである。その内在的修行は清静を重んじ、沖虚・退譲を以て自分から守り、柔弱・謙卑を以て自分を保持し、恬静・寂静を以て自分の天分に安んじ、純真に帰り、樸素に帰るを以て目的として自らを養うのである。

関連キーワード：老子、道、無状の状、無物の象、謙卑、樸素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壹、はじめに

老子は諸子とは異なる独特の「道」の概念を提倡する。これこそが「常道」だとする「道」、つまり「恒久不変の道」である。『老子』の第一章にある冒頭での「道の道とすべきは…」で出ているところだが、「自然」と同義語で、いろいろ万象を総括する唯一的存在である。第五章で「天地は不仁、万物を以て芻狗と為す」といっているのも「道は不仁」と置き換えて、その意味はあまり差し支えない。老子の「道」の働きは、目にも見えず、音にも聞こえず、手に取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ついに、「名付けようもないものだが、仮に呼び名を「道」としておこう」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しかし、万物を次第に生み出し、養い育てるという、その功業はまさに歴然としている。そうすれば、「道」の形状は、「無状の状」・「無物の象」・「惚恍」（『老子』第十四章）とでもいうほかはないである。

老子の思想は自然主義から人間の処世態度まで多岐に渡るが、その原則は天地万物の根本である「道」によって表現される。老子の「道」は、宇宙の存在以前に存在する造化のエネルギーであり、実在するが形を持たずむしろ人間には知覚や認識ができないものである。造化のエネルギーである「道」は、天も地もなかったときすでに存在した。この天地さえも、実際は「道」の働きによって生じたものである。そして「道」の作為をすることなく、いつ始まるということもなく、また、いつ終わるということもない、万物を安定した着実な営みつづけている。つまり「道」は、このように「無為」であり、「自ら然る」という営みである。

老子の「五千余字」は、もちろん自然科学を探究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それはあくまでも、形而上的な「道」の論説と、形而下的な人間における社会生活の規範の論説と、この両者が合論している。老子における「道」の要旨は、「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老子』第三十七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が、この命題は、同時に人間におけるの行動の規範ともなるものである。つまり、人間も「道」によって無為を持することにより、事功をも成就できるのである。「道」はあまりに広大で漠然としているので定義や解釈を超えているが、人為を廃し自然であることが「道」に通ずるとされる。このような態度を無為自然といい、老子はこれを処世から統治まで全て適用すべきと考えていた。小論のおもな内容は、「道」の働きについて、いささかの浅見を述べるものであろう。

貳、老子という人物について

老子という人物については詳しい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ない。前漢の司馬遷の『史記·老荘申韓列伝』に見られる老子の簡単な生涯を記録されている。

>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1]

> 老子は楚の苦県・厲郷・曲里の人なり。名は耳、字は聃、姓は李氏、周の守蔵室の史なり。孔子周に適き、将に礼を老子に問わんとす。老子曰く、子の言う所は、其の人と骨と皆已に朽ちたり。独り其の言在るのみ。且つ君子は其の時を得れば即ち駕す。其の時を得ざれば則ち蓬累して而て行る。吾れ之を聞く、良賈は深く蔵して虚の若く、君子は盛徳にして容貌は愚の若し。子の驕気と多欲と態色と淫志とを去れ。是れ皆子の身に益無し。吾れ子に告ぐる所以は是の若きのみ。孔子去り、弟子に謂うて曰く、鳥は吾れ其の能く飛ぶを知る。魚は吾れ其の能く游ぐを知る。獣は吾れ能く其の走るを知る。走る者は以て罔を為すべく、游ぐ者は以て綸を為すべく、飛ぶ者は以て矰を為すべし。龍に至っては、吾れ其の風雲に乗じて天に上るを知る能わず。吾れ今日老子に見うに、其れ猶お龍のごときか。老子は道徳を脩め、其の学は自ら隠して名す無きを以て務と為せり。周に居ること久しうして、周の衰うるを見、迺ち遂に去って関に至る。関令尹喜曰く、子将に隠れんとす。彊いて我が為に書を著せと。是に於て迺ち書上下篇を著し、道徳の意を言うこと五千余言にして

[1]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七、《史記・老荘申韓列伝》、藝文印書館、頁 1-7 参照。

去れり。其の終る所を知るなし。或は曰く、老萊子も亦楚人なり。書十五篇を著して道家の用を言う。孔子と時を同じうすと云うと。蓋し老子は百有六十余歳と。一説には二百余歳ともいう。其の道を脩めて寿を養えるを以てなり。

司馬遷の『史記·老荘申韓列伝』によると、老子は楚の国の生まれ、姓は李、名は耳、字は聃。孔子と同時代の頃には「老萊子」という人もいたが、あるいはこの人が老子ではなかったともいわれている。その真偽のほどはわからない。『史記』に見えるが、それによると老子は、孔子と同時期の先輩ということで、春秋時代末期、前六世紀の人であり、荘子の在世は孟子と同時期で前四世紀後半に当る。

老子は周の蔵室を管理した柱下史であった。周の都に長らくいたが、周の国力の衰えを見て、やがて周を立ち去り函谷関まで来た。その時関守の令尹喜の頼みを受けて書き残したのが『老子』上·下二篇、「道」と「徳」の意義を述ること五千余字。[2] この書で、彼の言葉の記載から見ると、背景となる人物の類は虚構されたもので、すべて漢代の人の記録であって実像とは殆ど関係がない。一方、『老子』という書物を著作した後、青い牛に乗り周を出て、その行き先は誰も知らなかった。老子という人物は、本来老先生を意味する匿名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とからすると、その生涯は永遠の謎といえよう。つまり、『老子』は果たして老子の自著でないとすれば誰の手によって、これらの点に関しても今のところはさまざまな見解が行なわれているだけである。

『史記』によって、孔子が礼について教えを乞うたことがあったが老子は戒めて、「きみが言っている人たちは、古代の賢人は空言のみ残って骨は朽ちている。君子など時流に乗れなければあちこち転々とするだけだ」といい。孔子は、周の老子へ礼を問いに行った…孔子は帰って弟子に、「鳥に対して、吾はその飛ぶのを知る。魚に対して、吾はその泳ぐのを知る。獣に対して、その走るのを知る。走るものに対して罔を使うことができ、泳ぐものに対して綸を使うことができ、飛ぶものに対して矰を使うことができる。竜に至っては、吾はそれが風雲に乗って天を上るの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日出逢った老子は、まさに竜なのだ」と話した。

中国古代の哲学思想によって、中国人にとって、万物の根源は「無」であり、「空」であり、「未決定」であり、「深遠な宇宙」であり、「道」あるいは理

[2] 老子の「道徳」とは、今日いわゆる宗教・社会生活・行為規範としての「道徳」が異なって、その「道徳」はそういう狭い限定された概念的なものではない。この宇宙、もちろん人生を含む、この宇宙が、これなくしては存在活動することのできない、これによって宇宙が宇宙たる所以の者を道といい、その道の人生におけるものを徳というのである。(安岡正篤、『老荘のこころ』、日本東京福村出版、1988 年、200 頁参照。)

性とよば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る。[3]『老子』のおもな思想は、殷·周以来天や上帝の神格思想を否定し、時·空を超越した絶対価値、すなわち宇宙本体である形而上的、理性的「道」を持った。[4]老子の「道」の世界を最終的に真実なるものと見るから、「道」の在り方をそのまま己れの在り方とする。この「道」は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しながら己れを創造者として意識することがなく、万物を差別することがない。そして、「道」の本質を表わす根本的な考えを含んで、実体と現象は同じものと見なされるのである。

老子における「道」の働きは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している。その要諦は「無為」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無為」とは、本来が「無作為」であることから知られるように、実際は何も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それは「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老子』三十七章）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それなら、人もこの「道」の原理を基づいて無為を持することにより、事情をも成就できるのである。「道は常に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という命題は、換言すれば、無為が大為となる、無用が大用となる、無治が至治となる、不争が至争となるのである。その内在的修行は清靜を重んじ、沖虚·退譲を以て自分から守り、柔弱·謙卑を以て自分を保持し、恬静·寂静を以て自分の天分に安んじ、純真に帰り、樸素に帰るを以て目的として自らを養うのである。それゆえ、人の営みである「大為」·「大用」·「至治」·「至争」とは、つねに失敗の危険を伴う。

---

[3] ヘーゲルによれば、中国人にとって最高であらゆる事物の根源は「無であり、空であり、未決定であり、深遠な宇宙であり、「道」あるいは理性とよば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る。ギリシア人が絶対的なものは一つであると捉らえ、また近代人がそれを最高のものとするとき、すべての決定は廃止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して、抽象的な肯定的な形で、この新しい否定をとり除こうとしても何も表わせないのである。」ヘーゲルの東洋思想についての説明では、「道」は理性であり、絶対的「存在」であるという西洋哲学の伝統にもとづいている。（張鍾元著、上野浩道訳『老子の思想』ー タオ•新しい思惟への道ー、“Tao: A New Way of Thinking”、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14 頁参照。）

[4] 天という概念のは、漢の劉向の『説苑•建本』に、斉の桓公が管仲に問うた、「王者は何を貴ぶか。」管仲が答えて、「天を貴びまする。」桓公は仰いで天を見た。管仲がいう、「私の申します天は、あの青々ひろびろとした天をいう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人の上に立つ者は、人民を以て天といたします」と。中国における「天」という概念の多義性をよく示している。ことにその中の二大要素である。自然物として天と、理念（王者の規範）としての天とを。もっともここでは両者が理性的に分別されているけれど、より古くは単なる自然物としての天という意識はなかったであろう…「道」を自然哲学的な実在の意味に用いるのは、老子に始まる。『老子』第一章、「道の道とすべきは常の道に非ず」に明の沈一貫は注して、「儒のいわゆる道とは路なり。日用常行を以て言う…老のいわゆる道とは、直ちに本体を指して言う」と。老子によれば、天地に先だって混沌とした物がある。それは形もなにもないもので、永遠に存在し、どんなところへも自在にりこむ。（赤塚忠•金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湧、『思想概論』、日本東京大修館書店、1968 年、31•53 頁参照。）

『老子』における言葉のおもしろさは、論理学の用語パラドック（paradox）という逆説的論法が大量に使用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5]例えば、「柔弱が剛強に勝つ」（『老子』三十六章）とすることは、実はその反対で、世間では勝のは剛強な者と決めてかかっているが実際は全て柔弱が勝っている。「柔弱」という言葉は、一見すると弱きものの代表として、実は無限のパワ―を含めている。柔と剛が弱と強となるのであって、この二字の持つ本来の意義を逆転されるものである。「道は常に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とすることは、これも世間の常識からすれば正反対である。「無為」が「無不為」となるのであって、実は老子に独特の考慮が働いているのである。

參、『老子』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

書物としての『老子』は、概ね五千という字数で、それが上·下二篇に分かれ、上篇は三十七章、「道」を説き、下篇は四十四章、「徳」を説くとすることから、上篇を「道経」、下篇を「徳経」と称し、便宜的に『道徳経』とも呼ぶことも通例であり、合計八十一章で構成された。ところが、各章の次第·順序も 、どうしてこのように配列されているのかよく不明である。その内容は戦争を否定し、人為を去って、無為·自然であるべきことを提倡するのである。

一九七三年の十二月、湖南省長沙の馬王堆漢墓の三号墓から前漢初期の『老子』二部の写本が発見された。研究グル―プによって、甲本·乙本と名づけられたのである。甲本は小篆に近い文字で書か、漢の高祖の即位する頃（前 206-195 年の間）の書写であり、乙本は隷書かれていて、漢の恵帝の即位前後（前 194-180 年の間）の書写と推定されている。さて、テキストの乙本八十一章「小国寡民」では、「邦」が「国」となったのは、実は漢の高祖劉邦の諱「邦」を「国」と改めているのである。ところで、甲本は改めず、[6]それは高祖の即位する以前の書写本であることを示す証拠だ、というのであり、一方、乙本は高祖在世から恵帝在世中の間に書写された本と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してこの両本を現行本と較べると、上·下二篇の順序が入れ替わって、すなわち「徳

---

[5] 逆説とは、英語 Paradox の訳語。真理に反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が、よく考えてみると真理である説。

[6] Robert G. Henricks，*"LAO-TZU　TE-TAO CHING"*，《老子徳道經》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1989 年, 頁 157 による。

馬王堆出土《帛本老子》甲本（第八十章）	馬王堆出土《帛本老子》乙本（第八十章）
小邦　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	小國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
重死而遠送有車周無所乘之有甲兵	重死而遠徙又周車無所乘之有甲兵
無所陳□□□□□□□用之甘亓食	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亓食
美亓服樂亓俗安亓居　邦相　雞狗	美亓服樂亓俗安亓居　國相望雞犬
之聲相聞民□□□□□□□	之□□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経」が「道経」の前に置かれ、字句にもなかなか多くの異同が見られるのである。ところで、この『帛本老子』二部の写本は殆ど現行本と同じ内容であり、この頃に『老子』は成書したと考えられる。

一九九三年、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楚墓から竹簡本『老子』が出土した。研究グル―プの鑑定で紀元前三百年前後の戦国末期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されるのであった。この『老子』のテキストは、竹簡の体裁などから三種類に区別されていて、甲本は都合 39 枚で一簡の長さが 32.3cm、乙本は全 18 枚で一簡の長さは 30.6cm、丙本は全 14 枚で一簡の長さが 26.5cm となっていのである。郭店楚簡本『老子』、各章の順序や区切り方が現行版と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ことのである。

多くの『老子』の注釈書の中で、もっとも古い伝統を持ち、精善なテキストを提供しているとされている『河上公注』(河上公 前 180-157 年）本と『王弼注』(王弼 226-249 年）の二種である。河上公という人物自体謎が多く、隠者だといい、姓名は不明で、しかしテキストの中には神仙の色味を帯びた内容が多く。王弼は『三国志』によって弱冠にして評判高く好んで儒家と道家について論じ、『易』と『老子』に注をつけたが二十余歳で早死にした。彼の『王弼注』は最もすぐれたテキストとして学者によって一般に承認され受け入れられてきた。

『老子』というテキストは、一般に紀元前六世紀の春秋時代に作られたと信じ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れ以来、『老子』について注目すべきは、中国、日本、ヨ―ロッパ を通じてじつに膨大な量に上る注釈書が作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中国においては、七世紀末の書籍目録である『隋書·経籍志』は、十八種の『老子』の注本を載せる一方、佚亡書約三十種をしるしている。しかも、その後、明の英宗·正統十年（1445 年）に編纂された『道藏』は、当時に行なわれていた『老子』の注本約五十種を収めている。ヨ―ロッパにおいても、諸国の言葉によって何回も翻釈されてきた。『老子』が最初にヨ―ロッパに紹介されたのはラテン語の翻釈でロンドンの英国学士院にもたらされた一七八八年である。そうして、一八四四年までにフランス語とドイツ語による『老子』の完全な翻釈がおこなわれた。

肆、「道」の働き

老子において「道」は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ずる根元であった。そして、「道」は天地の始まりとして、万物の母として考え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る。『老子』という書物の巻頭におかれたの第一章に、「道可道、非常道」（道の道とす可きは常の道に非ず）という言葉は、その全体哲学思想の根本をなす「道」につい

て説明する。[7]『老子』全体のなかで「道」の原理的説明を加えているのは、第四章に、「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は、冲しけれども之を用いて或に盈たず）、第十四章に、「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の道を執りて以て今の有を御む）、第二十一章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道の物たる、惟れ恍、惟れ惚）、第二十五章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物有り混成し、天地に先だちて生ず。寂たり寥たり、独立して改めず、周行して殆れず。以て天下の母と為すべきも、吾れ其の名を知らず。之に字して道と曰い）、第三十二章に、「道常無名」（道の常は名無し）、第三十四章に、「衣養万物而不為主」（万物を衣養して主と為らず）、第三十七章に、「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の常は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第四十章に、「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反は道の動、弱は道の用）、第四十二章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は一を生じ、一は二を生じ、二は三を生じ、三は万物を生ず）、第六十二章に、「道者、萬物之奥」（道は万物の奥にして）などである。老子の「道」は、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無形であった。無形のはたらきである「道」ははたらき自体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そのはたらきは万物の創造ということでる。故に「道」を創造自体ということもできるであろう。[8] さて、老子の「道」に関する思想が、ここに展開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一、「道の道とす可きは常の道に非ず」

『老子』第一章に、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妙之眾門。

---

[7] 老子の「道」は、天下の母たるべきもの。感覚を超えたものだから、名づけようもないが、強いて名づけれげ道という（第二十五章）。これは人格•意志をもつ存在でけはなさそうである。

[8] 老子の道は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無形であった。無形のはたらきである道ははたらき自体であるといことができる。そのはたらきは万物の創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故に道を創造自体ということもきるであろう。しかるにさきに触れたように万物のはたらきは道のはたらきにほかならず、そして道は常に新しきものを創造するが故に生命自体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にして老子において道は活動自体であり、創造自体であり、生命自体であった。いうまでもなく老子の道は固定した存在ではない。それは道がはたらき自体であることから当然である。（大濱晧『中国古代思想論』、勁草書房、1977 年 10 月 31 日、43 頁参照。）

道の道とす可きは常の道に非ず、名の名とす可きは常の名に非ず。名無し、天地の始めには、名有り、万物の母には。故に常に無欲にして以て其の妙を観、常に有欲にして其の徼を観る。此の両者は、同じく出でて名を異にし、同じく之を玄と謂う。玄の又た玄、衆妙の門。[9]

「道の道とす可きは常の道に非ず、名の名とす可きは常の名に非ず」という言葉は『老子』の第一章の冒頭に出て来る言葉である。その意味は、これが道だと規定しうるような道は、恒常不変の真の道ではなく、これが名だと示せるような名は、恒久不変の名ではない。老子によって、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す「道」は、それ自体不可思議で玄妙な働き、実在の神秘を形容する言葉のあでる。この「道」は、恒常不変なものを「常道」と呼んだ。要するに、「道」はそのなかに天地万物を包括する唯一的存在である。そして「道」自体は対象として捉えられない、名づけようもないという意味で、無であるといった。万物は、無から生じて無に帰するのである。

後漢の許慎の『説文解字』に見ると、「道」というのは、本来は人の往来する「道路」の意味であるが、転じて、人の行うべき道の意味となる。ところが、あらゆる人為的規範（儒家思想の礼義）を排斥する老子は、むしろ規範を自然の世界に求め、天地造化の営みに着目してそれを「道」と名づけた。天地間には恒常不変の原則（「道」）があり、万物は次第に生み出され化育されていく。その化育の功は完全無欠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これを「為さざるは無し」と称した。そして、老子はこの「道」をさまざまに思索し探究するところに、独特の「道」の形而上学が展開するのである。[10]老子において、「道」には名が無いといいながら、「道」という名のついていることは矛盾するが、老子は別に、それやむをえずしてつけたかりの名であることを釈明している。ものは名をつけられたときに、相対的有限の存在となる。それに対して「道」は、「無名」であるがゆえに、無限であり、絶対的である。かくて「常名」とは、「道」に対してつけられた「無名」という名にほかならないのである。[11]

「名無し、天地の始めには、名有り、万物の母には」という句は、第三十二章に「道の常に名無し」とある言葉と同じ思想である。この「道」は太易茫茫の混沌とした状態から、まず、陰陽二気（「道は一を生じ、一は二を生じ、三は万物を生ず。万物は陰を負うて陽を抱き、冲気、以て和することを為す」

[9] 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31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10]楠山春樹、『中国思想史』•「老子•道家思想の祖」（日原利国編）、日本東京ぺりかん社、1987 年、50-51 頁参照。
[11]楠山春樹『老子』一 柔よく剛を制す、東京集英社、1987 年、48 頁の説による。

第四十二章）が交合してさらに冲気が生じ、この冲気が生成の核となって万物が生み出されるのである。「道」の働きは、造化のエネルギ―とでも称すべきものであり、日々夜々に万物を生み出している。

「故に常に無欲にして以て其の妙を観、常に有欲にして其の徼を観る」の二句は、「常に無欲」の語は、第三十四章にも用いられ、「無欲」の語は、第三十七章、第五十七章などにも見え、すべて「道」を体得した聖人としての在り方であり、つぎの「常に有欲」の語は、一般世俗の人としての在り方である。「妙」は造化の妙、すなわち「道」の奥妙幽微を観られる形而上的な世界として状態であり、「徼」は辺塞、すなわち「道」の形而下的な世界として状態である。つまり、恒久的に無欲である者（得道の人）は、始元的な道の微妙を観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恒久的に有欲である者（世俗の人）は、現象的な万物の末端を観るにとどまる。[12]

「此の両者は、同じく出でて名を異にし、同じく之を玄と謂う。玄の又た玄、衆妙の門」という句は、「此の両者」とは、上文の「天地の始（無）」と「万物の母（有）」とを承けて、同じものであり、名を異にするのである。そして本章の結びである「玄の又た玄、衆妙の門」の句は、こうした「道」の奥深さ、或いはその働きの玄妙を象徴的に表わした言葉であって、「道」は神秘から神秘へ、このように玄で不可思議であるが、そこから入り、そこから出るそういう門である。

二、「道は冲しけれども之を用いて或に盈たず」

『老子』第四章に、

>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 道は、冲しけれども之を用いて或に盈たず、淵として万物の宗に似たり。其の鋭を挫き、其の紛を解き、其の光を和らげ、其の塵れを同じくす。湛として或に存するに似たり。吾れ誰の子なるかを知らず、帝の先に象たり。[13]

「道は、冲しけれども之を用いて或に盈たず」という言葉は『老子』の第四章の冒頭に出て来る言葉である。「道」に関して「冲·用·盈」など字をもち

[12]楠山春樹『老子』一「道」に関することば、東京集英社、1987 年、50 頁の訳注による。
[13]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62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いてその在り方を説明した。老子において、「道」は広大無辺てあり、「無」によって働き、満ち溢れものではない。換言すれば、「無」は単に空間を意味するではない、それは「無形の形」と同様であり、第十一章に、「三十輻、一轂を共にす。其の無なるに当って車の用有り。埴を埏ねて以て器を為る。其の無なるに当って器の用有り。戸牖を鑿って以て室を為る。其の無なるに当って室の用有り。故に有の以て利を為すは、無の以て用を為せばなり」とある。この章の主旨は、「無」である「道」の働きを掲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れなら、『河上公注』は、第十一章に、「無用」（無の働き）と名づけているように、形有る器物が形有る器物としての役割を充分に果たすためには、形無きもの、もしくは形無きところがその根底に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車輪·容器·部屋などを素朴な比喩として説明するのである。つまり、「無」はやはり無（なし）ではない。例えば、「三十輻、一轂を共にす」という言葉は、まず、三十本の輻が同じ轂に集まっているが、その真なかの車軸を通す部分に空間があって、その空間のところに車の動く働きがある。老子は、常に有と無とを対照的に論説が、その「無」を言うの場合は、「有ることが無い」という意味であって、要するに、上述した言葉の意味における「有」の否定の総和としての「無」である、というのである。

清の段玉裁の『説文解字注』に見ると、「冲」という字は「盅」の借字で容器のからっぽさま。そこから「虚」または「冲虚」と同義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る。[14]「盈」は「虚」の反対概念であり、「或」は「常」と同義である。「常」に関して、唐の易州の龍興観にある『道徳経碑』に刻まれている『老子』のテキストは、「或存」を「常存」に作っている。老子の「無」の働きに関して、福永光司氏は『老子』上で次のように説明する。

> 道はからっぽの容器のように一見空虚に見えるが、つまり人間の認識能力でそれがここにあると対象的にとらえることのできない冲虚な存在であるが、その器はいくら使っても一杯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ない、すなわち無限の効用性と無尽蔵のはたらきをもつ広大無辺な形而上的実在である。[15]

[14]「虚」という概念は、わずかに第五章に天地（の道）の作用を説明するに「虚にしてきず」といっていて、虚静説からの継承を示してぉり、第三章に「是を以て聖人の治や、其の心を虚しくして、其の腹を実たす」とあって、実際的応用手段としているだけである。これは、実質的には虚という概念は『老子』中で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るのであるが、無•沖（盅）等の用語がこれに代わり虚の用語に即した思弁は後退していたからであろう。（赤塚忠、『諸子思想研究』•「第二『老子』中の虚静」、日本東京研文社、197 頁参照。）

[15]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64 頁参照。

老子によって絶対の「道」は「無」（なし）と言われる。「道」が天地万物に越えて同時に内在する関係が「有」に掲示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れで「天下万物は有より生じ、有は無より生ず」（『老子』第四十章）ということは結局、天下万物は「道」の働きによって生ず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老子』第一章に「万物の母」すなわち天地を「名有るもの」とよび、「天地の始め」すなわち「道」を「名無きもの」という言葉によれば、ここで天地万物がそこから生じるという「有」とは、「名有るもの」すなわち天地をさし、「有」がそこから生じるという「無」とは、「名無きもの」すなわち「道」をさすことが知られるのである。つまり、「無」とは、始源としての「道」であり、「有」とは、働きとしての「道」であって、同じでありながら、「道」（無名）──→ 天地（有名） ──→ 万物という先後が順序である。つまり、万物は、無名の「道」と、有名の天地と、この両者の微妙関係によって生ず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

三、「古の道を執りて以て今の有を御む」

『老子』第十四章に、

>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 之を視れども見えず、名づけて夷と曰う。之を聴けども聞こえず、名づけて希と曰う。之を搏てども得ず、名づけて微と曰う。此の三者は致詰すべからず。故に混じて一と為す。其の上は皦かならず、其の下は昧からず、縄縄として名づくべからず、無物に復帰す。是れを無状の状、無物の象と謂う。是れを惚恍と謂う。之を迎えて其の首を見ず、之に随いて其の後を見ず。古の道を執りて以て今の有を御む。能く古始を知る、是れを道紀と謂う。[16]

この章も老子のいわゆる「道」を形而上的哲学に説明する文章として第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七章、第四十一章などとともに有名である。 第一章が「道」の状態は無名にして玄の又た玄なる在り方を、第二十一章が「道」の物たる、惟だ恍、惟だ惚なる在り方を、第二十五章

[16]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頁 113 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が「道」は天地に先だち生じて寂たり寥たる在り方を、第三十二章が「道」の常は無名なる在り方を、第三十七章が「道」は無名の樸なる在り方を、第四十一章が「道」は隠れて無名なる在り方を説明するのに対して、この章によって「道」が無色（夷）･無声（希）･無形（微）という状態は、人間の感知能力のすべてを超越した存在であることを説くものであって、とくにその結びである「古の道を執りて以て今の有を御む」の言葉は、老子はこの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す「道」の霊妙不可思議な営みを述べるのである。それでは、「其の上は皦からず、其の下は昧からず、縄縄として名づくべからず、無物に復帰す。是れを無状の状、無物の象と謂う。是れを惚恍と謂う。之を迎えて其の首を見ず、之に随いて其の後を見ず」という文句は、その上だからとて明るいわけではなく、下だからとて暗いわけではないの意味で、上は玄の又玄なる「道」の本質を言い、下は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す「道」の働きを言う。『老子』における「道」の働きは、目にも見えず、耳にも聞こえず、手にも搏てえない。それなら、「道」の働きは形のない、音のない、そして実物のないものと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つまり、「道」は古今続ける不変なものであって、その存在と非存在の両方の状態を含めているのである。[17]

「是れを惚恍と謂う。之を迎えて其の首を見ず、之に随いて其の後を見ず」という句のように、老子の「道」は見ることも聞くとも手にふれることもできない、惚恍として有るが如く無きが如く、その存在は「無状の状」･「無物の象」という状態である。いわゆる「状」･「象」･「惚恍」とは、人間の感覚･知覚による把握を超越するものの意。つまり、「道」の形象が人間の主観が認識する対象になり得ないものを言う。この章が「道」の状態は感覚的に「道」をとらえようとする姿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第二十一章に「惟だ恍、惟だ惚」という言葉は、冥想的に意向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道」の状態を探究する言葉である。

「古の道を執りて以て今の有を御む。能く古始を知る、是れを道紀と謂う」の句は、自然の「道」は古から宇宙真理に基づいて、今ある万象を制御している。第三十七章の冒頭に見える「道は常に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の「道」は、すなわち天地造化の営みであるが、人間わざを超えた広大無辺さを説明する言葉である。天地の中で恆久不変の秩序があり、天地万物はこの秩序に基づいて、次第に生み出され化育されていく。ところで老子は、天地に超越者の存在することを認めず、大自然（「道」）の営みであると考えた。だか

[17]「道」は形のない、音のない、そして実体のないものされている。過去と現在は同じものである。それは形のあるものと形のないもの、存在と非存在の両方を包む。このように、それは二重性と多様性の統合で、対立のない無限に打続くものである。（張鍾元著、上野浩道訳『老子の思想』ー タオ•新しい思惟への道ー、*“Tao: A New Way of Thinking”*、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103-104 頁参照。）

ら、この「道」は、「侯王、若し能く之を守らば、万物、将に自のずから化せんとす」(第三十七章) とあるように、侯王にとっては天下統治の秘訣であり、人間にとっては処世の規範である。老子によって、「道」の無為が単なる無為ではなく、「為さざるは無き」無為である。こういう思想は、「為さざるは無し」は「為」の否定としての「無為」から導かれるのである。

四、「道の物たる、惟れ恍、惟れ惚」

『老子』第二十一章に、

>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
> 孔徳の容、惟れ道に是れ従う。道の物たる、惟れ恍、惟れ惚。惚たり恍たり、其の中に象有り。恍たり惚たり、其の中に物有り。窈たり冥たり、其の中に精有り。其の精甚だ真なり、其の中に信有り。古より今に及ぶまて、其の名去らず、以て衆甫を閲ぶ。吾れ何を以て衆甫の状を知るや、此れを以てす。[18]

この章も「道」の形而上的哲学に説明する。「孔徳の容、惟れ道に是れ従う」の二句は、「孔徳の容」、すなわち孔（至）徳の働きは、ただ「道」にこそ従っている。徳は「道」と密切な関係がある。『中庸·第二十七章』の「いやしくも至徳の人でなければ、至道は成らない」（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の「至徳の人」という言葉のように、すなわち偉大な徳をもつ聖人の働きは、ひたすら「道」に従うことで示される。[19]換言すれば、「至徳の人」が体得している根源的な「道」を説明するのである。

「道の物たる、惟れ恍、惟れ惚」という句は、「道」というものはおぼろげで、とらえどころがない。「惚たり恍たり、其の中に象有り。恍たり惚たり、其の中に物有り。窈たり冥たり、其の中に精有り。其の精甚だ真なり、其の中に信有り」とあるのによれば、おぼろげで、とらえどころがないが、そこには形象がある。おぼろげで、とらえどころがないが、そこには万物がある。奥深い中に見えにくいが、そこには実質がある。その実質はまことに純粋であり、

---

[18]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164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19]『中庸』二十七章，「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朱熹『四書集注』、世界書局、1968 年、24 頁參照。

その中に確実がある。「象」と「物」とは「道」の形のことであるが、勿論、ここに「形」と言ったが、それは人間の意識に見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ことを示す。「古より今に及ぶまで、其の名去らず、以て眾甫を閱ぶ。吾れ何を以て眾甫の状を知るや、此れを以てす」という句は、古から今まで、その名前を保持する。我々は「道」によって万物の始まりを見える。[20]

五、「物有り混成し、天地に先だちて生ず」

『老子』第二十五章に、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物有り混成し、天地に先だちて生ず。寂たり寥たり、独立して改めず、周行して殆れず。以て天下の母と為すべきも、吾れ其の名を知らず。之に字して道と曰い、強いて之が名を為して大と曰う。大なれば曰に逝き、逝けば曰に遠く、遠ければ曰に反る。故に道は大、天は大、地は大、王も亦た大、域中に四大有りて、王、其の一に居る。人は地に法り、地は天に法り、天は道に法り、道は自然に法る。[21]

この章も老子の「道」の根本原理的に説明する。「道」は、「混沌たる状態を成すあるものがあり、それは天地開闢の前から存在していた。それは、ひっそりとして声なく、ぼんやりとして形もなく、それ自体で存在して変わることなく、あまねくめぐり歩くが疲れることを知らない。それは天下の万物を生み出す母といえよう」という意味である。老子の説によって、「道」は永遠に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している。その営みは、造化のエネルギ― とでも称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のエネルギ― は天も地もなかったときにすでに存在していた。

---

[20]「眾甫」とは万物をいう。昔から今に至るまで道の名が消えず残っているのは、道が万物を総轄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つまり道のはたらきが万物に滲透し内在するからである。万物の状態を知ることは、道と万物との連関を知ることにほからない。道と万物との連関を知るとき、万物を通して道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大濱晧『中国古代思想論』、勁草書房、1977年、42頁参照。）

[21]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年、185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物有り」の「物」は、第二十一章の「其の中に物有り」の「物」と同義。「混成」は、第十四章の「混じて一と為る」と同義。「物有り混成し、天地に先だちて生ず」の二句は、天地未分の混沌を想像される。しかし、造化のエネルギー である「道」は、形もなく声もない、恆久不変の働きが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す母親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寂たり寥たり、独立して改めず、周行して殆れず。以て天下の母と為すべきも、吾れ其の名を知らず。」の句は、天地のなかにひっそりとして何も見えない状態である。「寂」とは静まり返ったことであり、「寥」とは奥深くて広い空間である。無声·無形と並べて「道」の姿を想起させる。「独立して改めず」は、恒久不変の営みをつづける「道」を揭示し、「周行して殆れず」は、「道」の働きがあまねく宇宙間にめぐる行き渡るが、疲れることを知らない。天地万物は「道」のおかげで生じ、それぞれに所を得るが、しかし「道」は造化の大功を成し遂げているのであるが、その功績を誇ることもなく、主宰者の地位に居すわらない。「以て天下の母と為すべきも」から、「強いて之が名を為して大を曰う」までの句は、「道」は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す母親ということのであるが、本來名づけようもないものだけれども、便宜上、無理に名前つけて「道」とか「大」とか呼ぶの意。

「大なれば曰に逝き、逝けば曰に遠く、遠ければ曰に反る。故に道は大、天は大、地は大、王も亦た大、域中に四大有りて、人、其の一に居る。人は地に法り、地は天に法り、天は道に法り、道は自然に法る」、とあるのによれば、「大」とは実に「道」であると説かれていて、つまり、「道」が天地万物を包みながら、それらを超えてある茫茫と仮りに「大」と形容したのである。「逝」とは「往」と同義であり、遠方に往くことである。「遠」とは無限の広がるとは遠ざかることであり、「反」とは「道」の運動は、このように無限の広がりを示し、同時に原点に返ってくるのである。老子によって、「道」の働きは一切を包んで無限であり、それ自体としては綿綿として相変わらずであるから、そこでは往くしながら返ることであり、生成の働きが同時に復帰の営みでもあり得るのである。「遠」が「反」であるとするのは、循環することを説くものであり、それらは老子に独特の論説の方式である。ところで、「道は大なるものとよばれるが、大なるものといえば、天も大であり、地も大であり、王も亦た大である。つまり、この天地間には四つの大なるものが存在するが、人がそのなかの一つを占めているのだ」という説である。老子は「人間」が四大の一として特に強調されているのは、大自然の「道」に法るべきことをいうのである。人間を道·天·地と併列するところにもまた老子の独特の思想が見られる。末句に、「人は地に法り、地は天に法り、天は道に法り、道は自然に法る」という言葉のは、人間が「道」に法るべきことをいうのである。要するに、老子の「道」は、人間の道であり、特に君主の天下統治の道である。人間は大地の

なかに住み、大地によって養われるから、もし大地なくしては人間もまた生息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22]

六、「道の常は名無し」

『老子』第三十二章に、

>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 道の常は名無し。樸は小なりと雖も、天下、能く臣とする莫し。侯王、若し能く之を守れば、万物、将に自のずから賓せんとす。天地、相い合して以て甘露を降す。民、之に令する莫くして自のずから均し。始め制られて名有り。名も亦た既に有り、夫れ亦た将に止まる知らんとす。止まるを知れば殆うからざる所以なり。道の天下に在けるを譬うるに、猶お川谷の江海に於けるがごとし。[23]

この章は名前のないものとしての「道」を示し、天下の母たるべき混成物を意味している根本原理的に説明する。上文において「道」は、「物有り混成し、天地に先だちて生ず。寂たり寥たり、独立して改めず、周行して殆れず。以て天下の母と為すべきも、吾れ其の名を知らず。之に字して道と曰い、強いて之が名を為して大を曰う」（第二十五章）といっているのように、いわゆる「道」とは、それは天も地もなかったときすでに生じていた。このような混成物自体には元来名がないという意味から、これを「樸」とも称しているのである。本章の冒頭に「道の常は名無し」という言葉によると、「道」の名を否定し、その元始にある状態は渾沌である。老子においては、「道」は無名であるといったり、「無名の樸」（第三十七章）に大という名をあえたり、またそれて無にして有なる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たり、さらに「道」は超感覚的存在であることを示すためにこれに夷·希·微などという名をあえたりしている。[24]

---

[22]老子の天に対する態度は、儒家もしくは伝統的な中国人のそれとは、かなり調子の違ったものである。儒家にとっては、天は窮極のものであり、最高至上のものであった。然るに老子の場合は、むしろ道ないし自然が、天よりも優位に立つかのように見える。（森三樹三郎、『上古より漢代に至る性命観の展開』、日本東京創文社、1971 年、76 頁参照。）

[23]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230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24]穴澤辰雄、『中国の思想家』上巻〈老子〉、東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編、頁 60 の説による。

「樸は小なりと雖も」から、「天下、能く臣とする莫し。侯王、若し能く之を守れば、万物、将に自のずから賓せんとす。天地、相い合して以て甘露を降す。民、之に令する莫くして自のずから均し」などとあるのによれば、「樸」は第三十七章に「無名の樸」の「樸」と同じ意味であり、「無名」である「道」は常に「樸」に譬えられるので「樸は小なりと雖も」と続けたのである。「樸は小なりと雖も」とすれば、誰もそれを道具と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もしも侯王がこの樸の持つ自然を尊重するならば、世の中の全てが治世者の下に賓客として集まる。この説は、第三十七章にも「侯王、若し能く之れを守れば、万物、将に自のずから化せんとす」と同義。そうなると、天地陰陽の二気が調和し甘露を降らす。そして人々は、天地から命令されなくても自ずから治まっていく。「始め制られて名有り」から、「名も亦た既に有り、夫れ亦た将に止まる知らんとす。止まるを知れば殆うからざる所以なり」とあるのによれば、「制」は「製」と同義。「名有り」というのは、始めから樸に手を加工されてさまざまな名称をもつ器物になる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これも第一章に「名無し、天地の始めには、名有り、万物の母には」と、ほとんど同じ意味が見える。「道の天下に在けるを譬うるに、猶お川谷の江海に於けるがごとし」の二句は、第六十六章に「江海の能く百谷の王たる所以の者は、其の善く之に下るを以ての故に能く百谷の王と為る」と同様の思想である。老子の説くによって、「道」はあたかも江海と谷川との関係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り、あらゆる川や谷川の水が、自然にして河や海に注ぎこむように、天下万物が自ずから彼に帰服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5]

老子哲学の中心を為す思想は、「柔弱·謙下」である「道」ということで思っている。第六十六章に「江海の能く百谷の王たる所以の者は、其の善く之に下る」という言葉は、これと同義のは、第三十二章に「道の天下に在けるを譬うるに、猶お川谷の江海に於けるがごとし」とある。老子の慣用的な譬喩を使用するの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言葉の思想主体が、勿論「道」であるのに対して、ここでは「百谷の王」であることを別にすれば、意味はほとんど同様である。「百谷の王」とは、川谷や江海はあらゆる水を集めて、それをおさめる支配者の意。老子によれば、聖王は政事に対しては放任自然を事とする一方、自身もしばしば柔弱·謙下で人民に遜ることを実践し、そうすれば人民の帰服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同じ第六十六章に「是を以て民に上たらんと欲

[25] この章は、名前のない区別のないものとしての「道」を示している。対立物の統一と同様に多様性の統一を示している。多様性を統一するとき、「道」はどんな部分によっても支配されることはない。対立物を統一するとき、「道」は「平和の露」を産み出す。すなわち、命令されなくとも、対立物は自発的に調和し合一する。(張鍾元著、上野浩道訳『老子の思想』ー タオ•新しい思惟への道ー、*"Tao: A New Way of Thinking"*、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170 頁参照。)

すれば、必ず言を以て之に下り、民に先んぜんと欲すれば、必ず身を以て之に後る」とあるのによれば、「是をて聖人は、其の身を後にして身先んじ、其の身を外にして身存う」と同旨の言葉は第七章にも見える。なお、「是を以て聖人は、上に処りて民重しとせず。前に処りて民害とせず。是を以て、天下推すを楽しんで厭わず。其の争わざるを以ての故に天下能く之と争う莫し」（第六十六章）とあるのによれば、聖人は誰れとも争わないから、天下の人は聖人と争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ある。これは老子のいう無為の治の基本を示すことばである。「天下推すを楽しんで厭わず」という句によって、第十七章「太上は、之有るを知らずのみ」（最上の為政者は誰れも知らない）の句と同類の無為の思想を表す。

七、「万物を衣養して主と為らず」

『老子』第三十四章に、

>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
> 大道は汎として其れ左右すべし。万物、之を恃みて生じて辞せず、功成りて名を有せず。万物を衣養して主と為らず。常に無欲にして、小と名づくべし。万物、焉に帰して主と為らず、名づけて大と為すべし。其の終に自ずから大と為さざるを以て、故に能く其の大を成す。[26]

この章もまた「道」のあらゆる広がりを説明している。冒頭の行で「大道は汎として其れ左右すべし」という。文中の「万物、之を恃みて生じて辞せず、功成りて名を有せず」は、すでに第二章に「万物、作りて辞せず、生じて有せず、為して恃まず、功成りて居らず」と類似の意味が見える。老子の「道」は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無形」であった。「無形」の働きである「道」は働き自体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大道は汎として其れ左右すべし。万物、之を恃みて生じて辞せず、功成りて名を有せず。万物を衣養して主と為らず」とあるのによれば、「道」の働きは常に新しい事物を生み出していって、ゆらゆらとしてあちらへこちらへと行く。いうまでもなくこの「道」は固定した存在ではない。そうすると、「大道

[26]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240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は汎として其れ左右すべし」といわれることからも理解できるのである。しかも「道」はすべて普遍的な実在は自在に広がって行って、過去から未來へ流れるものである。[27]

「常に無欲にして、小と名づくべし、万物、焉に帰して主と為らず、名づけて大と為すべし」とあるのによれば、「常に無欲」とは、第一章の「常に無欲にして其の妙きを観る」と同義。老子において、「道」が人間とは異なって常に無欲自然であり、見るべき形も色もないのである。だから小さなものと呼ばれる。しかし、それだからこそ万物は「道」に帰服するのだが、主宰者を意識しない。だから大いなるものと呼ばれる。第二十五章に「周行して殆れず、以て天下の母と為すべきも、吾れ其の名を知らず。之に字して道と曰い、強いて之が名を為して大と曰う」と類似の思想である。

「其の終に自ずから大と為さざるを以て、故に能く其の大を成す」とあるのによれば、老子において、「道」は偉大になろうしない、だからこそ、その偉大さが得る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文句は、第六十三章にも「是を以て聖人は、終に大を為さず、故に能く其の大を成す」、また第七十七章では「是を以て聖人は、為して恃まず、功成りて処らず」と意味は同様であろう。以上の述べた言葉は、ほとんど老子の慣用的な論法である。[28]

八、「道の常は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

『老子』第三十七章に、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道の常は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侯王、若し能く之を守れば、万物、将に自のずから化せんとす。化して欲作れば、吾れ将に之を鎮むるに無名の樸を以てせんとす。無名の樸は、夫れ亦た将

[27]老子の道は、第三十四章の「大道は汎としてそれ左右すべし」といわれることからも理解できるように、きわめて流動的な実在であった。しかもこの流動的な実在は無限であった。道は世代に束縛されることなく永遠の過去から悠久の未来へ流動するものである。（大濱晧『中国古代思想論』、勁草書房、1977 年、43 頁参照。）

[28]「道」の立場によると、「無」においては対立が対立でなく矛盾が矛盾でないと。そうなれば、第七章の「聖人はその身を後にして身先だち、その身を外にしてす身存す」、第三十七章の「道は常に無為にして為さざるなし」という。これらの逆説は無の立場から当然いい得るのである。（この類似の説は、大濱晧『中国古代思想論』、勁草書房、1977 年、50 頁にもある。）

に無欲ならんとす。欲せずして以て静ならば、天下は将に自のずから定まらんとす。[29]

この章の「樸」も、第三十二章にある「樸」と同義であり、そのを守って天下を治めることの働きを説明する。「道の常は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侯王、若し能く之を守れば、万物、将に自ずから化せんとす」とあるのによれば、老子によると、天地間には恒久不変である「道」という原則がある。その「道」は日々夜々に天地万物を生み出され化育されいく。しかし老子にとって、こうした造化の営みは天地間に超越者の存在することを認めない、それは自然の現象である「道」と考えた。また、「道」の営みは、上述したように、その働きは作為もないとして、これを無為とよび、しかし、その成果は為さざるは無しと称するのである。つまり、老子の無為である「道」は目にも見えず、耳にも聞こえない、独特の思索の形而上学が展開する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統治者がその無為である「道」を守れば、万物は自ずからその徳に化するであろう。

「化して欲作れば、吾れ将に之を鎮むるに無名の樸を以てせんとす。無名の樸は、夫れ亦た将に無欲なんとす」とあるのによれば、統治者にとっては天下統治の秘訣であり、同時に万民にとっては処世の規範である。上述したように、老子における政治思想及び処世思想は、「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という「道」の在り方と対応するものある。「樸」・「無欲」というのは「道」の本質であり、「之を鎮むる」の「鎮」は安定あるいは治まるという意味である。「無名の樸」は、第三十二章に「道の常は無名、樸は小なりと雖も」と同義であり、混成物自体である「道」は元来名がない、これを「無名の樸」とも称しているのである。「欲せずして以て静ならば、天下は将に自のずから定まらんとす」の二句、「不欲」は、上文の「無欲」を承けて意味は同様である。老子は人間の主観的な智恵･情欲･意念を否定して、無知･無欲･無為を提倡している。特に「無欲」とは、統治者は財貨を無用として、これを価値ありとしなければ、社会のなかに盗賊などなくなる。もしも統治者の欲しがるものを見せなければ人民の心は乱れないように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つまり、老子の無欲思想とは財貨などに対する執着の弊害を指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人間の欲求を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老子において、「無為にして、而も為さざるは無し」とは、いわゆる「道」の造化の営みを説明する言葉である。「道」の働きであって、その作為の跡がぜんぜん見られない。それならば、このような「道」は無限であるが、第四章に「道は冲しけれども之を用いて或に盈たず、淵として万物の宗に似たり」、

[29]福永光司『老子』上、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252-253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第四十五章に「大盈は冲しきがごとく、其の用、窮まらず」などとある。「道」は虚にして、その働きは無限であるが、それは奥深くて天地万物がそから出てくる生成の根本である。

九、「反は道の動、弱は道の用」

『老子』第四十章に、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は道の動、弱は道の用。天下の万物は有より生じ、有は無より生ず。[30]

この章もまた老子の形而上学の「道」の「有」・「無」の思維と概念を論説する。老子の「道」は、しばしば「無の哲学」とも称されて、無名·無為·無形·無象·無物などと説明する。この場合の「無」は、天地万物の根元である無形の境地を言う、虚無な状態ではない。「反は道の動、弱は道の用」の二句は、「反」は「返」と同じ戻るの意。「弱」は柔弱の弱、水の柔軟さで具体的に説明される。「動」と「用」とは、働きの意。老子における「道」という理論は虚無主義であるが、これならば、「反」と「動」とは「道」に合体することである。つまり、天地万物は「道」の働きによって生じ、それぞれに所を得させる。このように「道」は、万物を養ても支配することはない、その功に誇ることもない。老子のいう「無為」とは、本来「為さざるは無し」の意味であることから知られるように、実は何も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

「天下の万物は有より生じ、有は無より生ず」とあるのによれば、いわゆる「無」とは「道」に基ついて、万物と「道」とのあいだに介在する「有」とは、天地をいうだろう。本章の前半の二句は、第二章に、「天下、皆な美の美たるを知るも、斯れ悪のみ。皆な善の善たるを知るも、斯れ不善のみ。故に有無相い生じ、難易相い成し、長短相い較り、高下相い傾け、音声相い和し、前後相い随う」、第十一章に 、「其の無なるに当って車の用有り。埴を埏ねて以て器を爲る。其の無なるに当って器の用有り。戸牖を鑿って以て室を爲る。其の無なるに当って室の用有り。故に有の以て利を爲すは、無の以て用を爲せばなり」、第二十二章に、「曲なれば則ち全く、枉なれば則ち直く、窪なれば則ち盈ち、敝るれば則ち新たに、少なければ則ち得、多なければ則ち惑う」などと同義である。老子の「無」は、上述したように、天地万物の根元であるが、万

[30]福永光司『老子』下、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28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物の母である「道」は第二十五章によると、「物有り混成し、天地に先だちて生ず。寂たり寥たり、独立して改めず、周行して殆れず」と表現される実在である。これならば、第一章で、「名無し、天地の始めには、名有り、万物の母には」という句によれば、「天地の始」と「万物の母」とは、その意味は同一であり、「無」と「有」の性質も異なることがない。つまり、また第一章に「此の両者は、同じく出でて名を異にし」といわれる所以である。これなら換言すれば、「無」は根元としての「道」をいい、「有」は働きとしての「道」をいうので、名前が異なったのである。そうすると、上句の「名無し、天地の始めには、名有り、万物の母には」の「無」と「有」とは、同じ「道」である。

十、「道は一を生じ、一は二を生じ、二は三を生じ、三は万物を生ず」

『老子』第四十二章に、

>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
> 道は一を生じ、一は二を生じ、二は三を生じ、三は万物を生ず。万物は陰を負うて陽を抱き、冲気、以て和することを為す。人の悪む所は、唯だ孤寡不穀、而も王公は以て称と為す。故に物は或に之を損して益し、或に之を益して損す。人の教うる所は、我れも亦た之を教えん。強梁者は其の死を得ず。吾れ将に以て教えの父と為さんとす。[31]

この章のおもな内容は、生成過程は一定の階段を通して天地万物を養成しているが、それがすべて「道」の働きによることが理解である。本章の冒頭に、「道は一を生じ、一は二を生じ、二は三を生じ、三は万物を生ず。万物は陰を負うて陽を抱き、冲気、以て和することを為す」とあるのによれば、「道は一を生じ」から、「三は万物を生ず」までの四句は、天地万物生成の過程を説明する。「一」とは、「一気」、「二」とは、「陰陽二気」、「三」とは、「陰気·陽気·和気」である。この「一」と「二」と「三」という次第によれば、「道」が一気を生じ、一気が分かれて陰陽の二気を生じ、陰陽の二気が交合してさら

[31]福永光司『老子』下、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38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に冲和の気が生成の中心となって天地万物が生み出されるのである。[32]「万物は陰を負うて陽を抱き、冲気、以て和することを為す」という句は、「道」の働きは循環復帰の作用を説明することである。第十六章に、「（万物は）各々その根に帰る。根に帰るを静といい、是れを命に復るという」とある。「静」とは動の極致、働きの窮極である。老子によって、天地万物の生成過程を循環と見ていて、己れの元来的な在り方に立ち戻ることになる。つまり、「道」の働きが天地万物に滲透し内在するからである。

「人の悪む所は、唯だ孤寡不穀、而も王公は以て称と為す。故に物は或に之を損して益し、或に之を益して損す」とあるのによれば、「孤·寡·不穀」とは第三十九章の「侯王は、自のずから孤寡不穀と謂う」の「孤·寡·不穀」と同義。「孤」は父をなくした子、「寡」は夫をなくした婦人、「不穀」は、不善の意。ちなみに言いますと、「孤」、「寡」、「不穀」というものを誰れも好まない。ところが、王や諸侯など統治者はそれらの言葉を自称して使っているのである。老子によって、物は価値を減らせば卻って価値をふやし、物は価値をふやせば卻って価値を減るものである。この思想については、第四章の「之を用いて或に盈たず」、第八十一章の「既く以て人の為にして、己れ愈いよ有り、既く以て人に与えて、己愈いよ多し」なども、これと類似の説を表現する言葉。

「人の教うる所は、我れも亦た之を教えん。強梁者は其の死を得ず。吾れ将に以て教えの父とさんとす」とあるのによれば、「人の教うる所は、我れも亦た之を教えん」の二句の句法は、第二十章の「人の畏るる所は、畏れざるべからず」とあるのと同類の句法で、世間の人の訓戒として教えることは、私もまたそれを教えたの意。老子によって、訓戒として教える言葉は、「強梁者は其の死を得ず」である。「強梁」とは、剛暴な人、「其の死を得ず」とは、天年に至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意。老子は覇道および戦争に反対している。しかし、止を得ない場合の戦争を交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きのあることは、柔弱謙下を説いている。老子は非戦論を提倡している。第三十一章に、「夫れ佳だ兵は、不祥の器なり。物、或に之を悪む。故に有道者は処らず。君子、居れば則ち左を貴び、兵を用うれば則ち右を貴ぶ。兵は不祥の器、君子の器に非ず。已むを得ずして之を用うれば、恬淡を上と為し、勝ちて美とせず。而し之を美とすれば、是れ人を殺すを楽しむなり。夫れ人を殺すを楽しめば、則ち以て志を天下に得べからず。吉事には左を尚び、凶事には右を尚ぶ。偏将軍は左に居り、上将軍は右に居る。喪礼を以て之に処るを言うなり」という。この説によると、

[32] これは老子の思想が『易』の陰陽と結びつけられて説かれている重要な章でああ。万物というのは陰陽の組み合わせであてある、と。すべてどんなものでも、いわゆる白と黒つまり無限と有限の組み合わせでないものはないんです。（長谷川晃、『老子と現代物理学の対話』、*"A "Dialogue" of Taoism and Modern Physics"*、日本京都 PHP 研究所、1988 年、71 頁参照。）

兵すなわち武器は人々によって軽視される不吉な凶器として誡める。だから、君子（「道」を有る人）はそこに身をおかない。ちなみに、武器は不吉な道具であって、君子人の道具ではない。戦争を避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きには、恬淡であるのがよい。戦争に勝ったとしても、喜んではならない。もし喜ぶとすれば、人を殺害するのを楽しむものである。人を殺害するのを楽しむような人は、志を天下に得ることなどできないのだ。また、一般に吉事（祝儀）の場合には左を貴ぶが、凶事（不祝儀）の場合には右を貴ぶ。ところが、軍隊では副将軍が左側におり、上将軍が右側にいる。それは戦争を葬式と同じく凶事という意味である。多勢の人を殺害する戦争には悲哀をもってこれに臨み、戦争に勝っても葬式をもってこれに対処してゆくのだ。老子は戦争を反対する趣旨のものとして、第三十章の「師の処る所に荊棘生じ、大軍の後に必ず凶年有り」と同類の思想表現である。[33]

十一、「道は万物の奥にして」

『老子』第六十二章に、

>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 道は万物の奥にして、善人の宝、不善人の保とする所なり。美言は以て尊を市うべく、美行は以て人に加うべし。人の不善なる、何の棄つることかこれ有らん。故に天子を立て、三公を置くに、拱璧の以て駟馬に先だつ有りと雖も、坐して此の道を進むるに如かず。古の此の道を貴ぶ所以の者は何ぞ。求めて以て得られ、罪有りて以て免ると曰わずや。故に天下の貴と為る。[34]

---

[33] このように老子は、政治的権力もなく、人知のもたらす弊害もない太古の世を理想とするが、しかし老子とて、いまさら原始に帰り得ないことは百も承知である。武力•知力のせめぎ合う現実の戦国社会において、せめて君主•世人の守るべき教訓として説かれたのが無為の治であり、柔弱謙下の処世論であった。そして、その正当性を根拠づけるために説かれたのが「道」の形而上学だったのである。（楠山春樹、『中国思想史』•「老子•道家思想の祖」（日原利国編）、日本東京ぺりかん社、1987 年、54 頁参照。）

[34] 福永光司『老子』下、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129-130 頁の読み下しによる。

この章も「道」が天地万物の究極に隠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ること、善人と不善人の区別とを明らかにする。本章の冒頭に、「道は万物の奥」の句は、第四章の「万物の宗」の意味と同じ。「奥」は、『論語·八佾』にも「奥に媚ぶ」とあり、家屋の西南のすみのへや、神を祭る所。「宗」は、根本、根元の意、祖先神の祭りを主宰する族長のを表わす。「奥」や「宗」とは、天地万物の根元である「道」に譬えるもの。「善人の宝、不善人の保とする所なり。美言は以て尊を市うべく、美行は以て人に加うべし。人の不善なる、何の棄つることか之れ有らん」とあるのによれば、「善人の宝、不善人の保とする所なり」の句、第二十七章に、「善人は不善人の師、不善人は善人の資」、第四十九章に「善なる者も吾れ之を善とし、不善なる者も吾れ亦た之を善とす」などと同義。老子の「道」は、善人にとっても不善人にとっても価値あるもあり、しかし、この「道」の価値は人為的な造作ではなく自然的なものである。つまり、老子は世俗的な価値観を強烈な批判している。第十二章に「五色は人の目をして盲いしむ。五音は人の耳をして聾れしむ。五味は人の口をして爽わしむ。馳騁田猟は人の心をして発狂せしむ。得難きの貨は人の行ないをして妨げしむ」という。前半の三句は、人が官能的楽しいに溺れるさまを述べているのであり、後半の二句は、人の心の正常さを失わせる、というのである。老子において、貴重なものを価値ありとしてなければ、人民に盗みをしないようにさせることができ、欲しがるものを見せなければ、人民の心は混乱しないように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同じく世間の人々がいわゆる美や善に執着するが、卻って不美や不善が生まれるのであって、美·善などことは相対的な概念にすぎない。[35]だから無為の聖人は内的なものに勤めて外的なものに勤めないことになる。具体的にいえば、聖人は腹に貯え、感官の誘惑を外に求めない。[36]

「故に天子を立て、三公を置くに、拱璧の以て先にだつ有りと雖も、坐して此の道を進むるに如かず」とあるのによれば、「三公」は、周代の制度。「三公」とは、太師·太傅·太保であり、臣下として最高の三つの地位である。「拱

[35]世間の人間はみな美しいものが美しい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てそれに執着するが、彼らの美しいとするものは実は醜いものなのだ。また、善いことが善い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てそれを固執するが、彼らの善いとすることは実は善くないことなのだ。なんとなれば、人間の考える美と醜、善と不善とは、相対的な価値であり、評価の立場を変えれば美も醜となり、醜も美となるからである。同様にして善もまた絶対的な善ではありえず、不善もまた絶対的な不善ではありえない。価値の基準を変えれば、善もまた不善となり、不善もまた善となるからである。（福永光司『老子』下、日本東京朝日文庫、1978 年、49 頁参照。）

[36]老子は儒家的•世俗的な意味における善不善は、これを相対的な区別にすぎないとして否定する。そして、その上に立って「無為の道」を提倡した。ところが、そうなるとこんどはその「無為の道」を「善」と称し、それを求める人を「善人」と呼ぶ。いささか手前かってのような気もする。同じ善ということばを、次元のちがう二種の意味で使われたのでは、読者にとって迷惑も甚だしい。そういえば「聖」の語もそうである。（楠山春樹『老子』〔六〕「その他の有名なことば」、東京集英社、1987 年、201 頁の訳注による。）

璧」・「駟馬」とは、むかし天子は臣下に物を贈与するものである。「坐して此の道を進むるに如かず」とは、天地万物の真理である「道」を臣下に贈与することの方が、どんな珍しい物をすることにも勝っているの意である。

「古の此の道を貴ぶ所以の者は何ぞ。求めて以て得られ、罪有りて以て免ると曰わずや。故に天下の貴と為る」とあるのによれば、老子において、「道」は天下で最も尊いものとされるのであり、求めればこの道によって得られ、罪があってもこの道によって免れるといっているのである。老子は世俗的な価値観における善不善や高貴や下賤なるものを否定する。例えば、第十一章に、「埴を埏ねて以て器を為る。其の無なるに当って器の用有り。戸牖を鑿って以て室を為る。其の無なるに当って室の用有り」という。そのなかに何もない容器や部屋にしても、無なる空間と有なる材料とは互いに相って働きが生まれる。また、第五十八章に、「禍か福の倚る所、福か禍の伏す所、孰れか其の極を知らん」という。禍や福にしても、禍のなかにはすでに福があらわれ、福のなかにはすでに禍が潜そんでいるとして、禍福の転変は誰にもそのとどのつまりは分かない。つまり、老子によって、聖人はこれらを差別だてしないものだともいって、世俗的価値と反価値とは相対的でぜることを指摘しつつ、反面ではこれらの対立を超越したところに絶対的価値を認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37]

伍、おわりに

老子という人物は、前漢の司馬遷の『史記·老荘申韓列伝』によると、孔子はかつて周に老子を訪ね礼について教えを請問した。老子は孔子とだいたい同時代の人である。しかるに、謎の人物である老子の伝記によれば、その事実は想像で虚構する可能性があり、真偽のほどは分からない。ところが、『老子』というテキストは、今まで筆者が深い尊崇した書物の一つである。老子の処世訓は柔弱·謙卑という言葉で要約されている。それが、無為·自然である「道」の働きを身に体した人の生き方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つまり、人間も「道」によって無為·自然を持することにより、事功をも成就できるのである。一方老子は、戦争·文明·学問·ぜいたくな生活·繁苛な法令などのもたらす弊害を批判する、自然素樸の生活をよしとする、処世の達人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現在、地球に暮らしているの人口が約 60 億人に達したが、地球上の限られた自然資源を分かち合いながら、われわれには大自然と共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生態環境との共存が人類共同の最重要課題となりつつある今日、老子の思想は再認識されるべきだと思う。まいど、筆者は老子の「道」に関することばを読んで、胸がどきどきすることがつづいているのである。

[37]穴澤辰雄、『中国の思想家』上巻〈老子〉、東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編、61 頁参照。

參考文獻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89 年。
J. J.M.de Groot （牧尾良海訳)『タオ・宇宙の秩序』, 日本東京平河出版社, 1987 年。
Robert G. Henricks，*“LAO-TZU　TE-TAO CHING*，『老子德道經』
大濱晧,『中国古代思想論』, 日本東京勁草書房, 1977 年。
王　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 文津出版社, 1993 年。
田云刚、张元洁,『老子人本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穴澤辰雄、『中国の思想家』上巻〈老子〉, 東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編, 1987 年。
安岡正篤,『老荘のこころ』, 日本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 1988 年。
朱謙之,『老子校釋』,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股份有限公司, 1985 年。
赤塚忠,『諸子思想研究』, 日本東京研文社, 1987 年。
長谷川晃,『老子と現代物理学の対話』, *“A 〝Dialogue〞 of Taoism and Modern Physics”*，日本東京 PHP 研究所, 1988 年。
胡楚生,『老莊研究』, 學生書局, 1992 年。
高　明,『帛書老子校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年第四次印刷。
張起鈞,『智慧的老子』,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再版。
張鍾元,(上野浩道訳)『老子の思想』－タオ・新しい思惟への道－ *“Tao：A New Way of Thinking”*，東京講談社, 学術文庫, 1989 年。
陳鼓應,『老莊新論』,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6 年二版。
森三樹三郎,『上古より漢代に至る性命觀の展開』, 日本東京創文社, 1987 年。
楠山春樹,『中国思想史』〈老子〉道家思想の祖, 株式会社 ぺりかん社, 1987 年。
楠山春樹, 『老子』－「柔よく剛を制す」, 日本東京集英社, 1987 年。
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福永光司, 『老子』, 日本東京朝日文庫, 1978 年。
福永光司, 『中国の哲学・宗教・芸術』, 日本京都人文書院, 1988 年。
錢　穆,『莊老通辨』,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七,『史記·老莊申韓列伝』, 藝文印書館。
稲田孝,『老子を読む』, 日本東京勁草書房, 1987 年。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xxx-xxx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老子的思想－「道」的機能

張才興*

摘　要

老子所說的「道」是天地萬物的創始者。「道」之為物，目視之而不見，耳聽之而不聞，手搏之而不得，所以「道」是無形、無聲、無物的東西。不過，「道」自古及今都未曾改變，它處於存在和非存在的惚恍狀態之中，因此，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老子稱它為「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所以說「道」永遠都處於人們的感覺、知覺以外的領域。老子主張「無為」之說，「無為」並不是「無作為」，反之，「道」是「常無為而無不為」的。老子認為人也必須依據這個原理，以「無為而為」的態度去從事一切事務就可以獲得成功。這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命題所揭示出來的就是，無為即是大為、無用即是大用、無治即是大治、無爭即是大爭之意。因此，老子「道」的思想主要是在於內在清靜的修為，以及以沖虛、謙遜、退讓為自守的根據。如此才可以保持柔弱謙卑、天真浪漫的本性，而回復于純真、樸素的境界。

關鍵字：老子、道、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謙卑、樸素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49-178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Working of Dao（道）in the Thought of *Lao-Zi*（老子）

Tsai-Hsin Chang[*]

Abstract

All things spring from Dao. We look at it, and we do not see it; we listen to it, and we do not hear it; we try to grasp it, and we do not hold it. Dao is always formless, soundless and invisible. But Dao never changes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and places in the fleeting and indeterminable conditions. We meet it and do not see its front; we follow it and do not see its back. The Dao in its regular course does nothing and so there it does everything. Because in the thought of the Dao, “does nothing” means “doing”; “useless” means “useful”; “non-governing” means “ governing”; “non-strive” means “strive for all.” Therefore, Lao-Zi is always humble and also empties his minds, so he could return to the condition of naivety and honesty.

Keywords: Lao-Zi, Dao, fleeting, indeterminable, naivety, hones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179-204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研究

胡志佳*

摘　要

本文由司馬昱生活的五十四年中，來觀察探討自東晉初期元、明之後帝位更迭的背景，並凸顯琅邪、會稽二封王在東晉皇權政治中地位的消長；以及從司馬昱的佈局與作為，分析孝武帝即位的背景。

三十八年遠離政治中心的爭鬥，司馬昱得到另一種的發展，亦即有別於其他司馬氏，走向玄學的發展，雖然在當時司馬昱被譽為第二流的玄學家，但在他提倡下，東晉中期以前會稽地區玄學呈現豐饒的的發展。也由於在會稽的長期經營，結交了一批文人雅士，這些人與司馬昱不但在文學清談中酬酢，也在司馬昱的政治發展中扮演謀士與實際執行者的角色。

從簡文帝司馬昱的研究，不只可以瞭解其一生的發展與重要性，另外更可觀察東晉自元帝以後至孝武即位前東晉帝位繼承之爭的另一面向；另也提供吾人從另一些角度，看待權臣與外戚操弄政權的手腕與結果。

關鍵詞：司馬昱、東晉、簡文帝、會稽

*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

壹、前言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一生歷經了幾個階段，首先在其出生至母親鄭貴妃過世之前，父親司馬睿共生六子，分屬四位女人，司馬昱因母親之故，甚得司馬睿所親，三歲時即受封爲琅邪王。但隨著司馬睿過世（318），母親也於咸和元年（326）過世，司馬昱開始成爲政治鬥爭中的眼中釘，從琅邪王改封會稽王，一待就是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遠離政治爭鬥，司馬昱走向玄學，在他提倡下，東晉中期以前玄學呈現豐饒的發展。在政治上，司馬昱歷經明、成、康、穆、哀與廢帝六位皇帝，曾經被提名爲皇帝候選人，但在政治鬥爭中失之交臂。但也由於置身於帝位爭奪之外，反而讓司馬昱的官位一路扶搖直上，沒有受到傷害。在穆帝即位後，司馬昱出任錄尚書六條事、撫軍大將軍，開始掌握政權，援引會稽人士以及玄學同好，大量進入中央，對穆帝、廢帝時期對外戰爭或內政處理以及自己即位爲皇帝後與桓溫之間的抗衡，這些人都產生諸多影響。

本文由司馬昱生活的五十四年中，來觀察探討自東晉初期元、明之後帝位更迭的背景，並凸顯琅邪、會稽二封王，在東晉皇權政治中地位的消長；以及從司馬昱的佈局與作爲，來分析孝武帝即位的背景。

從簡文帝司馬昱的研究，不只可以瞭解其一生的發展與重要性，另外更可觀察東晉自元帝以後至孝武即位前帝位繼承之爭的另一面向；另也提供吾人從另一些角度，看待權臣與外戚操弄政權的手腕與結果。

過去以還並未見對司馬昱個人研究的論文發表，但環繞在周圍的相關研究不少，如前所述，本研究中對司馬昱的探討集中在東晉帝位的繼承鬥爭、司馬昱一支的發展、東晉世家大族對政治的牽動影響，以及東晉門閥士族對司馬皇室的控制與影響。

有關於兩晉士族政治相關的學術研究，早期陳寅恪、何啓民、毛漢光、王伊同已有顯著的研究成果。近年則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清楚剖析東晉政治與門閥之間的關係；另外方北辰與王永平分別從政治與家風家學，探討六朝江東世家大族的發展。另外如王炎平、張國安、張學鋒等人，則從東晉不同家族對政治的影響來談，可幫助吾人拼湊東晉門閥政治的全貌。另外，筆者有系統地完成兩晉司馬氏的研究，亦可提供吾人瞭解兩晉政權更迭與司馬氏發展的背景。

另與本文研究主題相關的著作尚有李瓊英、金仁義、易圖強等人對東晉外戚與國婚的探討；另外，從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一書，對漢末至魏晉知識份子心態上轉變的描述，對吾人掌握這段時期中士族型態改變過程有很大助益。此後，林登順、陳明、葛承雍等人再深入探索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這些文章都有助於吾人瞭解當時士族心態轉換的過程。

有關於司馬昱玄學上的發展，目前也未有專書出現，記載最多的是《世說新語》，相關於東晉玄學發展的研究則不在少數，近年如洪修平、許抗生、趙書廉、羅宗強等人皆有專著，提供吾人瞭解東晉時期玄學發展的面貌。

而在日文研究成果方面，早期川勝義雄、越智重明、矢野主稅等人，對東晉貴族制以及北來貴族與江東世族之間的衝突與合作都有所剖析，近年則以三石善吉與金民壽等人，對東晉政治特質，以及從晉元帝司馬睿以及桓溫的幕僚來分析士族政治之消長，各有特色。

貳、遷會稽王之前的發展

建興四年（316）十一月，匈奴人劉曜攻破長安，晉愍帝出降，西晉王朝已名存實亡，僅賴散在各地的晉室皇族繼續推動著復興晉朝的工作，司馬睿也是其中之一。司馬睿建興五年（317）三月在建康稱晉王，改元建武。建武二年（318）三月，晉愍帝被殺的消息傳來，司馬睿以琅邪王正式稱帝。另一個司馬王朝，正式於江東拉開序幕。[1]

司馬昱爲司馬睿寵愛的鄭貴妃所生之子。司馬睿爲司馬懿的曾孫，父親爲司馬覲，是西晉皇族中較爲疏遠的一支。司馬睿共生有六男，虞皇后在司馬睿未即位前，於永嘉三年（309）已過世，未生子。長子司馬紹與司馬裒爲宮人荀氏所生。司馬紹在司馬睿爲晉王時，立爲晉王太子。司馬睿稱帝後，司馬紹立爲皇太子。永昌元年（322）閏十一月，司馬睿逝世，司馬紹即位爲皇帝，是爲明帝。司馬裒初出繼叔父司馬渾，司馬紹立爲太子後，更封司馬裒爲琅邪王以嗣恭王，並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建武元年（317）逝世，子司馬安國嗣立，未及年而死。[2]石婕妤生司馬沖，王才人生司馬晞，鄭夫人生司馬煥以及簡文帝司馬昱。

如上所述，司馬睿的六個兒子分別由四個女人所生。此四個女人中，最受司馬睿寵愛的應是司馬煥與司馬昱的母親—河南滎陽鄭氏。在這四個女人中，鄭氏的身份地位也最高，[3]生皇太子司馬紹的荀氏僅是宮人，石婕妤、王才人僅是因

---

[1] 有關司馬睿在江東初期的活動與琅邪王氏的互動，參見參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台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48-68；三石善吉，〈東晉の政治過程のいくつかの特質〉，《史境》，26 期（1993 年 3 月），頁 68-91；金民壽，〈東晉政權の成立過程—司馬睿（元帝）の府僚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48 卷、2 期（1989 年 9 月），頁 96-104；劉雪楓，〈吳姓氏族與東晉早期政治〉，《遼寧大學學報》，6 期（1990 年 11 月），頁 14-17、25；以及陳明，《中古士族現象研究—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初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120-125。

[2] 《晉書》，卷 64，〈元四王・司馬裒傳〉，頁 1725-1726。

[3] 《晉書》，卷 32，〈后妃・簡文宣鄭太后傳〉，頁 979。

生有皇子而被記錄下來。司馬睿在位的時間並不長，僅六年，但在這六年中，卻因外在環境的逼迫與個人的喜好，將本家的繼承制度破壞。[4]

經過永嘉之亂，司馬家族人士死之殆盡，司馬睿初建於江東，最重要的事之一，是如何延續與再次擴大司馬氏家族之血胤與勢力。爲此，司馬睿在世期間，先後將司馬裒與司馬煥過繼給自己早死的弟弟司馬渾，[5]另一子司馬沖過繼給司馬越。[6]司馬裒隨著年歲增長，表現越來越好，甚得司馬睿所喜愛，曾有一度想立司馬裒爲太子。司馬睿曾對王導說：「立子以德不以年」，這造成支持司馬紹的大臣相當不安。王導以「世子（紹）、宣城（裒）俱有朗儁之目，故當以年」之語，最後終於讓司馬睿冊立長子司馬紹爲太子。在司馬裒未能立爲太子後，司馬睿改封裒爲琅邪王。[7]司馬睿以此凸顯司馬裒在諸子之中的地位與重要性。由於司馬睿對皇太子與司馬裒的態度，終將使得朝中出現太子派與琅邪王派之競爭。還好司馬裒死於這一年（建武元年 317）十月，這使得可能出現的帝位繼承之爭，消弭無形。[8]

隔年（太興元年 318）十二月，司馬睿以鄭夫人所生兩歲卻已病入膏肓的司馬煥入繼琅邪王位。如前所述，由於司馬睿立基江東是以琅邪王起家，司馬睿這一支分封至琅邪王，是在其祖父司馬伷時代。咸寧三年（277）武帝重新調整同姓封王時，以東莞王司馬伷爲琅邪王，此後於太康四年（283）傳給兒子司馬覲；惠帝永熙元年（290）再傳至司馬睿。由於司馬睿建立江東政權，即位爲元帝，琅邪王代表的是這一支大宗的地位，這也顯示能繼封爲琅邪王者，代表其在家族中地位的重要。以當時司馬煥的地位與身體狀況，都不適合出繼這個具有象徵帝王大宗的封國王位，司馬睿之封司馬煥爲琅邪王，這是出於君王對寵妃的溺愛之舉。從史料中吾人未見有大臣以及其他諸房兄弟提出反對意見，但在司馬煥死後，司馬睿爲其大起陵園，耗費功役時，終於有大臣提出反對意見，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書諫言，以「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9]來制止司馬睿的行動，但司馬睿並未採納。

司馬煥二歲而死，至司馬睿臨死前（永昌元年 322），又再立司馬煥的弟弟，年僅三歲的司馬昱爲琅邪王，這裡突顯了鄭貴妃的勢力是相當龐大的。司馬昱出

---

4 參見胡志佳，《門閥士族時代下的司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六章〈司馬氏宗族婚姻網絡的擴展與變遷〉，頁 252-263。

5 《晉書》，卷 64，〈元四王・司馬煥傳〉，頁 1729-1730。

6 司馬睿對司馬越之裴妃有知遇之恩，是以東晉建立後，司馬睿以司馬沖嗣司馬越。參見《晉書》，卷 59，〈司馬越傳〉，頁 1626。

7 司馬睿本嗣琅邪，即位為帝後，琅邪當絕，但為永續父祚，以最愛的兒子司馬裒接繼之。

8 參見《晉書》，卷 6，〈明帝紀〉，頁 158-159、卷 64，〈琅邪孝王司馬裒傳〉，頁 1725。

9 《晉書》，卷 64，〈元四王・司馬煥傳〉，頁 1729-1730。

封琅邪王一直到成帝咸和元年（326），司馬昱在母親鄭貴妃過世後，自請出徙爲會稽王。

咸和元年司馬昱七歲，按常理而論，七歲之孩是否對自己的出嗣入繼有這麼清楚的意識。司馬昱因受元帝喜愛而受封爲琅邪王，對其政治地位而言，是一種鞏固作用，爲什麼會以七歲之齡，提出欲還封會稽？要司馬昱回嗣會稽究竟是司馬昱本人的想法，亦或是由旁人主導？這是很值得探究的。

司馬睿於永昌元年（322）閏十一月過世，司馬紹繼位，是爲明帝。由於明帝在位僅三年，三年間又內逢王敦之亂，外有長江上游佔據巴蜀的李雄不斷在邊境生事，北境劉曜、石勒軍隊相繼寇邊。司馬紹將所有的精力用於處理國家大政。[10]吾人從史料中看不出明帝對父親生前處理繼承或對諸子不平等寵愛的反應；另一方面，或許也因此時鄭夫人仍在世，其所凝聚的舊勢力仍很強，讓明帝無法有強力的政治動作。[11]

明帝司馬紹在太寧三年（325）三月，立五歲的長子司馬衍爲皇太子，確立接班人，同年閏八月駕崩，享年二十七歲。司馬衍即位，是爲成帝。鄭夫人在次年（成帝咸和元年，326）也過世。鄭夫人一死，以成帝爲首的政治集團開始進行消滅鄭夫人黨羽的行動。其中第一要務，是要將視爲皇權繼承的琅邪王位拿回來，如此一來，首當其衝的就是司馬昱。

鄭氏在世期間，手上究竟掌握多大的勢力，在史書中也未見完整記載，但由《晉書・后妃傳》之記載，或可窺見一端：

> （鄭氏）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倩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為尚書郎，以悅后意。[12]

鄭氏不僅自己貴爲夫人，更進一步爲其兩個妹妹透過聯姻與當時政治世家做重要的結合。但這種政治上的結合，在司馬睿死後逐漸衰微，到鄭夫人死時，大約鄭氏派的勢力已接近結束。

---

[10]《晉書》以明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在三年間能平定王敦之叛，北方外族也未能得逞。參見《晉書》，卷 6，〈明帝紀〉，頁 159-164。

[11]此外王導的勢力也是明帝所不能等閒視之的，於是明帝援引外戚庾氏的力量進入統治中心。參見張國安，〈晉明帝末年統治集團內部的一次鬥爭〉，《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4 期（1986 年），頁 127-128。

[12]《晉書》，卷 32，〈后妃・簡文宣鄭太后傳〉，頁 979。

鄭夫人一死，當權派立刻開始行動，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而奏免琅邪國相諸葛頤，先排除司馬昱身邊的近臣。司馬昱在有司奏免諸葛頤後，上書自請徙爲會稽王，《晉書》載：

> （鄭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13]

上引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應是「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明穆皇后即爲成帝時主掌朝政庾氏家族成員，深入分析以上這一段記載，應是當時司馬昱身邊的勢力，在鄭貴妃死了以後，逐漸瓦解，這些人眼見以庾氏爲主的反撲勢力排山倒海而來，最好的上策可能是讓司馬昱自行放棄政敵覬覦已久的琅邪王位，於是而有這裡所述「王（司馬昱）上疏」自請徙爲會稽王之舉。

在驅離司馬昱後，庾氏於成帝咸和二年（327）立幾近白癡的司馬岳爲琅邪王。司馬岳爲成帝的弟弟，司馬昱爲司馬岳的叔叔。這個作法清楚顯示庾氏欲透過無行爲能力的司馬岳來掌握這個具有象徵繼承帝位意義的琅邪王位。由附表一：「兩晉琅邪王表」來看，此後一直到司馬昱重新以琅邪王繼任爲皇帝爲止，中間歷經司馬岳、司馬丕與司馬奕，皆是以琅邪王繼任爲帝，這充分說明琅邪王位在東晉中期以前，在帝位繼承大統中的重要性。

參、會稽王時期的司馬昱

司馬昱於咸和二年（327）出藩至會稽，這一年他八歲，此後司馬昱在會稽悠遊成長，政治權力中心排除了他，也使他免於政治上的迫害。[14]司馬昱出任會稽王時間前後達三十八年，大致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前期自遷至會稽開始，一直到穆帝即位後，出任輔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前。這段期間，影響司馬昱最大的不是宮廷內院的鬥爭，而是會稽的山水與人物，這也使得我們看到一位不同於其他司馬皇帝的君主。後期自穆帝永和元年（345）開始至廢帝太和五年（370）皇太后下詔以司馬昱爲皇帝前爲止，這段時間司馬昱重新復出政治舞台，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漸漸擴張勢力的桓溫，司馬昱運用了最柔軟的身段與桓溫周旋

---

[13]《晉書》，卷 32，〈后妃・簡文宣鄭太后傳〉，頁 979-980。

[14]成帝即位後母后庾皇太后臨朝，以庾亮與王導共同輔政。庾亮掌握大權後，首先殺了密謀罷黜自己的司馬宗，並罷免西陽王司馬羕的太宰職務，降為弋陽縣王。這種削弱司馬宗室的舉動，連成帝亦覺不安。參見胡志佳，前引書，第四章〈兩晉政局與帝位繼承的權力結構分析〉，頁 147-148；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05-138。

與相處，使得桓溫在廢廢帝時會以司馬昱爲帝位繼承者，也讓司馬昱有機會將國家大權從權臣的手中交給自己的兒子司馬曜，下開東晉政治中司馬氏較能主導的一段黃金時期。以下分述司馬昱在這兩段時期中的發展：

會稽，這個地方從政治地理形勢來看，一直是立足江東者最重要的後衛地區。司馬睿初至江東時，即非常重視會稽地區的治理，史載：

> 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雋，召（諸葛）恢為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15]

會稽對江東政權而言，也一直是王都的第二選擇之地。在東晉初期蘇峻亂平之後，建康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時，三吳的地方豪族即建請遷都會稽。後來雖爲王導所阻，但會稽地位的重要可由此看出。

> 及賊（蘇峻）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16]

會稽除了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優美的山水風景外，更有一批固守兩漢以來儒家傳統的世家大族。會稽的世族對比於吳郡，在兩晉南朝的發展，前者相對的較爲保守，[17]這與會稽世族自孫吳以來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早在孫策過江之際，曾被江東世族輕視與排斥，孫氏兄弟在取得政權後，採取報復措施，會稽大族有許多遭到族滅的命運。[18]而吳地世族雖也受到傷害，但少覆滅之禍，以最重要的世族之一陸氏來看，雖然在東漢末年受到袁術嚴重傷害，但家族人物在不久後，相繼加入孫氏政權，且操控軍、政要津，成爲孫吳政權的支柱。[19]西晉一統

---

[15]《晉書》，卷 77，〈諸葛恢傳〉，頁 2042。

[16]《晉書》，卷 65，〈王導傳〉，頁 1751。

[17]根據劉淑芬對會稽士族的研究指出，會稽士族多世傳經學，在治學上多遵守漢儒途徑，因而具有相當的保守性，而對隨晉室南渡傳來的玄學思潮，採取漠視甚至反對的態度。參見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中篇〈六朝會稽社會〉，頁 279-284。

[18]參見王永平，《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六章〈「江表儒宗」：會稽郡虞氏、賀氏之家風與家學〉，頁 260-265。

[19]王永平，前引書，第二章〈忠義世家：吳郡陸氏之家風家學〉，頁 67-90。

江山，對於江東世族基本上是壓抑的，會稽世族在此時期是與西晉政權保持相當距離。東晉以後，統治者對江東世族的籠絡對象主要是吳地世族，加上地理位置遠離政治中心建康，對中央影響力較小，[20]獲得進仕的機會也少，會稽世族的地位在整體上並沒有改變，有者甚至在南朝以後從正史中消失。或者由於這樣的外在艱險環境，使得會稽世族堅持保存了漢代的經學傳統，在江東形成一大文化特色。但也由於這樣的堅持，相較於吳郡世族，在東晉後較快地接受了僑姓大族的重文學清談，從而提升家族地位，很快取得入仕機會，會稽世族的沒落可見一斑。

雖然會稽世族與政權及當時逐漸流行於南方的玄學間保持疏離，但因會稽的優越的自然山水美景，[21]在兩晉之交，仍吸引大批文人雅士集中於此：如《晉書謝安傳》載：

>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22]

王羲之所撰之傳世名文《蘭亭集序》，完成之地即在會稽山陰之蘭亭，《晉書王羲之傳》載：

>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23]

東晉前期會稽地區清談風尚也在司馬昱的提倡下快速發展。司馬昱雖被評爲二流的玄談家，[24]但在前期，以其會稽王的身份，仍有許多人相應和者，在《世說新語》中有不少司馬昱參與玄談的紀錄：

> 〈言語第二 39、48 條〉
>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25]

---

[20]如前所述，雖然會稽的地位在兩晉之交有其重要性，但到司馬昱出任會稽王後，東晉中央對抗的權臣力量主要來自於荊州；會稽地位的重要性較不明顯。參見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 年），頁 101-105。

[21]兩晉之交有名的畫家顧愷之對會稽自然山水描述為：「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晉書》，卷 92，〈文苑．顧愷之傳〉，頁 2404。

[22]《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2。

[23]《晉書》，卷 80，〈王羲之傳〉，頁 2098-2099。

[24]《晉書》，卷 75，〈劉惔傳〉，頁 1991。

[25]《世說新語箋疏》，上卷，〈言語第二〉，頁 100。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26]

〈文學第四 29、40、51 條〉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27]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28]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29]

〈賞譽第八 144 條〉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懷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榻，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30]

〈排調第二十五 34 條〉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31]

從上面幾段《世說新語》的記載可看到幾個面向：會稽王司馬昱往往是清談的主人，許多談客集結在司馬昱的麾下共同清談。司馬昱的談客中佛教人士不少，這顯示司馬昱在會稽時期，接受了多方文化的刺激與涵養。除了清談人士與佛教人士的接觸外，司馬昱另也與當時流行於上層社會的天師道有所接觸。在其長子被廢後，因無嗣，曾祈求於清水道師。[32]

《世說新語》一書記載了許多有關於司馬昱在爲會稽王時與名士之間的交往的資料，今作一粗略統計，在《世說新語》中出現與司馬昱有直接或間接交會的

[26]同上註，頁 108。
[27]《世說新語箋疏》，上卷，〈文學第四〉，頁 218。
[28]同上註，頁 227。
[29]同上註，頁 234，另頁 235 註二引程炎震之言，以為此條是錯謬不存的。
[30]《世說新語箋疏》，中卷，〈賞譽第八〉，頁 492。
[31]《世說新語箋疏》，下卷，〈排調第二十五〉，頁 805。
[32]《世說新語箋疏》，上卷，〈德行第一〉，頁 42。

名士約有二十三人之多，（參見附表二：「《世說新語》中與司馬昱交遊之名士表」）若加上《晉書》其他史料則更多。但就《世說新語》的記載來分析，司馬昱在會稽所來往的名士，仍以北來的僑姓士族爲主，會稽出身較有名的士族僅謝奉及謝聘。[33]這與前文所提會稽士族自東漢末年以來的歷史發展有關。在這二十多位人士中，包括清玄之人，也包括佛教人士與儒學世家人士；有些是司馬昱的玄談之友，有些是司馬昱所欣賞的對象。（參見附表二）會稽的風土人情，讓司馬昱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與浸醞。這些人在司馬昱復出政壇後，有些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如謝安、范汪、王坦之等人；也有些人被重用後無法對時局起振弊之效，如殷浩。[34]

從司馬昱徙封會稽王後，以成帝及庾氏爲主的權力核心，在成帝咸和九年（334）將司馬昱由原來的散騎常侍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340）再進位輔軍將軍、領秘書監。（參見附表三：「司馬昱官職升遷表」）司馬昱與另一尚存的兄弟司馬晞，[35]因爲爲元帝之子，在東晉帝系家族中地位高，所以每次新皇帝即位，皆會被擺置在輔政高位以示尊崇。如咸康八年（342）六月，成帝駕崩，即「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36]司馬昱並在次一年以本官兼領太常。雖然有如此多的加銜，這些職位皆高而虛閒，並不實際參與政治運作，此時的政權基本上掌握在庾氏手中，十四、五歲的司馬昱，僅具政治上的空名。

至康帝駕崩，穆帝即位後（建元三年，345），司馬昱才逐漸掌握政權，此時庾氏、何充等相關之長期掌握東晉前期的家族，一個個退出政治舞台。崇德太后臨朝，權臣的干預暫時解除，四月，進司馬昱爲輔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司馬昱重新回到政治舞台，這一年他二十六歲。次年（永和二年，346），崇德太后再詔司馬昱「專總萬機」，與蔡謨共同輔佐年僅三歲的穆帝。

司馬昱此時得以復出的另一原因是司馬家族人才凋零。從作者長期對司馬氏家族的研究來看，司馬氏歷經西晉末年之八王與永嘉之亂，進入東晉後經王、庾、桓等家族的排抑，[37]能用之才已不多。而此時正值青年，又在玄學領域嶄露頭角

---

[33]在會稽世族中，謝氏與孫氏政權一直採取合作態度，入晉後，尤其是東晉以後，謝氏仍是與政權之間，維持著作關係。參見王永平，前引書，第六章〈「江表儒宗」：會稽郡虞氏、賀氏之家風與家學〉，頁 262。

[34]參見金民壽，〈東晉政權の成立過程—司馬睿（元帝）の府僚を中心として〉，《史林》，75 卷、1 期（1992 年 1 月），頁 50-55。對於殷浩之所以未能成其功，自東晉以還，多以殷浩之敗，在於其虛名無實。對於這樣的說法，呂思勉以為不然，呂氏以為，殷浩之所以未能成事，主要是因為手上兵力不足，無法與桓溫相抗衡。參見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五章〈東晉中葉形勢（上）〉，頁 170-174。

[35]司馬晞為司馬睿之另一子，出繼武陵王司馬喆，活躍在康、穆帝之間，由於司馬晞「無學術而有武幹」，這些掌握東晉政權的世家大族，並不把他擺在眼裡，只讓他做虛位三公。

[36]《晉書》，卷 7，〈成帝紀〉，頁 183。

[37]參見胡志佳，前引書，第四章〈兩晉政局與帝位繼承的權力結構分析〉，頁 146-153。

的司馬昱，加上其家族輩份又高，是剛過世的康帝的叔父，是新即位穆帝的從叔祖，在整個司馬氏家族中反而顯得突出。

這些因素，讓司馬昱有機會重新站上政治權力的高位。但在此之前康帝死時，司馬昱一度成爲庾冰、庾翼用以爲政治鬥爭的工具，來與皇太子派支持者何充等人相抗衡，最後結果何充獲勝，皇太子司馬聃即位，是爲穆帝。[38]司馬昱在與帝位擦身而過後，與崇德太后及小皇帝之間如何相處？如何化解新皇帝權力集團的疑慮？另外，康、穆之際，也是桓溫逐漸掌握政權的時期，司馬昱執政，其中最大的挑戰也就在如何抑制桓溫勢力的擴張，這些都是司馬昱復出政壇後所立即面臨的挑戰。

穆帝即位後，由崇德皇太后聽政，爲安撫與拉攏人心，永和二年（346）下詔以司馬昱與蔡謨共同輔政。這是崇德皇太后釋出的善意，司馬昱接受了。但蔡謨自始即以種種理由推託不受，這對皇太后權威的行使是有實質上的傷害；此後蔡謨一直抗拒朝命，當時以蔡謨在朝臣中的地位，竟無一人能出面制止。永和六年（350），司馬昱出面制止了蔡謨目中無上的行爲：

> 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簡文時為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為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39]

司馬昱的提議化解了皇太后與小皇帝的困境，崇德太后順勢下詔「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司馬昱的作爲在某方面也宣達了他支持小皇帝的意向，這對二者的相處應是一次重要的交會。

而能有效抑制桓溫的發展，更是司馬昱得到信任的重要原因。穆帝即位後，面對日漸囂張的桓溫，以太后之父褚裒爲首的朝臣，推薦殷浩出任建武將軍、揚

[38]同上註，頁 150-151。

[39]《晉書》，卷 77，〈蔡謨傳〉，頁 2039-2040。

州刺史以制衡桓溫；[40]當詔令發佈後，引發桓溫極度不滿，因其欲染指揚州已久。永和三年（347）桓溫平蜀，聲勢如日中天。班師回朝後，崇德太后不得不以桓溫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41]當時朝中一批趨炎附勢者，建議應以平蜀之功，加封桓溫豫章郡。司馬昱接受荀蕤的建議，未讓其得逞。史載：

> 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荀）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42]

此次桓溫的加封雖未得逞，但其聲望和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引起東晉朝廷的恐懼。爲了與桓溫相抗，司馬昱引殷浩參與朝政；而殷浩又援引荀羨、王羲之等人與桓溫對抗，此後二者大小衝突不斷。[43]一直到永和五年（349）北方石季龍過世，後趙內部動亂，消息傳至南方東晉朝廷，桓溫不顧朝臣反對，「拜表便行」，率軍順流而下，行達武昌，殷浩懼怕桓溫是針對他而來，又想逃避，又想用軍法制裁，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還是司馬昱寫了封信給桓溫，曉以大義，才令桓溫撤軍。

> 及石季龍死，溫欲率眾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嘩　，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迴軍還鎮……。[44]

回鎮後的桓溫曾忿忿不平上疏，指出有人陷害他，並表達自己一片赤心：

>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

[40]《晉書》，卷 77，〈殷浩傳〉，頁 2044。
[41]《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69。
[42]《晉書》，卷 75，〈荀崧附荀蕤傳〉，頁 1980。
[43]胡志佳，前引書，第四章〈兩晉政局與帝位繼承的權力結構分析〉，頁 152。
[44]《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69-2570。

> 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45]

此後桓溫不斷以北伐一方面擴張自己的軍事力量，一方也用以要脅中央，司馬昱一直以迂迴妥協態度與之周旋。由於司馬昱的溫和個性與技巧，使得二人在合作過程，未出現大的問題。反倒是殷浩，在前次武昌事件中灰頭土臉，一直想尋求扳回顏面，在不聽勸阻之下，執意北伐，結果一路敗北，終於給桓溫機會，藉著群怒之下，於永和十年（354）廢了殷浩。[46]在此之前，桓溫已有效掌握荊州，與中央之間的關係「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殆不爲國家用。」[47]如今加上殷浩被廢，桓溫的勢力更如日中天。

前代史家多以司馬昱是懼怕桓溫而做出種種退讓之舉，但或可從其他角度來解讀司馬昱的行爲。一方面是司馬昱與桓溫早在司馬昱擔任會稽王尚未執政前，兩人在會稽已有許多交往的經驗，《世說新語》載有：

>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桓溫）。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48]
>
>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免。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49]

當然，在清談酬酢的同時，桓溫對司馬昱與司馬晞等司馬帝室元老，是存在著相當的戒心，也曾用計試探他們的能耐，若有人讚美司馬昱，仍會引起桓溫的不快：

>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閒故復有此賢。」[50]

---

[45] 同上註，頁 2570。

[46] 《晉書》，卷 77，〈殷浩傳〉，頁 2045-2047。

[47] 《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69。有關於荊州與東晉中央之間的緊張關係，早在五十年前傅樂成先生已提出精闢見解，傅氏指出東晉諸州刺史兼督他州軍事多係僑置州郡，只有荊州刺史所兼者為實土，所以荊州的實力，遠勝他州；而東晉荊州刺史往往又兼督數州，有荊州等於割江南之半。如此使得荊州與中央互相猜忌，尤有甚者，在陶侃以後，漸成世襲，桓溫以後荊州落入桓氏之手，溫弟豁、沖，豁子石民，沖子謙，均相繼掌荊州之政，至桓玄再次發動叛亂。參見傅樂成，前引文，頁 102-104。

[48] 《世說新語箋疏》，上卷，〈言語第二 60 條〉，頁 120。

[49] 《世說新語箋疏》，上卷，〈政事第三 20 條〉，頁 183-184。

[50] 《世說新語箋疏》，中卷，〈雅量第六 25 條〉，頁 366。

>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51]

桓溫與司馬昱就在這種相知相惜卻又互相競爭的情緒下共事著。到桓溫欲恢復聲勢而廢司馬奕時，也正是司馬昱欲重新穩固政治地位之時，二人是否在某種條件之下，達成廢司馬奕而由司馬昱繼帝位的默契，這是極有可能的。從桓溫提出廢帝之舉，司馬昱以一朝總宰大臣，而無一言相抗，反而順從地接受徵召；另外在司馬昱臨死前毫無反抗地要將帝位直接讓給桓溫，是否也是兩人協議中的一部份？雖然從史料中吾人並未能解讀出這樣的訊息，但這是值得繼續探索的課題。[52]

太和五年（370），桓溫奏廢司馬奕，扶持了司馬昱即位爲簡文帝，從此二人的關係進入到另一境界，當上皇帝後的司馬昱或許思維出現轉換，開始想要有所作爲，如此一來與桓溫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面對桓溫日漸顯著的奪權之心，司馬昱透過會稽時期結下的名士人才，有效壓制了桓溫的野心，順利地將政權移轉到司馬曜的手中，延續了司馬政權。

肆、即帝位後的簡文帝司馬昱

太和五年（370），在桓溫的壓力下，司馬奕被廢，由皇太后下詔，司馬昱即位爲皇帝，是爲簡文帝。史載：

> 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丞相、錄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53]

由於在位不到兩年，過去對於東晉帝王的敘述或研究多捨略司馬昱，但我們由《晉書・簡文帝紀》所載來分析，可以發現司馬昱在即位後，開始努力地有所

---

[51]《世說新語箋疏》，上卷，〈文學第四 80 條〉，頁 258。

[52]清・王夫之對於桓溫廢司馬奕而司馬昱並未出面阻止是有所指責的。參見氏著《讀通鑑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14，〈簡文帝〉，頁 4。

[53]《晉書》，卷 9，〈簡文帝紀〉，頁 220。

作爲，他一方面以國家領導者身份必需要有所作爲，另一方面又要與擁有軍政權於一身的桓溫共存，這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

在國家大政的治理上，甫即位的簡文帝司馬昱即下詔「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順忠貞鰥寡孤獨米人五斛。」[54]十二月再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55]咸安二年（372）又下詔要求中央與地方官員「省華飾煩費之用」與「各勤所司」；[56]最後也體恤對於過去在倥傯中減少的官吏薪俸，重新「籌量增俸」。[57]由《晉書》上所留下詔文，無論在現實中是否實行過，可以看出簡文帝是想承前朝的基礎，將司馬政權帶向一個天下安樂的時代。這些積極的作爲，讓司馬昱承受來自於桓溫更大的壓力，兩人之間的情誼也開始出現變化。

司馬昱即位爲皇帝後，桓溫主控朝政，一步步要消滅反對勢力，首先要對付的就是行徑囂張的司馬昱同父異母哥哥司馬晞。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司馬昱展現完全地執著，而終使桓溫不得不妥協。史載：

> （司馬）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自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　散騎常侍。」　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58]

《世說新語》有更詳細的描述：

>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59]

---

[54]同上註，頁 221。
[55]同上註。
[56]同上註，頁 222。
[57]同上註，頁 223。
[58]《晉書》，卷 64，〈元四王・司馬晞傳〉，頁 1727。
[59]《世說新語箋疏》，下卷，〈黜免第二十八 7 條〉，頁 869。

司馬晞事件後，或者是爲了要安撫桓溫，「賜（桓）溫軍三萬人，人布一匹，米一斛。」此後又加溫爲丞相。桓溫不接受，也不進朝，移鎮姑孰。[60]十二月又下詔廢東海王奕爲海西公，食邑降爲四千戶。咸安二年（372）四月，再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61]

即帝位的司馬昱，不到兩年就過世了。但在這兩年間，他一方面應付執政的桓溫，另一方面更積極地爲維持司馬家業而佈局。大量引用反對桓溫的人士進入權力圈，來發揮制衡桓溫的力量。司馬昱人才的佈局早在其擔任首輔已開始。如其所重用的高崧，曾爲他起草阻止桓溫北伐之書信；[62]遭受桓溫排擠的范汪，也被其援引出任重要的地方官，作爲外援；[63]以及積極爲司馬昱阻止桓溫竊國之欲的王彪之、王蘊與謝安等人。

豫州刺史謝奕死後，支持桓溫者欲以桓雲代之，在王彪之以「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爲由，[64]讓司馬昱有理由阻止了桓雲掌控豫州的機會。[65]

王彪之爲王彬之子，屬東晉丞相琅邪王氏之一脈。王彪之做事認真嚴謹，在桓溫執政過程中，曾有幾次與王彪之交鋒，彪之皆直言，不懼權勢，桓溫對之是又愛又恨。

> 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溫不臣跡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66]

---

[60]《晉書》，卷 9，〈簡文帝紀〉，頁 221。

[61]作者推測司馬昱再三貶徙廢帝司馬奕，應與桓溫的授意有關。其實貶徙司馬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或是保護司馬奕免於受害的方法，多少下台的君王死於非命，而司馬奕一直活到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才過世。《晉書》，卷 8，〈海西公紀〉，頁 215。

[62]《晉書》，卷 71，〈高崧傳〉，頁 1895。

[63]《晉書》，卷 75，〈范汪傳〉，頁 1983。

[64]《晉書》，卷 76，〈王廙附王彪之傳〉，頁 2010。

[65]王彪之早在桓溫以北伐之名出兵武昌時，就曾向司馬昱獻計阻止桓溫的行動。《晉書》，卷 76〈王廙附王彪之傳〉，頁 2007-2008。

[66]同上註，頁 2010-2011。

簡文帝剛死，群臣驚恐，不知該如何，有人提議立嗣一事應讓給執政的大司馬桓溫決定，王彪之以僕射一職，出面駁斥了這樣的建議，也讓司馬曜得以順利即位爲帝，並斷了桓溫的攝政之夢：

> 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67]

王坦之爲王述之子，司馬昱對王述的評價是「（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王述在政治態度上是反桓溫派，桓溫曾想以要結親於王坦之，結果遭致王述嚴峻的拒絕。當桓溫收復洛陽聲勢最盛時，王述仍毫無所懼地阻止桓溫遷都之舉。[68]王述的政治態度多少影響了王坦之，王坦之曾在桓溫手下擔任長史一職，父親王述過世後離開這個職位，後爲司馬昱重用，大力爲扶持司馬政權而努力。在司馬昱臨死前，桓溫不斷進逼要求立其爲帝，司馬昱眼見大勢已去，手詔桓溫以「少子可輔即輔之，如不可，君自取」，[69]當時擔任侍中的王坦之，公開毀詔反對，使桓溫喪失取得政權的機會：

> 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70]

司馬昱也重用由桓溫援引出仕的謝安。謝安在四歲時已爲桓彝所重，及長，聲名更重。早年寓居會稽，不願出仕，一直到謝萬被罷黜，才正式走入仕途。一入仕途即爲桓溫所重用：

> （謝安）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71]

---

[67]同上註，頁 2011。

[68]《晉書》，卷 75，〈王湛附王坦之傳〉，頁 1963-1965。

[69]唐・許嵩，《建康實錄》（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卷 8，〈太宗簡文皇帝〉，頁 42。

[70]《晉書》，卷 75，〈王湛附王坦之傳〉，頁 1966。

[71]《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3。

桓溫以爲自己過去之援引與重用，謝安會幫助他登上帝王之座，但他不知，謝氏家族早期在會稽與當時出任會稽王的司馬昱之間因玄學清談，已有交往，甚至相知相惜。[72]當簡文帝司馬昱臨死前，桓溫建議由自己援引出仕的謝安受顧命輔政，如此一來，在簡文帝死後即可拿下晉室政權，殊不知，最後阻止桓溫奪權的其中一重要人物，就是謝安。

> 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73]

> 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眾，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74]

自明帝太寧三年（325）下詔：「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75]開始，東晉透過集體議政的方式，將軍國大事乃至於特殊情況下的立君、立嗣，都要經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尚書令等共同參議，這使得此後東晉政權在不同時期雖由多家控握軍政大權，但仍難以完全專擅。[76]司馬昱也利用了王坦之、謝安與王彪之及其他朝臣，有效抑制了桓溫及其以後欲奪司馬政權的人。

---

[72]在謝安未出仕前，許多人對謝安不做官，整天悠遊山水的態度不以為然，但當時身為會稽王的司馬昱即曾言：「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2-2073。另參見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墓志研究－東晉流寓政府的輓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 卷、3 期（2004 年 7 月），頁 32-40。

[73]《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77。

[74]《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3。

[75]《晉書》，卷 6，〈明帝紀〉，頁 162。

[76]張承宗等人主編，《六朝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18-19。

簡文帝剛死，桓溫急切地要朝廷加自己九錫之封，以做好即位皇帝的準備，謝安與王坦之設法拖延，最後在桓溫病死的情況下，結束這場加九錫的鬧劇。

> 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嘩　，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77]

伍、結論

本文從司馬昱的角度來看東晉初期帝位鬥爭的一景。司馬昱一個三歲幼兒，被擺置在象徵東晉大宗繼承的琅邪王位，七歲徙封會稽，三十八年後回封琅邪王，五十二歲登基爲皇帝。這樣的人生經驗在司馬氏家族中是僅見的。東晉司馬政權因經西晉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的破壞，司馬氏家族人員死亡殆盡，東渡的家族成員已成爲統治階層中的極少數，爲鞏固建立統治基盤，在王導的建議下，司馬睿選擇了與世族共建天下。也因此，東晉政權週而復始的被幾個家族所操控著，甚至帝王的興替也由這些執政的家族所決定。

司馬昱，東晉元帝之子，因母而貴，也因母親死亡而被徙封至會稽。遠離政治中心的司馬昱，在會稽悠遊成長，結交一批北來的名士把酒清談，孕育司馬昱內在的個性，也因這些交遊名士，在他復出政壇時，得到許多的助力。

本文由司馬昱陷入琅邪王封位爭奪的風暴中，來探索琅邪王位在東晉初期被看待的角色。元帝時期，琅邪王爲元帝專封給所寵愛的兒子，象徵的意味大，成帝以後至簡文帝即位前，除長子繼承皇位外，都由琅邪王入繼爲皇帝。這也使得琅邪王位的爭奪不斷出現在東晉中期以前。

司馬昱得以重掌政權，就本文的分析大致有三個主要因素，其一爲至東晉中期，司馬家族的人才已衰亡殆盡，司馬昱在當時地位尊，人品亦佳。其二、當東晉前期政爭最劇烈時，司馬昱因徙封會稽，而遠離了傷害。另一條件是司馬昱的個性溫和，與穆帝及皇太后相處極有分寸，加上與當時勢力最大的權臣桓溫基於政治利益的結合，終使得司馬昱脫穎而出，再次站在權力的高峰。

對司馬昱的評斷自東晉以還可稱兩極，當時代與司馬昱共事的謝安以「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稱之；司馬昱好友支道林則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其後之謝靈運也以司馬昱爲「赧獻之輩」；唐代所修《晉書》亦稱司馬昱「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78]至清代王夫之，則以嚴厲文辭批評司馬昱，爲「賊」耳。其文曰：

---

[77]《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4。

[78]《晉書》，卷 9，〈簡文帝紀〉，頁 223-224。

> 簡文為琅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漠然不相為援，蓋其惡溫而忌之夙也。既惡溫矣，抑不能樹賢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恭之而猶擁立之，以為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蓋至於聽溫之扳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存焉者矣。帝奕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文既不能折之以衛弈，則以死拒溫而必不立奉名義之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遽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己，則溫之逆受眾惡而不足以容，即令己殺而溫篡亦可無咎於天下，乃雖靦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耳……。簡文之為賊也。[79]

王夫之著眼於司馬昱該救廢帝司馬奕而不救，坐視桓溫罷廢之舉，並接受桓溫提薦入繼帝位，而以賊稱之。這是歷來史家對司馬昱最嚴厲的評判。

近代學者呂思勉則有不同的看法，呂氏指出後代所修之《晉書》「好博采而辭缺斷制，往往數行之閒，自相矛盾」，並不值得全信；呂氏列舉司馬昱對抗桓溫的作爲來說明司馬昱本身有其能力：

> 蓋自其（桓溫）舉兵欲脅廢殷浩以來，至於孝武之初，始終若一，初非謝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數人之力也。簡文之才力，亦實有足稱矣。[80]

歷來對人物之評斷是歷史研究中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司馬昱在歷史上的評價由於不同角度的解讀也出現兩極化的判讀，孰是孰非，由於史料的不足，並不能讓吾人立判，但希望透過本研究，讓司馬昱在東晉歷史上的角色能更清晰地呈現出來。

[79]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卷 14，〈簡文帝〉，頁 4。
[80]參見呂思勉，前引書，頁 183-184。

附表一：兩晉琅邪王表

時間	姓名	即帝位者	備註
武帝泰始元年（265）十二月	司馬倫		《晉書・武帝紀》，頁 52。
武帝咸寧三年（277）八月	司馬伷		《晉書・武帝紀》，頁 68。
武帝太康四年（283）	司馬覲		《晉書・琅邪王司馬伷傳》，頁 1121-1122。
惠帝永熙元年（290）	司馬睿	元帝	咸寧二年生於洛陽，年十五，嗣位爲琅邪王。《晉書・元帝紀》，頁 143。
元帝建武元年（317）三月	司馬裒		同年十月薨。《晉書・元帝紀》，頁 149。
元帝太興元年（318）十二月	司馬煥		二歲，以疾篤，王之，當月卒。《晉書・元帝紀》，頁 151。
元帝永昌元年（322）三月	司馬昱		轉徙會稽王。《晉書・成帝紀》，頁 171。
成帝咸和二年（327）十二月	司馬岳	康帝	《晉書・成帝紀》，頁 171。
成帝咸康八年（342）六月	司馬丕	哀帝	成帝死，以同母弟司馬岳爲帝《晉書・康帝紀》，頁 184。
穆帝升平五年（361）五月	司馬奕	海西公	司馬丕即帝位，以同母弟司馬奕繼之。《晉書・海西公紀》，頁 210。
哀帝興寧三年（365）七月	司馬昱	簡文帝	二月哀帝崩，以司馬奕繼帝位。《晉書・海西公紀》，頁 218。
簡文帝咸安二年（372）七月	司馬道子		司馬昱臨死前封之。《晉書・簡文帝紀》，頁 223。
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十一月	司馬德文	恭帝	徙封司馬道子爲會稽王。《晉書・孝武帝紀》，頁 239。

附表二：《世說新語》中與司馬昱交遊之名士表

姓名	交往情形	《世說新語箋疏》出處
王獻之	獻之娶簡文三女新安公主	〈德行一 39 條〉，頁 40
竺法深	司馬昱與之結殷勤之歡	〈言語二 48 條〉，頁 108-109
王濮陽	司馬昱師事之	〈德行一 39 條〉，頁 41-42
劉惔	談玄之友	〈言語二 48 條〉，頁 108-109
顧悅	與司馬昱同年，談玄之友	〈言語二 57 條〉，頁 117
桓溫	談玄之友	〈言語二 60 條〉，頁 120
王濛	談玄之友	〈言語二 69 條〉，頁 127
竹道壹	司馬昱深所知重	〈言語二 93 條〉，頁 146
支道林	談玄之友	〈文學四 40 條〉，頁 227
許珣	談玄之友	〈文學四 40 條〉，頁 227
殷浩	談玄之友	〈文學四 51 條〉，頁 234
謝安	談玄之友	〈識鑑七 21 條〉，頁 403
庾統	司馬昱欣賞	〈賞譽八 89 條〉，頁 471
謝仁祖	談玄之友	〈賞譽八 89 條〉，頁 471
王述	談玄之友	〈賞譽八 91 條〉，頁 472
法汰	司馬昱所敬重	〈賞譽八 114 條〉，頁 482
謝奉	司馬昱欣賞	〈品藻九 40 條〉，頁 523
謝聘	司馬昱欣賞	〈品藻九 40 條〉，頁 523
郗超	玄談之友	〈品藻九 49 條〉，頁 527
范汪	玄談之友	〈排調二十五 34 條〉，頁 805
王坦之	玄談之友	〈排調二十五 46 條〉，頁 811
范啓	玄談之友	〈排調二十五 46 條〉，頁 811
孫綽	玄談之友	〈排調二十五 54 條〉，頁 816

附表三：司馬昱官職升遷表

時間	西元	歲數	官職遷轉
咸和元年	326	7	自請徙封會稽王。
咸和九年	334	15	遷右將軍，加侍中。
咸康六年	340	21	進撫軍將軍，領秘書監。
咸康八年	342	23	六月，成帝崩，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
康帝建元元年	343	24	兼領太常，本官如故。
穆帝永和元年	345	26	四月，崇德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永和二年	346	27	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二月，與蔡謨共輔政。
永和八年	352	33	進位司徒，故讓不拜。
升平元年	357	38	穆帝始冠，稽首歸政，不許。
興寧三年	365	46	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爲會稽王。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
廢帝太和元年	366	47	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又固讓。
太和五年	370	51	廢帝廢，皇太后下詔，立司馬昱爲皇帝。

參考文獻

史料

《晉書》，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9 年二版。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89 年。

唐・許嵩，《建康實錄》，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中文專書

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

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年。

王永平，《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

王伊同，《五朝門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年重刊第一版。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朱大渭等著，《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何啓民，《中古門第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 年再版。

何啓民，《魏晉思想與談風》，台北：學生書局，1990 年。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年。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胡志佳，《門閥士族時代下的司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年。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社會文化史論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年。

郭湛波，《中國中古思想史》，香港：龍門書店，1967 年。

葛承雍，《儒生，儒臣，儒君》，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

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蘇紹興，《兩晉南朝士族》，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年。

中文期刊

王永平，〈試論東晉中期門閥政治的演化—環繞桓溫專權的研究〉，收入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 年。

王永平，〈論中古時期世族家風、家學之特質－以江東世族爲中心的歷史考察〉，《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 卷 3 期，2003 年 9 月。
王炎平，〈關於王導與東晉政治的幾個問題〉，收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年。
余世明，〈論桓溫〉，《貴州大學學報》，第 4 期，1987 年 10 月。
張國安，〈晉明帝末年統治集團內部的一次鬥爭〉，《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4 期，1986 年。
張國安，〈庾亮專權與東晉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2 期，1988 年。
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墓志研究－東晉流寓政府的輓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 卷 3 期，2004 年 7 月。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於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台北：里仁出版社，1981 年。
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 年。

日文專書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 年。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64 年。
越智重明，《魏晉南朝的政治與社會》，吉川弘文館，1963 年。

日文期刊

三石善吉，〈東晉の政治過程のいくつかの特質〉，《史境》，26 期，1993 年 3 月。
川勝義雄，〈初期東晉政權の軍事的基礎—北來亡命貴族と江南土著勢力—〉，收於《加賀（榮治）博士退官記念中國文史哲學論集》，東京：講談社，1979 年。
金民壽，〈東晉政權の成立過程—司馬睿（元帝）の府僚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48 卷 2 期，1989 年 9 月。
金民壽，〈桓溫から謝安し：る至東晉中期の政治—桓溫の府僚を中心として〉，《史林》，75 卷 1 期，1992 年 1 月。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79-204 , No. 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A Study on Si-Ma Yu of East Jin

Chih-Chia Hu[*]

Abstract

The life of Jian-wen Emperor Si-Ma Yu of East Jin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in his life.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his birth until the death of his mother Imperial Concubine Cheng. His father, Si-Ma Rui, had six sons from four mothers. Because of the status of his mother, Si-Ma Yu was favored by Si-Ma Rui, and received the title of "Lang Ye Wang" at the age of three. However, soon after Si-Ma Rui passed away, his mother, Cheng, passed away in year 326. Si-Ma Yu became a thorn in the flesh to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his title was degraded to "Kuei Chi Wang" for 38 years.

For 38 years, Si-Ma Yu was kept away from political struggle and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Under his initi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before the middle of East Jin was prosperous. In terms of politics, he experienced over six Emperors, Ming, Cheng, Kang, Mu, Ai, and Fei. He was nominated twice for the Emperor but lost the political battle. Because he managed to stay out of the battle, his governmental rank kept rising and unharmed. After Fei Emperor ascended the throne, Si-Ma was appointed Lushang Shushi and Fujun General, and began to have political control. He introduced his connections in Kuei Chi and metaphysic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ose people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war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and internal affairs during the Fei Emperor period, as well as on the power struggle against Huan-wen after Si-Ma Yu became the Emperor.

This paper would discuss the alternation of the thrones of East Jin since the early period, the vicissitude of the titles "Lang Ye Wang" and "Kuei Chi Wang" in the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the political arrangement and movement of Si-Ma Yu,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hronement of Hsiao Wu Emperor.

Keywords: Si-Ma Yu , East Jin, Kuei Chi, Lang Ye

---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lics, Feng Chia University.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205-223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清代台灣烏溪流域的移墾與水圳修築

陳哲三*

摘　要

本文主旨在重建烏溪流域早期移民入墾及水圳修築之歷史，並進而探討移墾到水圳修築之時間早晚問題。本文研究結論是烏溪下游最早移墾，上游次之，中游最晚。原因決定於可耕地大小。水利修築大致與移墾同時，俾能水田化，種水稻在清代農業土地的收益最高。有許多水圳由平埔族所開鑿，尤其是埔里盆地，證明平埔族充分適應漢人農業模式。本文運用若干新史料，故有若干新發現足以糾正過去之錯誤。

關鍵詞：烏溪流域、移墾、水圳、平埔族

*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

壹、前言

清代台灣的田園以水稻與甘蔗的栽培爲最重要。二者之中，又以水稻爲重要。因爲米穀除了是商品外，又是主食。農作物都需要適當的灌溉，水稻則需要充分的水灌溉。因此水圳修築爲墾殖中重要之一環。墾殖者如果各種條件都允許無不同時修築水圳，水田種稻是當時最有效益的經營方式。所以讓旱田變水田是農民最大的希望，水田地價高於旱田，原因在此[1]。

王世慶研究農田水利，認爲埤圳修築，有幾個作用：一、促進土地之改良，提高土地經濟價值;以改變旱園爲水田，增加農業生產，尤其是主糧米穀之產量，因灌溉面積之擴大而激增。二、水田之農作收成倍於旱園，稻米增產，民食充足富裕，進而外銷中國沿海各省，政府賦課稅收增加。三、隨水利埤圳之開發田莊擴大，人口之收容量增加，擴大村落，村庄快速增加，米穀之增產，成爲農村社會繁榮，維護治安安定社會之原動力。[2]

水圳修築如此重要，清代台灣土地開墾同時也著手水圳之開鑿，但因爲財力、人力、技術及自然條件的不同，水圳規模與開鑿時間也有差異，有的地區早有水利埤圳，有的地區晚；有的地區工程規模大，灌溉面積大，有的地區工程規模小，灌溉面積小。本文擬就移民入墾與水圳修築，探討清代烏溪流域之開發。

本文所謂烏溪流域，即指烏溪主流、支流及源流之地區，以行政單位而言，包括彰化縣的芬園鄉；台中縣的烏日鄉、霧峰鄉、太平市；南投縣的草屯鎮、南投市、中寮鄉、國姓鄉、埔里鎮、魚池鄉。爲行文方面，芬園鄉、草屯鎮、南投市、中寮鄉稱烏溪下游南岸；烏日鄉、霧峰鄉、太平市稱爲烏溪下游北岸；國姓鄉稱烏溪中游；埔里鎮、魚池鄉稱烏溪上流。參看附圖一、附圖二。

本文研究領域的相關研究論文缺乏，不論是移民入墾或是水利修築，都屬初探性質。但本文運用較多古文書，並有第一次出土的史料，使研究有新發現，如郭雙富收藏的契約文書解決媽助圳的修築者及年代，曹士桂的日記知道番割李秀可能是第一位住在國姓鄉的漢人，愛蘭黃家的紀事曆稿確知南港溪流域的開發時間及水圳之修築情狀，昭和九年調查的〈各圳灌溉面積關係綴〉明確知道埔里各圳的沿革。本文寫作期間並到各圳實地考察，也到各水利工作站與工作人員做訪談。

---

[1] 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的地價及其相關問題〉，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台中：逢甲人文社會學院，2003 年 11 月），第 7 期，頁 89-116。

[2] 王世慶，〈從清代台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載王氏著《清代台灣社會經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83 年），頁 131-215。

貳、烏溪流域的移墾

烏溪是大肚溪的上流之一。烏溪之源流爲北港溪與南港溪。北港溪發源於合歡山西麓，向西南流經眉原、北港村，至國姓北方之大旗村與水長流溪會合，又西南流至柑子林，再與南港溪合併，以下稱烏溪，經龜溝、福龜、雙冬、土城，至茄苳山北側之烏溪大橋西邊進入台中盆地。南港溪亦發源於合歡山，其上流眉溪流經埔里盆地。[3]柑子林以上爲源流本文稱上游，柑子林至茄苳山之峽谷段爲中游，茄苳山以下爲下游。

烏溪流域在移民未入墾之前，是原住民的世界，烏溪下游平原南北岸屬洪雅族的北投社、南投社、貓羅社。烏溪中游及上流是泰雅族及埔社、眉社及邵族、布農族。本節只叙其殖民開始之情狀，不敘殖民開拓之完整歷程。

烏溪下游南岸之地，荷蘭人在熱蘭遮城日記中在 1650 年記道：「Tausa Talachei 和 Tausa Mato，中文稱之爲 Lamtau 和 Packtau，這兩社以前在 Tavocol（大武郡）社交易，但今年因有理由予以分開發賧，Tavocal 如上述 Tausa's Talachei 和 Mato 另有自己的賧商」[4]可以知道在 1650 年以前，荷蘭人已經向南投社、北投社收稅了。但只是收稅，並未有移民入居墾殖。移民入居墾殖，顯然要到清雍正三年（1725）戶部詔諭：「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令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5]移民始能合法入南北投社之社域賧耕社地。

在今草屯南投地區，有資料可據的，是雍正七年簡經賧耕北投社公共草地。因爲內凹庄事件留下史料。[6]另有張法在雍正十三年以前開墾大哮庄凹仔埔東北隅一百二十五甲。因有〈光緒十年大社庄張姓五房頭同立杜賣大租契〉[7]而得知。移民移入南投，形成南投庄，在乾隆十六年以前。今留存土地買賣租賧契約都在乾隆十四年以後。

烏溪下游北岸之地，烏日地方，地當巴布拉、貓霧揀、洪雅的過渡地帶，康熙末即有漳州府魏姓入墾，雍正年間續有閩籍楊、陳、林姓由大肚入墾，今有雍正十一年業主楊秦盛出賧契。[8]太平地方，乾隆五年有邱子茂出售田園契。[9]雍正

---

3 張光直編，《台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66 年），頁 164。

4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台南市：台南市政府，民國 92 年），頁 126。

5 《清會典台灣事例》，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二二六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5 年），卷 167，頁 43。

6 〈奏覆審理彰化凶番焚殺兵民摺〉，載《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七輯》（台北：故宮博物院，民國 71 年），頁 301-308；又見《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七》（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7 年），頁 275。

7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85 年），頁 299-301。

8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85 年），頁 61-62。

9 契約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號 82-0025 轉引自楊護源，〈清代台中地區的聚落拓殖〉（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4 年 11 月），頁 222。

初年粵籍潮州大埔曾、何、巫三姓開拓柳樹湳、丁台一帶。雍正十三年泰雅族眉加臘社出擾柳樹湳、丁台一帶，經官兵討平，事後官方於丁台設義勝寨安鄉勇巡防，於柳樹湳建營盤撥兵一百名駐防，[10]乾隆二十二年有阿罩霧、萬斗六招佃承墾之記錄。乾隆三十二年吳厝、溪心霸、阿密里有吳伯榮報陞田園，[11]三地均已開墾成功。

烏溪上游的國姓地方，早期文獻稱國姓埔或國勝埔。有內國姓、外國姓。龜紫頭（今福龜）以東，爲內國姓；以西，爲外國姓。乾隆末林爽文事件時，文獻已出現國姓之地名。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記官兵攻開大里杙後，「賊人都逃入內國姓埔地方」。[12]郭百年事件後，官方在「集集、烏溪二口各立禁碑」，[13]姚瑩在同文中並指出入埔裏社有南北二路，濁水溪是南路，烏溪是北路，「北路爲近，然常有兇番出沒，人不敢行。」[14]這是道光初年的情形，既然人不敢行，自然不會有人移入墾殖。又烏溪禁碑過去說立於龜仔頭坪，即今國姓鄉龜仔頭。[15]但據鹿港同知曹士桂日記所記則在賸屯園。曹氏爲了閩浙總督劉韻珂入埔里社考察，先於道光二十七年二月間入埔，五月間才陪總督入勘。二月二十六日日記從內國姓荒埔到龜仔頭，有番割李秀率其番婦迎于道，請宿其家。可知李秀住在龜仔頭。次日，出龜仔頭、九芎林、外國姓、大平林、粗坑、土城仔，洪璠迎入其書房。洪璠住賸屯園。五月二十七日日記記「于賸屯園烏溪岸上看禁碑，嘉慶二十二年立也，與集集舖天后宮前禁碑同。」[16]可知番界在土城、屯園一 線烏溪河岸，而李秀是文獻中第一位住在番界內龜仔頭的人，他的身份是番割，也不墾殖。要到咸豐年間，流民越禁到龜仔頭，才形成聚落。

至於北港溪流域，要到光緒十三年（1887）劉銘傳命總兵章高元討伐北港溪之泰雅族，移民始自東勢南下開墾。次年，設東勢角撫墾局水長流分局、北港分局。統領林朝棟以兵二千五百入山建砲台於扼要之地，水長流駐棟字隘勇營一營，並設銃櫃於番界山稜界之上，於是阿冷、白毛、眉加臘等社之出草殺害被制止，東勢方面客籍移入更多。[17]

南港溪流域則要到日治才大規模開墾，明治三十九年（1906）埔里黃家倡議成立埔里社開源會社，向台灣總督府提出請願，次年得社員二十二人成立會社。三十九年，台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指令「南投廳埔里社堡南港線內內墾鞍、大茅

[10]《清高宗實錄選輯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3 年），頁 12。
[11]周璽，《彰化縣志》〈田賦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0 年），頁 176。
[12]《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0 年），頁 774。
[13]姚瑩，〈埔里社紀略〉，載姚瑩，《東槎紀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6 年），頁 30-40。
[14]同註 12。
[15]劉枝萬，《台灣中部碑文集成》（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1 年），頁 169。
[16]曹士桂，《宦海日記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74。
[17]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73 年），頁 498-500。

埔、北山坑菅藜巷鴨母坪大石鼓、鴨母下坪打煎柑子林咬蚤坪、大肚番官有原野內面積百四十一甲七分二厘四毫六絲豫約賣渡之件特予許可。」[18]

水埔六社，可墾地一萬二、三千甲。[19]嘉慶二十年（1815）郭百年等擁眾千餘人入墾，雖以違禁被逐，但土著大衰，迎平埔族入墾，漢人稍稍復入。道光初年，姚瑩有云：「而水社之山川秀美，埔社之地土沃饒」說水、埔二社「即外社熟番亦垂涎至矣！」[20]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閩浙總督劉韻珂入勘埔里社時，田頭社、水裏社、貓蘭社、審鹿社、埔裏社、厝裏社，所謂埔水六社，合計九七０戶，而熟番約共二千人。熟番已是反客爲主。曹士桂在日記中有「則熟番與本年新來之漢人舖戶居民亦數十烟。」[21]則漢人亦入埔里。

魚池，以日月潭聞名於世，過去也以日月潭及住在此地的水社或稱水裏社，或稱水沙連社而知名。[22]是入埔里南路必經之地。林爽文事件，社寮人黃漢以平亂有功，被任命爲水沙連化番世襲總壯丁，[23]月給銀十二兩，挑募屯丁九十名，分給養贍埔地，撥給屯田一百餘甲以充屯餉。道光十六年，子天惠繼之，招佃入墾，獲利頗巨。道光二十九年，黃天惠報得墾戶首王增榮墾耕長祿埔一帶。同治十二年，又有吳忠鳳來墾木屐蘭毗連長寮內外茄道坑等處。[24]另在台灣道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中，有「水社番被漳人潛墾，租給陳姓一二百甲」[25]時道光二十一年。此與《集集古誌》[26]及伊能嘉矩之調查[27]大致吻合。陳姓者即陳坑。

歸結以上的討論，可見烏溪流域的移墾是由西到東，由平原入山區，照說應是先國姓，後埔里，但事實上國姓只成爲入埔里的北路，而且人不敢行，反而埔里魚池的開發較早，國姓落到最後，而入墾埔里的人早期來自南路的濁水溪線。

---

[18]〈黃家勝元堂八十三紀事曆稿〉（埔里愛蘭黃家油印本）。

[19]劉韻珂，〈奏開番地疏〉，載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8 年），頁 207-212。

[20]姚瑩，〈埔裏社記略〉，載丁曰健，《治台必告錄》，頁 179-187。

[21]曹士桂，《宦海日記校注》，頁 171。

[22]康熙末年朱一貴事件，藍鼎元來台平亂，有〈紀水沙連〉一文，寫到日月潭說：「山清水綠，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又說：「萬山之內，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勝地。……武陵人誤入逃源，余曩者嘗疑其誕，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言之非欺我也。」見藍鼎元，《東征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7 年），卷 6，頁 85-86。周璽，《彰化縣志》，卷 12，〈藝文志〉，頁 442-443。

[23]黃漢身分以往都據黃玉振、莊士杰〈化番六社志〉稱為水沙連化番世襲總通事，但據道光二十九年水沙連六社化番總通事毛澳草地主目改旦等同立招佃字，則黃漢之子黃肥稱「總壯丁」，則黃漢應稱總壯丁為是。該契見《清代大租調查書》，頁 623-624。

[24]見《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頁 621-622。

[25]見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8 年），頁 229-238。

[26]《集集古誌》日文手抄本，未出版。

[27]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台灣》（東京・富山房，明治 42 年），頁 94。

參、烏溪流域的水圳修築

本節之水利修築並不記全部之水利工程，只記早期之水利修築，主要在知道何時開始有水利設施。

烏溪下游南岸之水利修築，以草屯、南投爲早，以文獻記錄則以萬丹坑圳爲最早。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已有著錄，說圳在南北投保東。[28]余志修撰時間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三十九年（1774）間，所以本圳開鑿時間有可能在乾隆二十五年之前。之後道光十年周璽《彰化縣志》記有：萬丹坑圳、險圳、南投圳、馬助圳、阿轆治圳及半壁泉。萬丹坑圳已見余志，不贅。險圳云：「在南北投保，源從烏溪分脈，至茄苳山，穿山鑿石數十丈，流出灌溉七十餘莊之田。乾隆十六年，池良生開鑿，里人名爲石圳穿流。」[29]南投圳云：「水從哮貓流出，築埤瀦蓄，南投保之田皆資灌溉。」[30]馬助圳云：「在險圳下，源從烏溪分出，灌上下茄苳田五百餘甲。」[31]阿轆治圳云：「在馬助圳下，水源亦同，灌石頭埔等庄田五百餘甲。」[32]半壁泉云：「在北投保北勢湳莊青牛埔山嵌。半壁泉從石罅湧出，味極甘美，里人乏井，皆往汲焉。雖旱亦湧，灌田十餘甲。名曰半壁泉。」[33]

到日人治台，利用地契及調查，在《台灣土地慣行一斑》中記險圳，指係乾隆八年北投社番土目葛買奕委托漢人吳連淌所開鑿。記媽祖圳係乾隆初年洪媽祖者開設，灌溉番仔庄外七庄田四百餘甲。茄苳圳、埔仔圳爲其支流。記舊圳係乾隆二年北投社番等開鑿。[34]

與今日所見契約印證，日人所調查較爲正確，但仍有錯誤。

舊圳係北投社所開，但開於乾隆二年，缺乏史料可資佐證。險圳，《彰化縣志》寫是乾隆十六年池良生開鑿，沒有契約文獻可資印證。日人調查則有契約印證。契約所見是乾隆八年北投社委漢人吳連倘所開，但因爲北投社付不出工資，經彰化知縣斷北投社以四十張犁土地付吳氏方告解決紛爭。[35]媽祖圳係乾隆初年洪媽祖者所開，時間正確，圳名、人名有錯，應作媽助圳，且開圳人有二人，一

---

[28]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1 年），卷 28，〈規制〉，頁 108。

[29]周璽，《彰化縣志》，卷 2，〈規制志〉，頁 57。

[30]周璽，《彰化縣志》，卷 2，〈規制志〉，頁 58。

[31]同註 24。

[32]同註 24。

[33]同註 24。

[34]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慣行一斑》（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38 年），第貳編，頁 554-555。

[35]〈乾隆三十七年北投社番余啟章等立遵憲再給佃批字〉及〈乾隆四十一年李喬基等同立永杜賣斷根田厝契〉，載林美容，《草屯鎮鄉土社會史資料》（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0 年），頁 12-13、15-17。

爲洪媽助，一爲洪澀光。見〈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洪媽助、洪澀光立賣坡（陂）頭圳水契〉[36]並且茄荖圳不是媽助圳之支圳，是比媽助圳更早開設之獨立水圳。上引契即有「架造坡頭在于加老坡頭下」，可見茄荖圳之陂頭還在媽助圳之陂頭之上。又因爲日人誤將茄荖圳當作爲媽助圳之支圳，未另作說明。使草屯地區少一條直接取水烏溪之水圳。

《彰化縣志》所記阿罐治圳，日人調查中未見此圳，在今日所見四百餘張契約中亦未之見，而《彰化縣志》所記缺茄荖圳，且「阿罐」與「茄荖」之台語音相近，故或可推測阿罐治圳即茄荖圳。但《彰化縣志》記阿罐治圳「在馬助圳下」，也是一個錯誤，應該在馬助圳上才對，且由契約也知馬助應作媽助。

綜上所論，可知草屯南投地區之水圳開設，最早推到乾隆元年，未有開於雍正年間之記載。

烏溪流域下游北岸，有萬斗六溪圳，《彰化縣志》記云：「在猫羅保萬斗六埔。水源詳見山川，業戶吳伯榮築。灌田千餘甲。」[37]又山川中萬斗六溪條云：「發源於內山，逕火燄（山名），合大肚，入於海。」[38]而記大肚溪云：「源出南北投，南會猫羅，北收猫霧捒諸水，會於雙溪口。又西至掃箒尾，入於海。」[39]可知萬斗六溪即指今烏溪橋以上之烏溪。再查同書〈田賦志〉，乾隆三十二年條云：「吳伯榮即吳洛，墳墾溪心壩、阿密里、吳厝庄入額下則田園共一十一頃六十六畝九分九厘，共徵粟一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二合六勺。內下則田八頃一十九畝三分九厘，徵粟一百三石九斗八升八合六勺；下則園三頃四十七畝六分，徵粟五十四石二斗四升四合。」[40]此後又見乾隆三十七年吳伯榮在猫霧保續墾陞科下則田四頃三十七畝三厘，乾隆四十三年吳伯榮呈報續墾阿密里、溪心壩等庄入額起科下則園六頃一十四畝九分八厘八毫，乾隆四十六年吳伯榮續墾德典庄入額起科下則園六頃七十三畝五分三厘。[41]再查同書人物志吳洛傳云：「字懷書，泉州普江人。居邑治東門街。乾隆庚午歲貢。……迨親喪後，洛遊台，御史高公客諸幕。及高公秩滿回朝，適彰化初設縣治，洛留彰墾闢田園，置產成家。」[42]自此傳，知他來台時間曾任「御史高公」的幕僚。經查巡台御史只一人姓高，即高山，來台時間是雍正八年，留二年。[43]所以知道雍正十年以前吳洛已來台，乾隆年間在中部地區開墾，而開墾有成是在乾隆三十年到四十年間。開墾地點在烏溪下游北岸之

[36]契約原件在霧峰郭雙富先生收藏。
[37]周璽，《彰化縣志》，卷 2，〈規制志〉，頁 56。
[38]周璽，《彰化縣志》，卷 1，〈封域志〉，頁 15。
[39]同註 31。
[40]周璽，《彰化縣志》，卷 6，〈田賦志〉，頁 167。
[41]周璽，《彰化縣志》，卷 6，〈田賦志〉，頁 168。
[42]周璽，《彰化縣志》，卷 1，〈人物志〉，頁 242-243。
[43]鄭喜夫，《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八職官志第一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頁 13。

溪心壩、阿密里、吳厝庄、猫羅保、德興庄等地。而萬斗六圳溪即吳洛所開鑿，自當開鑿於此時。過去都說萬斗六圳溪創設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44]不知何據？

另外太平地方最早的水圳名頭汴坑圳，其開鑿時間有乾隆五年及乾隆十五年兩說。從開發史看，開鑿於乾隆十五年的可能性較高。一是乾隆三年才決定在登台，新庄（在今霧峰鄉）設立義勝，永勝二寨，各安鄉勇三十名；在柳樹湳莊口建營盤，安兵一百名，已見前述。霧峰、太平地區應始漸有入墾者。另一據研究，大橫屏山山腳的黃竹坑即開墾於乾隆二十年代。在乾隆二十二年，台灣道德文會同台灣總兵馬龍圖的報告中，說彰化現有十三處私開禁地，其中即有，東勢山腳庄及黃竹坑。前者在今台中市東邊與太平市沿山一帶，後者在今太平市東南山區。[45]

烏溪中游及上游地區，自上節知中游的國姓以山高谷深，泰雅族出沒，開發較晚；上流的魚池、埔里開發相對較早。水圳之開築也是國姓晚而魚池、埔里早。

埔里最早的水圳是南烘圳，開鑿於道光六年（1826），開鑿人是「北投蕃羅打朗等」。[46]光緒十四年三月台灣知府程起鶚給埔里社通判的移文有云：「道光年間，有土番在溪底堆石做埤，開一小圳，俗呼南烘圳。因該埤地勢窪下，圳道不長，灌溉南隅田百餘甲。」[47]又據日人在昭和九年的調查，在道光年間開鑿的尚有珠子山圳、茄苳腳圳，在咸豐年間開鑿的有大媽鄰圳、烏牛欄溪圳、北烘圳、守城份圳、東螺圳等。[48]可見平埔族入墾埔里後，水圳之開發甚爲普遍。在十九條水圳中，九條由原住民所修築。見附件一。

魚池方面土地之開墾雖可追溯到道光年間，但到日人調查才有王豐瑞圳灌溉大林庄、長簝庄及猫囒庄水圳灌溉猫囒庄之記錄。日人並指出猫囒庄圳係陳坑子陳化成所開設。王豐瑞圳則係吳進興、王豐瑞等開鑿。[49]據劉枝萬之王增榮、陳坑傳，云：「道光四年，王、陳二人遂爲墾首，……遂招致漳人入墾。迨道光二十九年，由水社化番承墾五城堡一帶荒埔草地，王分東部，陳割西部，約以歲繳

---

[44]有稱為阿罩霧圳，創設於乾隆 23 年（1756），見李連鎮，《南投農田水利會會誌》（南投：南投農田水利會會誌編輯委員會，民國 85 年），頁 35；趙雅書，《台中縣志．卷四經濟志．水利》（豐原：台中縣政府，民國 78 年），頁 174。

[4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3 全宗，165 目錄，7944 卷，34 號；另編號：軍機處錄副，民族類，634 號。轉引自柯志明，《番頭家》（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民國 90 年），頁 171 及頁 382 附錄二；楊護源，〈清代台中地區的聚落拓殖〉（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4 年 11 月），頁 218。

[46]《台灣土地慣行一斑》，第貳編，頁 557。

[47]《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報告台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明治 44 年），頁 161-162。

[48]《各圳灌溉面積關係綴》毛筆原件，昭和 9 年 5 月，南投農田水利會藏。

[49]《台灣土地慣行一斑》，第貳編，頁 555。

番口糧，大事墾殖，而促進地方之開發。」[50]再據光緒十二年三月王豐瑞立給分墾字有云：「有承租父向六社化番給出中落埔一帶草地。」[51]可以推知王豐瑞即王增榮之孫。而且在本契中已有雙冬水田二分，單冬田三分餘，可知本契之前已有水圳之開築。

國姓方面，連橫《台灣史》〈農業志〉記光緒十七年（1891）林朝棟引北港溪水灌國姓庄，稱內國姓圳爲最早。[52]其他各圳如南圳、國姓圳、大石股圳、福龜圳、茅埔圳、南港圳、鱸鰻洞圳、豐泉圳，南投農田水利會國姓工作站均作開鑿於民前十七年，[53]即 1895 年（明治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年，台灣割日前一年）。據前敘南港溪線之開發，是黃敦仁倡設埔里社開源會社之後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取得南港溪線之開墾許可，方才開始，則水利之修築，自當在此年之後。可知國姓工作站之說爲不正確。

肆、移墾與水圳修築的關係

茲將前二節所論述之移墾與水圳修築，各取其最早之年代史實，列成一表，以見二者之關係。

表一、移墾與水圳修築關係表

地點	移墾	水利修築
下游南岸	簡經於雍正七年（1729）	乾隆二年（1737）北投社開舊圳，灌田四十餘甲 乾隆八年（1743）北投社委漢人開險圳，灌田一千四百餘甲
下游北岸	乾隆初年	乾隆十五年（1750）頭汴坑圳 乾隆中葉萬斗六溪圳，灌田千餘甲
中游	龜仔頭道光末 北港溪流域光緒十三年 南港溪流域明治四十年以後	光緒十七年（1891）內國姓圳
上流	魚池　道光初 埔里　道光初	道光六年（1826）南烘圳，灌田百餘甲

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到移墾在先，水圳修築在後，時間有若干差距。有些情形則似乎是同時進行。烏溪流域下游南岸差距是七年，下游北岸約在十餘年，上游以北港溪線看只有四年，魚池道光初開墾，但水圳之開鑿不詳，無法討論，埔里

[50]劉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民國 51 年），頁 8-9。
[51]《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頁 132-133。
[52]連橫，《台灣通史》（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民國 88 年），卷 27，〈農業志〉，頁 517。
[53]見蔡介祐，〈南投農田水利會國姓工作站 93 年度業務簡報〉，民國 94 年 3 月。

則西部平埔族於道光三年入墾，六年開南烘圳，時差只三年。從草屯、北港溪線、埔里之時差少者三年，多也只七年，可以說明移墾者之土地開發與水圳修築幾乎同時進行。但規模大的險圳，時差便大，而且也有支付工資的波折。[54]

台灣農業史上，有米糖相剋之說，日治時尤爲嚴重，但農民之種蔗種稻，其抉擇主要在價格和水圳設施，而價格尤關緊要。康熙中葉高拱乾在〈禁飭插蔗并力種田示〉已說到：「偶見上年糖價稍長，惟利是趨。舊歲種蔗，已三倍於往昔；今歲種蔗，竟十倍於舊年。」[55]但在清代，人民可以自主，還以種稻爲主，以種稻之經濟收益較高，尤其濁水溪以北，北部氣候不宜種蔗。所以日治時期中部成爲米糖相剋最明顯的地區。[56]

純自經濟角色看，埤圳修築最直接影響是稻作普及，稻米產量增加，養活更多人口，米輸出也增加，與中國貿易更頻繁；耕作方式由粗放而集約，土地價值提高，生產單位由社群降爲家庭；集約耕作，又使耕作者釋出多餘耕地，大佃戶變成小租戶，產生新興小地主階層，租稅由官府—墾首—佃戶三級制變成官府—大租戶—小租戶—現耕佃人四級制。[57]這些影響在烏溪下游南北兩岸最爲顯著，尤其北岸出現霧峰林家，自林文察到林朝棟，由於努力經營加上官紳的威勢，土地大量而迅速的集中。據研究，日治前後林家有土地二千餘甲。[58]相對的南岸的草屯最富有的李春盛家只有水旱田園五十餘甲。[59]烏溪下游地區因爲平原廣闊，水利發達，經濟蓬勃。北岸土地集中於霧峰林家，林家代有人才，下厝林文察、林朝棟、頂厝林文欽、林獻堂在文武兩途中最知名；草屯地區也人才濟濟，在清代便是南投縣境人才最多的地方。[60]此一論點，容當另文討論。

伍、結論

烏溪流域的移墾，大勢是由西到東，先下游，再入山東進，但跳過中游的國姓，先到上游的埔里，再回頭到國姓。原因是埔里可耕地有一萬餘甲，令人垂涎。國姓則山高谷深，又有泰雅族游獵。可見地形，可耕地，族群都影響開發。

---

[54]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的水利〉，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台中：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04 年 5 月），第 8 期，頁 149-181。

[55]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9 年），頁 250-251。

[56]根岸勉治，〈日據時代台灣之農產企業與米糖相剋關係〉，載周憲文，《台灣經濟史七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8 年），頁 53-76。

[57]廖風德，〈清代台灣農村埤圳制度〉，載廖風德，《台灣史探索》（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85 年），頁 37-101。

[58]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台北：自立晚報社，民國 81 年），頁 52-77。

[59]陳哲三，〈從鬮書看清代草屯的社會經濟〉，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9 期（2004 年 12 月），頁 6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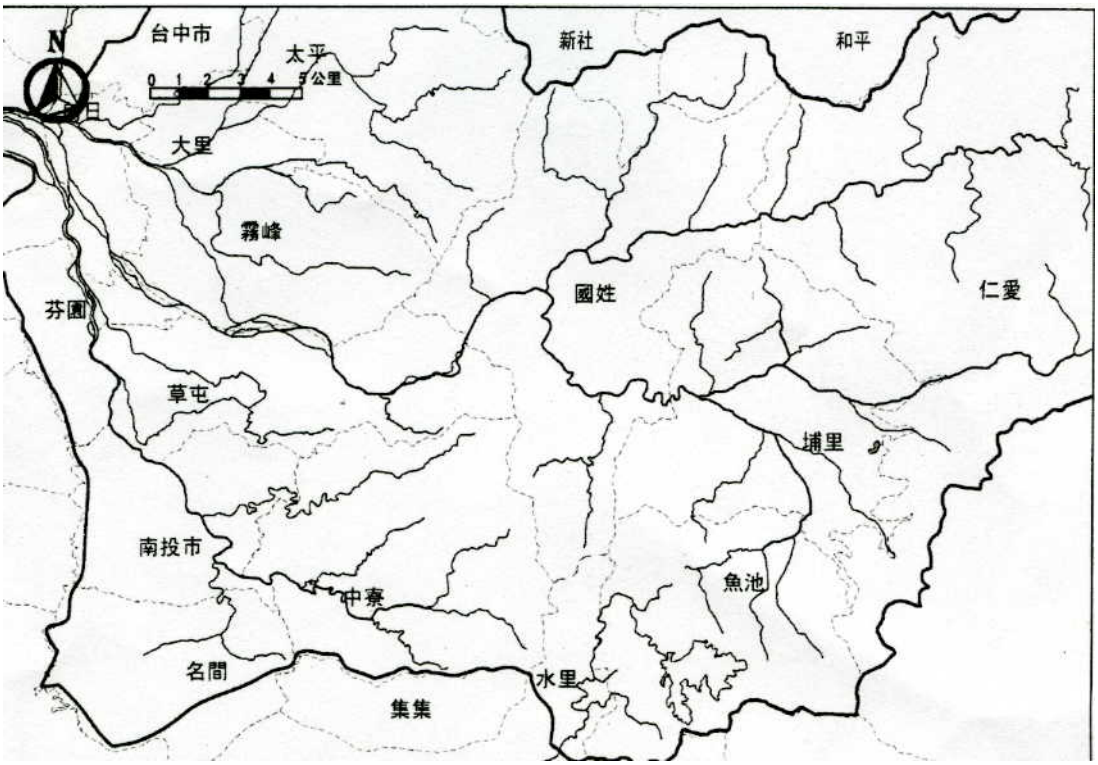
[60]陳哲三，〈清代南投縣人物及其相關問題〉，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61-183。

烏溪流域之水圳開鑿，有文獻足徵者，都是在土地開發之時同時進行，在草屯、北港溪、埔里最爲顯著，土地開發與水圳修築之差距都在十年以內。從而可知水稻種植在當時最具經濟效益，成爲墾民追求之最大目標。所以在土地開墾之後儘可能水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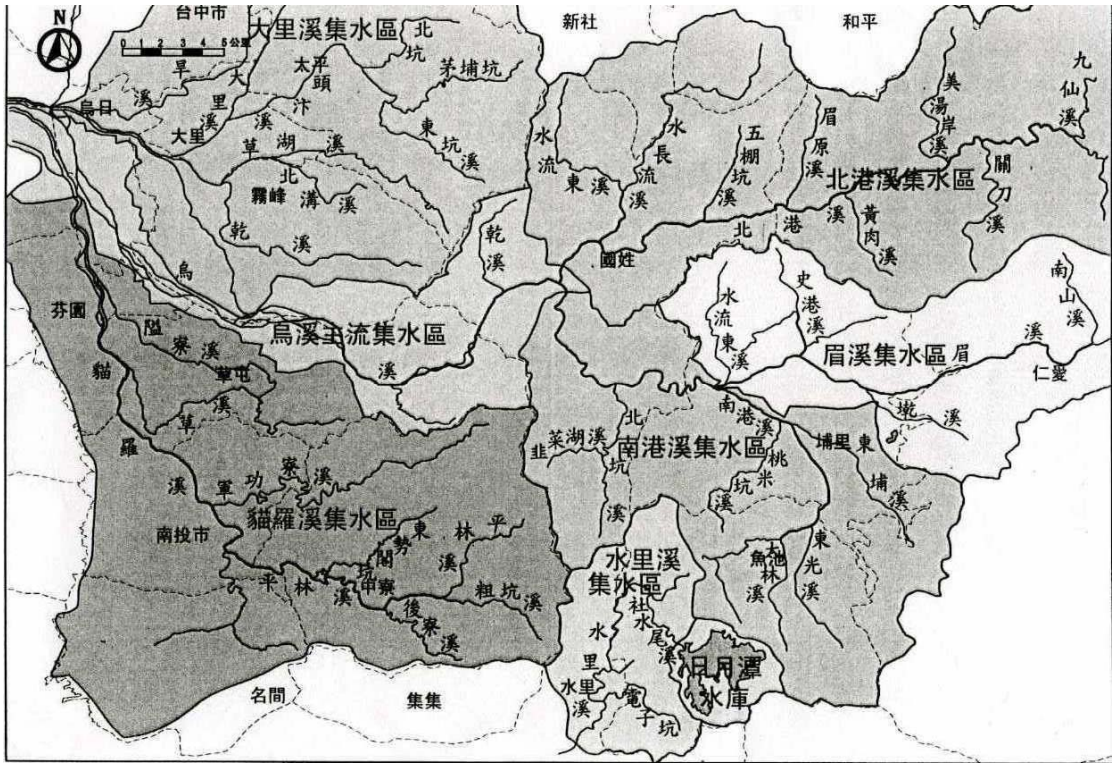
水圳規模有大有小，草屯險圳及霧峰萬斗六溪圳都可灌溉千餘甲，埔里南烘圳可灌百餘甲，草屯舊圳則只有四十餘甲，草屯半壁泉只能灌田十餘甲。可知自烏溪主流取水的，如險圳、萬斗六溪圳，水源充沛，可灌溉面積廣大；自支流取水的，水量小，灌溉面積小；自泉水取水，灌溉面積更小。但規模小，易修築，完成較早；規模大，難開鑿，完成較晚。

水圳的開鑿者，舊圳是北投社，南烘圳是移入埔里的北投社原住民，險圳是北投社委托漢人吳連倘，萬斗六溪圳是泉人吳洛。可知不論漢番都有能力修水圳，但大型水圳如險圳、萬斗六溪圳都由漢人修築，可能的原因是財力人力的問題，漢移民才有足夠的財力與人力，技術問題當然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自昭和年間的調查，埔里十九條水圳中有九條由原住民所修築，五條不明，則是十四條知道開鑿人中，原住民占九條，占百分之六十四強。可見平埔族將在西部學得的開圳技術帶入埔里，普遍運用，很快的使埔里水田化。以北投社雍正七年與移民接觸，到道光六年，計九十七年。也就是一百年平埔族已學會移民的農業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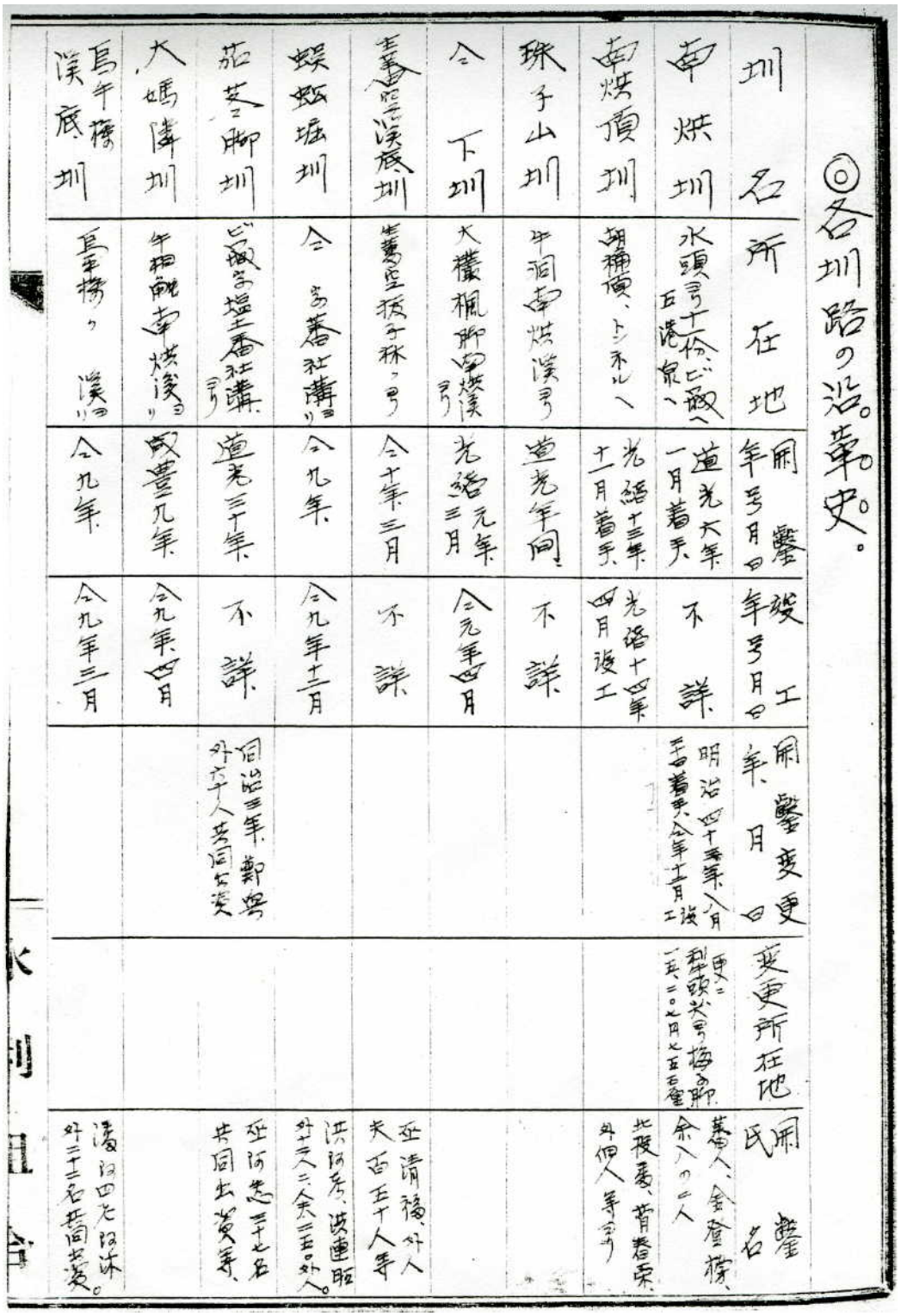
烏溪下游南北兩岸清代以來呈現明顯不同的人文景象，草屯地區幾乎是南投縣人文最活躍地區，也是人才最眾多地區，但北岸的霧峰、大平、烏日，似乎只有霧峰林家最突出。可能原因是北岸林家是大地主，林家以外大都是林家的佃農；南岸不同，大多數人是自耕農，都直接向北投社賸耕土地，只納每甲八石的大租，所以經濟力比較好，可以有餘力把人從勞動中解放出來。源流的埔里平原面積大，水圳密布，經濟情形也很好，比魚池、國姓更好。至於南投市、因爲可耕地，尤其水田面積較小，經濟力不如草屯；中寮在山區，可耕地更小，水田面積只有少數谷地，經濟能力更落後，人文發展也遲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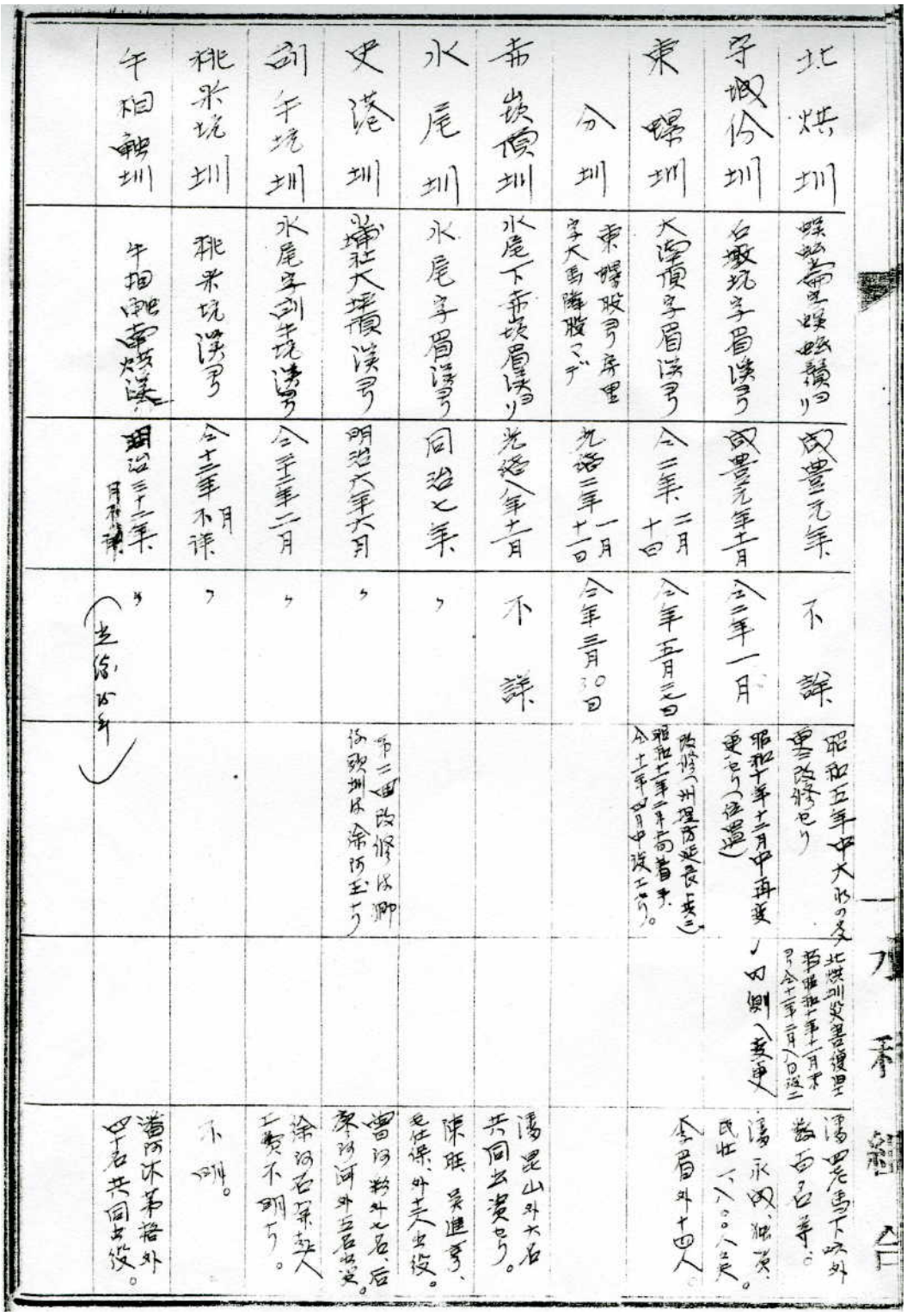
附圖一　烏溪流域圖


台中市
大里溪集水區
北坑
茅埔坑
太平頭
新社
和平
九仙溪
烏日
大里溪
草湖溪
霧峰北溝溪
東坑溪
水流東溪
水長流溪
五棚坑溪
眉原溪
美湳岸溪
北港溪集水區
關刀溪
黃肉溪
乾溪
烏溪主流集水區
國姓
水流東溪
史港溪
南山溪
眉溪集水區
仁愛
芬園
貓羅溪集水區
南投市
南港溪集水區
埔里
水里溪集水區
日月潭水庫
名間
集集

附圖二　烏溪水系分佈圖



附件一　《各圳灌溉面積關係綴》內之〈各圳路の沿革史〉　毛筆原件藏南投農田水利會



北烘圳	螺螄溪北岸ヨリ引水	咸豐元年	不詳	昭和五年中大改修ノ際廢止セラル				
孚敏伶圳	名數坑字眉溪ヲ	咸豐元年十月	今二年一月	昭和十年十二月中再要ノ如ク變更セラル				
東螺圳	大湳頂字眉溪ヲ	今二年二月十四	今年五月三日	改修ノ際現在ノ延長トナス。昭和十二年二月中改修セラル。				
分圳	東螺股ヲ亦里字大馬隆股ニテ	光緒三年一月十日	今年三月一〇日					
番挖圳	水尾下番挖眉溪ヨリ	光緒八年十月	不詳					
水尾圳	水尾字眉溪ヲ	同治七年	〃					
史落圳	埔社大壢頂溪ヲ	明治六年六月	〃	第二回改修ノ際廢止ス				
劍弁坑圳	水尾字劍弁坑溪ヲ	今二年一月	〃					
桃米坑圳	桃米坑溪ヲ	今二年不詳	〃					
牛相觸圳	牛相觸東勢溪	明治三十二年	〃					

（出給ノ外）

昭和五年中大改修ノ際廢止セラル

昭和十年十二月中再要ノ如ク變更セラル（延長）

昭和十二年二月中改修ニ付廢止

北烘圳受益區域ニ包含セラル

湯里老馬下吹外數百名ノ華。

湯永興、湖美、民壯一八。八名ノ外。

湯里山外十四人。

湯里山外六名共同出資ス。

陳旺、吳連芳、包仕保、外十人出役。

當汛務外之名、后衆汛河外五名出役。

除汛名保甲人工費不詳。

不詳。

當汛水弟招外四十名共同出役。

參考書目

〈黃家勝元堂八十三年紀事曆稿〉，埔里愛蘭黃家油印本。
《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七》，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7 年。
《各圳灌溉面積關係綴》毛筆原件，昭和 9 年 5 月，南投農田水利會藏。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七輯》，台北：故宮博物院，民國 71 年。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2 年。
《清高宗實錄選輯》，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3 年。
《清會典台灣事例》，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二二六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5 年。
《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0 年。
《集集古誌》日文手抄本，未出版。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報告台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明治 44 年。
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國 88 年。
王世慶，《清代台灣社會經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83 年。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編續第三台灣》，東京：富山房，明治 42 年。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台南市政府，民國 92 年。
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1 年。
李連鎮，《南投農田水利會會誌》，南投：南投農田水利會會誌編輯委員會，民國 85 年。
周　璽，《彰化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0 年。
林美容，《草屯鎮鄉土社會史資料》，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0 年。
姚　瑩，《東槎紀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所室，民國 86 年。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民國 90 年。
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73 年。
根岸勉治，〈日據時代台灣之農業企業與米糖相剋關係〉，載周憲文，《台灣經濟史七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8 年。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9 年。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古文書。
張光直編，《台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66 年。
曹士桂，《宦海日記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奏摺錄副〉，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連　橫，《台灣通史》，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民國 44 年。郭雙富先生藏古文書。

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的地價及其相關問題〉，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台中：逢甲人文社會學院，2003 年 11 月，第 7 期，頁 89-116。

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的水利〉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台中：逢甲人文社會學院，2004 年 5 月，第 8 期，頁 149-181。

陳哲三，〈從鬮書看清代草屯的社會經濟〉，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台中：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4 年 12 月，第 9 期，頁 61-89。

陳哲三，〈清代南投縣人物及其相關問題〉，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台中：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5 年 12 月，第 11 期，頁 161-183。

黃玉振、莊士杰，《化番六社志》，載《南度文獻叢輯（二）》，南投：南投文獻委員會，民國 44 年。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台北：自立晚報社，民國 81 年，頁 52-77。

楊護源，〈清代台中地區的聚落拓殖〉，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4 年 11 月。

廖風德，《台灣史探索》，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85 年。

劉枝萬，《台灣中部碑文集成》，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0 年。

劉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民國 51 年。

蔡介祐，〈南投農田水利會國姓工作站九十三年度業務簡報〉，民國 93 年 3 月。

鄭喜夫，《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八職官志第一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慣行一斑》，第貳篇，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38 年。

藍鼎元，《東征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7 年。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205-223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Reclaiming Ac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s in the Wu-Xi Drainage Basin in Taiwan in the Ching Dynasty

Che-San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the reclaiming ac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s in the Wu-Xi Drainage Basin.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onset of the reclamation took place in the downstream basin of Wu-Xi, and later in the basins of its upstream. The mid-stream basin of Wu-Xi was the last developed area. The acreage of the arable land determined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s approximately concurred with the reclaiming activity, so pioneers could turn the wild into rice paddies, which produced the most profits than other sorts of cultiva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Pingpu people construct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s in the Wu-Xi Basin, especially those in Puli. The fact proves that they have proficiently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Han people's agricultural sty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veral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 materials, which enables corrections to be made for the mistaken cognitions in the past.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lics, Feng Chia University.

Keywords: Wu-Xi Drainage Basin, Reclamation, Irrigation Systems, the Pingpu people.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225-265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之政經分析

李文志[*]　蕭文軒[**]

摘　要

泰國的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可說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而帶動經濟高速成長、從而促進充分就業、提高國民收入、改造整體國民經濟結構、逐步建立經濟均衡發展的社會經濟結構則是泰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目標。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泰國政府受到傳統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影響，乃採取優先發展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導致產業部門及空間經濟的不均衡發展。1980 年中期以來，有鑑於印支半島的社會主義國家為朝向市場經濟轉型，而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作為印支半島的核心國家，泰國認為必須強化其與鄰國間的經濟關連以調和國內的區域發展，透過偏遠地區的工業區、邊境經濟特區的設置，再結合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的推展，以達到國內、外相互帶動發展的最佳效果。同時，也可以緩和偏遠地區因過去經濟資源不足而導致貧窮所引發的諸多不滿。更重要的是，透過次區域經濟計畫的推展，泰國將可充分發揮其在地緣戰略構圖上的中介角色。

關鍵詞：泰銖經濟圈、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黃金四角、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壹、前言

1980 年代末期以來，隨著冷戰的終結，美、蘇勢力逐步撤出印支半島，導致冷戰時代美、蘇在印支半島所構築的扈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及同盟關係也隨之鬆動。蘇聯的解體意謂蘇聯式的社會主義（Soviet-type socialism）發展模式已宣告失敗，印支半島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無法再依賴其提供經濟援助，不得不積極地謀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並追隨中國模式的改革開放策略，以致力提升其出口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同時，延宕已久的柬埔寨問題亦因聯合國的積極介入，出現和平的曙光。此外，國際間也因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功能的漸趨衰落，導致保護主義的再度崛起，美國經濟霸權地位乃相對式微。日本、歐市等經濟強權的興起，使得區域性的經濟整合成爲 1990 年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在東亞地區，因其獨特的「雁飛型」（flying geese pattern）經濟發展模式，加上地理環境相似且經濟結構深具互補性，次區域經濟區[1]（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 SREZs）的發展模式乃日漸興起。

乘此之勢，泰國總理察猜（Chatichai Choonhavan）提出「察猜主義」（Chatichai Doctrine）的經貿外交政策，並於 1988 年喊出「變印支戰場爲市場」（turning the Indochina battlefield into a trading market）的「印支倡議」（Indochina Initiative），

[1] 所謂「次區域」（subregion）是指區域（the region）的一部份，其所界定之範圍乃是相對性的概念。例如，相對於亞太區域，則東南亞地區是一個次區域；相對於東南亞地區，則印支半島就是一個次區域。從地理範圍來看，本文所指涉的次區域經濟區涵蓋的範圍乃是以泰國為中心及其所毗鄰之印支半島、中國雲南省、南亞大陸等。另外，關於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名稱相當的多，包括：次區域經濟區（SREZs）、次區域自由貿易區（Subregional Free Trade Areas, SRFTA）、次區域成長區（Subregional Growth Zones, SGZs）、次區域主義（Sub-regionalism）、自然經濟區域（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 NETs）、跨國經濟區（Transnational Economic Zone）、跨國成長區（Cross-National Growth Zones）及成長三角（Growth Triangle, GT）等；而其定義則為涵蓋至少兩個、或三個以上，地理條件近似而經濟情況迥異的開放經濟區。它們擁有共同的國家界線，可跨越邊界進行投資或其它經濟貿易活動與人員移動，進而形成的次區域經濟網絡。其中，這種經濟網絡關係乃是透過利用成員國間的生產要素稟賦的不同來促進外向型的貿易和投資。近年來，隨著跨區域經濟合作盛行，因此學術界也出現「微區域主義」（micro-regionalism）的相關討論，而進一步將區域主義、次區域主義及微區域主義做出更明確的定義，其認為後兩者的差別在於次區域主義是一種裂解式的地緣概念，如拉美、東北亞等，而其主要推動者為中小型國家；而微區域主義則是一種次國家地緣概念，如成長三角，而其主要推動者則為地方政府。若根據前述定義，本文所指涉之範圍則明顯應涵蓋次區域主義與微區域主義兩個層次。不過，本文並非以理論探討為主要目的，所以，並未嚴格區分次區域及微區域間的差異。關於次區域及微區域的相關討論，請參閱 Lee Tsa Yuan,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in the Asia-Pacific: An Overview,” in Toh Mun Heng and Linda Low, （ed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rowth Triangles in ASEA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3）; Katsuhiro Sasuga, Microregionalism and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蔡東杰，〈多層次整合與東南亞區域發展〉，發表於《2005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5 年 4 月 28-29 日。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

企圖建立「泰銖經濟圈」（Baht economic zone），使泰國成爲印支半島的區域金融中心，甚至是成爲東南亞的經濟強權。[2]1991 年後，印支半島的局勢隨著巴黎「柬埔寨和平協定」(Paris Peace Accord)的簽署而更趨緩和，泰國川立沛(Chuan Leekpai）內閣遂於 1993 年提出一項範圍涵蓋泰北、緬東、寮西、中國雲南等地的「黃金四角」（Golden Growth Quadrangle, GQ）開發計畫，希望藉此開發計畫取得印支半島與中國西南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可以說，從察猜政府所強調的「政治是政治，貿易是貿易，兩者不能混爲一談；任何人都應該可以與其想要的對象進行貿易」[3]到川立沛政府所主張的「泰國是印支的金融門戶，並扮演印支半島與世界之間的橋樑角色」[4]，泰國印支政策的基本主軸已明確地從安全考量轉向貿易及投資。故而，強化與印支各國的經貿關係就成爲後冷戰時代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軸之一。

然而，1997 年後，泰國政府爲有效地因應自後冷戰時代以來之國際政經環境的快速轉變，以利其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競爭中，謀求經濟成長與財富的持續，除對內持續進行體系改革，對外則將次區域經濟合作的範圍擴展至南亞大陸。申言之，泰國政府除延續 1990 年代前期所採取的「面向印支」策略之外，更提出一項結合三個目標（即增加貿易、投資、調和源自次區域天然資源及稟賦的相互利益）的「西進政策」（Look West Policy），一方面強化與南亞、中東及非洲等地區之既存的經濟合作關係，另方面，則企圖透過建立及參與區域內的經濟合作架構，如「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Bangladesh, India, Myanmar, Sri Lanka, Thail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環印度洋經濟合作協會」（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OR-ARC）等，來尋求海外的潛在市場與投資機會，並且提升外資流入泰國的誘因，以達到創造經濟與社會繁榮的目標。

進入 21 世紀之後，儘管金融危機所造成的衝擊有所緩和，但泰國的經濟發展仍舊面臨因經濟發展不均衡所造成的農村貧困問題、金融部門體質不健全所造成的鉅額呆帳，以及經濟不景氣所導致的外資流入減少等困境。不過，這些經濟困境反而成爲他信（Thaksin Shinawatra）贏得 2001 年大選的最有利條件。他信政府執政後，爲改善經濟復甦進程緩慢的窘境，乃修改以往依賴無限擴張的出口以換取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戰略，轉而採取強調國內及區域連結進而邁向全球（Local/Regional Link--Global Reach）的雙軌經濟政策（Dual-Track Economic Policy）；同時，爲因應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他信政府也在各種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框架內，積極推動與周邊國家及地區友好的睦鄰外交政策。毫無疑問，就當

---

[2] Paisal Sricharatchanya, “The Golden Lan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43, No.8（February 23, 1989）, p.11.

[3] Bangkok Post（Thailand）, 9 September ,1988.

[4] Business Times（Singapore）, 15 April ,1993.

前國際形勢來看，隨著世界經濟區域主義的蓬勃發展，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將是泰國在壯大經濟實力時的重要途徑之一。

歷史上，泰國曾是印支半島的權力中心；1980 年代末期，泰國在經歷二十餘年的經濟繁榮發展與政治地位的提昇之後，重構「黃金半島」（Suwannaphume or golden peninsula）的意圖乃油然而生。爲能再次成爲印支半島的經濟中心，甚至成爲政治核心，推動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就成爲泰國達成上述目的之最佳途徑。然而，冷戰時代的地緣政治緊張雖已趨於舒緩，但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以資源競爭爲基礎的新衝突將逐漸升高。[5]換言之，以往在冷戰時代被政治軍事因素強行分割的自然地理區域，雖然隨著各國間敵對關係的祛除，而得以在地緣接近與類似的自然條件下，形成特定的經濟發展區域；但是，多數國家乃是在「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的基礎上進行區域經濟結盟，企圖在既有「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中，擴增「地緣經濟」的利益安排。[6]這使得次區域經濟合作呈現既合作又競爭的複雜關係；因此，如何透過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來汲取自身的利益，並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整合政治權力邏輯（極大化資源的取得）及經濟理性邏輯（極佳化資源的配置），就成爲後冷戰時代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時的最大挑戰。

承上，本文認爲要正確釐清泰國的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除須考量地理相對位置所隱含的利害關係—印支半島是亞洲的「巴爾幹」外，更要注意被經濟利益的鬥爭（即透過強而有力的市場經濟對其衰弱鄰國進行擴張與滲透）所掩蓋的政治與戰略本質。故而，本文將透過整合地緣特質和政治經濟學意涵的途徑，來分析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時的戰略佈局、機會及其所面臨的挑戰。

貳、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因

泰國的次區域經濟戰略可說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而帶動經濟高速成長、從而促進充分就業、提高國民收入、改造整體國民經濟結構、逐步建立經濟均衡發展的社會經濟結構則是泰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目標。二次大戰結束後，泰國政府受到傳統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影響，採取優先發展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歷經經濟恢復與經濟過渡時期（1945-1954）及發展進口替代時期（1954-1971）的經濟和工業穩定發展與成長之後，進口替代工業的發展很快就受到國內市場飽和的侷限。從 1968 年起，泰國的國際收支乃趨向惡化。同時期，因美國陸續自越南撤軍，美軍關閉在泰國的軍事基地，結束泰國依賴軍援來發展

---

[5] Philip Hirsch, “Competi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Toward a New Framework for Security,” in Bob Stensholt（ed.）, Development Dilemmas in the Mekong Subregion（Australia: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6）, p.60.

[6]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企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2。

經濟的歷史。一時之間，泰國因失去越戰期間作爲「前線國家」所享有的鉅額低息貸款，而導致外匯收入與開發援助資金急遽下降；而兩次石油危機更導致泰國面臨貿易赤字上漲、經濟下滑的壓力。[7]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過後，以出產農產品爲主的泰國西部地區適逢行情下跌而損失產重，爲獲得世界銀行的貸款，泰國政府乃採取調整經濟結構，轉以強調出口導向製造業爲基礎的經濟成長策略來取代進口替代導向的發展策略。爾後，泰國的經濟發展就進入高速發展的時期。1980 年代中期以來，泰國更因其經濟迅速成長以及國內政治趨於穩定，儼然成爲東亞第五條小龍。相較於其他的陸地東南亞國家，泰國的東亞新興經濟體化（NICness）使其在物質、組織、貸窮管理等方面均優於其周邊鄰國，進而成爲印支半島的次區域經濟核心，而這也成爲泰國總理察猜提出次區域經濟統一，以互利共榮帶來和平願景的政策推動基礎。[8]

1980 年代末期以來，泰國強調以面向出口作爲單一目標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開始遭遇挑戰。之前，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爲促進工業產品的出口而制訂；但隨著國際貿易體制因 GATT 談判結束而導致保護主義的興起，加上世界經濟集團化的趨勢日漸明顯，而泰國的國內經濟發展又面臨基礎設施不足、金融法令不健全、人力資源低落、地區發展不均衡等因素，而逐漸喪失競爭優勢。爲因應國際及國內經濟環境的轉變，泰國勢必要調整其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爲此，泰國政府乃實施了範圍涵蓋金融、稅制、外資政策及產業政策的綜合性經濟改革措施。

然而，在泰國採取面向出口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後，雖然有效地促進經濟高速成長，但也造成國民經濟嚴重依賴對外貿易，而外貿又嚴重依賴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隨著面向出口的工業發展，材料、中間產品、生產設備的進口額迅速成長，而初級產品及其加工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工業製品的出口成長又趕不上進口的成長，促使國際收支狀況惡化加劇。[9]此外，泰國因長期將資源集中投注於曼谷地區，乃產生工業佈局過度集中的不平衡現象，不僅未能充分帶動全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亦導致各地區因發展差距過大而影響社會安定，進而成爲

---

[7] 據統計，在 1950 年至 1970 年間，泰國接受美國經濟與軍事援助的金額達到 11 億 3 千萬美元。此外，美國軍事人員的駐進也帶來了很高的支出水平與服務部門的擴張，以及鄰近軍事基地之城市中心的成長，特別是在泰國東北部，因美軍及美援的進駐，帶來道路、電力及灌溉等各項基礎設施的建立，以及教育水平與醫療體系的提升，乃有效降低共黨勢力在偏遠地區發動叛亂的機會。因此，美國軍事援助的撤出不僅帶來經濟層面的衝擊，也導致泰國偏遠地區的叛亂叢生而危害國家安全，乃迫使泰國升高其國防預算，在預算排擠效應的作用下，運用在經濟發展與管理的預算就相對地減少。Cris Dixon, The Thai Economy: Uneve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London: Routledge, 1999）, pp.83-98.

[8] Donald E. Weatherbee, “Thailand in 1989: Democracy Ascendant in the Golden Peninsula,”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17（1990）, pp.337-350.

[9] 吳志生主編，《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76。

政治不穩定的主要根源之一。[10]在此情形下，經濟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發展乃成爲泰國政府在制訂社會經濟發展政策時的基本主軸。

自第四期五年國家發展計畫（1977-1981）開始，泰國政府就依據「區域城市中心」（regional urban center）的概念，指定主要城市作爲「區域城市成長中心」（regional urban growth centers）。之後，爲開發偏遠和落後地區，泰國政府在第五期五年國家發展計畫（1982-1986）中，乃制訂農村開發計畫，利用財政撥款和外國貸款來進行農村開發。期間，東海岸開發計畫（the Eastern Seaboard Development Plan）也被提出來，藉以替代曼谷大都會並與東北地區共同合作發展。在第六期五年國家發展計畫（1987-1991）中，泰國政府更進一步以散居於北部、東北部、南部等地區的城市中心（如清邁、孔敬、呵叻、宋卡、合艾、春武里等）爲對象，希望透過加強其基礎設施建設，使之成爲工業中心，達到帶動附近農村開發，促進中小型工業發展的目標（泰國各期國家發展計畫參閱表一）。[11]

另外，泰國因與緬甸、寮國、柬埔寨和馬來西亞等國享有共同邊界，而在族群及歷史上有相當緊密的關係。冷戰時代，這些國家內部因共產主義蔓延而遭受到政治與社會的動盪不安，導致難民、非法勞工、甚至非法毒品大量地流入泰國境內，所以，泰國無法不將其鄰國的經濟發展當作國土開發的延伸來加以考慮。於是，泰國乃乘印支國家轉向市場經濟的風潮，而將其國土開發計畫與跨境經濟合作的概念相結合，從中央地區開始著手其國土開發，再逐漸擴展到與鄰國緊密相連的邊陲地區（泰國國土開發結合跨境經濟合作構圖參閱圖一）。[12]

當然，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構想還需要更多共同因素的配合才得以成功，這些因素包括：[13]

首先，泰國與鄰國在資源開發的過程中享有共同利益，特別是貫穿整個次區域的湄公河，不僅是重要的運輸通道，而且蘊含高度的水力潛能；同時，湄公河流域還蘊藏大量的礦產資源，[14]例如：錫、鋅、鐵、金、鋁、鎢、鉛等，[15]以及豐富的生物資源、林業資源（特別是柚木）和旅遊資源，有待開發。

---

[10]Paul Handley, “Watering the Roo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56, No.31（August 5, 1993）, p.46.

[11]Takao Tsuneishi ,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of Thailand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IDE） Discussion Paper No.32（July 2005）,pp.4-5. <http://www.ide.go.jp/English/Publish/Dp/pdf/032_tsuneishi.pdf>；肖三華，〈泰國的地區發展戰略〉,《東南亞研究》，第 1 期（1995 年），頁 16。

[12]Takao Tsuneishi, op. cit., p.3.

[13]Osamu Yasuda and C. H. Kwan, “The Indochina Economic Zone,” in Edward K. Y. Chen and C. H. Kwan, （eds.）, Asia’s Borderless Economy: The Emergence of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7）, pp.147-148.

[14]印支半島的礦產資源豐富，湄公河上游地區被譽為「有色金屬王國」，中下游地區有「黃金半島」之稱，有色金屬和寶石馳名全球。現代更發現大量的黑色金屬和非金屬礦床，蘊藏量極為

其次，泰國與鄰國因位居印度及中國兩大亞洲文明之交接處，先是受到印度教與中國文化之薰陶，而共享文化傳統；之後，又受到自錫蘭（Ceylon）傳入的佛教與來自海洋的基督教文明的影響。[16]

再者，泰國與鄰國的經濟結構具有互補性。普遍上，印支各國均屬於低所得國家，其正從高度集中化且封閉的經濟型態轉型爲市場取向與開放的經濟型態。以泰國爲中心的區域內貿易與邊境貿易的迅速成長，將可以提供鄰國所需的資金，亦可改善鄰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運輸）的不足。

可以說，這種內、外相互帶動發展的思維就成爲後冷戰時代泰國致力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主要動力。

概括而言，自 1990 年代初期以來，泰國所積極倡議及參與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乃包括：「泰銖經濟圈」、「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The 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黃金四角」、「印—馬—泰成長三角」（Indonesia-Malaysia-Thailand Growth Triangle, IMT-GT）、「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環印度洋經濟合作協會」、「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Mekong-Ganga Cooperation, MGC）、「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The 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ACMECS）等。以下將以 1997 年泰國政府提出「西進政策」及 2003 年東南亞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爲分界點，分成「著重印支，兼顧東協」、「西進政策」及「強化印支經濟整合」等三個時期來說明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地緣佈局及進程。

豐富。請參閱馬樹洪，《東方多瑙河－瀾滄江、湄公河流域探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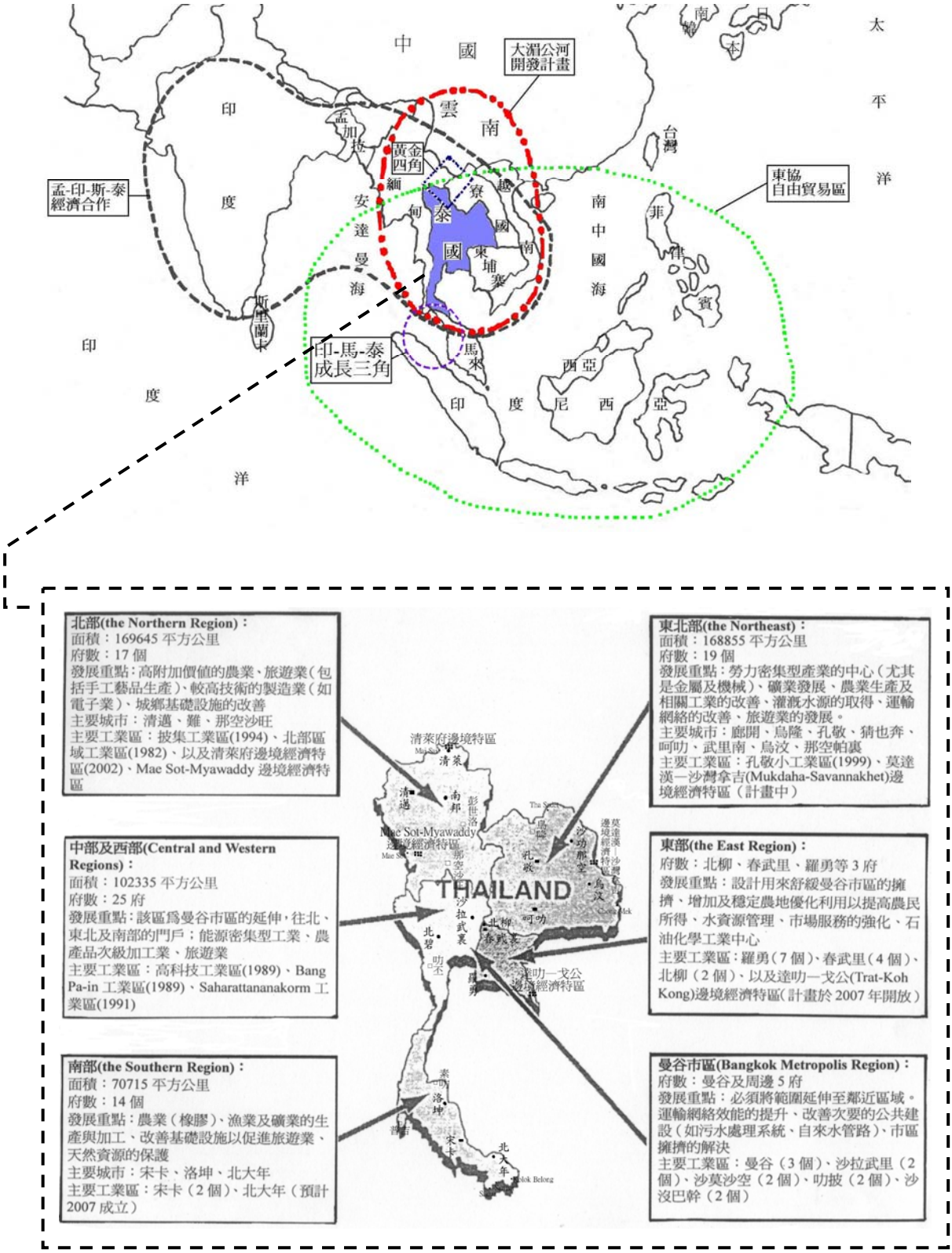
[15] 關於印度支那的礦物資源分佈詳見 E. Willard Miller, “Mineral Resources of Indo-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Vol.22, No.4（October 1946）, pp.268-279.

[16] Charles F. Keyes, The Golden Peninsula: 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1.

表一　泰國各期國家發展計畫 （1982-2006）

計畫議題 計畫期別	社經及政治條件	計畫的概念與特性
第五期 1982-86	政治較爲穩定；國際經濟因第二次石油危機而有所停滯。	該計畫聚焦於經濟穩定;國家發展計畫取向從計畫分析轉向方案設定,特別在鄉村發展與東海岸的開發上。該計畫雖屬綜合性計畫，但是一種區域與地區同級的計畫。另外，指定 6 個城市作爲區域城市成長中心。
第六期 1987-91	就國際經濟不利的條件來看，經濟局勢類似第五期計畫時期，國家面臨各種經濟與社會問題。	該計畫爲經濟與社會方面設立目標,並採用方案途徑，制訂 10 項主要計畫，強調由下而上的計畫,並著重行政體系的調整與政府的監督角色。設置五個區域成長中心並在第二階段增設 19 個次級中心。
第七期 1992-96	政治條件更爲民主，經選舉產生的代表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度提高。全球化的影響使國家轉向民主、人權與環保領域。蘇聯與社會主義解體，因政治意識型態所引發的衝突因而減緩。	該計畫強調可持續發展概念,有三項發展目標，包括經濟成長、所得分佈、及人力資源和生活與環境品質的發展。另外，強調平衡所有的目標。設置工業發展中心以承繼前期計畫所提之區域城市成長中心；同時，因提倡邊境貿易活動,而在北部與東北地區設置新經濟區。
第八期 1997-2001	經濟上面臨金融危機的重創。 該計畫處於第七期計畫轉進 21 世紀的發展時期，經濟、社會與環境等方面的發展不平衡正在持續。	該計畫藉由將人力資源發展視爲國家發展的主要目標以追求可持續發展,其強調行政管理與計畫權威當局的去集中化以允許更多數的參與。藉由設置工業區以使偏遠省分成爲區域工業中心。
第九期 2002-06	經濟局勢日益復甦，政治走向穩定民主化。 全球化浪潮蓬勃發展。	該計畫以充分經濟概念爲基礎,主張一種適度的、穩定的、持續發展的、而非一種不耐煩地尋求物質擴張的經濟政策,甚至對鄰國的經濟政策及與鄰國的合作都被認爲是必要的。該計畫持續強調各地區的均衡發展，以及彼此間的經濟關係,以達到互利共榮爲目標。藉由市場擴張，強化經濟競爭力，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參與，如 GMS。

資料來源：Offi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Thailand.轉自"Development Guidelines of the Eighth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http://www.thaiembdc.org/economic/dplan8.htm#First%20National> ； 以 及 Takao Tsuneishi ,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of Thailand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IDE） Discussion Paper No.32（July 2005）, p.4-7. <http://www.ide.go.jp/English/Publish/Dp/pdf/032_tsuneishi.pdf >



圖一　泰國國土開發結合跨境經濟合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參、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地緣佈局及進程

一、「著重印支，兼顧東協」時期

1980 年代末期，正當泰國致力於內部各區域之經濟平衡發展的同時，東協各國因亟欲落實東協成長區域的構想，企圖藉此擴大經濟競爭力，導致東協成員國不僅尋求結盟互利，同時也各自積極競爭，而形成亦敵亦友的關係。[17]泰國在面臨巨大壓力之餘，雖積極尋求與其它成員國結盟，更思擴展自己的經濟實力，以取得印支半島，甚至是東協的領導權。於是，泰國政府制訂出「著重印支，兼顧東協」的經濟發展戰略，希望利用泰國的工業及投資能量，帶動印支諸國的經濟發展，促進該地區的共同繁榮，而將印支諸國納入泰國的輻射範圍內和市場體系中，最終使泰國成爲印支半島，甚至是東南亞的區域金融、經貿和旅遊中心，以實現本地資本市場的國際化。[18]

爲達此長期戰略目標，在第七期五年國家發展計畫（1992-1996）中，泰國政府一方面鼓勵投資者開發東北部偏遠省份，並指定 9 個省分作爲「工業發展中心」以接續「區域城市成長中心」的概念。爲鼓勵工業化以促進經濟成長，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The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BOI）乃於 1993 年宣布促進投資的新政策及標準，將全國劃分成 3 個投資優惠區，包括：第一區（首都區）是大曼谷地區；第二區即東部濱海地區（Eastern Seaboard Region）是包括鄰近首都的四個府；第三區則包括其餘 58 個遠離曼谷的府省。位於這 3 個地區的優惠產業則可享受的優惠政策，主要是減免賦稅和關稅，及減少基礎設施的投資費用。其中，除北碧府（Kanchanaburi）外，其餘泰國邊境省分都位屬第 3 區，並且，某些邊境區域還被特別強調，如清萊府邊境經濟特區（Chiang Rai Special Economic Border Zone）。[19]另方面，則在前述的基礎上，以印支作爲中心來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藉此鼓勵泰商對外投資，特別是越、寮、柬、緬等鄰國市場，同時，亦積極推動與東協國家合作，推展「成長三角」（Growth Triangle, GT）經濟合作。

---

[17]陶允芳，〈建立泰銖經濟圈，泰國下苦功〉，《工商時報》，1996 年 7 月 12 日，版 7。

[18]吳崇伯，〈論中南半島的「泰幣經濟圈」〉，《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 期（1996 年），頁 30；田志立，《中華經濟區論綱：二十一世紀中華經濟藍圖》（香港：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43。

[19]Paul Chambers, “Harnessing Suwannaphum: Thailand’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ra of Thaks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Document Paper No.1, (2006), pp.38-39.

（一）推展以印支為中心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

普遍而言，印支三國（柬、寮、越）經濟雖較泰國落後，但因其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尚未開發，泰國政府早看準印支三國的廉價勞力與資源，從察猜時期就已提出「變戰場爲市場」的口號；而越南自柬埔寨撤軍後，泰國政府除率先與印支三國建立經濟關係，鼓勵泰商在該地區投資設廠，以促進邊境貿易。同時，還積極參與以下各項以印支爲中心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一是「泰銖經濟圈」；二是「黃金四角」開發計畫；三是「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

1、「泰銖經濟圈」

所謂「泰銖經濟圈」，又稱「印支計畫」，是由泰國提出的一個以泰國爲中心，包括印支半島的越、寮、柬、緬、以及印尼在內的經濟合作區。泰國政府除鼓勵泰商加強對鄰國投資以促進泰銖的流動，進而擴大泰銖的影響力，更積極實施金融制度的改革，[20]以使泰國的金融、稅務制度適應國際慣例，利用泰國在地理方面的有利條件和經濟實力，進而把泰國發展成本區域的金融和貿易中心。[21]此外，爲吸引外資流入，泰國政府更在 1993 年 3 月在開放資本帳戶上採取兩項重要政策：一是開放離岸金融業務，推出「曼谷國際銀行業設施」，即「境外金融中心」（Bangkok International Bank Facilities, BIBF）；二是允許外國居民在泰國商業銀行開立泰銖帳戶並可以借入泰銖。其中，BIBF 的建立是泰國致力於發展次區域金融中心戰略的核心佈局；而泰國發展次區域金融中心戰略則又源自泰國政府對當時世界經濟的這樣一種判斷：「隨著冷戰結束，可能從中獲得的主要收益之一，乃是源自於前中央計劃經濟進入國際市場的強烈願望和經濟重建對國際融資的巨大需求」。故而，泰國建立 BIBF 的主要目的明顯是想利用地域優勢，在東南亞前中央計劃經濟體與國際資本之間設立一個金融仲介。[22]

簡單來說，泰國建構泰銖經濟圈明顯具有下列益處：[23]1.隨著泰國與印支各國的貿易及投資量與日遽增，泰銖將可作爲一種可兌換的國際貨幣；2.對泰國商人而言，泰銖經濟圈的建立將有助於降低外匯交易時的成本及匯率波動的風險，

---

[20]例如，1990 年泰國中央銀行（Bank of Thailand）制訂「1990-1992 年泰國金融發展計畫」，該計畫的主要內容即包括：1.放寬對泰國金融體制的各種限制；2.按照國際慣例，改進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和監督；3.發展新的金融機構，以幫助動員國內儲蓄；4.根據國際慣例，簡化國家的票據交換清算制度。請參閱：田志立，《二十一世紀中華經濟區》（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41。

[21]Chee Peng Lim, “ASEAN-Indochina Relations: Prospects and Scope for Enhance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oshihiko Kawagoe and Sueo Sekiguchi, （eds.）, East Asian Economies: Transformation and Challeng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p.322.

[22]高海紅，〈資本項目自由化：模式、條件和泰國經驗〉，《世界經濟》，第 11 期（1999 年），頁 7。

[23]Medhi Krongla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 Real Promise or false Hop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15（2004）, p.997.

而成爲泰國商人另一種額外的競爭優勢；3.當泰國因其與印支各國間的貿易差額而遭受攻擊時，泰銖的使用將有助於減緩泰國在國際儲備金上的壓力；4.泰銖的使用可直接連結泰國國內商品生產與服務，以協助地區性的經濟發展；5.使用泰銖爲泰國帶來的鑄幣利差所得（seigniorage gains）將如同印支各國對泰國提供無息貸款一般。

從表二可清楚地發現，自 1980 年代末起，因泰國政府放寬對金融、外匯制度的管理，使得境外投資日增，泰國與印支各國的貿易量乃持續遞增；同時，貿易活絡也帶動泰銖的流動。爲應付日益增加的貿易量，泰國的商業銀行已於柬、寮、越三國設立多家分行。其中，泰國政府更準備二百億泰銖要用來與周邊國家邊境居民流通，爲泰銖成爲本區域流通的本位貨幣打基礎，使泰銖成爲東南亞最強勢的貨幣。[24]可以說，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泰國與印支國家的經貿關係頻繁，將提升泰銖經濟圈的可行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印支各國的基礎設施與投資、貿易等相關法規尚未完善，加上柬埔寨、寮國及緬甸的局勢仍未完全穩定，所以一切不利的因素都將制約著泰國與印支國家的經貿關係發展。

更重要的是，泰國意圖興建「泰銖經濟圈」的作法，已經引起鄰近國家的戒心。在印支國家方面，寮國中央銀行就擔心泰幣在寮境內普遍地流通將會導致通貨膨脹，乃要求泰國中央銀行協助干預，出面敦促泰商到寮國從事貿易活動時，必須先兌換成寮國貨幣。甚至，寮國更決定將銷往泰國的主要出口物資—木材，從採伐到加工全面置於政府的控制之下。除寮國外，越南也採取類似的保護性措施，對於不隨技術轉讓而要求開發天然氣、漁業資源的外資企業，則不輕易批准。[25]在中國方面，在建構大西南經濟圈的主軸下，中國計畫以雲南作爲中心來加強與印支國家的經貿關係，進而擴大人民幣的流動範圍，形成所謂的「人民幣經濟圈」。[26]無疑，印支國家與中國的各種舉措，使泰國企圖充當印支半島金融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面臨嚴峻的考驗。

另外，儘管發展境外金融中心對泰國是有助於發展其國內的銀行業，也可成爲利用外資的有效渠道之一，並且可使泰國較快成爲區域的金融中心。但相對地，採取境外金融中心的作法亦蘊含較高的風險，一旦政府當局對境外金融管理不善，而導致境外金融市場和國內金融市場過度融合，當國際金融市場發生波動時，國內金融市場甚至是國家的經濟運作都會受到波及。[27]泰國因缺乏有效的監

---

[24]國林，〈泰國調整經貿政策〉，《東南亞研究》，第 1 期（1993 年 1-2 月），頁 64；Chee Peng Lim, op. cit., p.322.

[25]吳崇伯，前引文，頁 33。

[26]〈中共緬寮越擬成立大西南經濟圈〉，《經濟日報》，1992 年 11 月 10 日。

[27]簡單來說，採取成立境外金融中心的風險主要表現在：第一、可能導致外債規模失控；第二、增大國內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第三、導致本幣資產價格和匯率的動盪不安第四、可能引起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失衡。天成，〈序一〉載於天開，《生存還是毀滅—用實證回答思考》（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年）。
<http://www.chinafph.com/scrp/bookdetail.cfm?iBookNo=208&sDirType=C>

管機制而使境外金融業甚至整個國家的金融風險逐漸增大，終在其他因素的共同催化下，於 1997 年爆發金融危機。至此，泰國建構泰銖經濟圈的目標更遭受嚴重的衝擊。

表二　泰國與其鄰國之貿易關係（1985-2004）

（單位：百萬美元／百萬泰銖）

國別	柬埔寨		寮國		緬甸		越南		中國	
年別	進口 邊貿	出口 投資	進口 邊貿	出口 投資	進口 邊貿	出口 投資	進口	出口 投資	進口 邊貿	出口
1985	0.0 -	0.4 -	1.07 -	21.74 -	2.38 9.31	1.54 -	-	- -	116.3 -	263.1
1986	- -	- -	1.16 -	14.09 -	2.26 7.6	1.66 -	-	- -	159.1 -	287.2
1989	2 -	0 -	39.70 109.5	70.21 -	1.69 57.6	1.06 -	15	2 -	499.9 -	756.3
1990	9 -	1 0	40.33 -	72.34 2	39.02 -	15.66 4	52	17 0	823.4 -	370.3
1991	10 -	5 54	43 113.9	84.0 0	0 104.8	4 3	58	14 17	800 -	400
1992	85 -	72 257	37 108.6	133.0 137	0 159.6	0 4	71	41 13	- -	-
1993	95 -	197 88	57 164	193.0 277	0 214.4	0 50	72	100 51	- -	-
1994	115 97.86	286 268	63 162.78	321.0 135	29 198.62	98 130	98	226 173	- -	-
1995	160 159.95	335 221	70 257.11	357 143	221 147.66	349 498	42	471 751	2094 -	1650
1996	49 146.01	363 778	68 251.5	364 1415	129 136.32	320 191	65	581 1335	1950 -	1879
1997	80 206.78	317 538	61 322.34	385 42	86 224.6	416 239	176	549 1369	2276 -	1779
1998	23 251.02	301 58	31 412.09	37 5	65 186.6	348 78	233	592 564	1800 -	1767
1999	15 198.32	354 114	57 408.17	410 8	112 204.34	396 108	229	573 314	2473 22.7*	1862
2000	6 248.05	352 50	76 508.84	385 43	258 446.19	510 29	331	849 344	3391 28.4*	2837
2001	14 361.26	469 119	88 566.30	413 -530	805 922.98	356 198	327	801 153	3699 52.4*	2873
2002	13 -	517 34	92 34.7*	397 14	902 109*	323 17	240	948 317	4899 74.5*	3555
2003	12 -	686 35	103 20.4*	456 56	902 204.4*	439 8	332	1261 530	6002 101.1*	5690
2004	29 -	724 93	113 -	581 62	1289 -	609 0	435	1878 334	8147 -	7120

註：-爲無資料；泰國對鄰國投資的單位爲百萬泰銖；*爲泰北對緬、寮及中國雲南之官方邊貿數額。

資料來源：整理自 1.Asian Development Bank ,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 initial possibilities for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Thailand, Viet Nam and Yunnan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nila,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93）, pp.70-77. 2.Chuthatip Maneepong and Chung-Tong Wu, "Comparative Borderland Developments in Thailand,"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21, No.2（2004）, pp.142,144-145. 3.Mya Than, *The Golden Quadrangle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 Myanmar Perspective*（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6）, p.42. 4.Takao Tsuneishi ,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of Thailand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IDE）Discussion Paper No.32（July 2005）, p.38. 5.泰國中央銀行（Bank of Thailand）官方網站。6.楊洪常，《雲南省與湄公河區域合作：中國地方自主性的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1 年），頁 3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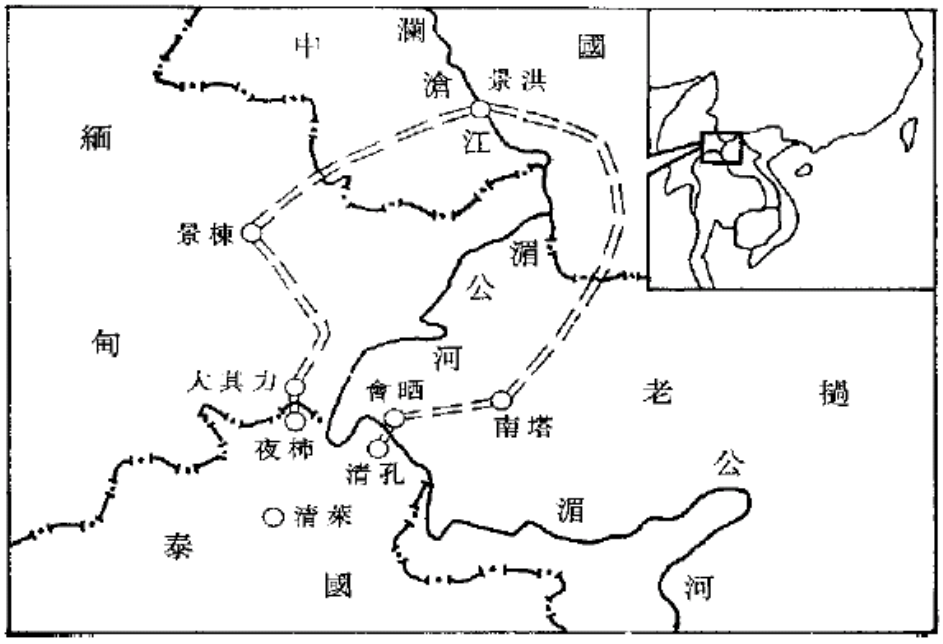
2、「黃金四角」開發計畫

1980 年代中期，泰國利用印支三國及緬甸恢復經濟建設，重建家園之際，擬將泰國北部、東北部發展成爲面向印支三國、緬甸市場進軍的門戶，以及產品加工的基地和貿易中心，以利於「泰銖經濟圈」的形成，進而擺脫與鄰國不對稱的經濟聯結關係，強化開發鄰國天然資源的機會。[28]泰國認爲，印支三國與緬甸在資源、人力及土地方面具有廣闊的市場潛力，若將其與泰國北部和東北部相互聯結，形成緊密的互補關係，則有利於泰國偏遠地區迅速擺脫落後的面貌，發揮刺激泰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作用，以作爲湄公盆地發展的地緣經濟中心。[29]特別在泰國總理察猜提出「變戰場爲市場」的口號後，「黃金四角」開發計畫被視爲其具體政策之一（涵蓋範圍參見圖二）。[30]

[28] Donald E Weatherbee, "Sub-regional Growth Zones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Mini-ASEANS," Journal of Asian Business, Vol.13, No.3（1997）, p.62.

[29] Brian Bridges, "Beyond Economics: Growth Triangles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Perspective: A Jour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1, No.1（Spring-Summer 1997）, p.68；楊曉輝，〈中、老、緬、泰「四角」經濟合作計畫探析〉,《東南亞研究》，第 2 期（1999 年），頁 25。

[30] Amos A. Jordan and Jane Khanna,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allenges to the Nation-State: The Emergence of 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8, No.2（Winter 1995）, p.457.



圖二　黃金四角經濟區示意圖

說明：「黃金四角」的範圍乃涵蓋中國雲南的西雙版納及思茅、寮國的北方七省、緬甸的景棟及大其力地區、泰國的清邁及清萊兩府。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1993 年 10 月 12 日，版 7。

簡單來說，「黃金四角」開發計畫的提出乃是基於一種發展跨邊境且相互聯結的貿易活動、旅遊業與運輸業網絡的概念，[31]其主要目標是利用瀾滄江—湄公河的流域豐富的礦產資源、水力、勞力及土地優勢，根據平等互利、共同開發原則，來推動區域經濟合作。[32]泰國希望透過擴大與北部周邊國家的經貿易合作，推動泰北成爲泰國另一個經濟和旅遊中心，以此取代過去惡名昭彰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33]並且，藉此計畫的推動進一步將市場拓展到緬甸、寮國、中國西南，獲取資源和市場的互補，使泰國經濟獲得持續、高速和穩定的成長，進而減輕泰北的貧困狀態。同時，泰國也可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並維護和改善泰國在印支半島的安全利益和戰略地位。[34]爲展示其積極推動「黃金四角」開發計畫的決心，泰國政府不僅將該計畫列入 1995 年國家財政預算和正在實施的第七個經濟發展計畫的內容中；更成立以川立沛總理爲主席的推動「黃金四角」

[31]Mya Than,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the Golden Quadrangle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in Bob Stensholt,（ed.）, Development Dilemmas in the Mekong Subregion（Australia: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6）, p.111.

[32]鄭傳良，〈中南半島的「黃金六角」〉，《東南亞研究》，第 2 期（1996 年），頁 57。

[33]Chayachoke Chulasiriwongs, “Thailand’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Michio Kimurea,（ed.）, Multi-Layere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5）, p.164.

[34]馬樹洪，前引書，頁 180。

經濟合作會議委員會，制訂有關「黃金四角」的開發計畫和協調各國對湄公河流域的開發與合作。[35]

有鑑於「黃金四角」在經濟發展上的最不利條件是有限的運輸網絡，因此，建設由中國西南通向印支半島的路上通道和經濟走廊，進而實現中國與東協兩大市場的連結，並促進次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就成爲「黃金四角」計畫的主要宗旨，[36]而公路建設、航運開發、鐵路計畫、航空運輸等四類基礎設施就成爲首要之建設。

首先，在公路建設方面，爲建設所謂的「湄公走廊」（Mekong corridor），四國一致同意優先建造東、西兩線國際公路而把四國連接起來。東路全長 240 公里，由泰國清孔（Chiang Khong）經寮國會晒（Huey Sai），琅南塔（Luang Namhta）到中國景洪（Tinghong）；而西路則由景洪經打洛（Dalou）出雲南，穿過緬甸景棟（Kengtung）和大其力（Tachileik）到泰國夜柿（Mai Sai）和清孔，全長 460 公里。其次，在航運開發方面，四國準備打通「景洪─清盛─永珍（Vientiane）」河段的瀾滄江─湄公河航道，這是投資最節省，而成效最快的交通線。[37]2000 年 4 月 20 日，泰、寮、緬、中四國正式簽署了「瀾滄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協定」，並於翌年 6 月在中國景洪舉行了瀾滄江—湄公河商船正式通航典禮，同時就航道改善工程達成共識。[38]根據該通航協定，締約四國的商船可在中國雲南的思茅港至寮國鑾勃拉邦之間，全長 886.1 公里的航道、4 個港口與碼頭間自由航行。[39]再者，在鐵路計畫方面，主要有兩個方案：一是修築從泰國清萊經緬甸景棟至雲南境內的鐵路；二是修築從雲南西雙版納（Shishuangbanna）連接寮國鑾勃拉邦（Luangprabang）、永珍，經第一座湄公河大橋，通往泰國廊開府（Changwat Nongkhai）的鐵路。[40]最後，在航空運輸方面，改善區域機場與航空服務；開通往返「曼谷─清邁─昆明」之航線。[41]

在上述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後，不僅吸引原居於高山峻嶺中的少數民族向交通沿線流動，導致城市發展迅速，而交通沿線的地價更因政府或私部門的徵用而隨

---

[35]例如，在金融措施方面，泰國政府宣佈將設立「次區域合作開發基金」，希望藉由國際金融機構和其它管道融資，來協助該區域內各國正在進行的工程項目。泰國銀行甚至批准在清邁和清萊設立內地促進離岸金融設施（BIBF），以適應「黃金四角」經濟發展過程中日益增多的資金需求。請參閱：楊曉輝，前引文，頁 26；邱振淼，〈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1997 年），頁 47-48。

[36]丁斗，《東亞地區的次區域經濟合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12。

[37]根據中國的評估，其西南地區邊貿物資若經瀾滄江出口東南亞，比經華南轉運要縮短運距三千多公里；而經由現有的「滇緬公路」出口中東或歐洲，運距更縮短五千公里。請參閱鄭傳良，前引文，頁 57；《聯合報》，2001 年 5 月 28 日，版 13。

[38]屠麗美，〈中國通往東南亞的幾條路〉，《環球時報》，<http://www.cmgsl.com.cn/images/wto2/gj172.htm>。

[39]《民生報》，2001 年 3 月 23 日，版 A2。

[40]楊曉輝，前引文，頁 27。

[41]鄭傳良，前引文，頁 57。

之高漲，[42]而「黃金四角」區域內的旅遊業亦因各項航道通航而蓬勃發展。從表二來看，泰國與鄰近國家的邊境貿易額正持續穩定的成長中。首先，在泰、緬部分，雙方自 1984 年 4 月簽署貿易協定，開始由官方推動邊境貿易的發展後，兩國的邊貿即開始迅速成長。但是 1995 年後，泰、緬邊貿常常受到兩國邊境衝突的影響，封關的現象時有發生，爲兩國邊貿活動的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障礙，其中，1995 年至 1996 年間及 2001 年至 2002 年間，因兩國發生嚴重的邊境衝突而導致邊貿數額有所下滑；其次，在泰、寮間及泰、中國雲南之間的邊貿數額則逐年上升的趨勢。這顯示泰國推動「黃金四角」經濟合作已逐漸獲得效果。就長期而言，「黃金四角」開發計畫對於改善長期處於較貧窮的泰國北部及東北部人民的生活水準是有利的，同時，與鄰國間的邊貿交流日深將有助於維持泰國的邊境安全與穩定。

3、「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

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The 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從 1950 年代就已經開始，但因二次大戰結束後，印支半島長期處於政治混亂，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內戰或游擊活動，所以，一直到冷戰結束後湄公河流域才真正進入開發的階段。1992 年 8 月，湄公河流域國家透過亞洲開發銀行的協調，開始著手範圍涵蓋貿易、投資、運輸、人力資源、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等領域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簡單來說，亞洲開發銀行推動 GMS 是希望能夠強化參與六國的經濟連結，而終極目標則是希望此計畫能夠提升經濟的實質成長，並改善區域人民的生活水準。

爲有效執行及維持六國的經濟合作過程，亞洲開發銀行計畫分成四個階段來推動 GMS 計畫，包括：第一，信心建立階段（1992-1994），主要是進行準備工作與組織建構等事務；第二，合作架構的形成階段（1994-1996），開始對各領域進行調查研究，並於 1994 年正式確定在交通、能源、旅遊、貿易、投資、環保和人力資源開發等七個領域優先進行合作；[43]第三，計畫準備階段（1996-2000），處理資源動員問題以及各區域合作計畫間的進行協調與運作；第四，全面實施階段（2000-），主要是建立有利之政策架構和有效之基礎設施

[42]Mya Than,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the Golden Quadrangle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p.116.

[43]GMS 的具體措施相當多，主要有 11 項旗艦計畫：1.南北經濟走廊。2.東西經濟走廊。3.南部經濟走廊。4.電信骨幹及資訊與傳播技術。5.區域電力網絡與交易協定。6.促進跨境貿易與投資。7.強化私部門參與及競爭力。8.開發人力資源與技術能力。9.策略性環境架構。10.洪水控制與水資源管理。11.GMS 旅遊業發展。請參閱：亞洲開發銀行官方網站。<http://www.adb.org/GMS/about.asp>

的連結，促進邊境貿易、投資、旅遊和其他形式的經濟合作，同時，進行人力資源開發與技術培訓，以保證計畫的永續進行。[44]

儘管 GMS 因 1997 年金融危機的衝擊而導致進程有所遲緩，但隨著印支各國經濟情勢的逐步改善，目前，GMS 國家正致力朝向區域實體的目標前進，亞洲開發銀行一方面希望透過金融與知識資源的運用，來促進區域的經濟轉型，爲 GMS 國家創造新的機會，以求在全球經濟中具有競爭力；另方面，爲促進 GMS 國家的共同體意識，亞洲開發銀行更希望透過基礎設施的發展，及跨邊境移動和旅遊業的提倡，來減少 GMS 國家的貧窮，並求得永續成長；同時，經由追求健康和其他與跨境活動相關之社經能力的建立，來達到人力開發的目標。[45]

對泰國而言，GMS 主要的發動機制雖然是亞洲開發銀行，但參與 GMS 可說是一種兼具刺激國內經濟與提升區域地位的「雙軌策略」。

首先，在刺激國內經濟方面，泰國政府一方面可以透過 GMS 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取得寮國與中國的電力供應以有效解決電力不足的困境；另方面，則可透過「南北經濟走廊」（the North-South Economic Corridor, NSEC）、「東西經濟走廊」（the East-West Economic Corridor, EWEC）等運輸網絡的建設而與 GMS 緊密連結而得以動員各項資源來開發東北部及北部等偏遠地區，進而消除泰國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46]尤其在 2000 年以後，泰國對美國及歐洲市場的依賴已經衰退，而對東協及其他區域與次區域市場的依賴則增加，故而，爲提升泰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泰國必須清楚的理解到：現有的競爭優勢將遭遇來自低成本國家的挑戰。[47]尤其是，北方的中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自由化的中國市場無疑是泰國所欲追尋的利益所在；其中，南中國又是進入中國市場的門戶。所以，以湄公河流域作爲軸心的 GMS 將是未來泰國在採取主動攻擊式的經濟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在提升區域地位方面，成爲大湄公河流域的運輸網絡與投資的集散中心乃是泰國參與 GMS 的首要目標，故而，泰國深入地參與多項 GMS 基礎設施計畫。泰國政府不僅對印支各國提供貸款援助以協助各國順利推展各項開發計畫；在開發的軟體上，泰國也爲印支各國提供眾多的人員訓練課程。透過 GMS 的推展，泰國及其鄰國的經濟差距將可日漸縮小，而有利於泰國開拓其鄰國市場；同時，因印支各國在經濟上依賴泰國的程度日漸提高，進而提升泰國在湄公河流域的競爭力而利於與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競逐東南亞地區的領導角色。

---

[44]詳細內容請參閱：李文志、蕭文軒，〈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2 卷，第 1 期（2005 年 4 月），頁 89-91。

[45]"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and Program（2004-2008）:Executive Summary," <http://www.adb.org/GMS/gms-executive-summary.pdf>.

[46]Siriluk Masviriyakul, "Sino-Thai Strateg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1992-2003）,"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6, No.2（2004）, pp.308-309.

[47]Medhi Kronglaew, *op. cit*., p.96.

（二）參與東協成長三角經濟合作：「印—馬—泰」成長三角

1990 年代初期，泰國除致力於以印支爲中心的各項次區域計畫，亦將經濟合作的範圍擴展至東協的成員，即參與所謂的「印—馬—泰」成長三角（Indonesia-Malaysia-Thailand Growth Triangle, IMT-GT），其又稱爲北成長三角（Northern Growth Triangle）。1991 年 8 月 30 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乃倡議將馬來西亞北部四州、泰國南部十四府及北蘇門達臘組成北成長三角（參閱圖三），共同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1993 年 1 月，泰國總理川立沛訪問馬來西亞時，乃與馬哈迪共同發表聲明，提出在印、馬、泰三國建立成長區的構想。同年 7 月，在馬來西亞蘭卡威島（Island of Langkawi）所舉行的部長會議中，印、馬、泰三國乃正式同意這項經濟合作概念，並擔保了涵蓋工業、旅遊業、電信、水資源重分配、加工及水果栽種等部門的各項計畫。[48]當時，泰國一方面受到川立沛及其閣員大都來自南部省分的政治性因素的影響，另方面，則因其經濟活動過度集中於曼谷地區而嘗試採取經濟發展分散化的政策，開發南部海岸乃成爲泰國制訂國家發展計畫時的戰略重點，如此，泰國正可乘勢將南部海岸開發計畫納入 IMT-GT。[49]所以，相較於印尼及馬來西亞，泰國對 IMT-GT 的推展乃展現強烈的企圖心。

對泰國來說，參與 IMT-GT 將可獲得下列幾項好處：[50]1.以農業爲經濟基礎的泰南地區可將其生產的農產品銷往周邊的工業基地；2.泰國可以藉 IMT-GT 的合作關係來提高其與馬來西亞談判關於泰勞在馬來西亞找工作之時限由一年延長爲三年的可能性；3.在能源方面，除可藉由 IMT-GT 能源開發計畫的推展，將電力生產基地由馬來西亞轉移到泰國，也可經由泰、馬聯合開發區協定（Joint Development Area Agreement），而降低泰國對石油及天然氣的進口依賴；4.旅遊業方面，經由 IMT-GT 架構的提倡，不僅可提升泰南地區的旅遊景點的知名度，更可透過連結三國旅遊景點的套裝行程來促進旅遊業的發展；5.在政治與安全議題方面，自 IMT-GT 開始著手進行，泰國政府就特別重視安全方面的問題。在南部邊境省分的國家安全政策（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n the Southern Border Provinces, 1994-1998）中，南部邊境行政中心就認爲，如果有適當的管理，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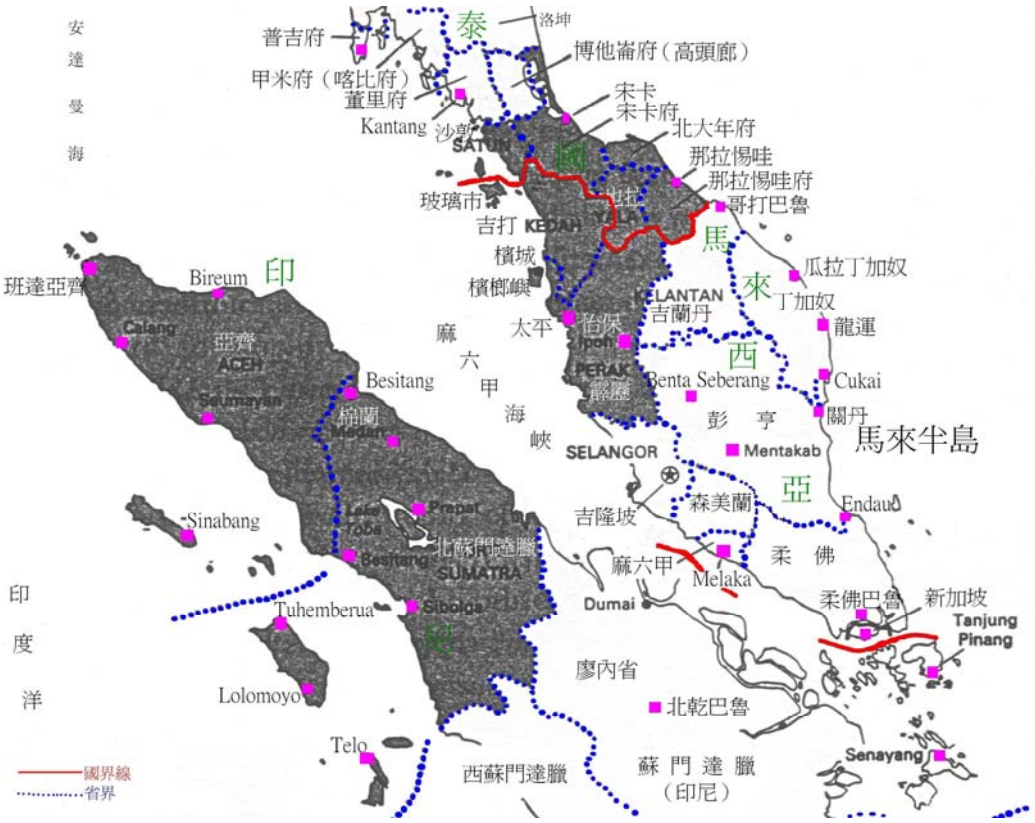
[48]關於「印-馬-泰」成長三角之各項合作計畫的詳細探討，請參閱：Myo Thant and Min Tang（eds.）, *Indonesia-Malaysia-Thailand Growth Triangle: Theory to Practice*（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96）.

[49]Michael Vatikiots, “Three’s Company: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Forge Development Zon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56, No.31（August 5, 1993）, p.59.

[50]Chayachoke Chulasiriwongs, “Thailand’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pp.163-164.

IMT-GT 的成立將可協助解決這地區的安全問題，[51]如泰、馬間的邊境衝突、少數民族問題（尤其是穆斯林社群）及非法的武器交易等。

綜上所述，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泰國不論在產業部門或空間發展上均面臨嚴重的失衡現象，導致政府機關致力推動產業去集中化及空間均衡發展的策略。同時間，正值周邊印支諸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而國際間又因區域化浪潮興盛提供泰國將其國內空間發展政策與區域經濟合作活動相結合的機會。簡單來說，1990 年代初期，泰國政府對外經濟戰略的目標可說是要透過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的推展使泰國變成「印支半島的新加坡」。[52]



圖三　「印—馬—泰」成長三角示意圖

資料來源：James Parsonage, ”Trans-state Developments in South-East Asia: Subregional Growth Zones,” in Garry Rodan, Kevin Hewison, and Richard Robison,（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258.

[51]Srisompob Jitpiromsri et al., “The Indonesia-Malaysia-Thailand Growth Triangle（IMT-GT） Project: Implications of “Open Regionalism” to the Local Economy,” *Songklanakari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Vol.6, No.1（January-April, 2000）, p.44.

[52]Cris Dixon , *op. cit*., p.256.

二、「西進政策」時期

1997 年金融危機爆發前，泰國的經濟發展正面臨產業結構轉型與出口減少的問題，所以，泰國政府除延續過去「以點帶動面」作爲主軸的經濟發展策略，而在第八期五年國家發展計畫（1997-2001）中，認爲必須透過沿邊境的經濟特區與免稅區的設立以促進泰國與周邊鄰國間的貿易與投資，進而創造產業發展的機會；同時，也考慮到當今國際關係的趨勢，而認爲必須將泰國的經濟水平線自東南亞及太平洋沿岸地區擴展至其西邊區域，以促進政治友好及強化經濟合作關係。因此，泰國政府提出一項以「強化與標的國之雙邊關係」及「尋求海外投資機會與潛在市場、促進外國投資」爲目標的「西進政策」。其中，所稱之標的國乃包含南亞、中東及非洲地區之國家。爲達成「西進政策」所設定之目標，泰國政府除致力於高層互訪，更積極推動區域內的經濟合作架構，如「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及「環印度洋經濟合作協會」。1997 年之後，儘管泰國遭遇金融危機的重創，但泰國政府仍延續前期計畫，於第九期五年國家發展計畫（2002-2006）進一步強調發揮各區域本身的潛力以均衡國內區域發展，同時，也致力於強化與周邊鄰國間的經濟關係，透過經濟合作的談判，提升自身在貿易與投資等領域的競爭力。[53]

（一）「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

1995 年，泰國外交部長 Prachuab Chaiyasan 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時首次提出和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共組經濟合作組織的構想；翌年 1 月，印度外務部長 Shri Pranab Mukherjee 在出席聯合委員會（the Joint Commission meeting）時再度提出成立「印度、斯里蘭卡、泰國次大陸經濟合作」（the India, Sri Lanka, Thailand Sub-Continent Economic Cooperation, ISTSC）的建議。當時，印度因擔心被排除在國際舞台外，乃積極加強外交攻勢，意欲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外交關係，而泰國正位處印度洋的出入口，成爲印度東進東南亞的門戶，因此成爲印度亟欲拉攏的對象，這對於仰賴出口以維持經濟高度成長的泰國來說，擁有 9 億人口的印度和鄰近國家的廣大市場乃是泰國最佳的投資和出口對象。[54]更重要的是，泰國可進一步藉由強化與印度間的關係，來牽制中國意圖透過緬甸而實現其南出印度洋的戰略目標。

故而，泰國在參考亞洲開發銀行對區域經濟合作的研究後，提出一份關於達成泰國、印度及斯里蘭卡之間經濟合作的詳細綱要，並於 1997 年 6 月 6 日在曼

[53]Takao Tsuneishi , *op. cit.*, p.6.

[54]張珍麗，〈東南亞國協勢力向西擴展〉，《經濟日報》，1997 年 6 月 9 日，版 9。

谷成立。[55]起初，這個次區域性貿易聯盟的成員只有孟、印、斯、泰等四國，所以稱爲「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會議」（Bangladesh, India, Sri Lanka, Thail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ST-EC），但基於緬甸對加入該聯盟展現出高度的興趣，所以，在 1997 年 12 月 22 日於曼谷所舉行的特別部長會議中，緬甸正式從觀察員變成正式成員，而名稱也改爲「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Bangladesh, India, Myanmar, Sri Lanka, Thail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之後，BIMST-EC 又在 2003 年加入尼泊爾與不丹。2004 年 7 月 30 日，在曼谷舉行的第一次高峰會中，各成員國決定將 BIMST-EC 改稱爲「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或 BIMSTEC。[56]

BISMT-EC 成立之初，乃著重在貿易聯繫的強化及合資計畫與擴展投資的增加上，之後再研究降低關稅或取消關稅的可能性。[57]首先，擴展投資與貿易方面，BIMST-EC 於 1998 年 12 月在孟加拉首都達卡（Dhaka）召開第二屆部長會議，其會後聯合聲明就強調運輸與傳播連結對於提升 BIMST-EC 次區域的商業、工業、文化與社會互動及旅遊業必要的，所以，BIMST-EC 必須先發展鐵路、道路設施、多功能的陸海空交通系統連結，因爲這些基礎設施會強化產生於 BIMST-EC 認同感中的互補性；同時，該聲明也明確界定 BIMST-EC 的合作範圍主要涵蓋貿易與投資、技術、能源、運輸、旅遊業、漁業等六個領域。[58]之後，再逐步將範圍擴大到所有的商品、服務及投資。其次，在關稅問題方面，則要等到 1999 年所舉行的 BIST-EC 商業論壇[59]（Business Forum）中，才決議成立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s）以確認關稅與非關稅領域中的問題及計算上的困難。[60]2000 年 4 月，BIMST-EC 中開發程度較高的三國—印度、斯里蘭卡、泰國在第二屆貿易／經濟部長會議中提議將 BIMST-EC 從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pact）擴展爲自由貿易區（free-trade area, FTA）；同時，該提議並以關稅減免與非關稅障礙爲合作的第一步而展開談判。[61]

---

[55] Prema Viswanathan," Historic 4-nation pact shows promise,"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9, 1997.<http://expressindia.com/ie/daily/19970609/16050033.html >。

[56]請參閱<http://www.mfa.go.th/bimstec/bimstecweb/html/background.html>。

[57]〈泰與南亞三國組貿易論壇〉,《經濟日報》, 1997 年 5 月 30 日。

[58]"BIMST-EC Meet Agrees to Step up Economic Forum," *The Independent*（Bangladesh）, December 20, 1998.

[59]BIMST-EC 商業論壇是 1998 年 3 月，由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SCAP）於曼谷所組織之會議中，BIMST-EC 各成員國之私部門代表所倡議的。同年，BIMST-EC 部長會議的聯合聲明則對商業論壇的成立表示歡迎；另外，在這次的部長會議中，主辦國孟加拉也提議成立經濟論壇（Economic Forum）以作為經濟合作的平台，提倡成員國之間的公、私部門合作。請參閱<http://www.mfa.go.th/bimstec/bimstecweb/html/2ndstatement.html>。

[60]"Need for Promoting BIMST-EC Intra-regional Trade Stressed," *The Independent*(Bangladesh), July 1, 1999.

[61]"Plan for Free-trade Area Gets Approval," *The Nation*（Thailand）, December 19, 2001.

2004 年 2 月初，BIMST-EC 在泰國普吉島舉行的第六屆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中，除孟加拉因國內程序問題而延後至六月才加入，[62]其餘各成員國均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for the BIMST-EC Free Trade Area）。爲使談判順利展開，BIMST-EC 乃成立貿易談判委員會（the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TNC），並在九月於曼谷召開第一屆 TNC 會議，展開自由貿易區框架的談判。概括而言，各成員談判的內容乃涵蓋商品降稅（快速關稅削減及正常關稅削減）和商業服務與投資部門自由化等。[63]

對泰國而言，BIMST-EC 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無疑將爲泰國開放擁有十三億人口且總國民生產超過八千億美元的龐大南亞市場。目前，基於南亞各國巨大的消費群、高購買力、適宜的投資機遇和豐富的工業原材料，泰國工業聯合會正同南亞六國攜手建立泰國與南亞商務聯合委員會，以增進雙邊貿易、投資和開發南亞消費市場。[64]

（二）「環印度洋經濟合作協會」

「環印度洋經濟合作協會」（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OR-ARC）乃是 1997 年 3 月在模里西斯（Mauritius）所成立的，其倡議乃是基於對所謂「區域主義之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的認知而來；該理論堅信在區域的基礎上來推動合作過程將是有利的。IOR-ARC 的成立就是環印度洋國家爲回應大型貿易集團，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APEC）等，而主張自己的經濟空間；同時，澳洲、印度與南非也希望藉此在全球市場扮演領導者的角色。[65]

概括而言，IOR-ARC 成立的目標主要有五項：一、刺激區域內的貿易與投資；二、協同商業、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競爭優勢；三、資訊與資料的蒐集、分類及散佈；四、協助 IOR-ARC 國家建立網絡；五、促進資料、統計與程序的標準化與協調化。另外，在組織架構方面，IOR-ARC 則是有三個分立的工作小組，包括：貿易與投資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WGTI）、環印度洋商業論壇（the Indian Ocean Rim Business Forum, IORBF）及環印度洋學

---

[62]事實上，孟加拉乃是擔憂低關稅可能影響其製造業的發展而拒絕加入，直至各成員國在協定同意它的補償問題後才加入簽名。

[63]"Free-trade Talks with BIMST-EC Members to Start in September," *The Nation*（Thailand）, July 23, 2004; "Free Trade Talks' First Meeting Ends in Bangkok with Role Examinations," *Bangkok Post*（Thailand）, September 9, 2004.

[64]〈泰國密切與南亞交流合作〉,《中國新聞網》, 2004 年 5 月 1 日。<http://61.135.142.194/n/2004-05-01/26/432152.html>

[65]Saman Kelegama, "Can Open Regionalism Work in 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15, No.2（August 1998）, p.153-154.

術小組（the Indian Ocean Rim Academic Group, IORAG）。其中，WGTI 主要是處理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與漁業合作等事務。[66]

自 1999 年泰國開始成爲 IOR-ARC 的成員開始，其除每年派代表參與各項會議之外，更希望達成實質性的結果。爲此，泰國乃藉由各項工作計畫來達成 IOR-ARC 的目標，同時也符合泰國的國家利益，如促進貿易與投資、提升與成員間的可持續成長和平等發展。近年來，泰國已在各項不同的互利領域中取得進展，特別是在漁業與學術性合作等方面。

（三）「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

「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Mekong-Ganga Cooperation, MGC）的概念乃是2000年6月在曼谷所舉行的東協部長會議（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AMM）中，由泰國所倡議的連結湄公河與恆河區域的旅遊業計畫。此構想原本稱爲「恆河—湄公黃金半島計畫」（Ganga-Mekong Suvarnabhumi Project.），但因寮國基於泰國的歷史性角色，認爲 Suvarnabhumi 具有強烈的安全、歷史與地理上的特殊內涵而反對使用。不過，泰國則認爲 Suvarnabhumi 不應該被賦予政治性的意涵，它僅是象徵著各成國具有共同的文化遺產。[67]同年 11 月，第一屆 MGC 部長會議在寮國永珍舉行，會後發表永珍宣言（the Vientiane Declaration on Mekong-Ganga Cooperation），正式宣告 MGC 成立。根據永珍宣言的內容，MGC 的成立乃是基於各成員國對於發展彼此的緊密關係與相互瞭解的共同渴望，希望藉由 MGC 的成立來促進各成員國的友誼、團結與合作。[68]故而，當這些成員國完整無缺的保持其本土認同與特性時，MGC 成立的目的乃是爲了定義該區域在新的全球經濟中的地位。[69]

簡單來說，MGC 主要強調在旅遊業、文化、人力資源開發與運輸連結等四個領域的合作，以作爲該區域未來貿易與投資合作的堅實基礎。在旅遊業方面，各成員國將針對聯合市場及旅遊業的行銷進行戰略性的研究（strategic studies），並採取各項措施來提振區域的旅遊業，例如：開辦 MGC 觀光投資指南以提供旅遊資訊、擴展多型式的通訊與運輸連結以便利旅遊活動、提出兼具文化、宗教與生態的套裝旅遊行程等。在文化方面，MGC 準備透過舞蹈、音樂及戲劇等共同研究計畫、與學者專家進行座談等方式來促進對文化的瞭解，並作爲旅遊業的服

---

[66]IOR-ARC 的發展過程及組織沿革，請參閱：R. T. Shand, and K. P. Kalirajan, "Yamazawa's Ope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 Indian Ocean Grouping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35, No-1（March 1997）, pp.16-23.

[67]"China Seeks to be Part of Dual River Promotion," *The Nation*（Thailand）, November 24, 2000.

[68]關於永珍宣言全文，請參閱<http://www.mfa.go.th/internet/MGC/vientianedeclaration.pdf>.

[69] Chandan Irom, "Whatever Happened to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The Mekong- Ganga Cooperation," <http://www.manipuronline.com/Features/January2002/mekongganga19.htm>.

務基礎；同時，推動多項的古蹟保存及維護計畫。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MGC 除積極尋求外國資金的援助，也準備透過交換師生、締結姊妹市、語言教學計畫等機制來培養具有技術與管理能力的人才。在運輸與通訊設施方面，MGC 將致力發展各項運輸網絡，特別是「東西走廊計畫」（the "East-West" corridor project）與「泛亞高速公路」（the Trans-Asian highway）；同時，MGC 也決定強化在 IT 產業的基礎設施及網絡的開發等方面的合作。[70]

2001 年 7 月，MGC 第二屆部長會議在越南河內舉行。會中，各國的外交部長與資深官員同意採取一項「河內行動計畫」[71]（Hanoi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MGC）確定其在旅遊、文化、教育和交通運輸四個合作領域的執行工作，計畫在六年內，在爭取先進國家援助的同時，加強多方面的（multi-faceted）合作與可持續的發展，以促進成員國的經濟成長。翌年六月，MGC 第三屆部長會議在柬埔寨金邊召開，會中除回顧與討論「河內行動計畫」的執行進度，還提出一份「金邊路徑圖」（Phnom Penh Road Map），[72]具體指出 MGC 四個合作領域未來的進程及任務以作爲各成員國加速實現 MGC 的行動綱領。目前，MGC 因成立的時間尚短，組織結構並未完備，仍屬於組織建構的階段，不過，各成員國（尤其是印度及泰國）對此合作機制仍展現出積極的企圖心。

三、強化印支經濟整合時期

2003 年 4 月 29 日，在東協與中國爲討論共同預防 SARS 而於泰國曼谷舉行非正式領袖高峰會議期間，泰國總理他信與柬埔寨、寮國及緬甸三國的領袖達成一項名爲「經濟合作戰略」（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ECS）的新倡議。[73]簡單來說，泰國提出 ECS 的主要目標，除縮小印支半島次區域的經濟鴻溝，及促進次區域的經濟繁榮之外，更希望增添東協的內在價值，以達成整個東南亞區域的經濟團結，進而使區域各國在自我信賴（self-reliance）與共享繁榮的情況下，向前邁進。[74]泰國外交部長素拉革（Surakiart Sathirathai）就表示，泰國會將 ECS 的倡議，化作具體可行的方針。若柬、寮、緬、泰四國（CLMT）進一步加強團結合作，則基於比較利益原則，透過聯合性的經濟活動，例如：擴大農產品與原

[70]請參閱<http://www.geocities.com/mekong_ganga2000/mekong-ganga.html>.

[71]「河內行動計畫」請參閱<http://www.mfa.go.th/internet/MGC/HaNoiProgrammeofAction.pdf>.

[72]「金邊路徑圖」請參閱<http://www.mfa.go.th/internet/MGC/phnompenhroadmap.pdf>.

[73]在 2003 年 11 月 12 日於緬甸蒲甘所舉行的第一次四國領袖會議中，各國領袖同意將此項新倡議的經濟合作框架稱為「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ACMECS）。另外，越南於 2004 年 5 月加入。

[74]"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ECS） among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nd Thailand," declared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ingdom of Thailand. <http://www.mfa.go.th/web/1657.php>.

材料的市場、提昇製造業產品的供應、鼓勵區域內的投資等，將可強化區域經濟的發展。[75]

對泰國而言，透過 ECS 的推動來改善周邊鄰國的經濟發展及增加財富是必要的，因爲泰國若不採取措施來改善鄰國的生活水平，則非法勞工、毒品、地下貿易與非法金融體系等負面情事將繼續流入泰國，進而對泰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影響。因此，泰國不僅提供貸款給鄰國來發展其基礎設施以利於各國之連結，更希望透過減免關稅的措施來促進區域內農產品、原材料及人力的流動，而使泰國成爲印支半島的生產中心，進一步將該區域所生產的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市場。爲此，泰國商業部乃將發展邊境貿易視爲優先性政策。[76]事實上，過去泰國與其鄰國間的貿易活動因複雜的關稅手續而未能完全地發展其潛能，爲能促進貿易及克服此障礙，簡便貿易就成爲立即而必須的措施，所以，ECS 四個成員國乃同意在不久的將來成立一次手續到底的關稅服務中心（one-stop custom service centres）；而泰國中央銀行也與緬甸投資及商業銀行（Myanmar 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Bank, MICB）簽訂一項簡便貿易的協定。[77]

值得注意的是，ECS 在促進次區域的旅遊業合作方面，特別提出一項範圍包含柬埔寨西北部的柏威夏（Preah Vihear）與上丁（Stung Treng）、寮國南部的占巴塞（Champasak）與阿速坡（Attapeau）及泰國東北部的烏汶府（Ubon Ratchathani）與四色菊府（Si Saket）的「綠寶石三角合作架構」（又稱「翡翠三角」, Emerald Triangle Cooperation Framework）。[78]根據「綠寶石三角合作架構」，柬、寮、泰三國同意成立工作小組來擬定關於旅遊業合作的行動綱領以明文其合作的優先領域，[79]同時，鑑於柬、寮兩國財政之不足，泰國政府更在預算上分派一百億泰銖作爲該計畫的財政支持。由此顯見，泰國政府對此計畫的重視。泰國外交部長素拉革在會議聲明中就指出，旅遊業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最有效的手段

---

[75] Surakiart Sathirathai, "Welcome Remarks," at The First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ECS） between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nd Thailand, 1 August 2003. < http://www.mfa.go.th/web/35.php?id=5222>

[76] "Thailand to Aid Neighbors in Forming Strategic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Bangkok Post*（Thailand）, October 4, 2003.

[77] "Thai Government to Allocate 134 Million Baht to Boost Neighboring Economies," *Bangkok Post*（Thailand）, February 9, 2004.

[78] "Pakse Declaration on Tourism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at Foreign Ministerial Meeting among Cambodia – Lao PDR – Thailand, at Pakse, Champasak Province, Lao PDR, 2 August 2003. < http://www.mfa.go.th/inernet/emerald/Pakse Declaration.doc>

[79] 這些領域包括：1.針對「綠寶石三角」旅遊業的相關領域與活動，成立共同研究，並將研究結果作為進一步合作的基礎；2.保證旅遊業之人力資源開發，如導遊的訓練與交換或旅遊商業人員的訓練等；3.公、私部門中的各層級之旅遊部門人員互訪；4.促進區域的旅遊工業，如提昇所規劃區域內之旅遊設備及旅遊據點指南的生產。請參閱："Action of Plan on Touris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at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ourism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Pakse District, Champasak Province, Lao PDR, 2 August 2003. <http://www.mfa.go.th/inernet/emerald/statement2.doc>.

之一，因此，推動該合作架構不僅有利於旅遊工業，更能提升經濟成長、減少柬、寮、泰三國內部之所得不對稱的情形，並且提升一般國民的財富。同時，「綠寶石三角」之旅遊業合作也可作爲其他既存之區域及次區域合作架構的補充，以增加區域內的相互瞭解與繁榮。[80]

綜上所述，透過 ECS 的推動，不僅可以提升泰國東北部的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業及旅遊業兩大部門；同時，可藉由邊貿活動的活絡來改善鄰國偏遠地區的生活水準，促進鄰國內部的民族和解，緩和政治緊張局勢。如此，將有助於減輕鄰國經濟移民湧入泰國邊境的壓力。更重要的是，ECS 的推動意謂著泰國已擺脫援助接受國的角色，並首次成爲長期低利貸款的供應國，這顯示泰國已初步具備東南亞大國的地位。

肆、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企圖及挑戰

一般而言，人類對於空間的認知通常基於兩種重要的思維機制，即中心性機制與同心圓原理。所謂中心性（centrality）是指每個人都從自己、自己所在之家庭、社區…出發，從而與外部世界構成同心圓環（concentric rings），這種同心圓式的空間觀在定居或農耕民族中尤其普遍；其中，不同個人與人群所抱持的中心性與同心圓意識（心智地圖或認知地圖），乃立基於個人對世界的認知，而這種認知又經常是受到認知主體所處之位置與文化的影響。[81]同樣地，對國家來說，其經常是從中心的角度或立場來進行戰略思考以維護國家（中心）的利益。當每個國家的政府對其國家利益的界定及潛在威脅有所認知，從而制訂出一套具有長期存續特性的可操作對策／回應方案，其可說是一套背後蘊含特定國家之外交與國防政策的戰略性假設。這一套可操作的對策不只是國家中心論的（state-centric），更牽涉到單一國家的世界觀，故其定義乃高度地基於外在世界的認知圖像。[82]

就泰國而言，自 1238 年由泰族作爲主體而建立素可泰王國（Sukothai）開始，其國家性質乃是封建領主式的，亦即國王所能直接控制的範圍僅是內圈層的畿內

---

[80] Surakiart Sathirathai, “Statement,” at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ourism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Pakse District, Champasak Province, Lao PDR, 2 August 2003. <http://www.mfa.go.th/web/35.php?id=5229>

[81] 張錫模，《地緣政治學講義》（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2004 年），頁 11-12。

[82] 基本上，每個國家依其國力的強弱對於自身國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在標定對國家利益的外部威脅外，從而提出的回應方案亦有所不同。簡單說，這有三個層次：一、地區性的（local），其牽涉到對鄰國的評估，這是所有國家都具備的；二、區域性的（regional），這是那些渴望跨越鄰國而投射其權力的國家（即區域性強權或潛在性區域強權）所必須的；三、全球性的（global），只有全球性的強權才有能力制訂此層次的對策，以利其全球權力地位的追尋。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New York: Longman Scientific & Technical, 1994）, pp. 91-92.

各省（王國的核心），第二圈層的畿外省與第三圈層的臣屬國乃是半獨立的狀態。當這些泰族王國在經濟、政治及軍事上強盛起來時，便將這種「中央—地方」關係的內政觀念套用在對外關系上，從而建構出一種朝貢式的外交關係。可以說，這種建立保護國（protectorate）或依附國家（dependent states）的策略乃根源於泰國基於歷史經驗而對於周邊安全所產生的心理認知，即「唯有真正落實緩衝國（buffer state）或緩衝社群政策（buffer communities policy）才能避免與其主要敵人的直接對抗」。[83]

歷史上，泰國一直試圖能在地緣戰略上支配緬甸、寮國與柬埔寨，希望將這些國家整合成以泰國爲中心的戰略整體，就是出於這種同心圓式的空間思維。只是，泰國的歷史企圖不僅從未成功，反而在寮、柬境內激起一股強烈的反泰（anti-Thai）意識。19 世紀，儘管因大英帝國（Great Britain）與法國等西方殖民強權涉入印支半島而削弱泰國對印度支那的支配，但是，曼谷當局仍然渴望成爲一個強權的角色，這種霸權式思考仍具體呈現於 1930 年代末期的「泛泰族」[84]（Pan-Thai）運動中。[85]二次大戰期間，泰國協助其東部邊境的「吉蔑伊沙拉」（Khmer Seri）與「寮國伊沙拉」（Lao Issara）及西部邊境的克欽族獨立組織（C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 CIO）、克倫族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與蒙泰軍隊（Mong Tai Army, MTA）等民族獨立運動團體，亦是基於同樣的戰略邏輯—邊疆地帶的去安定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泰國與周邊鄰國的關係也隨之更爲緊張，甚至成爲威脅泰國國家安全的主要來源。尤其在 1978 年至 79 年間，隨著蘇、越關係增進及越南加入經互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和雙方簽署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而日益緊密；同時間，越南爲達成印支聯邦的目標而入侵柬埔寨，

---

[83] Chayachoke Chulasiriwongs, "Thailand's Relations with the New ASEAN Members: Solving Problems and Creating Images," *Southeast Asia Affairs*（2001）, pp. 337-354.

[84] 所謂「泛泰族」運動乃是披汶（Phibun Songkhram）政權所提出來的，其目的是要尋求收復「失去的領土」與曾經是擴張的帝國組成部分的人民（包括一些非泰族的民族）。1939 年，泰國（當時稱為暹邏）出現一波民族統一運動，當時把帶有中性民族色彩的國名—「暹邏」改為「泰國」，其內在意義是表示泰人對華人或西方影響的控制，字面意義則是要宣傳泰國是所有「泰人民族」的天然祖國，以達成範圍涵蓋緬甸、南中國及印度支那的「大泰國」（greater Thailand）；其中，實現「大泰國」理想的第一個實質性步驟就是於 1940 至 41 年向在印度支那被削弱的法國政府宣戰，其結果是收復殖民時代被迫失去的柬埔寨西部與北部（即暹粒與德望兩省）及湄公河彼岸的寮國的前「泰人」領土。這種「大泰國」的領土意識不僅延續到冷戰時代，更成為影響日後泰、柬關係的最大變數。請參閱尼古拉斯・塔林主編、王士錄等譯，《劍橋東南亞史Ⅱ》（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42。

[85] Surin Maisrikrod, "Thailand's Policy Dilemmas Towards Indo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4, No.3（December 1992）, p.287.

這些局勢發展更讓位居前線國家的泰國倍感威脅。[86]直至 1980 年代中期，越南因受到蘇聯軍、經援助騷減的影響而無力負擔駐柬的龐大軍費，不得不允諾將勢力逐步撤出柬埔寨，才爲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帶來契機，抒解泰國沈重的邊境防務。可以說，冷戰時代，以軍人執政爲主的泰國政府，不僅透過強調共產主義對其國家安全的威脅來鞏固政權，同時，也藉此取得援助周邊各國之獨立運動團體的正當性，而將其基地作爲泰國與共產國家之間的緩衝區；同時，從國際體系的角度來看，冷戰時代的泰國乃是鑲嵌於美、蘇兩大強權所構築的政經網絡中。如此就建構出以泰國爲核心的地緣戰略圈層。

1980 年代末期，儘管共產勢力的威脅因冷戰終結而不復存在，泰國對其國家利益的界定也因隨著強調經濟和科技實力的世界新秩序的認識，無可避免地從過去政治安全與軍事安全逐漸轉向強調經濟安全。然而，過去強權主導的國際政經體系並未因此而有利於小型國家。期間，國際上所興起的經濟區域合作的主導權仍掌握於美、日、歐等大國手中。爲平衡美、日等經濟大國在經貿、投資上對泰國所造成的壓力，泰國勢必尋求新的市場以降低貿易對象過於集中的困境。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前提下，泰國對外的戰略佈局自然也會因經濟發展策略的調整而作相對的轉變。特別是，1990 年代初期，隨著泰國經濟成長的高度發展，開拓市場的需求乃日漸急迫，穩定周邊就成爲泰國的當務之急。然而，歷史發展所遺留下來的邊境衝突問題，包括：泰南穆斯林問題、柬埔寨政府軍與反政府軍游擊隊的內戰、寮國的內戰、緬甸政府軍與克倫族（Karens）的戰爭等仍間接或直接地對泰國的國家安全、經濟、社會造成影響。更何況，泰國所處的印支半島向來就是中國與印度的邊疆，過去曾深受兩大強權的文化影響，1990 年代，隨著中、印兩國的崛起，泰國也將成爲兩大強權擴張勢力範圍時的首要目標。

爲了創造有利於「面向印支」經濟戰略的國際環境，泰國政府乃主動與越南修好並與柬埔寨接觸，進而使柬埔寨問題和平解決；同時，在建設性接觸的指導原則下，對緬甸軍事政權採取友好的途徑，以爲日後泰商在緬甸投資尋求利益，並謀求泰、緬邊境的安全。這些舉措實爲後來所推展的「泰銖經濟圈」、「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及「黃金四角」等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提供良好的基礎。相反地，隨著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推展，特別是湄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印支各國在經濟上的互賴日深，在發展經濟爲優先的前提下，也爲過去印支各國所蘊藏的政治歷史（如人民、王朝或民族國家間的戰爭）、種族之間的競爭（如泰族、緬族、吉蔑族、越南人等）、殖民時代所遺留之邊界問題以及當代政治文化中隱含的對立及懷疑等引發衝突的要素，帶來和平解決的契機。

---

[86]根據當時對泰國內部菁英的調查顯示，多數人認為越南入侵並佔領柬埔寨對泰國的安全威脅可分為幾個面向：1.沿著泰、柬邊境的軍事緊張；2.大量難民的流入；3.柬埔寨成為越南威脅泰國的主要基地。詳細說明請參閱 Sukhumbhand Paribatra,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Indochina Conflict: Thai Perspectives,” *Asian Affairs*（New York）, Vol.11, No.3（Fall 1984）, pp.28-46.

進入 1990 年代中期，泰國的經濟發展因面臨產業結構轉型與出口減少的問題，在擴展經濟空間的強烈需求下，泰國政府認爲必須將其經濟水平線自東南亞及太平洋沿岸地區擴展至其西邊區域，以促進政治友好及強化經濟合作關係，乃於 1997 年初提出「西進政策」。事實上，泰國過去總是將東方的亞太國家視爲貿易及投資的主要來源；相對地，印度也因其被殖民經驗而採取自立更生的政策，導致泰國與印度之間的經濟關連並未獲得應有的關注。不過，在印度 Narasimha Rao 政府於 1991 年採取經改政策以及「東進政策」（Look East Policy）之後，印度已在經濟上向世界開放，特別是對東南亞地區。這就成爲泰國推動「西進政策」的有利條件，這也是「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環印度洋經濟合作協會」等次區域合作計畫能夠順利成立的因素。

1997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因憑藉人民幣的力量而逐漸在東南亞地區站穩其強權的地位，特別在中國展現參與次區域開發計畫的興趣之後，藉此來建構其西南交通網絡，進而改變其傳統上單面地依賴太平洋海上出口的「一洋戰略」而發展「印度洋戰略」的意圖，益加明顯。有鑑於此，泰國爲避免中國在湄公河流域的開發上取得絕對優勢，乃於 2000 年提議籌組「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希望藉由將印支半島與南亞大陸的兩大河川的開發合作連結起來，引進印度勢力來平衡中國，進而在中國與印度的權力競逐中，[87]藉其地緣優勢而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更何況，中國自緬甸獨立後，就積極透過軍事及經濟援助，使緬甸成爲中國在印支半島的親密夥伴，這種軍事同盟般的關係對泰國則猶如芒刺在背。[88]故而，藉由「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的推動，而把印度與緬甸納入更爲緊密的關係網絡中，將有效牽制中國勢力的擴張。同樣地，他信政府所倡議的「經濟合作戰略」刻意地將中國雲南排除在外，也大有緩和中國在印支半島上因貿易優勢而對泰國所造成的威脅之意。

另外，位居泰國東方的越南，向來就是泰國在政治及軍事上的最大競爭者，隨著越南的經濟改革已獲致初步的成功，就長期發展而言，越南很可能將發展成足以在經濟上與泰國相抗衡，進而成爲泰國在競逐印支主導權時的最大競爭者。在此情形下，泰國透過主導「經濟合作戰略」計畫的推展，以提供經濟貸款的方式，深化越南對其經濟依賴，進而弱化越南的威脅力度。1990 年代初期，泰國政府曾嘗試建構所謂的「泰銖經濟圈」以達成其區域經濟霸權的目的，但此構想因遭逢金融危機爆發而中斷，如今，在他信政府所倡議的「經濟合作戰略」中，以泰銖作爲主要的借貸貨幣，其戰略設計無非是要減少貨幣交換的成本，提升交

[87]中國與印度的競爭乃顯現於鐵路建設上。中國乃是藉由湄公河開發計畫而積極推展泛亞鐵路建設，欲將其勢力深入東南亞；而印度則是透過 MGC 來建設一條起自新德里，通過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而達越南河內的鐵路計畫，意欲抵銷中國在湄公河流域競爭中的優勢。

[88]除此之外，隨著共產勢力的衰退，泰國認為其東部邊疆環境已逐漸穩定與安全，轉而將西方的緬甸視為國家安全的立即威脅來源，主因是泰、緬邊境的叛亂武裝份子與大量難民問題。

易量，並降低貨幣波動所帶來的風險，以利於泰國企業的跨境貿易及投資；[89]但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透過泰銖的廣泛使用，泰國也就支配了印支半島的市場體制運作，從而深化其在東南亞地區甚至是國際間競逐權力的基礎。如此說來，當前泰國最大的國家利益乃是建構安全的周邊環境以利其經濟戰略的順利推展，故而，如何鞏固周邊關係就成爲泰國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這也是他信政府提出「進取性外交政策」（Forward Engagement policy）的主要原因之一。

總之，泰國希望透過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推行來加強印支各國在經濟層面的相互依賴，達到內、外經濟發展配套運用的成效，如此，不僅可以利用印支諸國豐富的資源來發展國內經濟，並透過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的推展引進國際私人資金與國際正式組織（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信用貸款來填補國內金融缺口；同時，達到降低地區性矛盾與衝突的強度來確保邊疆的穩定，甚至藉由與南亞大陸的緊密經貿連結，進一步緩衝中國南下的威脅，而且，也可在印度與東協及其他東亞國家之間扮演樞紐的角色。

無疑地，唯有在經濟利益與安全關係協調的前提下，泰國才能尋求極大化其國家利益。

然而，泰國推動次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期間亦遭遇許多障礙與挑戰。首先，印支諸國的經濟發展程度與泰國存有一定的差距。泰國原先希望能扮演印支半島的工業、貿易、金融和旅遊中心，而印支諸國則成爲天然資源與能源的供應中心，但因泰國強勢的經濟滲透，乃導致印支諸國對於泰國缺乏信任感，使得原本應該進行的計畫項目遭到延宕。當然，這也意謂著印支諸國對泰國過去擴張主義的心理認知並未完全消除。其次，次區域經濟合作乃以經濟發展作爲最高指導原則，所以，很難兼顧到環境與生態的保護，而容易導致各國政府間及政府與市民社會間的衝突發生。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在湄公河上游（瀾滄江）建立大壩問題。近年來，中國致力於開發大西部，而在湄公河上游建築水壩以取得水力發電之能源。儘管中國政府宣稱建築水壩將有利於下游國家在雨季時調節水量以避免洪災，並在乾季時提供用水。但是，湄公河下游的越南則認爲中國建造水壩將截斷湄公河的水流，將導致鹹水持續滲入湄公河三角洲，進而影響南越地區的農業產出。[90]另外，對電力求之若渴的泰國則認爲，藉由中國將向泰國輸電，以及與緬甸、寮國等水電資源豐富的國家進行合作，將有效降低泰國的電價；不過，環保團體則認爲其效益與成本落差過大，反而會製造嚴重的生態危機。這些反對聲浪對於經濟合作計畫的推動，將無可避免地造成衝擊。再者，非法商品貿易、販毒活動與非法移民等跨境問題將因邊境開放而更趨嚴重。這樣一來，泰國雖然透過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推動改善了偏遠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新問

[89]Paul Chambers, *op. cit.*, p.53.

[90]Michael Richardson, "China's Key Role in the Politics of Mekong Water,"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August 18, 2005.

題似乎也緊跟而來。面對此一兩難課題，泰國如何化危機爲轉機已成爲其開展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的首要課題。

伍、結論

儘管區域性貿易集團的興起，以及國際組織的林立叢生，導致國際間對於民族國家的未來有著更深層的思考。然而，對資本、商品與觀念而言，法律上疆界的迅速崩解，並不表示跨國生產、投資及資訊的「無疆界世界」，可以模糊化地理疆界、國家與政府在國際體系中的實體意義與影響。[91]相較於過去大國所主導推動的區域主義合作計畫，經常意涵著「劃地自限」的保護色彩，次區域經濟區的興起，不僅彌補正式合作機制的缺失，也提供開發中國家發展其經濟的機會，同時，也因推動者大多爲中小型國家而能以更爲開放的態度來深化彼此間的合作，達到互利共榮的目標，並藉此銷解大國透過正式合作機制所帶來的壓力。[92]

目前，在區域化的潮流影響下，非正式機制（如經濟網絡）雖然已經獲得實質的注意，例如，在 1990 年代初期 Robert A. Scalapino 及 Harry Harding 等人就曾經提出「自然經濟區域」的討論，[93]但這些討論大多停留於經濟意義的賦予，而僅侷限於經濟層面的功能性分析。事實上，經濟現象與政治現象一樣，都是行爲者透過權力而追求利益才產生的，對於身處國際社會主要行爲者的國家而言，經濟無疑僅是實現國家特定價值與利益的手段，即在實踐上經濟行爲常被當成達到政治目的之憑藉，而政治行爲也屢被視爲獲取經濟目標的方法。

特別是，自從冷戰結束後，美、蘇集團對峙不再，有些學者（如美國學者 Edward N. Luttwak）就認爲，在強調跨越國家界線之區域經濟合作的時代，國家所採取對外經濟行爲的重要性，已逐漸等同甚至超越外交與軍事行爲的重要性；其中，強調地緣性的經濟活動更常是各國展現其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在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中，由國家提供或導引的產業投資資本如同傳統國家關係中的『火藥』；而國家補助的產品開發則如同『武器』的創新；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國家在國外設立軍事基地及駐軍的外交『影響』」。[94]這意謂著，如何擴張對地緣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將是大國能否建立以其爲區域經濟中心的區域化

[91] Paul Battersby, “Border Politics and the Broader Politics of Thailan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1990s: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Pacific Affairs*, Vol.71, No.4（Winter, 1998-99）, p.473.

[92] 蔡東杰，前引文，頁 5。

[93] Robert A. Scalapin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uture Prospec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5（Winter 1991/92）, pp. 19-40. 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6 （December 1993）, pp. 660-686.

[94] Edward N. Luttwak,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m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pp.35-36.

進程，以便爲自身謀求一個良好的周邊發展環境，進而有利其在未來世界政經發展中佔據更有利的地位。[95]

然而，若回歸地緣經濟學的本質，其如同地緣政治學理論一般，都是強調在地理空間的基礎上，透過權力的運作以獲取國家利益，並維持國家的生存與安全發展。其中，不管是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都是以國家的稟賦作爲基礎來加以運作。因此，即使在後冷戰時代，亦不代表地緣經濟學已取代地緣政治學，反而要避免單一功能性的區分政治與經濟事務，因爲不管是人類社會或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爲者，其行爲經常都是兼具政治性與經濟性的複合行爲，故而，應該採取一種結合權力和利益又兼顧地緣特質的整合性分析架構。[96]在這意義上，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推展就涉及該國國家利益如何透過權力的運作而落實於特定的地理（區域）空間內；其中，所謂的國家利益不僅涵蓋政治、安全、經濟與文化等範疇，[97]同時，也涉及如何在國家、次區域與區域三個層次間落實國家利益的目標。

就此而言，泰國，作爲印支半島的主要強國，爲了在區域主義的普世框架中尋求極大化國家利益之道，勢必要制訂出一套兼涵各種層面的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

誠如，前泰國外交部長西堤（Siddhi Savetsila）在世界經濟論壇國家會議（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National Meeting）中表示：[98]

> 在柬埔寨重新獲得和平與穩定之後，泰國願意也準備好以其發展的經濟來扮演印度支那重建的支持夥伴。以泰國的地緣位置及緊密的文化聯結，其可作為外來援助的管道、聯繫印支國家與全球經濟的橋樑，甚至是外來投資的門戶與跳板；其中，曼谷與東北部的城市更是貿易與經濟關係的最佳基石，同時也是各種跨國企業與印支國家間的最佳聯結。

由此顯見，泰國亟欲透過資源與市場潛力的經濟聯結，使其成爲周邊鄰近國家區域經濟合作的核心所在。1991 年，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

[95]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9。

[96]關於政治與經濟整合的概念，請參閱：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 年）。

[97] Pushpa Thambipillai, "The ASEAN Growth Triangle: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terest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3, No.3（December 1991）, p.330.

[98]Khatharya Um, "Thailand and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plex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3, No.3（December 1991）, p.247.

Council, NSC）主席查蘭・古拉瓦尼乍耶（Charan Kullavanijaya）就明確指出必須制訂一項區域合作戰略來指導政府對印度支那的各項活動。[99]

簡單來說，自從察猜政府倡議「變印支戰場爲市場」，以及使曼谷成爲「黃金半島」中心等構想以來，使曼谷成爲印支半島的區域霸權穩定者儼然成爲指導泰國的外交及對外經濟政策的一種典範。繼察猜之後上台的泰國總理，如阿南德（Anand Panyarachun, 1991-92）、川立派（Chuan Leekpai, 1992-5, 1997-2001）等人，不是將泰國視爲通往印支的商業門戶，就是金融門戶；而曾擔任國防部長的昭華利（Chavalit Yongchaiyudh, 1992-94）及外交部長的他信（1994-5）更提議對鄰國採取建設性接觸政策，以拉近與鄰國間的經貿與投資關係。近年來，泰國政府積極在東北地區與北部地區設立工業區以及邊境經濟特區，就是希望藉由偏遠省分的工業群聚作用來帶動全面性的經濟發展以作爲推動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

隨著「泰銖經濟圈」、「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黃金四角」、「印—馬—泰成長三角」、「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環印度洋經濟合作協會」、「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經濟合作戰略」等各項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的推展，泰國與周邊鄰國在經濟結構及天然資源均具有互補性的條件下，因跨境經濟活動的活絡不僅改善了偏遠地區的基礎設施，而長久存在的國內市場不足和貧窮問題亦因熱絡的經濟投資活動而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更重要的是，日趨緊密的經濟互賴關係，使得過去泰國無法以軍事手段完全征服印支半島的地緣戰略目標，將得以透過金錢（經濟手段）予以達成；同時，也讓泰國在面臨中國及印度的競爭時，爲國家安全創造出更有效的戰略縱深。

目前，泰國政府爲恢復和振興因金融風暴而衰退的經濟，除針對內部的各項經濟措施進行結構性的調整，藉以恢復經濟和社會的活力；同時，也希望在各種次區域合作的框架內，繼續推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合作，以作爲泰國經營區域層次（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或亞洲合作對話）甚至全球層次（如亞歐會議）的多邊合作基礎。

可以預見的是，跨越邊境地區的合作模式（即次區域經濟區），將成爲泰國日後推展對外經濟戰略的主要手段。

---

[99] 另外，查蘭・古拉瓦尼乍耶在評論泰國的後冷戰時代發展戰略時，更強調泰國所面臨的安全問題，主要集中於漁業糾紛、與鄰國的劃界問題、種族衝突等三個領域。Leszek Buszynski,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of a Regional Vision," *Asian Survey*, Vol.34, No.8（August 1994）, p.726.

參考文獻

中文資料

《人民日報》，1993 年 10 月 12 日，版 7。
《中國新聞網》〈泰國密切與南亞交流合作〉，2004 年 5 月 1 日，<http://61.135.142.194/n/2004-05-01/26/432152.html>。
《民生報》，2001 年 3 月 23 日，版 A2。
《經濟日報》〈中共緬寮越擬成立大西南經濟圈〉，1992 年 11 月 10 日，版 10。
《經濟日報》〈泰與南亞三國組貿易論壇〉，1997 年 5 月 30 日，版 8。
《經濟日報》，1997 年 5 月 29 日，版 8。
《聯合報》，2001 年 5 月 28 日，版 13。
丁　斗，東亞地區的次區域經濟合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天　成，生存還是毀滅—用實證回答思考，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年。
尼古拉斯・塔林主編，王士錄等譯，《劍橋東南亞史Ⅱ》，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田志立，《二十一世紀中華經濟區》，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田志立，《中華經濟區論綱：二十一世紀中華經濟藍圖》，香港：中華書局，1997 年。
吳志生主編，《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
吳崇伯，〈論中南半島的「泰幣經濟圈」〉，《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 期，1996 年，頁 30-34,84。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企業有限公司，1997 年。
李文志、蕭文軒，〈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2 卷第 1 期，2005 年 4 月，頁 81-123。
肖三華，〈泰國的地區發展戰略〉，《東南亞研究》，第 1 期，1995 年，頁 15-17。
邱振淼，〈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1997 年，頁 45-51。
馬樹洪，《東方多瑙河－瀾滄江、湄公河流域探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高海紅，〈資本項目自由化：模式、條件和泰國經驗〉，《世界經濟》，第 11 期，1999 年，頁 3-11。
國　林，〈泰國調整經貿政策〉，《東南亞研究》，第 1 期，1993 年 1-2 月，頁 63-64。

屠麗美，〈中國通往東南亞的幾條路〉，《環球時報》，<http://www.cmgsl.com.cn/images/wto2/gj172.htm>。

張珍麗，〈東南亞國協勢力向西擴展〉，《經濟日報》，1997 年 6 月 9 日，版 9。

張錫模，《地緣政治學講義》，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2004 年。

陶允芳，〈建立泰銖經濟圈，泰國下苦功〉，《工商時報》，1996 年 7 月 12 日，版 7。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

楊洪常，《雲南省與湄公河區域合作：中國地方自主性的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1 年。

楊曉輝，〈中、老、緬、泰「四角」經濟合作計畫探析〉，《東南亞研究》，第 2 期，1999 年，頁 25-30、35。

蔡東杰，〈多層次整合與東南亞區域發展〉，發表於《2005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5 年 4 月 28-29 日。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

鄭傳良，〈中南半島的「黃金六角」〉，《東南亞研究》，第 2 期，1996 年，頁 57-58。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 年。

英文資料

"Action of Plan on Touris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at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ourism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Pakse District, Champasak Province, Lao PDR, 2 August 2003. <http://www.mfa.go.th/inernet/emerald/statement2.doc>.

"BIMST-EC Meet Agrees to Step up Economic Forum," The Independent （Bangladesh）, December 20, 1998.

"Building on Success: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Next Ten Years," in Building on Success: A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he Next Ten Years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building_success/building_success.pdf>.

"China Seeks to be Part of Dual River Promotion," The Nation（Thailand）, November 24, 2000.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ECS） among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nd Thailand," declared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ingdom of Thailand. <http://www.mfa.go.th/web/1657.php>.

"Free Trade Talks' First Meeting Ends in Bangkok with Role Examinations," Bangkok Post（Thailand）, September 9, 2004.

"Free-trade Talks with BIMST-EC Members to Start in September," The Nation（Thailand）, July 23, 2004

"Need for Promoting BIMST-EC Intra-regional Trade Stressed," The Independent（Bangladesh）, July 1, 1999.

"Pakse Declaration on Tourism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at Foreign Ministerial Meeting among Cambodia – Lao PDR – Thailand, at Pakse, Champasak Province, Lao PDR, 2 August 2003. <http://www.mfa.go.th/inernet/emerald/Pakse Declaration.doc>.

"Plan for Free-trade Area Gets Approval," The Nation（Thailand）, December 19, 2001.

"Thai Government to Allocate 134 Million Baht to Boost Neighboring Economies," Bangkok Post（Thailand）, February 9, 2004.

"Thailand to Aid Neighbors in Forming Strategic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Bangkok Post（Thailand）, October 4, 2003.

"Development Guidelines of the Eighth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http://www.thaiembdc.org/economic/dplan8.htm#First%20National>

Bangkok Post（Thailand）, 9 September 1988.

Battersby, Paul. "Border Politics and the Broader Politics of Thailan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1990s: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Pacific Affairs, Vol.71, No.4（1998-99）, pp.473-488.

Bridges, Brian. "Beyond Economics: Growth Triangles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Perspective: A Jour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1, No.1（1997）, pp.55-77.

Business Times（Singapore）, 15 April 1993.

Buszynski, Leszek.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of a Regional Vision," Asian Survey, Vol.34, No.8（1994）, pp.721-737.

Chulasiriwongs, Chayachoke. "Thailand'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Michio Kimurea,（ed.）, Multi-Layere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5.

Chulasiriwongs, Chayachoke. "Thailand's Relations with the New ASEAN Members: Solving Problems and Creating Images," Southeast Asia Affairs（2001）, pp.337-354.

Dixon, Cris. The Thai Economy: Uneve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Harding, Harry.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36（1993）, pp.660-686.

Hirsch, Philip. “Competi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Toward a New Framework for Security,” in Bob Stensholt,（ed.）, Development Dilemmas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Australia: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6.

Jitpiromsri, Srisompob et al. “The Indonesia-Malaysia-Thailand Growth Triangle（IMT-GT） Project: Implications of “Open Regionalism” to the Local Economy,” Songklanakari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Vol.6, No.1（2000）, pp.40-48.

Jordan, Amos A. and Jane Khanna.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allenges to the Nation-State: The Emergence of 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8, No.2（1995）, pp.433-462.

Kelegama, Saman. “Can Open Regionalism Work in 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15, No.2（1998）, pp.153-167.

Keyes, Charles F. The Golden Peninsula: 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Lim, Chee Peng. “ASEAN-Indochina Relations: Prospects and Scope for Enhance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oshihiko Kawagoe and Sueo Sekiguchi,（eds.）, East Asian Economies: Transformation and Challeng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Luttwak, Edward N.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m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Maisrikrod, Surin. “Thailand’s Policy Dilemmas Towards Indo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4, No.3（1992）, pp.287-300.

Masviriyakul, Siriluk. “Sino-Thai Strateg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1992-2003）,”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6, No.2（2004）, pp.302-329.

Miller, E. Willard. “Mineral Resources of Indo-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Vol.22, No.4（1946）, pp.268-279.

Paribatra, Sukhumbh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Indochina Conflict: Thai Perspectives,” Asian Affairs（New York）, Vol.11, No.3（1984）, pp.28-46.

Parsonage, James. ”Trans-state Developments in South-East Asia: Subregional Growth Zones,” in Garry Rodan, et al.（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ichardson, Michael. “China’s Key Role in the Politics of Mekong Water,”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August 18, 2005.

Sasuga, Katsuhiro. Microregionalism and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Sathirathai, Surakiart. “Statement,” at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ourism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Pakse District, Champasak Province, Lao PDR, 2 August 2003. <http://www.mfa.go.th/web/35.php?id=5229>

Sathirathai, Surakiart. “Welcome Remarks,” at The First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ECS） between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nd Thailand, 1 August 2003. <http://www.mfa.go.th/web/35.php?id=5222>

Scalapino, Robert 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uture Prospec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5（1991/92）, pp.19-40.

Shand, R. T. and K. P. Kalirajan. “Yamazawa’s Ope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 Indian Ocean Grouping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35, No.1（1997）, pp.3-27.

Sricharatchanya, Paisal. “The Golden Lan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43, No.8（1989）, pp.11-12.

Taylor, Peter J.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New York: Longman Scientific & Technical, 1994.

Thambipillai, Pushpa. “The ASEAN Growth Triangle: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terest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3, No.3(1991), pp.299-314.

Than, Mya.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the Golden Quadrangle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in Bob Stensholt,（ed.）, Development Dilemmas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Australia: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6.

Tsuneishi, Taka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of Thailand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IDE） Discussion Paper, No.32（July 2005）. <http://www.ide.go.jp/English/Publish/Dp/pdf/032_tsuneishi.pdf>

Um, Khatharya. “Thailand and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plex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3, No.3（1991）, pp.245-270.

Vatikiots, Michael. “Three’s Company: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Forge Development Zon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56, No.31（1993）, pp.58-59.

Viswanathan, Prema. ” Historic 4-nation pact shows promise,”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9, 1997.<http://expressindia.com/ie/daily/19970609/16050033.html>

Weatherbee, Donald E. “Thailand in 1989: Democracy Ascendant in the Golden Peninsula,”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17（1990）, pp.337-350.

Weatherbee, Donald E. “The Foreign Policy Dimensions of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6, No.4（1995）, pp.421-432.

Weatherbee, Donald E. “Sub-regional Growth Zones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Mini-ASEANS,” Journal of Asian Business, Vol.13, No.3（1997）, pp.47-68.

Yasuda, Osamu and C. H. Kwan. “The Indochina Economic Zone,” in Edward K. Y. Chen and C. H. Kwan,（eds.）, Asia’s Borderless Economy: The Emergence of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7.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225-265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ailand's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Wen-Chih Lee[*] *Wen-Hsuan Hsiao*[**]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Ⅱ, Thailand'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centralized economy and emphasized export-oriented policy. From 1960s to the mid-1980s, the unbalanced pattern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caused Thailand's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to become an obvious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n order to efficiently enhance the economic growth in rural areas, Thailand began to focus on the de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meanwhile, the wav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rose rapidly, and Thailand'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lso tried to carry out the open policy. These changes had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ailand to make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By early 1990s, there were several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mes initiated.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interests, this paper also deeply concerns about som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n Thailand's participation in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mes as well.

Keywords: Baht Economic Zone, Golden Growth Quadrangle, GMS, ACMEC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for Social Sciences, Sun Yat Sen University.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267-310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國民黨苗栗縣
基層專職黨工關係網絡之研究

鍾道明*　黃東益**

摘　要

台灣的地方選舉特色之一就是講求人情關係連帶。政黨或政治人物除了要履行他們的選舉政見和諾言之外，還必須重視選區經營和選民服務來建構他們的社會網絡與群眾基礎，使其關係網絡滲透到社會各階層角落，在選舉時轉換成動員力量或選票以贏得勝選。

國民黨自一九五二年起在全台各鄉鎮市設立了民眾服務站，且招募為數眾多專職黨工，透過民眾服務站的組織運作方式和基層黨工平時與地方民眾建立情感來發展它的關係網絡。但是現有學術研究中有關基層黨工的研究並不多見，致對公共事務的瞭解或解釋顯有不足之處。本文認為國民黨基層黨工在地方公共事務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角色，其經營基層之運作方式應是值得研究的素材。

本文藉由關係發展階段理論，針對國民黨苗栗縣各鄉鎮市民眾服務站的退休及現任基層黨工，以個別訪談、焦點座談以瞭解他們在地方社會中發展關係網絡的情形。研究發現國民黨基層黨工早期透過人情交往及關係取向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網絡和群眾基礎，確實是過去國民黨在基層社會普遍獲得民眾支持的主要因素。但是隨著台灣民主化、社會趨勢與政黨輪替的進程，基層專職黨工的社會關係網絡在面對選民投票影響力上已面臨資訊科技、意識型態等嚴峻挑戰，也使他們面臨被裁撤的命運。

關鍵字：國民黨、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站、專職黨工、關係網絡

---

*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專任副教授。

壹、前言

義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a Gramsci,1891-1937）在其《獄中札記》中討論「現代君王」時曾說：「如果現在要再寫一本新的《君王論》，那麼主角將不再是一位個別的英雄，而會是政黨。因爲政黨在不同時期和相異民族的不同內部關係裏，它均致力於肇創一種新的國家型態。因此，政黨已然取代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1459-1517）眼中的君王，成爲現代政治的新君王」。葛蘭西認爲「政黨除了肩負著組織與動員群眾參與政治的一般功能外；在威權體制的國家裏，政黨還相當程度的滲入到社會體系的內部，成爲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運轉的核心機制。從政黨延伸至政府，再進而擴伸到國家，整個社會都被緊密納入一套嚴謹的運作系統裏」，因此現代政黨的地位已足稱「新君王」。所以，當我們試圖探析當代政治的脈動時，焦距若不對準政黨已是不可能的事[1]。

政治學者夏特史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在其所著《政黨政府》（Party Government）一書之序言指出，「要了解一個政黨，完全得看研究者在分析時，是否能掌握真正的問題核心」[2]。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聯，它在台灣發展組織的歷史可溯自民國 29 年（1940）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命翁俊明負責籌設台灣黨部開始，以及民國 35 年（1946）台灣光復後，台灣省黨部的進駐及在各縣市設立「黨務籌備員辦事處」籌備建立它的基層組織和吸收黨員。但是國民黨真正全面積極的發展它地方黨務工作卻是在民國 38 年（1949）中央政府撤退來台之後，隨著國民黨政權移入台灣，國民黨以黨組織的重建（party-building）開始對台灣社會進行全面性滲透，透過其黨的組織運作機制，使得國民黨在基層社會中擁有甚強的控制能力（control capacity）與回應能力（response capacity），並得以穿透它掌握台灣社會、控制地方達五十年之久[3]。

一、二重侍從主義機制論述

對於國民黨在台灣社會進行全面性支配的觀察，部份學者接受吳乃德的觀點，認爲國民黨政府在國政層級上有所謂的「外省人」（Mainlanders）壟斷的「統治菁英」結構（national ruling elite）和「台灣本省人」（Taiwanese）組成的「地

---

1 蔡詩萍，《誰怕政治》（台北：桂冠，1989 年），頁 217-218。

2 楊泰順，《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民主基金會，1991 年），頁 125。

3 陳三井，《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台北：中央文物，1985 年），頁 120-124。謝鴻儀主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印行，2000 年），頁 180-183。陳曉慧，〈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對社會基礎的強化〉，《藝術學報》，63 期（1998 年），頁 209。林佳龍，〈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245。

方公職政治菁英」結構（local elite）的「政治菁英族群二重結構」。以及國民黨以此「族群二重結構」爲前提，在地方社會中操作「政黨侍從主義機制」和「選舉侍從主義機制」的「二重侍從主義機制」來掌握其權勢（power-holders）和它在台灣的正統性（legitimacy）。吳乃德認爲國民黨運作「二重侍從主義」時有兩個系統，一是在鄉鎮層次設立區黨支部和其一體化的民眾服務社的黨組織（party clientilism）；另一則是與擁有選舉網絡的地方政客交換利益的之侍從主義機制（electoral clientlism）。朱雲漢和陳明通進而對台灣選舉侍從主義之核心勢力即「地方派系」做理論與實證研究，提出「統治菁英、地方派系、地方選民」三者間侍從主義機制之論述[4]。

在此略予說明「選舉侍從主義機制」的意義，它指的是「國民黨」和「地方派系」之間以及「地方派系」和「選民」之間，兩兩互爲「雇主」（patron）與「侍從者」（client）的一種「上下利益交換」的關係。「雇主」提供「侍從者」物質性的利益如金錢、就業、官商合約、特權貸款、特許行業、優惠措施等和非物質性的利益如安全保護、社會聲望等。而侍從者則回報以政治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即是選票，其目的在爲雇主創造更大的權勢用以均霑更多的利益。國民黨統治者就是透過這種有意設計之「侍從主義」或稱「恩庇主義」，以公共資源按多層「侍主-隨從」結構來進行分配，利用地方派系幫助國民黨政權來穿透其本身難以穿透的本地社會，而國民黨則回報地方派系以區域性的寡占經濟特權[5]。以此觀點，地方派系現象成爲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焦點。

而在「政黨侍從主義機制」的論述中，對於國民黨組織的研究可由陳曉慧所指，國民黨在全省各地普遍設立「民眾服務站」，藉著爲民服務的方式與過程來和民眾接觸、互動並建構它與社會各群體間的關係以建立其社會基礎，對社會做全面性的滲透與控制[6]。而龔宜君則以「滲透」的觀點，分析國民黨是在特殊的結構條件下，透過其改造後在全台各縣市普遍建立之黨組織的滲透機制和被滲透的不同社會和族群基礎之間建立關係來維繫其政權[7]。由於國民黨透過這種隱而不露的服務和滲透機制，使得國民黨在台灣恰如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言「老大哥無所不在，但你卻毫無所覺」[8]。

---

[4] 若林正丈（Masatake Wakabayashi），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新自然主義，1994 年），頁 37-42。

[5] 林佳龍，同註 3，頁 193-194。吳重禮，〈亦敵亦友：論地方派系與國民黨候選人選擇過程的互動模式〉，《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學報》，7 期（1998 年），頁 179。

[6] 陳曉慧，同註 3，頁 211。

[7]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鄉，1998 年），頁 27-29、頁 133-134。

[8]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合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1991 年），頁 22。

二、對派系侍從機制論述的質疑

政治學是一個相當多樣化的研究領域，學者之間或因所持意識型態立場、基本假設或價值偏好或所採取的研究途徑不同，對於同一個研究對象所產生的研究結果或闡釋也因之存有相左的看法[9]。政治學者 John Morrow 指出，政治思想始終具有一股濃烈的「預設傾向」。也就是說，政治學者試圖深入理解政治的性質以及各項特定政治問題時，難免都會提出其所持特定政治理念之論證[10]。

以選舉侍從主義的地方派系現象來說，作者在基層二十多年的服務經驗與所認知的事實並非如部分學者論述的恩庇與利益交換，認爲他們的研究可能僅是個案現象，並沒有全面的視野。我們以趙永茂對「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結構」的研究數據觀察，他把台灣社會的地方派系分爲（1）嚴重派系對立、（2）輕微派系對立、（3）無派系等三個層次。他所謂的「嚴重派系對立」是指非但選舉過程中派系嚴重的衝突、對立杯葛，在當選之後雙方或多方亦激烈對立，發生衝突事件，而致影響公務或公益。而「輕微派系對立」則指只在選舉過程中兩方或兩方以上派系，彼此發生對立、衝突事件，選舉過後即無嚴重衝突對抗事情。而「無派系」是指在選舉過程中或選舉後在公所或代表會間無派系對立、衝突的具體事件發生。趙永茂指出包括台北、高雄兩院轄市在內的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中，地方政治或選舉受到地方派系影響的縣市有 17 個，佔 74% 。在台灣 309 鄉鎮縣轄市中，依據前述標準統計，派系嚴重的鄉鎮市有 45 個，佔 14.6% ；輕微派系對立的有 109 個，佔 35.3% ；合計有 154 個，佔 49.9% ；無派系的鄉鎮市有 155 個，佔 50.1% [11]。

其次，我們也可從廖忠俊與陳怡如在有關台北縣的派系個案研究中找到反證，他們分別表示「台北縣並沒有全縣性的地方派系，在 29 個鄉鎮市中只有三重、板橋、永和、中和、新莊、淡水等部份鄉鎮市長期存在有對立的派系勢力」[12]。王金壽的個案研究也指出，屏東縣的 33 個鄉鎮市中，除了 8 個原住民鄉外，其餘的 25 個鄉鎮市中，13 個鄉鎮存有地方派系，另 12 個鄉鎮則沒有地方派系[13]。綜上略舉相關研究數據來看，地方派系並非全面普遍的存在於台灣地方社會。由

---

[9] 周育仁、鄭又平，《政治經濟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2 年），頁 28。

[10] John Morrow，李培元譯，《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台北：韋伯文化，2004 年），頁 4。

[11] 趙永茂，《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圖書，1997 年），頁 209。趙永茂，〈基層政治菁英之個人背景分析〉，《思與言》，第 25 卷、第 6 期（1988 年 3 月），頁 572。

[12] 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及其主要領導人物》（台北：允晨，2000 年），頁 50。陳怡如，〈政黨競爭與地方派系轉型之研究－台北縣中和市的個案分析〉（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2003 年），頁 2。

[13] 王金壽，〈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一九九三年風芒縣長選舉的個案研究〉，《台灣政治學刊》，2 期（1997 年），頁 8。

前提條件的不足，我們就可以瞭解到某些學者所指國民黨以「恩庇-侍從」關係利用地方派系來取得或掌控政權的論述證據顯然是不充分的。

再者，即便某些地方曾經出現過派系對立現象，也會隨著政壇風雲流轉，或政治現實取代鄉土人情牽繫，許多地區早期所形成的地方派系已然消逝。例如桃園、新竹兩縣改以宗親爲主流，彰化縣山頭取代了派系，花蓮縣選舉時候選人強調的是族群意識，高雄市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族的各領風騷，而基隆市久已不聞派系聲音，有的只是個人利害的結合……等等，可見派系人物或現象並非恆久[14]。

無可諱言的，地方派系的現象是地方自治與公共事務問題當中的一環，但它並非全部。地方派系在平時是隱而不顯，在選舉時才突顯了它的社會異質性。事實上，部分媒體或學者所聲稱的「地方派系人物」，未嘗不是媒體在他們登記參選公職的時刻起，或是在地方事務的互動中，以「人情」、「關係」的異同予以「標籤化」成「非此即彼」的派系人物，讓他們積非成是的成爲「事實」。因此我們可從「一些已被外界認爲是從事派系活動，賦予派系名稱的政治人物，自己則可能會極力否認自己是派系人物」[15]。王金壽在其研究中亦明白表示，「對於派系人物的認知，是以一般新聞媒體報導爲認定的標準，當事者或是一些受訪者並不承認這樣的分類」得到相當的佐證[16]。同時，派系以及派系人物的角色與地位在地方公共事務所呈現的「個案」問題，也是部份研究學者用放大鏡把它給局部放大了，若再加上意識型態或者道德的光環，把部份或個案的事實推衍成全面的可能，做了「以偏蓋全」的結論。

高承恕認爲「社會問題的面向是複雜多樣的，學術上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建構了基本理論與發掘出事實的基本輪廓，幫助我們對該現象的了解，但卻永不等於事實的真相。」以及「雖然不是任何一位學術研究者所樂見，但是學術殿堂的著作，往往是束之高閣，學者之外難以窺望」[17]。因此，一些被作爲研究的「地方派系」對象沒有機會予以指正謬誤，這樣的學術研究成果，若再任由研究學生以「次級資料」作爲他們的研究論述依據時，他們若忽略了對於事實真相或脈絡的探討理解就逕予移植、轉載、引述，彼此相呼應的結果，很可能「積非成是」的對基層公共事務造成誤解。

---

[14]張昆山、黃政雄，《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台北：聯經，1996 年），頁 6。

[15]蔡明惠，《台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山頂」與「街仔」的爭鬥》（台北：洪葉文化，1998 年），頁 1。

[16]王金壽，同註 13，頁 10。

[17]高承恕著，劉仁傑主編，《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聯經，1999 年），頁 20。

三、基層黨工是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基礎之一

如果國民黨在基層不全然是依賴地方派系，那麼國民黨做爲一個政黨，它是如何建立其社會基礎？又是如何運作來獲得民眾的信賴和支持？對於這樣的質疑，我們或可由王振寰所指「國民黨的組織特色，就是每一層級政府就有相對層級的黨組織來監控其運作」。國民黨透過其正式的編制與常態的黨組織系統、制度性的運作，他們靠著爲數眾多的專職黨工及義務幹部平時的經營和服務，構成了層層的社會網絡，在選舉時就轉換成選票動員的基礎得以了解[18]。

顯然的，國民黨過去在地方基層組織的發展是採取兩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是透過國民黨本身的組織的發展，黨員的吸收以及全面的操控地方，讓基層勢力陸續納入其政黨體系的掌握，來進行其全方位的滲透，達成其全面的控制。第二種方式是對於地方領導菁英的網羅，國民黨除了透過其黨內提名參選的機制之外，更對於全省各地方非國民黨籍的選任菁英進行吸收入黨。這樣雙管齊下，不但可藉由選舉動員來整編地方政治勢力，用來強化國民黨在基層民意機關的力量，也順勢拉攏了地方菁英和原有的地方勢力，以利其遂行社會控制的動員[19]。

陳曉慧與龔宜君分別指出，民眾服務站的設置成爲國民黨組織滲透台灣基層社會的掩體。基層的「區黨部」與「民眾服務站」有一暗一明之分，「區黨部」對內是國民黨鄉鎮區級領導中心，負責開展組織工作，對外則是以「民眾服務站」以服務方式來和廣大群眾接觸[20]。換言之，國民黨在平時是透過「民眾服務站」以「服務」成果積累的過程來建立它與民眾的情感，而在選舉時則將它轉換成「區黨部」輔選動員的基礎。所以，國民黨以「民眾服務站」做爲它的區黨部組織化身之後，在基層社會能夠持續贏得選舉，並透過選舉過程進行「準列寧式政黨」（quasi-Leninist party）的組織調整，成爲極少數成功駕馭民主化浪潮的威權政黨[21]。

前揭論述雖然解釋了當年國民黨透過其地方黨部組織系統與動員方式對於台灣社會的高滲透能力，但是地方黨部如何動員？執行方式如何？這些屬於「人」的因素，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則鮮少討論，導致許多人對地方公共事務的瞭解與認知產生落差。其理由可能是早期國民黨的地方黨部對內是「區黨部」的秘密的組織，對外卻以「民眾服務站」爲名，長期保密結果，致有民眾將將「民眾服務站」誤認是政府的派出機關所在多有[22]。

---

[18]王振寰，《誰統治？如何分析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1996 年），頁 58、218。
[19]蔡明惠，同註 15，頁 65。
[20]陳曉慧，同註 3，頁 209-212。龔宜君，同註 7，頁 192-193。
[21]林佳龍，同註 3，頁 245。
[22]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1992 年），頁 136。

試想一個擁有二、三千個黨工的龐大組織，若是專職黨工飽食終日然後靠地方派系的恩庇就可掌握政權，那黨工存在超過五十年的必要性與價值爲何？其理自明。因此，作者認爲研究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或公共事務，若能針對久爲人所忽視的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組織機制和其所屬基層黨工在地方社會中之關係網絡進行研究，將有助於補充或釐清現有地方自治與選舉的觀察與解釋。因此，本文對於國民黨民眾服務站專職黨工的研究可說是一種嘗試，冀喚起社會予以關心並探究此議題，讓活潑客觀的研究精神得以注入。

貳、文獻探討

一、政黨內部權力落在黨工身上

學者蘭尼與肯道爾（Austin Ranny and Willmoore Kendall）認爲「政黨」（political party）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標、理念或利益而結合而成的組織化團體。它透過競選活動以爭取執政和人事控制權」[23]。「政黨」在憲政體制下，政黨的功能係透過選舉競爭的運作以爭取政治職位與掌握政府的權力。而在政黨獨占政治權力的政體中，更常被形容是政治壟斷和控制的機制[24]。所以，政黨在組織結構上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政治體系。更重要的，它還是個決策體系[25]。因此，有相當多政治學者研究政黨會聚焦於政黨內部的權力落在何方？

最早研究政黨內部民主運作的學者奧斯特葛斯基（Mosei Ostrogorski）在其《民主與政黨組織》（*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一書指出，政黨機器之影響力日益增強，政黨內的控制權已由資深的黨團幹部所掌握。密歇爾斯（Robert Michels）在其《政黨》（*Political Parties*）一書中分析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權力結構時發現，雖然該政黨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權力卻集中在少數政黨領袖的手中，他認爲「一切組織都是寡頭的」，因此他提出了「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論點。馬坎茲（Robert McKenzie）在《英國政黨》（*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分析比較英國菁英領袖導向的「保守黨」和高度內部民主的「工黨」兩黨的權力分配時指出，兩大黨的權力皆由國會領袖的網絡所支配，密歇爾斯的寡頭統治學說再度受到重視。再以美國的政黨來說，美國

[23]Andrew Heywood，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重譯，《最新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2 年），頁 386、395。

[24]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論》（台北：五南，1996 年），頁 8。

[25]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雷飛龍譯，《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台北：韋伯文化，2000 年），頁 87。

政黨基礎在於「政黨機器」（machine politics）的「黨霸」（party boss）身上，他們是權力的掮客，在政黨提名大會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26]。

本世紀德國最偉大之社會、政治思想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1929-〉指出，「政黨是政治意識形成的工具；但是，他們並不掌握在公眾手中，而是掌握在操縱著政黨機器的人手中」[27]。列寧〈V.I. Lenin〉在其所著《該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一書中也解釋了共產黨必須依賴少數願意獻身、犧牲及有紀律的黨工幹部，而不能依賴具有共同利害的廣大無產階級的理由[28]。所以，他們直言政黨的黨工是政黨實現其社會控制、發揮組織力量與維繫政權最關鍵的因素所在。

二、民眾服務站仿效美國城市政黨組織

國民黨政府 1949 年退居台灣，由於置身歷史情境的必然性格，國民黨一直是，同時也被認爲是「革命政黨」（revolutionary party）。因此，它在黨的體制架構上所展現出來的特性，就會呈現出具有列寧主義色彩的革命政黨架構[29]。但是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之後所引發的省籍、族群對立，使國民黨政權在語言、文化上與台灣民眾有所隔閡[30]。國民黨不得不省思如何經營其地方基層社會、掌握社會各階層領袖，因此，國民黨參考了美國城市「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組織型態和它稱做「政黨頭目」（boss）的黨工運作模式做爲它經營基層社會的模式。

美國城市政黨組織稱作「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而它的組織領導者稱爲「政黨頭目」（boss），此機制溯自於 1789 年紐約市的「聖坦慕尼會社」（Society of St. Tammany Hall）。該會社原是以社會救濟、職業介紹、就業服務等以服務社會爲宗旨的社團組織。自 1850 年代起由於該會社影響力深遠，被民主黨紐約市利用及轉型成爲該政黨提名、人事分贓、控制選舉的政黨組織。黃文齡指出就該政黨機器的組織結構而言，它是一個「因地制宜」的地方政黨組織。其內部組織結構呈現多樣性且呈金字塔型排列，最上層的領導階級稱爲「政黨頭目」（boss），之下有「次層頭目」（sub-leaders）、「地區頭目」（district-leaders）、「選區頭目」（ward-leaders）、「區隊長」（precinct-captains）等各司其責。其

[26] Andrew Heywood，楊日青等譯，同註 23，頁 400-401。

[27]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曹衛東、王曉珪、劉北城、宋偉杰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Offentlichkeit,2nd.ed.*）（台北：聯經，2002 年），頁 264。

[28] Mancur Olson，董安琪譯，《集體行動的邏輯》（台北：遠流，1991 年），頁 112。

[29] 蔡詩萍，同註 1，頁 239-240。

[30] 何來美，《劉黃演義－苗栗近代政治史話》（台北：台灣書店，1997 年），頁 11-16。陳曉慧，同註 3，頁 210。

內部組織體系是一個權責分明、正常運作的工作網絡，每個成員都必須嚴守紀律、絕對服從[31]。

黃文齡的研究認爲早期美國「政黨頭目」（party boss）的社會關係是建立在人民的「社會需求」和資本家的「政治需求」之上。所謂社會需求是人民希望能透過政黨頭目來獲得各種日常生活必需的援助；而所謂政治需求則是人民或資本家希望透過政黨頭目的運作以獲得特權或特殊利益。政黨頭目和政黨機器不僅能適時伸出援手，也能做爲他們聯絡的管道。只要民眾有問題，找到政黨頭目必定能夠獲得解決或者得到適當的指引，所以，政黨頭目與基層人民之間自然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基礎[32]。

而在生活層面上，政黨頭目與當地人民的關係更密切。政黨頭目非常重視酒館（saloon）的功能，拉攏酒館主人、在裡頭與人民喝酒聊天、噓寒問暖及聯誼互動等和人民的關係運轉至顛峰。而政黨頭目的「了解選民」和「信守承諾」及「平易近人」等特質也吸引了人民的支持。他們工作非常努力，人民隨時隨地都可找到他們，問題也立刻可以獲得解決，這種「馬上辦」的精神絕非按時上下班的官僚所能做到。政黨頭目融入基層人民的生活中，並適時伸出友誼之手，基層民眾身分低微，若有人伸出援手或信守對其所做之承諾，他們必會以感恩的心情對待這份受人重視的禮遇，這種心情很容易轉變成對政黨的效忠與回饋選票。另一方面，對資本家而言，政黨頭目和政黨機器是其與政府溝通或獲得特殊利益的便捷管道。私人企業需要政府的特許權狀和執照以拓展事業若遇有障礙時，政黨頭目可適時搭起政府和商人溝通的橋樑，因此資本家與政黨機器的關係也因此形影不離[33]。由於政黨頭目掌控地方黨部的政治機器，以物質利益動員選民、拔擢候選人並扶植其當選、任免人事等，因此他們成爲正式政府架構之外的實際掌握統治權力者[34]。

國民黨基層黨工在融入基層人民的生活工作本質、內容和廣度上與美國城市政黨機器之政黨頭目（party boss）上確有相似性。劉義周的參與觀察研究發現，國民黨民眾服務社黨工與社區民眾的日常接觸頻繁，他們與鄉鎮市區內地方領袖甚爲熟識。他常見這些黨工在政見發表會中、晚宴中、會議裡，與地方居民討論地區內一般事務，例如路燈之設置、公共工程補償等。他指出積極的區黨部書記尤其是關鍵人物，他們有過人的酒量，認識大部分地方領袖。這種平日建立起來

[31]黃文齡，〈美國進步時期城市政黨組織與下層人民之互動關係之研究〉，《歐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1 年），21 卷、3 期，頁 54-55。
[32]黃文齡，同註 31，頁 58-59。
[33]黃文齡，同註 31，頁 61-63。
[34]吳重禮，同註 5，頁 189。

的友誼，使他們有效的掌握地方的人際關係網；到了選舉時，以此人際關係爲中心的輔選組自然就織順勢成形[35]。

此外，劉義周認爲黨工是國民黨候選人贏得選舉的關鍵人物。他指出，國民黨民眾服務社所維持的人際關係網絡，對初次競選的候選人而言尤其是最重要的憑藉。因爲大部分的選民與候選人很難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候選人常需透過國民黨區黨部與地方領袖做「直接的」溝通，然後再透過地方領袖「間接的」與選民搭起溝通橋樑。國民黨區黨部對地方領袖所做工作的成敗，就決定了直、間接溝通的效果，地方黨部工作成效愈佳，助選的功能愈顯著[36]。

國民黨退職黨工詹碧霞描述她的黨工生涯時指出，「專職黨工的信念就是靠服務來爭取民眾的選票，鞏固國民黨的政權。黨的機器雖然是一體成型，由中央發號司令，但如何在基層爭取選票，票票落櫃，那就是國民黨區黨部書記，在當地人稱民眾服務社主任的本事了」[37]。黨工蔡育全也表示，黨工雖然不是，也不同於地方政府機關公職人員。但是他們在地方公共事務中卻扮演多元化的角色，因此他認爲「黨工是社會工作者，也是社會運動者和社會的潤滑者」[38]。

因此，本文針對地方公共事務中既讓人感到熟悉，卻又蒙上一層神秘面紗的國民黨「基層黨工」此議題做研究，可說是一種新的嘗試。同時基於展現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關懷，作者認爲對於國民黨黨工在地方社會中的生活歷程與意義得以發掘瞭解，或可補充「台灣經驗」的內涵，當是本文的貢獻。

參、關係發展理論

在確定本文研究對象之後，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的基層黨工是如何深入基層、走入群眾來建構其社會基礎呢？作者認爲王振寰的論述頗爲貼切。他說「關係取向的社會網絡連帶和文化滋養了台灣的政治。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只要做好關係即可，而不必要有政見和想法，更不必擔心政策的公共討論和議論」。因此，他認爲「台灣式的民主特色就是人情關係重於對政見和政策的關注」，台灣的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都要靠著平時的選民服務，例如法律服務、參與婚喪喜慶、政治關說等來構成他們層層的社會網絡[39]。

這種人情交往、關係取向以及透過人情及關係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網絡關係，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人脈關係」，應是國民黨黨工運作之主要力量。國民黨除了

---

[35]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92 年），第 60 期，頁 216。

[36]劉義周，同註 35，頁 228。

[37]詹碧霞，《買票懺悔錄》（台北：商業週刊，1999 年），頁 211。

[38]蔡育全，〈「黨工」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行〉，謝鴻儀主編，同註 3，頁 89。

[39]王振寰，〈台灣式的民主：一些觀察〉，蕭新煌主編，《考驗台灣命運》（台北：允晨，1995 年），頁 295。

透過它的民眾服務站使其權力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角落之外，也經由爲數眾多的基層黨工與地方民眾建立關係網絡，藉著人情交往與感情建立，來維繫其社會基礎。

一、關係網絡理論的解釋與應用

（一）關係的意義與性質

1、「關係」（relationship）的定義

政治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認爲「關係」是人與人之間因認識或認同的「連帶」（ties），它涉及兩造間的「相同」或「感情」[40]。「關係」無所不在，它影響著每一個人、每一樣行爲，它可簡單的解讀是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在商業行爲及社交活動中，它可保障或獲取資源與利益，因此關係被視爲「有價值的資產」[41]。我們可說「關係」基本上是一種長時期、多面向、雙向的溝通行爲，當許多個體彼此間因爲直接或間接的人情關係而得以相互連結成一個網絡時，我們稱這樣的網絡爲「人情關係網絡」[42]。

個人或企業考量人情的因素時，基本上是傳統的以「自己」爲中心的「差序格局」往外推展，「人情關係」的運用會是理性的選擇以主導經濟交換。其次，除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網絡關係之外，個人參與組織活動時還會考慮到該「組織」的價值觀。我們在研究產業網絡中確實發現到人際關係網絡會隨著「情勢」改變而改變，同時也會隨「組織」所存在的價值而運作，因爲組織的價值能夠實現個人的交換效率、資源累積與正當性三種利益。因此，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會考量前述三種利益而做出經濟理性的決定[43]。

2、社會網絡即社會關係

黃毅志與張苙雲、譚康榮以及羅家德等學者指出在網絡分析圖上，關係網絡的建立剛開始是由個人的「節點」（node）與他所「認識」的其他「節點」之間串聯起來的「關係」或「線」（arc 或 line）所組成。有了這些「線」才有關係網絡的「面」，結合許多的線與面再形成網絡結構即「社會網絡」（social

[40]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台北：允晨，1997 年），頁 35。
[41]葉正綱，《中國消費市場行銷策略》（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2002 年），頁 103。
[42]王輝煌、黃懷德，〈經濟安全、家族、派系與國家：由制度論看地方派系的政治經濟基礎〉，徐永明、黃紀主編，《政治分析的層次》（台北：韋伯文化，2001 年），頁 119-121。
[43]張苙雲、譚康榮，〈形構產業網絡〉，《網絡台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台北：遠流，1999 年），頁 49-50、頁 271-277。

network）。換言之，「社會網絡」指的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社會關係」。一般來說，社會階層越高者他就有越大的社會網絡，參與組織活動的也越多[44]。

至於「社會關係」的定義，張維安、陳介玄指出，「社會」是指人與人互動綿延的一組秩序或規律所形成的結構體，可以說是某種「生活結構」，它意味著人在生活中所經歷的一些不斷重複瑣事而成的常數。而「關係」則意指在前述的結構體當中所建立的特別感情和維繫情誼網絡，人們依此從事人際互動和活動。而人際關係所建立的基礎是行動者兩兩之間因爲認識和往來所形成的社會關係網，對個別的行動者有社會控制的作用，這種作用社會學者稱之爲「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所謂「鑲嵌」（embeddedness）就是指社會關係網絡，鑲嵌的出現是源自以血緣爲基礎的初級人際關係網的「初級連帶」以及傳統的同學、同事、同鄉、同好、同業等「五同關係」所搭建起來的社會關係網，簡言之，社會鑲嵌的代名詞就是「人脈」[45]。

3、國外關係網絡之相關研究

「關係網絡」（networks）成爲社會科學研究探索的對象始自 1970 年代，美國心理學家拉普波特及荷瓦士（Anatol Rapoport and W. Horvath）、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及管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等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找到模式來解釋。

美國心理學家拉普波特及荷瓦士（Anatol Rapoport and W. Horvath）於 1961 年以密西根州一所中學的一千位學生做實驗，來測試人際關係在訊息擴散上的效果。他們從研究對象的「人際關係網絡圖」中，顯示「好朋友」使人際網絡圈圈變小，「泛泛之交」使人際網絡的圈圈變大。因此，某個謠言若只在好朋友之間傳播，只會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傳來傳去影響不大。反之，若謠言經由「泛泛之交」傳播就會傳得寬廣。所以，「泛泛之交」多的人可以在建立情報網、經營知識創新、就業徵才、口碑行銷、建立客戶關係、尋找商業夥伴上占優勢[46]。

美國心理學家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1933-1984）於 1967 年在美國中部的內布斯加州及堪薩斯州以隨機抽樣選出一批實驗者，寄信給他們請他們把信轉寄給設定在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但卻沒有書明地址的實驗對象。受測試者接到此封請託函後也將信件寄給他們認爲「有可能」幫助他完成此任務的友人，如法炮製的結果，出人意料的這些信被轉寄不到六次就寄達收信人處。也就是說轉寄的

[44]黃毅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巨流，1999 年），頁 111-113。張苙雲、譚康榮，同註 43，頁 22。羅家德，《企業關係管理》（台北：聯經，2003 年），頁 76-82。

[45]張維安、陳介玄，〈把生活結構放進來－三個台灣企業研究個案的分析〉，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 年），頁 188。

[46]Mark Buchanan 著、胡守仁譯，《連結－混沌複雜之後，最具開創性的「小世界」理論》（*NEXUS：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science of Networks*）（台北：天下文化，2003 年），頁 67-69。

中介者不超過六人，因此他提出了「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概念[47]。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管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在 1973 年發表了「弱連帶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論。他把家人或好朋友、同事之間的情誼稱爲「強連帶」（strong ties），而點頭之交之間的連結稱爲「弱連帶」（weak ties）。管諾維特指出「強連帶」指的是一種經常互動，具有高度情感涉入，甚至多重連帶的關係，舉例來說，某個人和他妹夫一起工作，兩人也是好朋友。他們之間就包含了三種連帶：工作連帶、親屬連帶和朋友連帶。「弱連帶」也在我們社會中隨處可見，它指的是一種低度情感涉入的「點頭之交」。但是，弱連帶它可以發揮橋樑作用，讓人際關係網絡得以開展，並有助於資訊的流通和獲得，它扮演著維繫整個人際網絡的關鍵角色，因此，他認爲弱連帶要比強連帶來的重要[48]。

管諾維特雖然提出了「弱連帶優勢」概念，認爲弱連帶提供了人們取得自身所屬的社會團體之外的訊息與資源的管道。但是，他也指出「強連帶」可以傳遞影響力和信任、情感支持，對人際互動有較大的助益，尤其對處在「不安全位置」(insecure position)的個人更有幫助。所以也不能忽視強連帶的重要[49]。但是，強連帶之所以強，就是因爲互動較多，必須投入較多的資源和時間來加以維繫，除對社交時間會產生排擠效果外，也將使一個人的關係網絡變小，所以一群好朋友之間自然會成爲一個小圈圈[50]。

至於要如何判斷什麼樣的關係是強連帶或弱連帶？管諾維特認爲可藉由連帶的「強度」，包括認識時間的長短，情感的緊密程度，可以相互傾訴的親密性以及互惠的服務內容來予以判定[51]。前揭社會心理學者對於人際關係網絡的實證探索成果，帶給社會學研究新的視野，發現關係網絡有了客觀之規律，得以將科學方法浸潤入社會學的新途徑。

4、國內人情關係與關係網絡的研究

國內有關人情關係與關係網絡的研究大都被採用於社會心理學方面。社會學者張苙雲、譚康榮與張維安、陳介玄以及高承恕等以關係網絡理論來研究台灣中小企業中，企業主所呈現的社會關係網絡頗有建樹。張苙雲、譚康榮的研究指出，台灣中小企業的創業與供需產銷是循著中國文化特色之企業主個人的「強連帶」和「弱連帶」向外伸張網絡而進行。台灣經濟個體的成功和發長奠基於台灣社會

[47]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18-20。
[48]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65。
[49] 羅家德，同註 44，頁 55。
[50]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61。
[51] 羅家德，同註 44，頁 57-58。

特有的社會關係網絡，而這些關係網絡包含著能提供訊息與資源管道優勢的「弱連帶」以及對企業主有較大助益之「強連帶」[52]。

至於運用關係網絡理論於政治學領域上的研究則較少見，陳介玄曾用來解析地方派系的現象，他指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人情與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絡與人際互動場域。同時關係網絡也解釋了派系本身就是人情與關係的再製者，派系借用了「人情」與「關係」的結構發展，使它得以透過選舉成熟化到具有政治支配力的基礎。因此，政治學者白魯恂 Lucian W. Pye 也認爲「人際關係網」與「人際關係網」結合起來就構成了派系的基礎[53]。

二、關係發展階段之研究

國內現有學術領域中有關關係網絡的發展理論建構或研究大都傾向於企業界現象。社會心理學者鄭伯壎指出關係網絡的發展事實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但是「爲了方便學術分析與提供學習者瞭解相關模型」，鄭伯壎將關係發展階段區分有「進入」（認識）、「試誤」（變遷）、「穩定」（維持）與「離開」（終止）四個階段[54]。居延安也認爲關係有「建立」、「發展」、「衰退」及「終止」的「關係生命過程」四個階段[55]。至於國外 John Egan 研究顧客關係的發展演進時則引用 Dwyer 等人在 1987 年所提論點，將顧客關係的發展區分成「認識」（awareness）、「探索」（exploration）、「擴展」（expansion）、「承諾」（commitment）到「解散」（dissolution）五個階段[56]。試簡述如下：

（一）居延安的「關係發展生命過程四階段論」

居延安將關係發展的過程分爲四個階段：即第一階段的「關係的建立」，第二個階段的「關係的發展」，第三個階段「關係的衰退」以及第四個階段的「關係的終止」。

---

[52]張苙雲、譚康榮，同註 43，頁 19。

[53]陳介玄，〈派系網絡、椅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 年），頁 50。

[54]鄭伯壎，《組織網絡的形成及其相關因素的探討》（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1996 年），頁 12-18。

[55]居延安，《關係管理－企業的虛擬發展與人本再造》（*Relationship Management*）（台北：楊智文化，2003 年），頁 292-311。

[56]John Egan、方世榮譯，《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台北：五南圖書，2002 年），頁 194-196。

1、第一階段：關係的建立

居延安以美國學者 L. Altman 與 D. Taylor 在 1973 年提出之「社會滲入理論」（Social Penetration）來說明關係的建立。該理論認爲「潛在關係夥伴」剛開始建立關係時係靠著直接的接觸或者是間接的透過朋友、同事的介紹，但是無論是用直接或間接方法總是免不了潛在關係夥伴的親自交流和溝通。關係建立初期還要考量其必要性、雙向選擇問題、初期互動問題、遊戲規則，因此往往需藉助社會禮儀與遊戲規範來指引相互之間的互動。例如「自我介紹」、「以禮相待」、「投石問路」等都是陌生人之間開始交往所必須遵循的遊戲規則。

2、第二階段：關係的發展

潛在關係夥伴一旦建立起關係後就進入關係的發展階段。新建立的關係中，關係夥伴彼此間對對方的經驗和角色、能力瞭解不多，雙方一般都會進行試驗、整合和遵循互動遊戲規則，使得「關係文化」逐步形成。所謂關係文化是指關係夥伴在建立關係過程中所形成的行爲模式、價值規範、象徵系統的總和。關係夥伴角色的相對確立是關係走向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因此，關係發展的過程也可以說是關係文化逐步建立的過程。

3、第三階段：關係的衰退

關係發展到什麼時候會開始衰退並無定論。但是關係衰退呈現的就是關係夥伴之間逐漸的停止了對關係「生命之樹」進行「澆水施肥」所外顯的關係冷淡、激情喪失，或是衝突。

4、第四階段：關係的終止

在經歷了關係衰退階段之後，大概都已有關係終止的心理準備。居延安認爲關係終止似乎是一場悲劇的錯誤觀念需要予以糾正。他說事實並非如此，有許多關係是「自然中斷」或者是「好聚好散」。

（二）Dwyer 等人的關係發展演進五階段論

John Egan 引用 F. R. Dwyer 和 P. H. Schurr 以及 S. Oh 等三人於 1987 年所提的「顧客關係發展五階段論」，認爲關係的發展從「認識」（awareness）、「探索」（exploration）、「擴展」（expansion）、「承諾」（commitment）到「解散」（dissolution）有五個階段，通常都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演進：

1、認識（awareness）

「認識」意指一方認知另一方是「一個可行的溝通對象」，互動雖已就此展開，仍有許多「立場」與「態度」待調整來提高彼此之間的吸引力。

2、探索（exploration）

「探索」指的是彼此在關係互動中「搜尋與嘗試」的過程，潛在的關係夥伴會考慮建立關係所應承擔的「義務、利益及負擔」。在此探索階段有五個互相「找尋與嘗試」的步驟，分別是吸引、溝通與協商、權力的發展與運用、關係的規範化以及期望的發展。

3、擴展（expansion）

「擴展」意指關係夥伴所獲得的利益持續增加，彼此間的相互依賴亦提高。它與前述探索階段之最主要區別在於雙方不但已有初步的信任與相互的滿意，更願意增加「風險的承擔」，彼此之間互相傳遞資訊、提供協助以及對方困難時伸出援手等使關係發展得更爲穩固。

4、承諾（commitment）

「承諾」指的是關係夥伴願意以隱性或顯性誓約讓關係持續下去。在此階段中，雙方發展出相互預期之角色與確定性，建立了「信任」的效率性（efficiency）與效能性（effectiveness）。

5、解散（dissolution）

「解散」是最後不得已的選擇與可能性，雖然關係的發展未必會走到這個地步，但是關係中止或脫離亦是完整模型的一部份，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三）鄭伯壎的關係網絡發展四階段

鄭伯壎在研究組織網絡發展的形成是採取「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他認爲關係的建立、演變與消長有「進入（認識）」、「試誤（變遷）」、「穩定（維持）」與「離開（終止）」四個階段。

1、第一階段：進入（認識）

鄭伯壎引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教授 Andrea Larson 之研究，認爲人際關係發展初期，潛在關係夥伴建立關係會考量「之前的關係」（prior relations）和良好的「信譽」（reputations）之「雙元」（dyads）因素。這兩個因素可減低雙方互動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也可以增加預期及加強早期合作的機會。Larson 指出建

立信任的前提是「誠實」，有了誠實才可談信任，信任與誠實是人們建立人際關係的基礎[57]。印地安那大學商學所教授 Dollinger 則指出，關係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會由雙方先建立互動關係，彼此經過互動，看雙方交往是否有利，找出交易或互動的最大效益及最小成本，並設法提高自己在互動網絡中的地位，進行「損益矩陣」(payoff matrix)[58]。因此，在建立新的關係過程中，關係夥伴互相之間一般都會進行試驗或探索。

2、第二階段：試誤（變遷）

由於關係夥伴雙方因瞭解不夠，會進行試驗來看對方是否稱職。鄭伯壎引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授 Hans B. Thorelli 於 1986 年發表的「網絡動力四階段論」（Nework Dynamics）理論指出，在潛在關係網絡參與者在建立關係的第二階段的「定位」（positioning）與第三階段的「再定位」（repositioning）過程中，常會以「經濟基礎」、「科技」、「專業」、「信任」、「合法性」五個因素互動來相互評估克服關係進入之障礙，並在網絡關係中「定位」（position）自己的位置[59]。

3、第三階段：穩定（維持）

關係建立（Conditions to Build）時，關係夥伴雙方在經濟利益上的「互惠」（reciprocity）以及心理感情上的「互信」（trust）則是建立彼此關係網絡所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此外 Thorelli 強調在關係網絡上「個人特有的」（person-specific）人格特質、權力、專業、可信賴的感覺與社會連結要比組織所賦予他的關係網絡來得重要。

4、第四階段：離開（終止）

關係從「衰退」（decline）到「脫離」（Exit）之前的整個過程可說是定位與再定位「循環持久不斷的歷程」(perpetual process)，關係中斷或脫離的可能性是「關係發展」階段完整模型的一部份。

綜上所述，居延安的「關係生命過程四階段」以及 Dwyer 等人的「關係發展五階段」的概念和鄭伯壎的「關係發展四階段」、都有共通性以及可以相互印證的，作者試做簡表如下：

關係發展階段的比較：

---

[57]Larson, Andrea “Network Dya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7,（1992），pp.85-97.

[58]Dollinger, Marc J. “The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strategies in fragmented indust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5. No.2（1990），pp.272-279.

[59]Thorelli, Hans B. “Network：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7, （1986），pp.42-44.

關係發展理論 / 發展階段	居延安（2003） 關係生命四階段	Dwyer et al（1987） 關係發展五階段	鄭伯壎（1996） 關係發展四階段論
第一階段	1、關係建立時期：潛在關係夥伴開始接觸時，常需藉助社會禮儀與規範來引導彼此的互動行爲。	1、認識階段：若一方認知另一方是「一個可行的交易對象」，互動就此展開。	1、進入（認識）階段：在此階段有賴於「之前的關係」與個人「聲譽」。
第二階段	2、關係發展時期：互動雙方的角色經過試驗和確立，彼此遵守遊戲規則，「關係文化」自此逐步形成。	2、探索階段：在找尋與嘗試的過程中，彼此吸引、溝通、運用權力、關係的規範及相互期望對方角色爲何來進行相互探索。	2、試誤（變遷）階段：雙方因瞭解不夠，會進行測試對方是否稱職，「角色」的確立是關係再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階段	3、關係衰退時期：關係夥伴間若停止對關係的生命之樹進行澆水施肥可能呈現關係冷漠現象。	3、擴展階段：雙方已有了初步的信任與相互的滿意，彼此相對應之互賴性提高。	3、穩定（維持）階段：個人的人格特質、權力、專業、可信賴的感覺比組織所賦予他的關係網絡更重要。
第四階段	4、關係的終止：彼此關係會因感情冷淡或是衝突而中斷或是好聚好散。	4、承諾階段：雙方發展出相互預期之角色、信任或承諾使關係得以延續下去。	4、脫離（終止）過程：關係中斷或脫離的可能性是完整模型的一部份。
第五階段		5、解散階段：關係發展未必會至此地步，但關係中斷或脫離也是模型的一部份。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在方法論上，「質的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可使研究者分享和了解研究對象的主觀想法，了解研究目標之過程、事件、關係、社會環境的背景脈絡[60]。本文有關國民黨基層黨工關係發展的研究，主要係描述性與探索性（exploratory）的研究，因此針對苗栗縣現任、退休黨工的關係建構和發展以「個

[60]Chava Frankfort-Nachmias ＆David Nachmias 著、潘明宏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下》（*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台北：韋伯，1999 年），頁 195-221。

別深度訪談」（individual face-to-face interview）與「焦點團體座談」（focus group interview）予以研究。

（一）個別深度訪談法（individual face-to-face interview）

個別深度訪談法是「質化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的一種，它是研究者針對研究旨題與受訪者之間的概略互動，並不使用一定用詞與順序的問卷來詢問特定的問題。換言之，個別深度訪談的本質是使受訪者願意敘述其過去的生活史，或說明發生在過去的事（something happened in the past）。它突破傳統上取自於文字來源的歷史限制，尤其適合用於較少使用文字的弱勢者，它的重要性就在於其能戳破時空、重新建構歷史的積極意義。而訪員也有其能力，使個別角色在訪談中得以發揮，因此最理想的情況是由受訪者負責大部份的談話。雖然個別深度訪談法是以個人經驗爲主的研究方法，並非社會學的主流，但是越來越多的社會學者已體認到其在歷史學領域上的重要性[61]。

本文採取「標準化開放式訪談」（standardized open-end interview）方式，將歷史的取材、資料來源與詮釋權回歸於國民黨基層黨工，讓他們暢談在歷史脈絡中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建立人際關係網絡與社會群體間的關係，並藉由探討影響關係網絡建立的結構因素及其效果，來分析國民黨黨工關係發展的形成、維繫及其變遷歷程（訪談大綱如附件一）。

（二）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interview）

「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又稱「焦點訪談法」（focused interview），屬於團體訪問的質性研究方法。它藉由一群參與者在相互激盪中所發表之言論，提供大量的對話內容而獲得相關資料。它可提高團體成員的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程度，所蒐集的資料是以團體成員之間互動討論的言詞內容爲核心。特點是可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蒐集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話，由於焦點訪談法允許被研究者陳述其個人之反應資料、特殊情感；同時屢屢激發出超乎研究者意料的焦點，非以個人訪談所可能得到的資料，因此，它具備了經濟便捷性、互動動態性、廣角探索性、意料之外的發現可能性等特質[62]。

---

[61]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f of Social Research,8th. Ed.*）（台北：時英，1998 年），頁 455。游清鑫、鄭夙芬、陳陸輝合著，《面訪實務》（台北：五南，2001 年），頁 65-68。Floyd J. Fowler, Jr. ＆ Thomas W. Mangione 著、黃朗文譯，《標準化的調查訪問》（*Standardized Survey Interviewing*）（台北：弘智文化，1999 年），頁 75。

[62] 李美華譯，同註 61，頁 385。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1996 年），頁 223-237。Richard A. Krueger ＆ Mary Anne Casey 著、洪志成、廖梅花合譯，《焦點團體訪談》（*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嘉義市：濤石文化，2003 年），頁 8-12。黃朗文譯，同註 61，頁 25。

二、研究對象

本文受訪個案的選取係採取「非隨機抽樣」（nonprobablity sampling）中的「滾雪球抽樣」法，此法又稱「偶遇抽樣」（accidental sample）。它是透過研究對象的人情連帶，由他建議找出另外其他研究對象的累積過程。而選擇「資料提供者」（informants）係指背景資訊組合相似的人士或團體，亦即研究者可以和他們直接談論該團體所有事務的成員[63]。

位於台灣中北部的苗栗縣，同時集合了客家、閩南、「泰雅」和「賽夏」原住民等多族群的生活型態。本文作者在苗栗縣基層服務二十餘年，並在該縣中港溪、山線客家、海線閩南以及住有原住民、眷村鄉鎮等不同形態的七個鄉鎮以及縣級單位的服務經驗，選擇苗栗縣作爲研究對象，既是地利之便，亦有進行深度訪談的人脈奧援實務之利，這是一般學者或研究者所缺乏的條件與視野。

當然僅以苗栗縣的鄉鎮民眾服務站及其所屬黨工爲研究對象，有可能會面臨資料蒐集的疏漏及研究面向不足的情形，則有待後續之研究補充。本文採取「立意抽樣」與「滾雪球抽樣」方法，首先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透過關係，聯繫拜訪退休與現職黨工取得其協助後，接著再由這些初始受訪者推薦其他受訪者再逐一聯繫拜訪（訪談名冊如附件二）。在實際執行訪談時確有困難出現，例如有些黨工顧慮職業倫理、業務保密，或存有防衛的心理而出現拒訪或避重就輕情形，均需作者逐一克服。

三、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的範圍在時間上，溯自 1945 年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台建立組織至 2004 年 4 月總統大選之後，大約六十年之久。但是在分析旨揭關係網絡發展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時間長軸上（locus）歷史背景及社會發展之殊異，也就是說時空的差異性。

在有關台灣政治變遷的歷史分期上，學者陳明通將台灣政治變遷的時段分爲：一、從台灣光復（1945）到國民黨撤退來台（1949）的「戰後初期」；二、從國民黨撤退來台到國民黨改造、完成土地改革後（1953）的「威權統治重建時期」；三、從威權統治重建期完成到反對黨成立（1989）止的「威權政體鞏固時期」；四、從解除戒嚴（1989）到政黨輪替爲止（2000）的「民主轉型時期」；五、從政黨輪替（2000）到目前爲止的「政黨競爭期」五個階段[64]。

---

[63]李美華譯，同註 61，頁 304-306。

[64]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1995 年），頁 11-12。

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前黨工謝順欽以其多年主持台灣省黨政關係業務經驗，將國民黨的黨政關係歷程隨國內政治環境的不同區分爲：一、民國 39 年（1950）至民國 58 年（1969）的「以黨領政」時期；二、民國 59 年（1970）至民國 66 年（1977）爲「以黨輔政」時期；三、民國 67 年（1978）至民國 80 年（1991）爲「黨政分工」時期；四、民國 80 年以後至民國 89 年（2000）爲「黨政分際」時期等四個時期[65]。

本文作者綜合他們的政治歷程佐以本文之觀察予以區分爲：一、自台灣光復（1945）到國民黨改造前（1949）的「台灣光復初期」；二、國民黨改造後（1950-1960）之「國民黨改造後時期」；三、從國民黨改造後（1961）到民進黨成立前（1986）的「一黨獨大時期」；四、從民進黨成立（1986）、解除戒嚴到政黨輪替前（2000）之「民主轉型期」；五、政黨輪替（2000）後的「政黨競爭時期」等五個階段。本文以這樣的五個階段做爲黨工關係發展的研究歷史分期，配合前述的關係理論概念進行訪談，來探析國民黨基層黨工在不同階段、不同時代背景的關係網絡變遷過程。

伍、黨工關係網絡的研究

社會學者對於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維持、變遷的研究論點容有相異之處，但基本上均可能會經歷如鄭伯壎的「進入（認識）」、「試誤（變遷）」、「穩定（維持）」、「離開（終止）」四個階段。或如居延安所指的關係的「建立」、「發展」、「衰退」及「終止」的階段。本文認爲居延安的關係的生命四個階段論述簡單明白，因此，藉由該理論與國民黨基層黨工的訪談，來瞭解他們建立關係網絡的經驗。

一、台灣光復初期（1945-1949）

台灣光復初期，地方行政機關大抵延續日據時期之建制，鄉鎮公所人員大都由政府任命日據時期的街庄役場「助役」來接管並暫代職務。直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於民國 34 年（1945）12 月 26 日公佈「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成立方案」作爲各級議會、鄉鎮民代表及縣、鄉鎮、村里長設置之依據，並進行辦理公民宣誓登記以及公職候選人檢覈，當時辦理公職候選人檢覈多得讓學者有「有知識者不約而同的想走進政治的窄門」之嘆[66]。

而早在民國 31 年（1942）9 月始，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即開辦「台灣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由翁俊明兼班主任，招考首批台籍或閩、粵籍青年學員六

[65]謝順欽，〈黨政關係六十年回顧〉，謝鴻儀主編，同註 3，頁 92-98。
[66]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 年），頁 16-18。

十人，受訓三個月，派往到台灣地方從事黨務工作[67]。因此，台灣光復初期的黨工可說並非台籍人士擔任，他們是以開疆擴土的精神到各鄉鎮發展黨務。

（一）關係建立階段

「信任」是關係建立時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個人長期經營關係網絡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取得他人的信任，進而因受到他人的信任而獲得友誼[68]。受訪之退休黨工表示，他在民國 35 年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地方從事黨務工作時，台灣地方上就已經成立有區黨部委員會的組織和黨員，那個時候鄉鎮長擔任常委，委員有代表會主席、學校校長等。而他到地方的第一個關係建立對象就是當地的鄉鎮長，獲得他的信任進而得以發展組織。他們在關係的建立上則是先從拜訪認識黨員開始，再由黨員以關係連帶來介紹認識其親朋好友，再循線串聯起全面的關係網絡。

> .....在（民國）35 年的時候.....被派到「大台中縣」的埔里做區黨部的工作.....（R2－2）。.....35 年就有區黨部委員，委員是推薦的，鄉鎮長當常委.....（R3－2）。到區黨部第一個我是找鄉長，要跟鄉鎮長關係搞的很好.....然後拜訪黨員.....我是先認識黨員，由黨員介紹認識其他人（R4－1）。

（二）關係發展階段

關係發展的過程會有如 Dwyer 等人所指的「擴展」和「承諾」階段。「擴展」意指關係夥伴經歷過探索階段後，雙方已有了初步的信任與相互的滿意，而彼此間的相互依賴也相對的提高。黨工在地方以拜訪來和黨員博感情及廣結善緣，他們的關係發展途徑卻是關係取向的。

> 區書記要跟鄉鎮長關係搞的很好，黨政關係搞好，工作順利推展。區書記和幹事要吸收黨員，編小組，召開小組會，所以一部份也要靠自己去建立關係.....（R4－5）。

---

[67]陳三井，同註 3，頁 120-124。

[68]Tom Richardson, Augusto Vidaurreta, with Tom Gorman 著、劉慧清、江郁清譯，《關係是一種策略性資產》（*Business is a contact sport*）（台北：臉譜，2003 年），頁 163；羅家德，同註 44，頁 117。

（三）關係衰退階段

民國 36 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後續整肅行動所引發的省籍、族群爭議成爲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關係疏離的最大原因。至於在微觀之個人方面，黨工與地方幹部關係的變化或中斷來自於選舉「提名制度」，受訪黨工表示：

> 我到 36 年成立區黨部以後，正好 36 年 2 月 28 號發生 228 事件，當時.....暴民.....，把我抓起來.....。戴村長從外面跑回來，跟暴民說這個人不能殺，他是我好朋友，因此暴民就沒殺我，.....。（R2－2）.....影響關係變化的原因就是選舉，你提名這個，他很高興，別人不高興，就不理你。.....（R4－3）

（四）關係終止階段

黨工與黨員、政治人物關係終止的原因源自於當時選舉提名作業、利害關係、政經利益或缺少互惠。退休黨工說道：

> .....影響關係變化的原因就是選舉，你提名這個，他很高興，別人不高興，就不理你。（R4－3）

二、國民黨改造後時期（1950-1960）

國民政府於民國 38 年撤守台灣之後，國民黨認知必須依賴本地的菁英才能掌握社會。在黨的改造時參考美國政黨機器的架構，在各地成立民眾服務站，開始招聘本省籍青年從事地方黨務工作。民國 41 年之後，國民黨地區黨部以「民眾服務站」爲名，以提供獎助學金、法令解答、技藝訓練、民眾補習教育、圖書閱覽、協助救災、急難慰問扶助、替民眾代寫書信訴狀、調解糾紛、義診的服務方式，試圖以此方式讓民眾獲得好感。

（一）關係的建立階段

民眾服務站在全省各地成立之後，所招募的黨工的條件除了要具備高學歷、熱誠、在地人以及與當地民眾沒有語言隔閡的鄉土優勢外，也要求他們勤跑基層，召開小組會議，透過服務工作建立起人脈關係並藉此贏取民眾的好感。

> 民國 35 年到 45 年之間，那個時候是 18 鄉鎮各顯神通，有借寺廟辦公的、有租的、有向鄉鎮公所借一張桌子辦公的.....（L3－1）。黨工的條件，我想應該是要地方人，那時後的學歷要求是要高中畢業以上，還要到省黨部考試.....（L2－2）。當時黨務基層的工作要求從基層小組做起，所以每天早晚都要去各里各里的去召開小組會.....（C3－2）。.....我們跟基層的鎮公所、農會、衛生所人員有感情外，跟一般民眾也都會認識。所以，你在基層跑，大家都會認識你（C4－1）。

（二）關係的發展階段

國民黨地區黨部對外以「民眾服務站」爲名，提供文康服務、圖書閱覽、急難慰問、替民眾代寫書信訴狀、調解糾紛的服務方式讓民眾好感，藉以穩固關係。

> .....在 43、44 年的時候，.....我們就成立「民眾夜校」，自己編教材，.....對於掃除文盲的工作做起來很有意義（H3－1）。
> .....那個時候比較多土地、房子糾紛，.....部隊演習的時候破壞老百姓農田，都要靠民眾服務站出面來協調，.....（C4－2）。

（三）關係衰退階段

影響黨工關係衰退的原因，源自於輔選成敗定英雄是黨工必然的宿命。選舉後的論功行賞的升遷他調，或者是輔選失利的人地不宜。職務調動到新的環境開展工作，都可能中斷了黨工原有服務鄉鎮所辛苦建立的關係。受訪黨工表示：

> 當然利益衝突，比如沒提名他，或是提名他的對手，也是關係變化的原因（T4－3）。影響關係變化的主要原因，還是在調職，一方面是時間不允許，一方面是調到一個新環境，要重新開始認識一批人（H4－2）.....。黨務工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好做過！所謂好做，只是人家選舉的時候回報你溫情，讓你覺得心血沒有白費.....（H6－1）。

（四）關係終止階段

對國民黨地方區黨部來說，贏得輔選與執政是它的根本任務。因此，選舉提名作業所引發未被提名者的反彈衝突、疏離或來自得不到政治資源者「利益」衝突因素使然，都是黨工與當地黨員或民眾關係終止的原因。

> .....國民黨對於違紀參選的派系領導人開除黨籍，派系人物-要嘛，怕！接受國民黨勸退，不選了。要嘛，違紀參選到底.....或者乾脆變成反對黨。（L6－2）

三、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1961-1986）

國民黨地方黨部的存在是因爲它能夠實現地方政治人物的利益，因此政治人物會考量經濟理性，例如權力資源的交換、爭取選舉的提名及考量未來的政治發展前途，以政治上的忠誠交換國民黨對他們未來的發展前程。所以黨部賦予了基層黨工在當地社會中扮演社會協調、溝通、領導之的關鍵角色和地位。

但是黨工在地方要建立關係與獲得關係網絡的擴展與穩固，他們仍須付出心力才能獲得。所以，黨工仍需主動拜訪、與黨員互動、召開會議、舉辦活動、參加婚喪喜慶融入當地社會，以密切的互動來穩定關係。隨著彼此認識時間的增長，可以和黨員相互傾訴及互惠性的內容擴展、情感漸趨緊密，而他們的表現若被當地人士接納，與地方領袖建立情誼，他們才能掌握地方公共事務的脈動。

（一）關係的建立階段

黨工在政黨組織系統建立穩固之後，他們在關係網絡的建立和方式即循著「關係文化」模式主動拜訪模式進行，方法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也就是說，他們是由現職黨工引領新人介紹拜訪，有關係拉關係的方式建立起網絡關係。而他們表示真誠、人格值得信賴是他們和黨員民眾建立良好關係的方式。

> .....強調清廉第一，不貪不取，重視品德操守，.....不要給人做文章，幹部相信我言行一致，可以信任，這就是我獲得他們信任的地方...（C4－4）關係的建立，第一就是職務上關係。另外就是親友跟同學的私人關係，建立在公、私誼.....還有老同事帶著去認識地方人士（S1－1）。那時前輩、同仁會帶我們一一去介紹認識、打點關係.....（F1－1）。我們新人通常是由主任、前輩帶領這樣去認識地方人士.....

（D1－1）。「真誠、信賴與接納」是我和黨員民眾保持良好關係的方式……，能夠完成長官交付的政治任務，自然有我的一套工作方式，而這種方式就要靠一顆好的「心」來支持（P4－4）。

（二）關係的發展階段

國民黨實施義務幹部制度讓更多黨員參與黨的活動，由於義務幹部大都具備熱心服務的人格特質，且背景愈相同愈有利於信任之建立的特點，他們與黨工之間自然形成「強連帶」的關係網絡，而不同的義務幹部類型也可以讓黨工透過他們將人際關係網絡拓展得更寬廣。黨工與當地黨員民眾建立關係的模式既定，因此拜訪互動、會議活動、服務與參加婚喪喜慶仍是他們建立關係的主要工作方式。

……八卦村沒有電，點那個石油燈，……經過我們溝通陳情，全村將近 100 戶人才開始有電，這是我印象最深也是那時黨部服務的效果（W3－3）。

……用真誠的聯繫、關懷和問候，由幹部、黨員、鄰居、民眾同心圓向外擴散逐漸熟悉，同時也以活動的推展，作為服務的橋樑，廣結善緣……（P4－1）。黨務工作就是人際關係工作，黨工在地方事務中必須……想到你是可以提供「服務」的，而且是熱心的、可以託付的人，這樣你被人家信任，黨員民眾有問題第一個找你（T5－1）。

（三）關係衰退階段

隨著黨員人數的增加，國民黨組織內部存在著上對下的僵化體系，缺少了下對上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長期下來使得黨員感覺其意見無法受到尊重，大多數黨員也沒有機會參與決策。加上當時「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政治意識型態、選舉立場與提名與否的對立，或者是利害關係的取捨，都可能產生政黨疏離感。

此外，台灣自 1970 年代起兩岸關係與台灣的主權地位成爲反對運動衝撞國民黨執政當局的政治訴求。因此，統獨議題勢必都有言論市場與投票支持者。統獨的認同分歧也愈來愈與政黨認同有密切的關係，甚至成爲政黨投票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所以，國家認同與省籍情結在這段時間影響了台灣政黨競爭的基礎

[69]。自 1984 年以來的實證資料分析中顯示，省籍、國家認同與政治價值等三種分歧是台灣政黨競爭與動員選民的基礎，也是主導台灣選舉的關鍵議題[70]。

民國六、七十年代國民黨面對當時「黨外」的挑戰與國際地位的不利，已感受到不得不朝本土化轉型的壓力，台灣省黨部主委宋時選當時引進救國團「親切、自然、實在」作風帶入國民黨組織體系中，要求黨工在工作方式上予以轉型來與黨員民眾建立互動關係。

> 到七十年代後，美麗島事件是一個分水嶺，解嚴的同時國民黨的權力慢慢削弱.....（J3－1）。.....還有宋時選要求的「親切、自然、實在」也是黨工建立與黨員或民眾關係最重要的因素（L4－4）。至於國家認同，國民黨自詡為中華民國的捍衛者，但當台灣本土意識高漲的時後，.....就勢必會造成國民黨的兩難.....（G5－2）。

（四）關係終止階段

在地方選舉過程中，黨員對於提名作業的不諒解依然是黨工與其關係網絡中斷或受到影響的最主要原因。

> .....每一次選舉就有一批黨員對組織不諒解，我想這是今天國民黨長期執政所造成的包袱（Y4－3）。

四、民主轉型期（1986-2000）

社會價值日趨多元化，政黨意識薄弱是正常的現象，人們對政黨的需求，可從意識形態的效忠至符合本身需要的利己主義型態之間作選擇，使得黨工平時建立的關係網絡與選民選舉投票行為之間「不必然」有正相關。隨著社會變遷與台灣本土意識的高漲，在選戰中這種人情交往、關係連帶的方式將不若心理的意識型態管用。

---

[69]徐火炎，〈選舉與台灣政黨重組的趨勢〉，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7 年），頁 256。

[70]徐火炎，〈台灣的選舉與社會分歧－政黨競爭與民主化〉，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163。

（一）關係建立階段

由於關係文化已逐步形成，所以黨工在發展其關係網絡的方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基本上還是以主動拜訪，有關係拉關係的方式建立他們的網絡關係。

> 我認為獲得黨員和民眾的信任最重要，無信不立，要當黨的領導幹部一定要獲得人家信任，否則調解糾紛、派系協調怎麼會讓人信服，所以我個人認為公正、有信用很重要.....（L4－4）

> 工作上我覺得組織所提供的網絡關係是好比是靜水，自己去跑、去經營的才是活水，靜水能變成活水，必需再付出更大的代價，.....（J4－5）。

（二）關係發展階段

在此時期，國民黨因組織系統龐大、黨員分屬於十八個省級特種黨部，黨籍各有隸屬，彼此之間平時欠缺橫向聯繫，產生了黨員聯繫及向心力式微等問題。而黨工關係網絡的發展仍係以推銷自己、親自拜訪的方式來進行。

> 黨工最重要一件事是會認人、在最短時間會記住人，而且要平易近人。.....最好是親自拜訪，平時就要做好聯繫服務，.....。常出去曬曬太陽，走出辦公室，才有人脈，.....（J4－2）

（三）關係衰退階段

近二十年來台灣頻繁的選舉，統獨意識、省籍的對立操弄與政治動員逐漸撕裂了地方社會中人際情感，朝野政黨極力爭取其基本票源與選民認同的同時，也喪失了另一個區塊的群眾基礎，1996 年總統大選後，國民黨開始檢討其組織架構是否合乎時代趨勢，「選舉機器」之議浮上檯面[71]。

> .....10 年前選舉，民進黨出來，民眾可以選擇就不一樣了，.....黨工平時的服務已經沒有效果，沒人領情，.....國民黨做好是應該，做不

好被罵得體無完膚.....（L6－1）。.....當社會不斷進步，黨部很難以所謂的交情來維繫關係，.....（G4－4）。

（四）關係終止階段

國民黨民眾服務站以三至五人的編制，卻要處理地方錯綜複雜事務和推動政黨工作，而在選舉過程中，常見黨員提名落空致對黨部不諒解，以抗議提名不公爲由退出國民黨。這種「權力」與「資源」的無法獲得，是黨工認爲係其關係網絡中斷的主要原因。

.....十年前的人就開始有利益、黨派、省籍情結衝突，這都是選舉和政黨競爭惡化民風的後果，雖然民主了，但民心已不古了，黨務工作也面臨苟延喘息的局面.....（T6－1）

五、政黨競爭期（2000--）

微電腦、通訊系統與網絡技術的資訊技術革命，根本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這種人類心智的根本轉變可以稱得上是「革命」[72]。網際網路(Internet)與「電子郵件」（E-mail）已是政治人物的新疆土，讓競選活動帶來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新契機[73]。網際網路(Internet)的方便、互動、沒法管特性，顛覆了傳統資訊及意見的傳播管道，使得網路使用者具有強烈的功能導向。政黨或候選人可以動員網友以電子郵件或網路動員來進行宣傳或群眾運動。因此，傳統依賴人脈關係的「兩階段傳播」模式已然崩解，改由網路取代[74]。

（一）關係建立階段

關係的建立是潛在關係夥伴之間靠著直接接觸或朋友同事的介紹，認識另一方是可行的交易對象的過程。從受訪黨工所描述的「不管在任何階段，黨務工作

---

[71]葛永光，〈選舉機器的理論建構-兼論國民黨的黨務改造方向〉，《理論與政策》，1996 年，頁 136-148。

[72]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台北：唐山，2000 年），頁 34-36。

[73]Dick Morris 著，張志偉譯，《網路民主》（*Vote.com*）（台北：商周，2000 年），頁 129、150。

[74]吳崑玉，〈網路政治：一個顛覆性的時代〉，《*Catch* 選舉》（第 5 期，1996 年），頁 32-33。

就是人際關係的經營，必然的要主動去認識週遭的人」。國民黨黨工面臨多黨競爭情勢依然是沿用舊法來建立他們的關係網絡，幾位年輕現職黨工表示：

> 我基本上是從鄉鎮市長、村里長、曾任公職或公務人員來開始認識，再擴展認識到村里小組長、區分部委員、社團幹部.....建立自己的人脈.....（Y4－1）。.....只要你勤於訪問，確實對建立關係很有幫助，.....對地方人士在最短時間就能互相熟悉。.....（A4－1）

（二）關係發展階段

黨工在此時期除了沿襲拜訪、活動與服務來建立其關係網絡之外，義務幹部制度也提供黨員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管道，因此強連帶的關係網絡然存在著。

> .....我們也提供很多舞台，.....我們聘他擔任義務幹部就有讓他在地方上表現的機會，讓他提高知名度.....去認識、發展、去結交更多的人（D2－1）。

（三）關係衰退階段

國民黨受困於心理層面上之統獨認同與省籍困擾，而資訊科技的進步也取代了人際網絡，國民黨透過黨工建構基層人脈關係網絡的方式疲態已露。黨工投入極大心力和資源建構其關係網絡，卻必然的面臨關係的冷淡、衰退、脫離，即因我們已經是處於一個社會變遷的時代。

> 資訊的發達取代了黨員的參加活動和聚會意願，也取代了民眾對政黨的依賴和需要.....（T5－2）。網路上言論常帶動民意與人心，掌握網路和大眾傳播媒體，自然能夠網羅民意。.....（J5－2）。

（四）關係終止階段

國民黨在 2000 年總統選敗選後進行其黨務改革檢討，除精簡裁員大半黨工外並實施鄉鎮市黨部的合併，因此各鄉鎮市民眾服務站的功能性已不若以往，也

不復往日門庭若市景象[75]。一位退休黨工受訪時感慨的表示「黨工即將走入歷史」，道出了這個趨勢之可能。若果真如此，本研究在因緣際會中竟銓釋了民眾服務站和無數基層黨工的歷史，爲基層公共事務的運作過程留下了些許紀錄。

> 由於過去國民黨區黨部是以鄉鎮為單位，區書記在一個鄉鎮活動，現在變成一個區書記要面對二至三個鄉鎮，很難面面俱到，基層實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專職黨工變少了.....（K6－1）

六、研究討論

社會學家 Amitai Etzioni 曾言「社會變遷是社會現象的改變，對社會變遷作研究可說是社會科學的重點，嘗試著探索這些現象與過程的機制，即掌握了時代脈動的精神」[76]。台灣光復後經歷了「二二八」與白色整肅、國民政府遷台與戒嚴、動員戡亂變局，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的設立舒緩了基層社會與國民黨的緊張關係。之後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情形下，中央的「萬年國會」與地方自治並存，關係連帶的講求與運作就成爲當時地方層次選舉的特色。我們可從歷次選舉觀察，在七〇年代前，黨外候選人的問政或選舉策略雖曾有省籍訴求，但國家認同問題並不突出。基層的鄉鎮市長、縣市議員、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社會關係的運作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換言之，在 1980 年前，社會關係網絡是政黨或參選人動員選民的基礎[77]。

國民黨爲了掌握台灣基層社會因此在各地設立「民眾服務站」，透過服務途徑來與民眾接觸，並藉由黨工擴展關係，早期確實拉近了國民黨與民眾的距離。誠如受訪黨工所言「以前農業社會大家重感情，只要肯努力，服務工作做得多，關係好、認識人越多，選舉的時候就會獲得回報，讓黨工覺得服務或關係建構的心血沒有白費」，我們當可了解到關係網絡在當時的選舉中是必要的因素。

但是隨著社會變遷，這種人情交往的方式已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在選戰中逐漸不管用。即便受訪黨工均認爲他們真誠、值得信賴、熱心、可以託付和勤跑基層，他們平時建立的關係網絡在近幾次大選結果顯示已不若以往，因此關係衰退的原因就是我們所要探悉者。我們了解選舉的投票行爲是受到許多複雜的因素影響的，例如意識型態、社會關係網絡、候選人的形象、公共政策、政黨表現和形象、社團身分、家庭社會化、甚至經濟景氣等。由於選舉是台灣社會中最大規模

---

[75]聯合報，民國 91 年 10 月 2 日，雲林縣地方新聞，版 18。

[76]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1995 年），頁 181。

[77]陳明通、林繼文，〈台灣地方選舉的起源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23-70。

的政治動員和政治溝通的時機，政黨不可能不利用選舉期間宣示它的主張與理念，來鞏固其原有的社會基礎並同時尋求與擴充新的社會支持[78]。

從本文「民主轉型」時期近二十年的選舉過程與結果觀察，民進黨以省籍情結和台灣獨立意識型態作爲政治號召，找到了支持它這個政黨力量的支點和社會基礎[79]。他們以省籍、國家認同、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作爲政治訴求，已取代過去的政策政見或人情關係連帶。因此，徐火炎指出「台灣的選舉競爭基本上並非歐美社會的政策功能性投票傾向，而是民進黨以省籍、國家認同做爲選舉文宣訴求，如此必然使得人心衝突」[80]。

在民主時代，除了政黨核心選民或稱「死忠支持者」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構成的之外，那些人數眾多，在各黨派之間或搖擺不定或不關心政治或對選情冷漠的「沒有明確意向」中間選民，卻是所有政黨必須利用選舉廣告竭力來拉攏爭取這些游離選民的選票。而政黨所用的手段卻是以投民眾之所好的形式，讓步來迎合選民的「非政治的消費態度」，也就是我們在所俗稱的「政見或牛肉在那裡？」。他們期待著獲得提供較高的退休津貼、老人年金等政策利多的社會福利供給。因此政黨爲了贏得選票，除了要排除對其不利之投票因素、塑造領袖或候選人良好形象，尚需提供「公共性動因」如安全、安定保障以及改革社會福利體系之做法與訴求[81]。

面對此種情勢，國民黨黨工表示「關係歸關係，選舉是另外一回事，選民的選票投給誰已是選民的自由意志」，這點讓黨工感覺到人情變薄。關係網絡在近幾年的選舉動員的效果已是每下愈況，因此黨工本身覺得「在當前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亦不復往昔重要」。國內媒體報導國民黨中央「黨務改革小組會議」將大幅精簡及裁減現職專職黨工[82]，對此趨勢退職黨工詹碧霞數年前即已感慨基層黨工一定會被「扔進垃圾桶」的宿命[83]。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程，我們或許已可見到民眾服務站和及基層黨工將悄然邁入歷史。

國民黨黨工關係網絡在面對弱連繫的橋樑作用理論、資訊網絡社會的來臨以及民進黨的非公共政策議題等的競爭情勢，顯然已難發揮它在大選中的動員效能。對於此種情形，哈伯瑪斯指出，政黨雖然可以用意識型態號召選民進行政治動員，但面對時勢所趨，仍不得不用盡一切方法、甚至無所不用其極的來爭取選

[78]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 期（1992 年），頁 33-61。

[79]陳安，〈關於中國大陸民主化動力問題的比較研究〉，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481。

[80]徐火炎，同註 69，頁 163。

[81]曹衛東等譯，同註 27，頁 277-286。

[82]中國時報，民國 93 年 4 月 27 日，版 A2；中國時報，民國 93 年 5 月 4 日，版 A4。

[83]詹碧霞，同註 37，頁 211、頁 324-326。

票以以鞏固其政權。因此他不禁慨嘆「如果一個政黨，沒有正式黨員，而僅僅在選舉期間才活躍起來，集中運用廣告策略，那麼，這對於它是多麼的有利」[84]。

學者張茂桂表示「社會研究的進展，不可能完全脫離當代重要關懷。在對於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系統的剖析中，我們得以生產、累積新的知識。但是真正好的研究，必將超過當下眼界的侷限，經得起時間的考驗」[85]。近幾年網際網路與電子郵件的運用已改變了選舉行爲，尤其在都市化地區、35 歲以下的年輕人已在網路上形成新的樁腳系統，他們顛覆解放了傳統的政治或選舉樁腳，使得網站成爲無形的樁腳。誰能在網路上提出意見，誰就能掌握了傳統樁腳或民意代表所具有的功能。換言之，網路的發展已經改變了利益交換的程序、壓力團體的形成過程以及政治力量集結的方式，導致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完全依賴人際關係網路所建構的政治體系，當然逃脫不了變革的命運[86]。

最近十餘年來，整個世界政經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已遠遠超越過去農業社會時代人們之想像。馬克思主義者史勒（Herbert I. Schiller）就認爲「資訊在當前時代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成爲關係發展的核心，資訊的生產與傳輸已經成爲我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活動」[87]。從之前南韓總統盧武鉉、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的選戰觀察，他們透過網路 internet 號召年輕人投票、募款、發表政策等，不僅改變了傳統選戰方式，更是吸引年輕人接觸政治的最好方式[88]。根據美國的選舉趨勢分析，在過去十幾年當中，18 至 19 歲的選民投票率下降達 50%，而使用網際網路 Internet 者恰好大部分是這個年齡層的人，尤其是現在 20 至 30 歲的新新人類，他們是民意調查找不到、新聞廣告打不到的政治冷感族群，但他們卻是網路上最常見的顧客，所以在選戰中運用網際網路的效果將是往後政黨所必需正視者[89]。

科技時代打選戰，無線電話手機的「簡訊動員」已經使過去依賴傳統關係網絡的方式產生重大變革。例如韓國總統大選中候選人盧武鉉選前情勢危急，他在投票前夕大量發送手機簡訊抗議「財團誤國」，一舉扭轉選舉劣勢而當選韓國總統[90]。在 2004 年台灣總統大選中，「簡訊動員」也成爲強化選舉及造勢的新利器。因手機簡訊可在選戰造勢、文宣活動及各種動員通知中發揮極大的效果，三二〇總統大選前一天，手機簡訊單日超過兩千五百多萬通，催票簡訊也比平日成

---

[84]曹衛東等譯，同註 27，頁 263、頁 273。

[85]張茂桂，〈探索台灣權力統治的三把入門鑰匙〉，《新新聞周報》，第 539 期（1997 年 7 月），頁 84。

[86]吳崑玉，同註 74，頁 32-35。

[87]Frank Webster 著，馮建三譯，《資訊社會理論》（Theories of Information Society）（台北：遠流，2001 年），頁 152-153。

[88]林智清，〈世界資訊網路將成選戰新利器〉，《Catch 選舉》，第 1 期（1995 年），頁 43。

[89]簡大森，〈選舉走上資訊高速公路〉，《Catch 選舉》，第 1 期（1995 年），頁 42。

[90]聯合報，民國 93 年 1 月 27 日，版 A4。

長數百倍，陳水扁靠三一九槍擊受傷簡訊動員來扭轉選舉劣勢，突顯手機簡訊的力量不容小覷[91]。因此，無線電話手機「簡訊動員」將是今後強化選務、選舉文宣、造勢活動、催票動員、澄清重大選情的主流。無線電話手機的「隨身攜帶」方便性、「無遠弗屆」的寬廣性，加上「立即顯現」、「立即傳播」的快速性，將使其傳播通訊動員效果更益擴張，也證明了管諾維特的「弱連帶優勢」理論在現今社會中關係連結的重要性。

陸、結論

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國民黨民眾服務站基層黨工透過其關係網絡和關係連帶來維繫它的政權基礎。因此，藉著居延安的「關係生命過程」中關係的建立、發展、衰退及終止四個階段；鄭伯壎所認爲的關係發展有進入、試誤、穩定與離開四個過程以及 Dwyer 等人的認識、變遷、維持和終止的過程等「關係發展」的理論概念，來探析國民黨基層黨工在建立社會關係中的發展過程、差異或變化以及他們的努力與方式。

從本文訪談資料中瞭解到國民黨黨工得以和黨員民眾建立關係的基礎，除了民眾服務站的職務身分提供了專職黨工關係建立的基礎之外，黨工自身的表現和風評與聲譽以及值得信任才是他們贏得黨員民眾相信的重要條件。有了信任和聲譽這兩個要素才能建構出黨工成功的「關係發展初期」第一階段，也才有 Larson 所說的後續「關係建立」第二階段時期的互信與互惠與合作關係可言，這種合作關係是黨工與民眾關係得以維持之重要關鍵因素。至於利害關係衝突，例如提名落空、選舉過程的對立等「權力」與「資源」的有無得失與交換，則是導致黨工他們與幹部關係變遷，甚至最後到「脫離」過程的理由，在黨工的訪談過程資料中得到相當的印證。所以，「聲譽」、「交情」、「信任」、「合作」、「互惠」、「權力」等因素在國民黨黨工關係的建立、維持與變遷的過程研究中確實有助於關係結構的解釋。

本文以國民黨苗栗縣所屬鄉鎮市民眾服務站的現、卸任黨工作爲研究對象，從他們的訪談資料我們發現到：其一、國民黨在其遷台後的「改造」工作建立了民眾服務站的組織性質和其運作模式，使它可以透過服務民眾的方式來掌握社會的脈動並建立與支持其政權的社會基礎。其次、國民黨爲了融入台灣社會，甄選了在地菁英做爲其專職幹部，以他們在地人的優勢以及以「人情交往」及「關係取向」在地方社會中來建立其關係脈絡，透過他們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來牽動社會連帶（social ties），建構了黨工的地方社會人脈關係，並在選舉或政治活動中發揮了他們所建立之連帶關係及影響力，並轉化成國民黨組織動員力量。

[91]聯合報，民國 93 年 3 月 20 日，版 A11。

本文的遺憾是沒有透過量化的方法，分析國民黨黨工對於關係發展過程中許多變項之間的強弱、互相影響的互動關係，到底有那些外在因素影響了關係的變遷。此外，受限於作者的能力，在短時間內所蒐集的資料實屬有限，可說只是一個小小片段。在歷史發展、社會寬廣度等面向上仍有不足，對此不足的部分，有待日後之研究。作者也建議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後續研究者能將研究對象予以擴大至其他政治、社會菁英之訪問並加以分析比較，如此所得之研究成果與貢獻勢必更爲輝煌。

附件一

訪談大綱：

一、背景資料：

（一）基本資料：請你簡單自我介紹，包含年齡、籍貫、學歷與經歷。

（二）進入管道：請說明初次與國民黨接觸的情形？怎樣成爲國民黨的專職幹部？它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三）民眾服務站與黨工的角色：請扼要說明國民黨地方黨部與民眾服務站的差別？它們如何運作？它的工作方式與效果爲何？

二、關係網絡：

（一）關係如何建立：

1、初任黨職或者職務調到新的環境，一開始你是如何與人建立關係？

2、你是怎麼和他（他們）認識？這種關係對你的工作有何助益？

（二）關係的發展：

1、你如何維持這種關係？

2、你認爲建立與黨員或民眾關係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3、工作上是你的職務提供你關係的網絡？還是靠你自己建立了關係網絡？

（三）關係的衰退：

1、影響關係衰退或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2、你如何克服獲改善這種式微的關係？

（四）關係的終止：什麼樣的情形之下，會讓你經營的關係終止？感想爲何？

（五）今昔對話：

1、請你比較或描述初擔任黨工和當前的工作環境與運作情形？

2、工作上與地方派系的接觸爲何？你怎麼看待地方派系？

附件二

訪問名單：

代號	年齡	受訪者經歷	訪問地點	訪問時間
L	70	三灣、南庄、通霄、銅鑼、頭份鎮黨部書記、縣黨部視導。	大湖鄉民眾服務社	93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30
T	56	三灣、南庄、頭屋鄉黨部書記，縣黨部視導；苗栗縣政府勞工股長、自治課長、計畫室股長、文化中心秘書；現任南庄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南庄鄉戶政事務所	93 年 3 月 29 日下午 1430
R	87	南投縣埔里鎮、台中縣梧、太平，苗栗縣銅鑼、獅潭鄉黨部書記，苗栗縣黨部幹事退休。	苗栗市勵志街羅寓	93 年 3 月 30 日下午 1330
Y	50	卓蘭鎮、苑裡鎮、銅鑼鄉、苗栗市黨部主任。	頭屋鄉頭屋村張寓	93 年 4 月 5 日下午 1930

M	48	竹南鎮黨部婦女專員、視導。	竹南鎮民眾服務社	93 年 4 月 8 日下午 1730
K	43	南庄鄉黨部專員、三灣鄉黨部主任、縣黨部視導、苗栗縣第五區黨部書記，	頭份鎮民眾服務社	93 年 4 月 9 日下午 1730
H	70	西湖、大湖、獅潭、三灣鄉黨部主任，縣黨部視導、考紀會常委。	公館鄉五谷村黃寓	93 年 4 月 12 日上午 1030
W	64	泰安鄉黨部專員、視導	苗栗市高苗里伍寓	93 年 4 月 14 日下午 1530
C	76	竹南鎮黨部幹事、書記，縣黨部考紀會常委。	竹南鎮中美里陳寓	93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30
J	50	通霄鎮、西湖鄉、苑裡鎮黨部主任。	苑裡鎮苑東里周寓	93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830
P	56	三灣鄉黨部專員、苗栗縣黨部專員、視導、組長。	苗栗市福麗里吳寓	93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430
G	31	竹南鎮、後龍鎮黨部專員	後龍鎮民眾服務社	93 年 4 月 24 日上午 0830
A	44	通霄鎮黨部專員，西湖鄉、後龍鎮、苑裡鎮黨部主任。	苑裡鎮民眾服務社	93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00

焦點訪談：

一、時間：93 年 5 月 5 日上午 1030。

二、地點：苗栗縣銅鑼鄉民眾服務社。

三、參加人員：

代號	年齡	經歷
S	51	泰安、公館、銅鑼鄉黨部主任；縣黨部專員、視導；苗栗縣第二區黨部書記
D	31	公館鄉、銅鑼鄉黨部專員
F	53	南庄鄉、卓蘭鎮、大湖鄉、三義鄉黨部主任
X	29	造橋鄉、公館鄉、三義鄉黨部專員
Z	49	獅潭鄉、苗栗市黨部婦女專員、西湖鄉黨部主任

參考資料

中文資料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重譯，《最新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1 年（原書於 1997 年出版）。

Chava Frankfort-Nachmias David Nachmias 著、潘明宏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下》（*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台北：韋伯，1999 年（原書於 1996 年出版）。

Dick Morris 著、張志偉譯，《網路民主》（*Vote.com*），台北：商周，2000 年。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8th. Ed.*），台北：時英，1998 年。

Floyd J. Fowler, Jr. ＆ Thomas W. Mangione 著、黃朗文譯，《標準化的調查訪問》（*Standardized Survey Interviewing*），台北：弘智文化，1999 年。

Floyd J. Fowler, Jr.著、王昭正、朱瑞淵譯，《調查研究方法》（*Survey Research Method*），台北：弘智文化，1999 年。

Frank Webster、馮建三譯，《資訊社會理論》（*Theories of Information Society*），台北：遠流（原書於 1995 年出版），2001 年。

John Egan、方世榮譯，《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台北：五南圖書（原書於 2001 年出版），2002 年。

John Morrow、李培元譯，《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台北：韋伯文化（原書於 1998 年出版），2004 年。

Mancur Olson、董安琪譯，《集體行動的邏輯》，台北：遠流，1991 年。

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2nd.ed.*），台北：唐山（原書於 1996、2000 年出版），2000 年。

Mark Buchanan 著、胡守仁譯，《連結－混沌、複雜之後，最具開創性的「小世界」理論》（*NEXUS：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science of Networks*），台北：天下文化（原書於 2002 年出版），2003 年。

Richard A. Krueger ＆ Mary Anne Casey 著、洪志成、廖梅花合譯，《焦點團體訪談》（*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嘉義市：濤石文化，2003 年。

Tom Richardson, Augusto Vidaurreta, with Tom Gorman 著、劉慧清、江郁清譯，《關係是一種策略性資產》（Business is a contact sport），台北：臉譜，2003 年。

王金壽，〈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一九九三年風芒縣長選舉的個案研究〉，《台灣政治學刊》，2 期，1997 年，頁 3-59。

王振寰，〈台灣式的民主：一些觀察〉，蕭新煌主編，《考驗台灣命運》，台北：允晨，1995 年，頁 295-297。

王振寰，《誰統治？如何分析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1996 年。

王輝煌、黃懷德，〈經濟安全、家族、派系與國家：由制度論看地方派系的政治經濟基礎〉，徐永明、黃紀主編，《政治分析的層次》，台北：韋伯文化，2001 年，頁 117-181。

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著，〈關係取向：爲中國社會心理方法論求答案〉，楊國樞、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爲》，台北：桂冠，1991 年，頁 49-66。

何來美，《劉黃演義－苗栗近代政治史話》，台北：台灣書店，1997。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 期，1992 年，頁 33-61。

吳乃德，〈地方勢力可能顛覆國民黨嗎〉，蕭新煌主編，《考驗台灣命運》，台北：允晨，1995 年，頁 109-113。

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論》，台北：五南文化廣場，1996 年。

吳重禮，〈亦敵亦友：論地方派系與國民黨候選人選擇過程的互動模式〉，《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學報》，第 7 期，1998 年，頁 177-204。

吳崑玉，〈網路政治：一個顛覆性的時代〉，《*Catch* 選舉》，第 5 期，1996 年，頁 32-35。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1995 年。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

周育仁、鄭又平，《政治經濟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2 年。

周素卿、陳東升，〈基層選舉下的地方政治與經濟利益：以房地產開發爲例〉，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71-126。

居延安，《關係管理-企業的虛擬發展與人本再造》（*Relationship Management*），台北：楊智文化，2003 年。

林佳龍，〈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 卷 1 期，1989 年，頁 117-143。

林佳龍，〈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160-260。

林智清，〈世界資訊網路將成選戰新利器〉，《*Catch* 選舉》，第 1 期，1995 年，頁 43-44。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王曉珪、劉北城、宋偉杰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Offentlichkeit,2nd.ed.*），台北：聯經，2002 年（原書於 1962、1990 年出版）。

洪永泰、林瓊珠編著，《2001 年台灣政治紀實》，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編，台北：韋伯，2001 年。

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1996 年。

若林正丈（Masatake Wakabayashi）、洪金珠、許佩賢譯、吳密察審訂，《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2004 年 3 月二版一刷）。

徐火炎，〈選舉競爭與政治分歧結構的變遷：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力的消長〉，《人文及社學科學集刊》，6 卷 1 期，1993 年，頁 37-74。

徐火炎，〈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投票行爲〉，《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學科學集刊》，7 卷 1 期，1995 年，頁 17-48。

徐火炎，〈選舉與台灣政黨重組的趨勢〉，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7 年，頁 245-262。

徐火炎，〈台灣的選舉與社會分歧－政黨競爭與民主化〉，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127-168。

高承恕、劉仁傑主編，《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聯經，1999 年。

張昆山、黃政雄，《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台北：聯經，1996 年。

張茂桂，〈探索台灣權力統治的三把入門鑰匙〉，《新新聞周報》，539 期，1997 年 7 月，頁 83-84。

張苙雲、譚康榮，〈形構產業網絡〉，張苙雲主編，《網絡台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台北：遠流，1999 年，頁 16-61。

張維安、陳介玄，〈把生活結構放進來－三個台灣企業研究個案的分析〉，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 年，頁 159-210。

陳　安，〈關於中國大陸民主化動力問題的比較研究〉，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459-488。

陳三井，《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台北：中央文物，1985 年。

陳介玄，《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1994 年。

陳介玄，〈派系網絡、椿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 年，頁 31-67。

陳怡如，〈政黨競爭與地方派系轉型之研究—台北縣中和市的個案分析〉，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3 年。

陳明通、林繼文，〈台灣地方選舉的起源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261-286。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1995 年。

陳東升，《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巨流，1995 年。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合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1991 年。

陳曉慧，〈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對社會基礎的強化〉，《藝術學報》63 期，1998 年，頁 209-229。

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1992 年。

彭懷恩，〈台灣地區政黨內部結構之分析〉，楊泰順編《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民主基金會，1991 年。

游盈隆，《民意與台灣政治變遷－1990 年代台灣民意與選舉政治的解析》，台北：月旦，1996 年。

游清鑫、鄭夙芬、陳陸輝合著，《面訪實務》，台北：五南，2001 年。

費孝通，《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台北：風雲時代，1982 年。

黃文齡，〈美國進步時期城市政黨組織與下層人民之互動關係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歐美研究》，21 卷 3 期，1991 年，頁 47-81。

黃光國，《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巨流，1988 年。

黃毅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巨流，1999 年。

楊泰順，《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民主基金會，1991 年。

葉正綱，《中國消費市場行銷策略》，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2002 年。

葛永光，〈選舉機器的理論建構－兼論國民黨的黨務改造方向〉，《理論與政策》，1996 年，頁 136-147。

詹宏志，《趨勢報告/台灣未來的 50 個解釋》，台北：商周文化，1988 年。

詹碧霞，《買票懺悔錄》，台北：商業週刊，1999 年。

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台北：允晨，1997 年。

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及其主要領導人物》，台北：允晨，2000 年。

趙永茂，〈基層政治菁英之個人背景分析〉，《思與言》，25（6）期，1988 年，頁 552-574，。

趙永茂，《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圖書，1997 年。

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60 期，1992 年，頁 209-233。

蔡育全，〈「黨工」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行〉，謝鴻儀主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印行，2000 年，頁 132-133。

蔡明惠，《台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山頂」與「街仔」的爭鬥》，台北：洪葉文化，1998 年。

蔡詩萍，《誰怕政治》，台北：桂冠，1989 年。

鄭伯壎，《組織網絡的形成及其相關因素的探討》，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1996 年。

謝順欽，〈黨政關係六十年回顧〉，謝鴻儀主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印行，2000 年，頁 92-98。

謝鴻儀主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印行，2000 年。

簡大森，〈選舉走上資訊高速公路〉，《*Catch* 選舉》，第 1 期（內部刊物），1995 年，頁 42。

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雷飛龍譯，《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台北：韋伯文化，2000 年（原書於 1976 年出版）。

羅家德著、葉勇助整理，《企業關係管理》，台北：聯經，2003 年。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 1950-1969》，台北：稻鄉，1998 年。

英文資料

Berg, Bruce L.（1998）,.“Ethnographic Field Strategies”,“ Unobtrussive Measures in Researc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nt Analysis”*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Allyn and Bacon.

Bosco, Jacobs.（1994）,“Taiwan Factions：Guanxi,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Local Politics.”*Enthnology,* Vol.31, No.2, pp.157-183.

Burgess, Robert G.（1982）,“Approaches to Field Research.”*In Field Research：a Sourcebook and Field Manual.* N.Y.：Routleedge,pp.1-11.

Dollinger, Marc. J.（1990）, “The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strategies in fragmented indust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5. No.2 pp.,266-285.

Hwang, K. K.（1987）, “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4）, pp.944-974.

Larson, Andrea.（1992）, “Network Dys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7, pp.76-104.

Thorelli, Hans B.1986. “Network：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7,pp.37-51.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267-310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Networks of KMT's Full-time Local Staff in Miao-li County

Tao-Ming Chung [*] *Tong-Yi Huang*[**]

Abstract

In Taiwan's elections, relationship is a special feature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policies. Politicians especially value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election district as well as their public services in order to build up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to earn voters' support. In view of this, the KMT knows that they have to reinforce trust and relations among their supporters by providing good services through their full-time local staff.

The KMT established public service stations to develop its social connection with people in Taiwan in 1952. In various elections, the rank and file staffs can be easily mobilized and play a vital role to appeal to the people to support the KMT's candidates. However, researches on this subject are rare,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in political observation and elaboration with regard to public affair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operation and procedures of KMT's Miao-li County public service stations but also analyzes how KMT's grass-root staff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With the rapid changes of society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aiwan, the research on the changeover of the rol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KMT's local staff will also be addressed.

Keywords: the KMT, Public-Service-Stations, KMT's Full-time Local Staff, Relationship, Networks

---

[*] Maste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in Feng Chia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
第 311-338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

王振軒*

摘　要

長久以來，具非營利性、公益特質的非政府組織，一般都被刻板的認為，應該是屬社會中默默付出且最為無聲的一群，在組織的經營型態上，不應與營利組織相提並論；也因此，許多非政府組織在經營管理上的問題，一直也都乏人問津，甚少被業界與學術界所討論。然而，隨著社會的多元和公民社會概念的崛起，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個衝擊一則帶來了非政府組織在「量」上面急速增加而令人振奮的喜悅，一方面卻也因此讓人擔心其在對「質」管控上的問題；特別是在這樣一個新興、廣大且氛圍混沌的公益市場中，非政府組織將會穩健的成長，抑或不自覺地走入組織生命週期的末端而最終走向死亡？令人好奇也值得探討。

本文將從危機管理的角度出發，探討非政府組織在長期沒有經營管理理論的指導下，在面對瞬息多變、狀況百出的市場環境，如何建構一項專屬於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能力，並對其做出最即時、有效的回應，讓組織能在這樣一個新型態的經營環境中脫穎而出。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危機管理、危機偵測、公共責信

*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

壹、前言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對於組織而言，由於外部環境變化或內部管理不善，以及市場環境的變化，也可能會陷入經營的危機之中。管理學大師閔茲伯格（Mintzberg）在他的著作《閔茲伯格談管理：探索組織世界的奧秘》中提及，每個組織的經營都會因爲市場環境的改變，以及組織內部氣氛、文化與制度的變化，勢將面臨到許多可預期或不可預期的衝擊，最後終將掉入組織生命週期的輪迴，走入組織瓦解滅亡之路；而組織如何讓自身跳脫傳統組織結構配置的桎梏，避免墜入生命週期的惡性生死循環，則端看組織能否妥善處理各種突如其來的危機，甚至將危機有效管理，化危機爲轉機。[1]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組織在經營與發展過程中遇到挫折和危機，是正常和難免的，危機是組織生存和發展中的一種普遍而無法規避的現象；然而，如何在經營發展歷程中，如何管理好每一次的危機，讓組織能在危機四伏的經營環境中，穩定、順利成長，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

[1] 「組織生命週期」乃一個組織可能歷經組織生命週期的四個主要階段：創生、成長、衰敗與死亡。不同的組織經歷各個階段時所費的時間不同，也有些組織不會歷經所有的階段。但有些組織甚至是由創生直接邁向死亡，因為他們並沒有吸引到顧客或資源，所以未曾享受到成長的滋味。有的組織具有很長的成長期，所以許多研究者進一步將組織所經歷的成長期再細分為幾個次階段。衰敗期也可分成幾個次階段，如部份組織在進入衰敗期時，立即採取了補救調整的措施，讓組織重生。請參考，上官譯，閔茲伯格著，《閔茲伯格談管理：探索組織世界的奧秘》（台北：中天出版社，2000 年 10 月），頁 430-433。

長久以來，具非營利性、公益特質的非政府組織[2]，一般都被刻板的認爲，應該是屬社會中默默付出且最爲無聲的一群，在組織的經營型態上，不應與營利組織相提並論；也因此，許多非政府組織在經營管理上的問題，一直也都乏人問津，甚少被業界與學術界所討論。然而，隨著社會的多元和公民社會概念的崛起，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個衝擊一則帶來了非政府組織在「量」上面急速增加而令人振奮的喜悅，一方面卻也因此讓人擔心其在對「質」管控上的問題；特別是在這樣一個新興、廣大且氛圍混沌的公益市場中，非政府組織將會穩健的成長，抑或不自覺地走入組織生命週期的末端而最終走向死亡？令人好奇也值得探討。本文將從危機管理的角度出發，探討非政府組織在不營利、公益性的前提下，在面對瞬息多變、狀況百出的市場環境，如何建構一項專屬於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能力，並對其做出最即時、有效的回應，讓組織能在這樣一個新型態的經營環境中脫穎而出。

貳、危機的定義

危機（crisis）的定義眾說紛紜，危機的概念可以回溯至古希臘時代，crisis在希臘文中爲 crimein，其意義即爲「決定」（to decide）。中文的「危機」則是由「危」（danger）和「機」（chance）所組成的，而韋氏大字典中，則定義危機是：

一、疾病或是事情變好變壞的轉捩點（turning point）。

---

[2] 關於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的定義，較為流行的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萊斯特.薩拉蒙教授（Salamon）提出的所謂 5 特徵法，即將具有以下 5 個特徵的組織界定為 NGO：（1）組織性；（2）非政府性；（3）非營利性；（4）自治性；（5）志願性。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結合亞洲國家的國情，可將上述定義修正為如下 6 個條件：(1)非政府性；(2)非營利性；(3)自發性；(4)持續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他強調亞洲的多數國家屬發展中國家，從經濟上和社會上救助弱勢群體是非營利組織存在和發展的特殊背景，因而應將利他性作為一個重要指標，以區別那些以相互扶助為目的的社區非營利組織；進一步來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其開展活動的主要資金不能來自受益者，而應主要來源於社會捐贈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體，換言之，是否非政府組織的另一個重要標準，是看其資金是否來自向受益者收費之外的其他來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標準比流行的非營利組織定義嚴格，也強調了發展中國家非營利組織扶助救濟的重要屬性。此外，聯合國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非政府組織是公民所成立的地方性、全國性、或國際性非營利、志願性組織，以促進公共利益為工作導向，提供多元的服務，發揮人道的功能，將人民的需求傳達給政府，監督政府政策，鼓勵人民參與地方事務。非政府組織並可提供政策分析與專業技能，建構早期預警的機制，協助監督與執行國際協定。有些非政府組織以人權、環保或衛生為宗旨而創立，各依其目標、管轄、與授權的不同，與聯合國各局、署保持密切的關係。」晚近新興的私有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事實上許多專家學者說法不一，有的以非營利組織為主，有的則使用非政府組織，學術界並無作清楚的定義與正名；本文由於除考慮到此一民間組織的公益性、非營利性外，亦希望能擴大其分類範圍，並強調它獨立於政府之外的特殊性與獨立性；因此，乃以非政府組織(NGO)此種在聯合國中較常使用，並且在概念上更為廣泛的名詞，來總稱此種民間組織。參考 Salamon ，L.M.，Anheier，H.K.Global Civil Society ：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U.S.A.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aryland,1999 ,p29.

二、決定性（decisive）的時刻。

三、一個變動或是緊急的且不穩定的關鍵時期或事態，特別是可能會產生高度不受歡迎的結果。[3]

而學者赫曼（Hermann）綜合各家看法，歸納出三點認定危機的標準：

一、威脅（Threat）到組織或決策單位之高度優先價值或目標；

二、在情況急遽轉變之前，可供反應的時間有限；

三、對組織或決策單位而言，危機乃是未曾意料而倉促爆發所造成的一種意外驚訝（surprise）[4]。

現代的非政府組織正處於市場急劇擴大但資源卻明顯不足的環境中，組織的使命與價值，經常在經營環境競爭的壓力下，出現「爲五斗米折腰」的情況，長久行之，使命價值與經營利益之間便可能產生矛盾與錯亂，進而發生動搖非政府組織經營根基的「誠信危機」；此外，由於現今非政府組織的內、外在環境的複雜，許多突如其來的狀況都足以讓非政府組織措手不及，例如，社會公眾對於組織的某項公益計畫執行內容的不信任、受其他事件的影響與組織內部董事會間的爭執等問題，這些突發的狀況，都可能使得非政府組織在內部的業務推動與專案運作的穩定上，將發生急速失衡的現象；例如，因領導階層突如其來的不和諧，導致組織在執行工作上的停滯不前；或者是組織因社會公信度下降，招致捐款數的急速下滑，諸此種種問題，都是突如其來危機，也形成了非政府組織在內部治理能力上產生很大的問題，進而造成所謂的「治理危機」。再者，當非政府組織在執行某項方案或發展某項業務時，領導人能否在決策與執行上，適時做出完善的決策工作指導，關係著非政府組織在運作上能否發揮應有的效能與發展；而當面對個別事件的突發性危機時，領導人對於現代資訊傳播快速與範圍廣大的影響力也不可小覷，由於資訊傳媒的快速與廣大，都可能使組織領導人在時間的壓縮下，很難做出理性的決策，領導者的決策正確與否，將可能對組織的存續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此，領導人的危機，此刻便隱然浮現。

前述這些非政府組織的危機，大多對非政府組織充滿了不確定性，例如，董事會的不和諧、領導人一時的決策錯誤（這種一時的決策錯誤或領導階層不和諧的狀況，經常發生在組織運作穩定的時候，當組織營運得宜時，組織的資源自然豐厚，領導階層的抱負也就更爲廣大，而在資源分配上也就意見繁多，意見相左的現象就可能因此油然而生，這種危機似乎都具有及時性，也可能危機組織的價值與使命），以及因一時誠信不足，而造成組織再不受公眾信任，而導致的誠信危機等（組織可能因無法獲得公眾的信任，而獲得足以維持組織生存營運的善款挹助）；雖然，這些危機狀況，有的是因爲一時的決策錯誤，也有部分是因爲組

---

[3] Richardson, B. (1995). Paradox management for crisis avoidance. Management Decision, 33(1), pp5-18.

[4] Hermann, Charles F.(1972)，Som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in Charles F. Hermann, International Crisis: Insight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Free Press.

織長期經營方式不善所累積而成的，但其結果大多會讓組織措手不及，進而到威脅到組織的生存與發展。

參、何謂危機管理

一、危機管理

有關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國內學者孫本初說明「危機管理」是組織爲了避免或減輕危機情境所帶來的嚴重威脅，而從事長期性規劃及不斷學習、適應的動態過程。亦可說是一種針對危機情境所作的管理措施及因應策略[5]。邱毅將「危機管理」定義爲組織爲降低危機情境所帶來的威脅，所進行長期規劃與不斷學習、反饋的動態調整過程。即將危機予以制式化管理，由事前預防至事後處理[6]。本文參考國內學者邱志淳，並綜合以上學者的說法認爲「危機管理係指一種有計劃的、連續的及動態的管理過程，也就是組織或個人針對潛在或當前的危機，於事前、事中或事後，利用科學方法，採取一連串的因應措施，並由資訊回饋作不斷地修正與調整，以有效預防危機、處理危機及化解危機，甚至消弭危機於無形」。[7]

而現代的非政府組織與一般的營利組織一樣，需要承載莫大的市場競爭壓力，在經營的過程中上難免遇到一些緊急的危機情境；而在組織結構上，非政府組織也與公部門同樣有著分層負責的各個部門，在內部系統的溝通、協調上，也不免會因意見紛歧或領導失調而產生若干的危機狀況。因此，非政府組織在危機管理事務上，應採取的手段與應投注的心力，實不亞於一般的營利組織或政府部門。雖然，目前不管是實務界或學界，仍然沒有發展出一套針對非政府組織爲機管理的理論與辦法，但借重一般營利組織或公部門所善用的危機管理典範，並參酌非政府組織的實境，再將其轉化成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運用上的參考，應屬可行之道。本文在研究的過程中，也將據此要旨，以一般商業組織或公部門的危機管理理論與技術爲基礎，輔以非政府組織運作實況的分析，分析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範圍、因素與來源，進而推導出非政府組織在面對危機時可能適用的管理方法與措施。

---

[5] 孫本初，〈危機管理策略之探討〉，《人事月刊》，第 22 卷、第 6 期（1996 年），頁 17-29。

[6] 邱毅，〈面對危機的因應和對策〉，《人力發展》，第 54 期（1998 年），頁 1-6。

[7] 邱志淳，危機管理與應變機制，頁 2。參考網址：http://www.life.fcu.edu.tw/safe/documents/pd03.doc。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9 日。

二、危機管理的相關理論

危機管理並不是新的名詞或概念，在政府機構、私人企業、大眾傳播媒體、個人、甚至國際關係的領域，都已有豐富的論述，並發展出許多相關的理論；而近來，非政府組織由於市場環境的需求，也開始對危機管理多有討論，並將許多其他領域的危機管理理論，「轉移」運用在其經營管理的實務上。[8]本節將引用各領域相關之危機管理理論，來闡述危機發生的情況、危機處理的作法，以及善後的危機修補辦法，來試圖找出適合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的理論架構。

（一）威脅評估模式[9]

威脅評估模式主要是由柯亨（Raymond Cohen）所提出的危機處理觀點。其精神乃著重於組織危機發生時，是否能夠準確掌握外在的威脅，是危機處理的重要關鍵。如果事先沒有評估到危機的嚴重性，就很難會採取有效的解決途徑。威脅的認知是經過評估，評估的正確與否關係著後續的危機處理。

（二）危機壓力與反應理論[10]

危機壓力與對危機反應模式的看法，在於找出危機的壓力根源，並由此發現壓力是促成危機處理的背後動力。有三個相關的變項：認知的時間壓力、高估外界的反擊能力、關切立即的威脅。由於這三個變項會壓縮並強化處理者的思考認知，並且在龐大的外界壓力的壓迫下，會促使決策者產生強烈動機，而採取有效行動來解決。

---

[8] 若從組織的角度來看，企業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他們有幾點共性之處：第一、都是非政府組織；第二、都靠非行政的手段獲得社會財富；第三、都靠經營產品或服務來獲得社會資源。我們在對非政府組織的研究中進一步發現,其實非政府組織也在從事產品生產或服務的工作，與第二部門所不同的是：1、這種產品是看不見的，我們稱其爲滿足心靈需求或精神需求的產品；2、從事公益事業的目的不在於爲法人或個體自然人獲取利潤，而是在於獲取社會財富和社會資源後再服務於社會，尤其是服務於那些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以實現追求整個社會公平、公正、和諧發展的目標。因此，當我們把非政府組織所從事的公益事業看成是在經營心靈產品或精神產品時，我們就可以在非政府組織的運作中引入或借鑒成功企業的經營管理理念、制度和運作模式，如：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客戶關係管理理念、產品的市場營銷與品牌策略等等，以此非政府組織的組織經營可以以更科學的方式營運，並更貼近逐漸競爭的經營市場。

[9] 黃志忠，社會工作專業機構的組織危機管理與因應策略之初探，參考網址：http://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02/16.htm。瀏覽日期：2006 年 10 月 21 日。

[10] 朱延智，《危機處理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市：幼獅，2000 年），頁 56。

（三）形象修復理論[11]

形象修復理論適用於組織發生形象危機之後的補救方法。其前提是組織被一群重要的社會大眾指控必須對某一種「不恰當」的行為負起責任。此理論運用的前提，包含幾個重要概念：

1、「不恰當」的行為在事實上不一定是冒犯，完全由公眾的認定與知覺來決定。

2、組織的責任歸屬亦非由事實來認定，只要公眾認為組織與此行為有關連，即產生形式上的責任歸屬。

從以上前提可知，公眾對組織責任的感受是影響組織形象最關鍵的因素，這些公眾因而成為形象修復的主要目標對象。Parsons 認為組織應該先重新定義外界的指控，視外界指控的重視程度再行決定。如果危機真的是多數人的認知，或是指控者再三提出攻擊，則組織就要嚴正面對這項指控。[12]

綜整上述三個理論，可歸納出一般組織危機管理理論的概略重點，首先要預防危機的產生，危機來臨時對危機之本質進行界定，在進一步瞭解組織正處於何種危機周期，才能採取相對的因應與補救善後措施。一套完備且周詳的管理辦法，應從不斷偵測危機、執行危機管理辦法、與修補調適的過程中來落實管理成效。

因此，動態的危機管理過程大致可化約成三大管理步驟：1、危機訊息的偵測（危機的準備及預防）；2、損害的控制及處理（危機管理辦法的運用與落實）；3、從事復原工作、及調適等。

肆、非政府組織危機來源與管理的主客體

根據 Sturges（1994）以及 Coombs（1995）的界定方式，危機的來源包括主觀與客觀兩個層面，客觀層面為外界對組織的評價，以及組織會受到組織外界危機因素影響所造成的危機情境。主觀層面著重在組織內部的認知層面，乃因組織內部認知不協調，並造成組織系統運作上的不良，而引發的危機情境。若就組織內、外的觀點分析，危機的來源，可由主、客觀的概念概分為由「內在｜外在」兩個面向來討論；而就組織危機發生後的危機來源與管理危機的主要機制來看，則又可區分為屬於危機發生後危害組織的危機客體（危機事件），以及管理危機的主要主體（組織本身）。[13]

---

[11] 同前註 9。

[12] Parsons, P. J.(2002). Communicating strategically in a crisis. Healthcare Executive, 17(6), pp.56-57.

[13] Sturges, D. L. (1994). Communicating through Crisis: A Strategy for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 pp.297-316

而從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環境來看，其危機發生後的危機管理主、客體，與一般的政府、企業等組織並無不同，在區分上當然還是以非政府組織爲危機管理的主體，其他舉凡對組織造成危機的事件、群體、機構等，都稱之爲危機客體。而由非政府組織內部的結構，以及外部經營環境來分析，又可交叉而成以下幾種危機：關於出自組織內部的危機，可依組織構成的結構分爲治理危機（源自於組織決策階層的危機）、CEO 的領導危機（源自於組織內部領導、執行階層的危機）、責信危機（組織使命實踐，以及體現社會公信力是否恰當的危機）；就來自組織外部的危機，可概分爲市場危機（市場環境改變對組織經營所產生的危機）、突發事件危機（由於外在意外事件對組織造成影響的危機）。

一、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的主體與客體

危機的管理範圍，可包含兩個構面，一個是危機的主體，一個是危機的客體。危機管理的主體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說。也就是面對危機、欲處理危機的組織或個人，稱之爲危機的主體；而危機的客體，則指涉危機主體所面臨的各種危機事件、狀況，或者是對主體有造成傷害的組織或個人。[14]

（一）危機主體

就非政府組織而言，危機主體可以廣義的包括整個非政府組織界、單一非政府組織本身、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董事會，或者是非政府組織中的個別成員。從狹義上來說則只包括單一發生危機事件的非政府組織。

（二）危機客體

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客體，則應可分成以下四類：（1）重大突發性事件；（2）社會所給予公眾的壓力；（3）組織本身內部產生衝突或矛盾，所造成的危機；（4）由於市場環境的變遷使然的經營危機。而危機管理的客體一般都帶有以下一些特徵：（1）發生的突然性和緊急性。（2）發生結果的不確定性。（3）給管理者處理時間的有限性。（4）都對組織的價值目標產生一定的威脅。[15]

綜言之，非政府組織的危機主體必須掌握住危機客體的來源與特徵，才能對了解危機的本質與範圍，面對各種不同的危機做好危機管理的工作。

---

[14]謝慶奎，〈危機管理演講提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2004 年 12 月），參考網址：http://politics.soc.ntu.edu.tw/news/940105.pdf。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9 日。

[15]參考前註。

二、非政府組織危機分析面向

此外，現代非政府組織的經營活動，由於市場大開、活動項目多元，因此日益受到外部和內部環境的作用和影響。非政府組織要進行危機管理，首先必須全面的、客觀的分析和掌握內外環境的變化，並以此爲出發點，來探討危機來自何處，並按其來源的特性，制定有效的危機管理辦法。而環境分析的主要分析範圍，則應分爲外部環境分析和內部環境分析。內部環境危機來源的分析，包含了組織內部的董事會運作、業務執行情形、人員與領導者的關係，以及組織使命與價值能否維持等問題。而外部環境危機來源的分析，則應側重在偶發事件所造成的危機，以及市場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經營危機等。

換言之，非政府組織的危機分析面向，大致上可從兩個部分來做分析：

（一）內環境面向

第一個部分應是所謂的非政府組織的內部環境，這個環境看似簡單、單純，因其含括的範圍應只屬組織本身。非政府組織的工作執行，看似由成員複雜的少數專職人員與志工推動。但事實上，其運作的主要首腦，乃是以董事會與 CEO 爲主的決策機制；決策與領導方向的正確與否，關乎非政府組織經營的良與莠；而非政府組織的存在意義以及工作執行的價值核心，則是非政府組織的使命與理念[16]，使命的秉持與理念的一貫，是非政府組織能否獲得社會責信力與公眾支持的重要因素。因此，就非政府組織的內部分析面向來看，則必需從組織「董事會與 CEO 的治理功能」，以及「使命與理念能否維持的責信觀點」著手。

（二）外環境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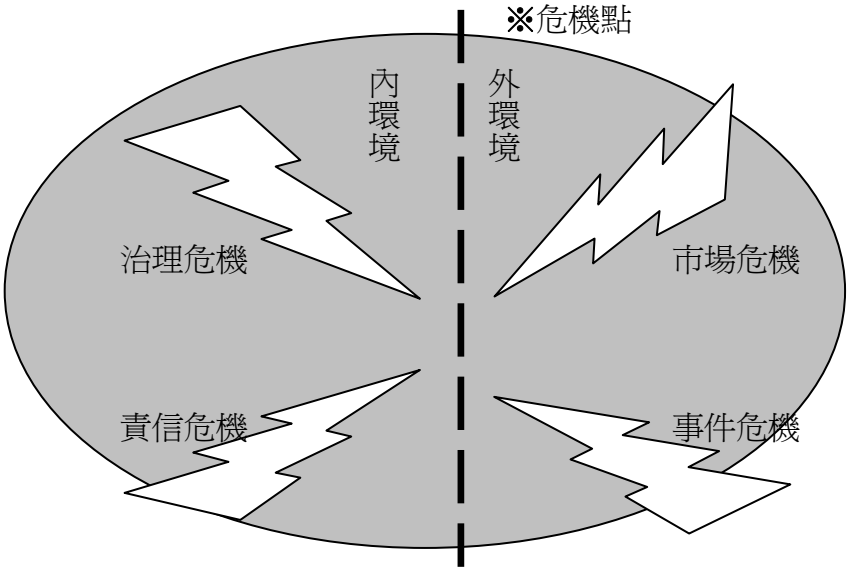
外環境涉及的因素，則比內環境來的複雜多了，包括由市場資源的稀少，非政府組織爲了爭取資源所可能採取的回應方式、以及其他突發事件對非政府組織造成的意外影響等；這些外在環境因素對非政府組織的衝擊，將可能導致其能否在市場的競爭壓力下，繼續生存發展。因此，外部環境的分析，應從「市場環境」與「突發事件」兩個部分著手。

[16] 同前註。

伍、非政府組織有哪些危機

歸結前節所述，非政府組織的危機來源，可分爲來自內在環境（也就是來自組織內部）的危機，以及源自外部環境（也就是來自組織外部）的危機兩個部分。若從危機主客體的面向來看，則可廣義的說，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的因素，可能爲一部分來自危機主體的危機因素，以及來自危機客體的危機因素兩種。因此，非政府組織的危機來源，應概可自內環境（非政府組織本身的危機主體）與外環境（組織以外的危機客體），兩個部分來找尋。而其危機的種類，則可就組織本身的運作結構與組織外的環境因素來分類。就組織本身運作結構的部分，大致有組織內的「治理危機」與「責信危機」兩種類型的危機；而組織外環境因素所造成的危機，則應包含市場環境變遷與不確定因素的兩個危機種類，一是「市場危機」二是「突發事件危機」。

Fink 認爲，當危機已到達臨界點無法制止其產生，此時就會引爆出組織的危機點，爆發出來如同河水決堤或火山爆發一樣一發不可收拾的威脅，倘若沒有在第一時間立即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處理，那麼將會造成無法估計與預料的損失或傷害。[17]換言之，當非政府組織的內、外部危機對組織威脅程度，已經到了組織無法承受之時，如果組織不儘速採取有效的危機管理措施，將可能引爆組織的危機點，進而產生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形。（如圖一所示）



圖一：非政府組織的危機分析面向與危機分類圖

[17]Fink, S.(1986).Crisis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p.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 Fink, S.（1986）.Crisis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p.15 整理。

一、來自內環境的危機

（一）治理危機：

1、董事會危機：非政府組織本具有推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灌輸民間「審議式民主」概念的重要使命，[18]而董事會（board）的運作，就是表現審議式民主精神的基礎與起點。因此，必須確保其運作在成員彼此間有廣泛、深層討論與溝通的保證。對於組織共識凝聚和增進組織長期不脫民主運作模式等問題，都必須嚴格關注董事會的合理運作，[19]因爲非政府組織董事會的治理機制，提供一個更有活力和內涵的民主模式。他們可以讓組織能在「共識決」的最小異議下，順利推動組織業務，並以此模式鼓勵公民學習，將公眾生活的豐富智慧從地方流動到整個公民社會。因此，在組織的董事會中，若有成員違反民主、集體決策的精神、甚至有意見相左僵持不下的情形，一則將可能嚴重影響組織業務的推展，一則違反非政府組織推動審議式民主的精神，而在此違背大眾期望的前提下，失去了社會原本給予的信任。此乃非政府組織的董事會危機。

2、CEO 的領導危機：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說非營利組織所面對的問題，其實比一般商業機構複雜，而主事者所依靠的，主要是「使命」與「領導」。而「領導」的關鍵並不在於領袖的魅力，而是使命，因爲只專注於個人魅力將使領導者走上誤導的不歸路。身爲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者，其職責就是要將使命中的說詞轉換成更精確的目標。理由是使命是永存的，甚至是負有神聖的任務；目標則僅是暫時性的。[20]綜言之，非政府組織的領導，就是以審議式民主之

---

[18]審議式民主，是指公眾經由公正、平等的決策模式來治理公共事務。原則有三：1.政治辯論是為了做出符合公眾整體利益的抉擇，公民和政黨在政治競技中不應採取狹隘的、小團體利益取向的立場；2.政治機會和權力必須平等，必須獨立於經濟和社會地位之外，不能被經濟和社會優勢團體控制；3.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公民的自尊，增進公民的政治能力，讓公民瞭解自己和自己的合法利益。這種概念對於導正目前民粹的、粗糙的、金權的政治形態深具啟發意義。請參考廖錦桂等，審議民主國際研討會活動報導，財團法人台灣智庫，2005 年 9 月 29 日。參考網址：http://taiwanthinktank.org/ttt/servlet/OpenBlock?Template=Article&category_id=34&article_id=510&lan=tc。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12 日。

[19]陳韋聿，低估非營利治理的力量，台灣非營利組織研究網，2004 年 6 月 24 日。參考網址：http://npo.nccu.edu.tw/content/section04/item02/2004_07_22.php。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12 日。

[20]余佩珊譯、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ker)著，《使命與領導：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台北：遠流出版，2002 年 6 月 1 日），頁 4-9。

「民主式領導」[21]爲基礎的「影響組織與他人趨向使命的一個過程」。然而事實上，當今我國許多非政府組織的領導者，特別是宗教型的非政府組織，由於領袖個人的魅力過大，加上信徒主動將其「神格化」的心理，導致這些非政府組織在短時間內獲得很多信眾的支持，呈現急速發展的狀態，但也忽視了非政府組織「民主領導」的內涵，以及常態性領導制度的建立。這樣的情況，讓人憂心如果這樣具魅力的領導者不再領導組織時，組織將如何在維持現有的榮景，並繼續正常運作。

（二）責信危機：

1、「使命與目標置移」的危機[22]：由於各國財政狀況日益吃緊，致使已往非政府組織賴以生存之個人捐贈與政府補助日益減少，非政府組織爲求自給自足，應另闢財源管理，而愈來愈依賴「營利化」（產業化）行爲之收益。然而，非政府組織愈來愈「營利化」的行爲，也引發許多爭議與質疑，例如：社會公眾能否認同非政府組織的「營利化」行爲？非政府組織「營利化」時間一久，可能會引發「使命與目標置移」的危機，該如何避免非政府組織變成「披著非營利外衣卻從事營利行爲的僞公益組織」？「營利化」過程是否會模糊非營利組織及營利部門間的界線？這些問題，都觸及非政府組織的營運基礎—原使命與目標，也是動搖組織行爲根本的危機因素。

2、利益與貪腐的危機：1990 年代的初期至中期，美國國內發生多起非政府組織的醜聞，例如「美國聯合勸募」（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與「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高階主管的超高薪酬及貪墨事件，嚴重地傷害了美國社會大眾對於非政府組織的信任，[23]促使學術界開始注意非政府組織管理的責任問題。Regina E. Herzlinger 認爲長期以來美國的非政府組織管理呈現出以下各種問題，例如無法達成社會使命的無效能（ineffective）問題、投注過少比例之收入於服務對象上的無效率（inefficient）問題、內部人員的圖利自身問題、輕率進行投資或財務決策的過度

[21]Iowa State University 的心理學家勒溫（Kurt Lewin）將領導者分爲兩種類型：一是，獨裁式或專制式（Autocratic）：具有這種作風的領導者從不考慮別人的意見，所有決策都由自己作出；二是民主式（Democratic）：具有這種作風的領導者鼓勵下屬參與決策，下屬個人擁有相當大的工作自由和靈活性；在領導工作中主要應用個人權力和威信，而不是依靠職位權力和命令使人服從；在分配工作時儘量照顧到個人的能力、興趣和愛好；積極參加團體活動，與下級沒有任何心理上的距離。請參考，戴維·貝贊可、戴維·德雷諾夫、馬克·尚利，公司戰略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89。

[22]江明修審定，Burton A. Weisbrod 著，《非營利產業－To Profit or Not to Profit: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台北：智勝文化，2003 年 10 月）。

[23]孫煒，〈非營利管理的責任問題—政治經濟研究途徑〉，《政治科學論叢》，第 20 期（2004 年 6 月），頁 141-166。

風險（excessive risk）問題等等，[24]皆因非政府組織的管理缺乏一套妥善的責任機制，致使非政府組織在責信問題上，產生了危機。

二、來自外環境的危機

（一）市場危機：

1、環境變遷與適應的危機：由於非政府組織的市場正處於新興的階段，許多市場的走向與趨勢仍不明確，而組織經營的理論與做法也不若一般企業組織已經建夠的相當完整，因此，在市場經營方面遭遇更多複雜的挑戰，約略可歸納出以下[25]：

（1）經營目標的「多重性」：「利潤極大化」決不是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目標，屬於社會責任的精神層次目標，才是最重要的。然而精神層次的目標，當然不若「利益極大化」簡單，它在目標的規範上，當然更具有「多重性」的特質，這也使得非政府組織效能的衡量，添增許多複雜性和困難度，非政府組織在組織生存、服務導向和組織使命之間面臨衝突時，找到妥善的解決方案，是一大難題。

（2）缺乏緩衝風險的彈性空間：在一般企業組織中，「資本與利益的利基」可以做爲市場環境變動時的風險緩衝器，但非政府組織則沒有這樣的空間。欠缺「利益積存」的後盾，非政府組織能夠承擔的市場風險就相當有限，也妨礙了它們在市場中順應變動環境的能力。

（3）同時必須面對「雙向」的公眾：企業通常只需抓住利益目標的顧客。但非政府組織則必須同時面對兩種不同的對象：接受服務者和捐助者。

（4）更多社會公眾的關注：非政府組織的一舉一動，在「道德」的基礎之下，自然是社會公眾注意的焦點。舉凡其一切的活動，都必須拋棄利益的前提，以社會服務或公益爲主。若是爲了市場競爭的關係，投注若干的營利方法或行爲，通常會引致公眾，甚至媒體的注意，成爲社會討論甚而撻伐的議題。

2、商業化危機：目前非政府組織的經營，有逐漸傾向「市場導向」的趨勢，這種必須進入競爭市場的類商業化營運方式，對不講求利潤的非政府組織，其實是潛藏著許多危機和風險的，這可能使得非政府組織在維持組織使命與爭取資源的矛盾中，發生經營的風險和危機[26]包括：

---

[24]Herzlinger, Regina E. （1996）. "*Can Public Trust in Nonprofits and Governments be Restore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4(2),pp97-107.

[25]Gallagher, K., & Weinberg, C. B. (1991). Coping with success: New challenges for nonprofit marketing.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Fall,pp.27-42.

[26]Dees, J. G. (1998).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 pp.55-67.

（1）爲了爭取資源，類似商業化的收入來源，將可能讓組織偏離了應有的社會使命。

（2）創造一個可維持市場優勢並能時刻順應市場走向的組織策略並不容易。

（3）大部分的非政府組織並不具備企業組織的營利、行銷與管理技能，如果太強調這些商業技術，將使得非政府組織無法專心致力於原本的使命執行。

（4）企業與社會服務事業，在文化上本來就存在著本質上的矛盾，如果強行將兩者結合，將可能產生組織文化衝突的危機。

（5）當非政府組織從事商業性的活動時，他們也會面對營利競爭者的抗拒。

（二）突發事件的危機：

1、受其他事件影響的危機：2004 年底南亞大海嘯過後，新聞局募款募到 4 億元，委託家扶中心和世界展望會等團體，協助認養南亞災童，不過災童認養了，新聞局的撥款卻遲遲沒有下文，原本新聞局規劃把錢平均分給世界展望會、家扶中心和慈濟基金會，3 個團體每年大約可以領到 3600 萬，可是過了 8 個月，沒有團體領到一毛錢。當初家扶中心目前認養斯里蘭卡 5 百名災童，以 1 個月 1 千塊資助金來算，再加上其他急難救助金，家扶中心已經先支出 4 百萬，世界展望會則是認養 3 千名印尼災童，加上重建校園的經費，世展會自掏腰包先墊 3 千多萬。[27]像這樣的新聞，突如其來的在大眾傳播媒體上不斷的播放，很難不讓一般民眾對善款的流向質疑，雖然這個案例，並非直接是非政府組織的作爲，但對於社會捐款的公眾而言，直接的感受就是：「善款是否已流入私人之手？」。這種負面的慈善事件，除了會造成一般公眾的捐款熱誠降低，也直接地讓非政府組織界普遍的捐款來源，由於民眾的防衛心態，多少也受到不良的影響。如此，將可能讓非政府組織在財務上，甚至是志工加入的人力上，造成暫時短缺的危機。

2、受其他組織影響的危機：聯合報在 91 年 7 月 8 日有一篇「建屋起爭議，行善團紛紛自清」的報導正可說明責信的重要性。「中華民國嘉邑行善團」被質疑向南投縣政府拿 3 千萬元，又向災民收錢，使得該非政府組織受到民間強烈的質疑。[28]由於受到名稱相近之累，「嘉義市嘉邑行善團」表示，他們與被質疑向南投縣政府拿 3 千萬元，又向災民收錢的「中華民國嘉邑行善團」是不同的民間社團，「嘉義市嘉邑行善團」堅持默默行善，但受到「中華民國嘉邑行善團」爲南投縣災民建屋被質疑的影響，接獲不少關心及探詢究竟的電話，也帶來不少的困擾。這無非是受其他組織突如其來事件所造成的事件危機的最佳例證。

---

[27]請參考網頁資料：南亞海嘯募 4 億 8 個月未撥款，2005 年 8 月 22 日，參考網址：http://keroppiyen.myweb.hinet.net/LanYu_2005/Feeling/Feeling.htm。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10 日。

[28]高永興，募款倫理與責信－國外個案研究，台灣公益資訊中心：npo 學習網，參考網址：http://www.npo.org.tw/StudyOnline/ShowSOL.asp?SOLID=35。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12 日。

陸、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

非政府組織與一般營利企業組織一樣，就內部來看也有著分工的組織結構、從事業務推展的人員，以及欲達到的組織目標等等，而就外部而言，也同樣處於一個市場龐大、競爭激烈，以及環境走勢渾沌不明的處境。因此，本文同樣以一般組織從事危機管理的觀點爲基礎，再以「轉化」的方法，推移至非政府組織操作危機管理的執行辦法上。

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有其階段性，比如在事情的發生前，總有一段醞釀期，而待事情發生時，都有若干的因應辦法，最後在事情發生過後，則必定會有所謂的善後工作必須著手。而危機的發生也一樣有其階段性，本文就前文中對危機的各種討論，綜合歸納出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的實質意義就在於：「非政府組織內的人員或機制，首先應了解危機的潛在位置，並對它的範圍與位置加以定義，它可能是組織內的董事會危機，也可能是外環境的市場變遷的經營危機；一旦危機發生時，則應利用危機進行過程的掌握，進行妥善的階段性管理，並以各種迅速的手段減災，特別是非政府組織的危機減損程度，不能以利益爲取捨的指標，在從事危機管理時，應以社會的觀感、組織的使命以及其永續經營爲主要著力點，以此讓非政府組織的危機損害程度，能在每一個階段中的積極控管辦法中，減損到最低，甚至化危機爲轉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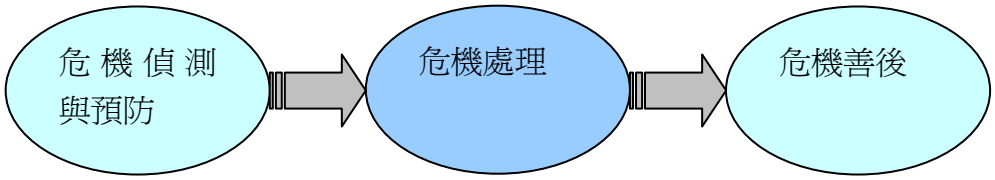
由前述的危機管理理論分析，有效的危機管理即是針對危機的各階段，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及因應作爲。本文將以危機管理的管理階段切入，探討非政府組織在危機管理的過程中，各階段應有的實際做法。而危機管理的階段論，各家看法不同，有的學者強調「三階段論」，即 1.危機爆發前、2.危機發生期間、3.危機解決後等三階段爲探討指標，分別規劃各階段所需的管理活動，並建構「危機管理動態模式」，以爲危機管理之參據[29]。也有人主張所謂的「四階段論」，這主要是「美國聯邦危機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於 1979 年將危機管理過程分爲：紓緩（Mitigation）、準備（Preparedness）、回應（Response）、復原（Recovery）四階段。另外還有「五階段論」，此論點將危機管理分爲危機警訊偵測階段、預防及準備階段、遏止災害擴大階段、恢復階段、學習階段。[30]

因理論基礎之不同，而有三階段論、四階段論或五階段論，各理論階段不盡相同，但大致依據那納美克（Nunamaker,Jr. et al.）所劃分三階段之精神，以危機

[29]Nunamaker, Jay f. JR., Weber, E. Sue, and Chen, Minder, (1989)" *Organiz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Systems: Planning for Intelligent Ac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Vol.5, No.4, pp.7-32.

[30]Mitroff, Ian I. & Christine M. Pearson. (1993), "*From Crisis Prone to Crisis Prepared: a framework for crisis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Vol.7, No.1, pp.48-59.

爆發前、中、後各時期之處理而發展[31]。本研究爲在概念上力求精簡，且在執行上單純可行，因此，亦依循三階段的管理模式，來探討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首先在第一階段應是危機爆發前的「危機偵測預防階段」、第二階段是危機發生時的「危機處理與遏止階段」，第三階段則是「危機後的恢復與善後階段」。（如圖二）



圖二：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階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第一階段－危機偵測預防

處在瞬息萬變的新興發展市場中，充滿著各種不確定因素，非政府組織隨時可能會發生各種危機事件，如果未能妥善加以處理，勢必危及到組織的運作與經營。因此，瞭解危機的成因，事先偵測組織的危險因素，可能是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很重要的課題。

雖然，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環境愈來愈顯得困難，資訊的掌握也必須投入更多的心力。但大部分危機的發展歷程還是有其脈絡可循，比如像責信力的危機，就可經由董事會的決策以及方案執行的過程中，看出若干的端倪。因此，對於危機的防處，早期預警訊號的偵測就變得相當重要，非政府組織可以透過預先的危機防處計畫來追蹤掃描這些預警訊號，以作爲決策管理單位在執行危機管理方向上的參考[32]。沒有危機偵測的計畫與行爲，而要防止及因應危機，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對大部分的非政府組織來說，雖然有可能在無意間地不經偵測而防止了危機，但這種例子係基於幸運與偶然，而不是由組織慎思熟慮得以防範遏止的結果。危機管理中早期預警系統（Early warning system─ EWS）的偵測活動需要有一定的偵測工具，以及明確的偵測範圍，否則容易產生混淆；如偵測機制可能包括了電腦化流程業務與財務或資訊控制系統、完整的危機偵測計畫、明確的決策系統及組織環境掃瞄系統（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對環境資訊的敏感度，包括組織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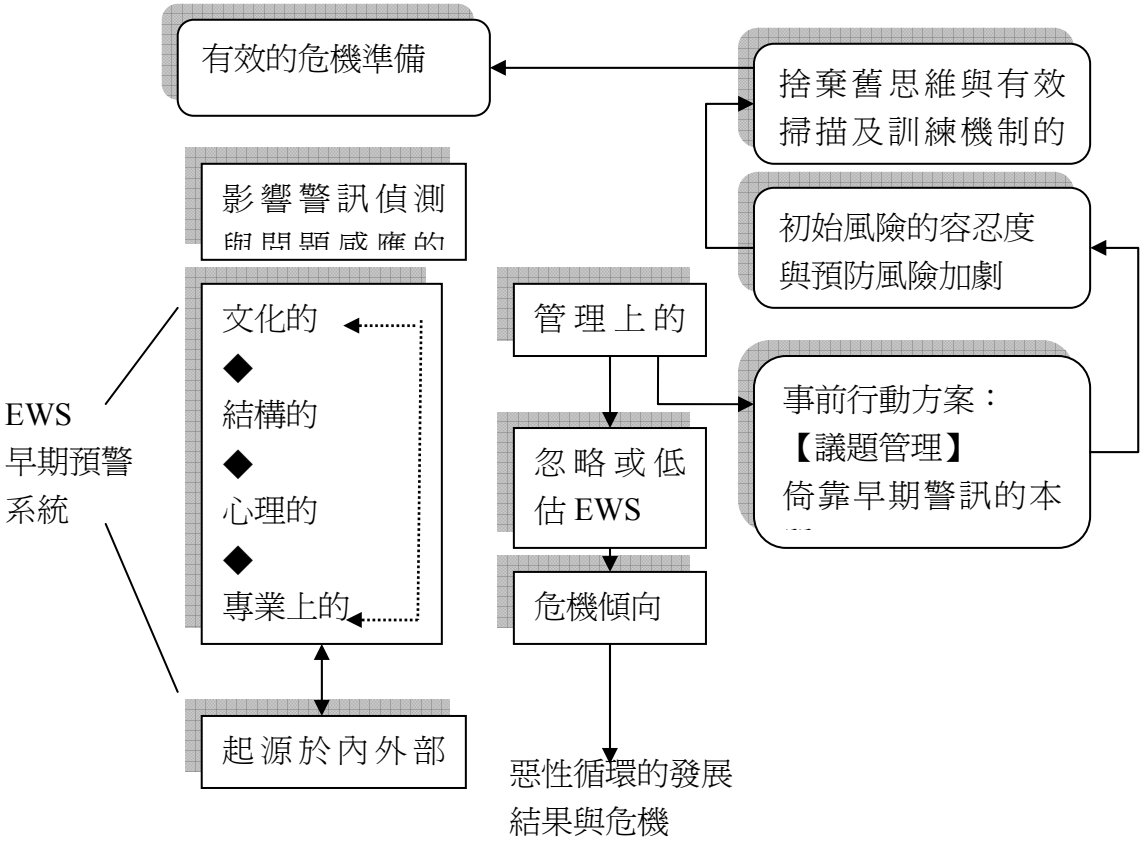
[31] 王振軒，軍隊危機管理之研究─從公共事務途徑探討，參考網址：http://military.fhk.edu.tw/military/research/seminar%E5%AD%B8%E8%A1%93%E7%A0%94%E8%A8%8E%E6%9C%83mpag%E6%AA%94/sec_mili/papers/military13.htm。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13 日。

[32] 詹中原，《危機管理─理論架構》（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160。

各階層人員的敏感能力─以掃瞄外部與內部可能即將發生危機的訊號）[33]。換言之，非政府組織的偵測活動除了科技工具（電腦資訊系統）外，還必須包含計畫的偵測，以及人的檢視。

Zachary Sheaffer 等人對早期警訊管理的研究中，綜合歸納許多學者對引起危機關鍵構成因素的假定，並進一步指出，偵測並確認危機傾向，有一共通的型態，這個型態包括一些要素的特定組合。這些因素是交互影響與彼此增強的，Zachary Sheaffer 把警訊偵測與問題感應的因素區分爲四個構面，分別爲社會心理的抑制因子、結構的/策略的/控制的系統特性、組織的文化因子及外界的因子/敵意的工作環境[34]。

相關警訊處理模式如圖三。



圖三　EWS 早期警示系統處理程序模式
資料來源：譯自 Zachary Sheaffer. et al.（1998）, p.17.

[33] Ian I. Mitroff.（1987）,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Vol. 1, No. 3, p.285.

[34] Zachary Sheaffer, (1998) Bill Richardson and Zehava Rosenblatt., "*Early-Warning-Signals Management: A Lesson from the Barings Crisis.*"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 crisis management, Vol. 6, Issue 1, pp.7-8.

上列因素依其屬性分類後，再經整理歸納，概可獲得各主要影響層面之因素，其中「組織成員個體的因素」層面，可歸納出產生成員個人對警訊的直覺敏感度強弱、成員個人對警訊偵測的態度與動機強弱、成員個人的知識、工作經驗與資歷、個人滿足環境所需資源的充分程度、自我與過度自信等五個因子；其次在「組織結構的因素」層面，可歸納出產生警訊偵測作業流程的完備程度、有無偵測警訊的專責部門、保守且抗拒改變的組織文化、警訊偵測績效有無獎懲制度、組織內資訊分享、溝通系統暢通程度、管理階層領導風格是否鼓勵等六個因子；另外「警訊本質的因素」層面，則可歸納出產生警訊出現頻率的多寡、警訊明確一致性程度的高低、警訊本身威脅程度的大小、鑑定評估是否爲警訊的明確標準及警訊夾雜在其它訊號中等五個因子。並以此爲基礎，建立層級分析的架構。

對非政府組織來說，以上這些警訊偵測構面的組成以及運作，可能因爲財力、人力與規模的不足，無法做到近臻完美，但仍可依照組織現有的財務力狀況，訂定適合組織現有規模的「危機偵測策略」：

（一）針對組織內部的危機因素實施的監控策略：「事前的危機偵測計畫的擬定」、「領導人與董事會危機偵測會議定期召開」以及「成員對個人專業知識掌握的強化訓練」等策略。

（二）針對外部危機因素的監測策略：則可分施行「組織內外部資訊分享及溝通系統暢通」及「管理階層領導應鼓勵組織內人員提供危機資訊」、「人員對外部危機偵測敏感度的訓練」以及「業務與環境資訊掌握訓練」等等，都是非政府組織可以預先做好危機偵測工作的一般性做法。

二、第二階段－危機的處理

任何危機大都具有威脅性、不確定性、時間的有限性及雙面效果性等特性，故危機的處理特別的困難。又由於非政府組織所遭遇危機的來源環境不同，因而必須考慮組織發展情形（包括組織的財力、人力情形、董事會凝聚力、領導者意向等）、外部環境的狀況（包含危機的屬性與範圍、社會公眾的觀感，以及其他同業可能協助的程度爲何等），及危機造成損害與延續的程度等面向，而對危機作權變處理。本文擬從非政府組織的結構面（包括董事會、CEO、組織成員），非政府組織如何規劃整體危機處理計畫，以及組織外支援資源面向，逐一提出非政府組織處理危機，可採行的作法：

（一）領導（CEO）執行危機處理即時性作法－成立智囊團（think tank）供決策者諮詢：

受到能力、智力及時間上的限制，使決策者無法制定最佳的決策，或因受外在環境壓迫而無法詳細考量，此時便有賴智囊團的幫忙，並協助決策者蒐集資訊，發揮諮詢的功能，提供適切的建言，幫助決策者作好危機處理工作。

（二）領導者訓練部分－強化決策者的危機辨識能力：

不管是 CEO 或董事會成員，這些決策群往往礙於以往的成功經驗及自我認知能力上的限制，未能對危機的初期警訊予以注意並採取適切的回應及處置措施，以致錯失處置的良機。因此，若能強化決策者的危機辨識能力及改善其所持的態度，不但能面對危機的挑戰，更能主動將危機視爲轉機，進而創造良機、解除危機。

（三）董事會部分－預防團體盲思（groupthink），提高決策品質：

董事會是非政府組織的決策最高層，也是組織面臨危機時，第一個衝擊的團體。由於董事會採取的決策模式乃屬「審議式民主」，這種共識決的決策模式，時間通常非常冗長，且多頭討論的過程，很難做出明確的即時性決策，甚至可能導致「團體盲思」[35]的情形出現，使得決策品質不佳，甚至作出不利組織的決策與行動。爲了預防此種壓力的影響，必須對決策者的認知結構重新調整，並且加強心理建設，以提高危機的辨識能力，祛除決策中的盲點，提高決策品質，有效因應危機。

（四）組織成員部分－加強幕僚人員的訓練：

由於非政府組織經營環境已逐漸呈現「市場導向」的趨勢，外在環境充滿了高度的不確定性，組織面對危機的人員，已不再僅止於決策階層的高階管理人了。在任何時候、任何時間，組織內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必須面臨到突如其來的危機狀況。因此，危機處理的能力訓練，除了在領導階層中必須強化外，對於組織的幕僚、甚至志工群，都必須在事前因應計畫能力上，給予適當的訓練，此外，還需不斷將該計畫予以實地演練及模擬，並不斷檢討、修正及學習，以訓練非政府組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應變危機的能力，如此才能提升組織整體危機處理的能量。

（五）組織計畫部分－制定危機應變計畫，舉辦實地模擬演練：

現代的非政府組織，除了與市場競爭外，還必須面對多元的公眾意見，甚至必須關注社會風氣的走向；因此，非政府組織經常是處於一個難以預測的環境中，對未來的事務更是難以掌握。如果能先期做好計畫預擬的工作、訂定應變計

[35]一般認為團體迷思這個概念由美國心理學家艾爾芬·詹尼斯（Irving Janis）首先提出。但 William Safire 於 2004 年 8 月 8 日《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撰文指出，團體迷思一詞實為 William H. Whyte 於 1952 年在《財富雜誌》中首先提出。團體迷思（亦作團體盲思，英文：Groupthink），指團體在決策過程中，由於成員傾向讓自己的觀點與團體一致，因而令整個團體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進行客觀分析。一些值得爭議的觀點、有創意的想法或客觀的意見不會有人提出、或者是遭到忽視及隔離。團體迷思可能導致團體作出不合理、甚至是很壞的決定。部份成員即使並不贊同團體的最終決定，但在團體迷思的影響下，也會順從團體。詳見，維基百科，參考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8%E9%AB%94%E8%BF%B7%E6%80%9D。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11 日。

畫，並做經常性的沙盤推演與模擬式的操作演練，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將可在危機發生時，發揮預防性與即時性的管理效果。

（六）運用組織外的支持資源－動員同業力量協助處理危機：

危機事起突然，常需要大量人力協助應變及善後。因此，若能善用外環境中的潛在資源，與組織外背景與工作類同的同業，簽訂互助協定，組成一個平時虛擬的組織支援網絡，並定期給予適當的危機支援訓練，使這個平時虛擬的組織，能在危機事故發生時能發揮最實際的效用，如此對組織而言，不僅能在危機時能獲得其他同盟組織的充分奧援，同時也能在其他組織發生危機時，支援其他組織。這樣一個支援網絡的做法，除了將可大大提高危機處理的績效與能量，也能發揮非政府組織業界「生命共同體」的互助精神。

三、第三階段—危機的善後

危機處理告一段落後，善後工作仍是不可輕忽。就如同企業要講求良好的售後服務，才能贏得消費者信賴，也才能永續經營一樣，非政府組織也必須在危機過後重拾社會的信任，並再度凝聚內部的向心，組織才能繼續實踐其使命。非政府組織對危機所產生的後續問題，如組織內外部人員的安撫與照顧、組織架構的重建及形象口碑的再造等，皆需作適當的規劃處理，期能儘快脫離受創後的陰霾，迎向未來。對問題的發生應有客觀深入的調查與瞭解，並針對缺失確實檢討改進；對危機處理的過程，有無缺失？是否適當？亦宜一併檢討，並將此經驗納入危機管理的範疇，防杜下一個危機的發生。而就非政府組織經營的內、外部環境來分析，其在危機善後處理的考慮上，應注意以下重點：

（一）外部環境考慮事項

1、外環境復原：

整合外環境有關人員與單位，進行遊說、溝通、同業對組織觀感的重塑、社會形象再造等等，儘速恢復外界對組織的信心，並隨時注意外界對組織的評價波動情形等。

2、外環境與內環境的迅速接軌：

當危機發生後，組織的資訊接收與整合功能，勢必相當虛弱，對於外環境市場的資訊，很難在組織最脆弱的時候，做即時的掌握，更遑論有條理的歸類、分析。但經營市場的變化，是不會隨著組織的危機來臨時而跟著停止，相反的，組織在危機處理期間，因組織的人物力等資源大都投入因應危機事務中，無餘力再對外環境資訊做市場分析；此時，組織對於市場資訊的瞭解，很可能呈現一片空

白。因此，在善後期，組織應盡速對市場資訊進行了解，並迅速讓組織的每一個成員了解，期使組織的運作能在短時間內跟上市場的步調，正常營運。

（二）組織內考慮事項

1、組織運作系統復原：

修復組織的結構（包括人力結構、業務結構等）、溝通管道的復原、內部同仁心理創傷的治療，讓組織能快速恢復正常運作；管制危害並設置停損點以防止二次危機發生。

2、學習與經驗傳承：

這時最主要的工作，還是要從危機事件中學習教訓，並將此學習反饋至危機前的準備工作，以利危機管理活動的良性循環，如此才可做到學者雷米（Ram'ee）指稱的：「預期下一個危機、避免下一個危機，更進一步達到管理下一個危機」[36]的目的。通盤檢討危機應變處理策略，累積應變經驗，化危機爲轉機，除了讓組織能快速回復正常運作爲，也讓組織具備鑑往知來的能力，不再重蹈覆轍。

危機的善後工作主要是消除危機處理後遺留問題和影響。危機發生後，經過危害減損、控管等善後工作後，還會有人員心理上的影響和組織社會形象的影響，這些危機之後的影響，絕對不是一朝一夕可完全解決的，要靠一系列危機善後管理工作來挽回影響。如果危機善後工作處理得好，除了可以廣泛建立非政府組織與社會公眾各界的良好關係，增進彼此的瞭解和溝通，爭取更多的社會支持，也可再次凝聚組織內部的高度向心，並獲得組織內部人員的諒解和支援，借助危機讓組織的社會形象與內部團結同時提高。

柒、結語—危機管理具體做法

危機管理在非政府組織的運用上，雖然大多還是移植了企業或政府部門的理論爲基礎，但在實務操作上，卻顯的更爲困難，特別是非政府組織所追求的使命與社會責任，不若企業或政府部門追求「利潤」或「效能」來的容易衡量與評估，因此，在危機風險的判斷上，也較爲不易；而在實際危機處理的做法上，更必須顧及非政府組織強調「審議式民主」的共識型決策機制，因此，在制定危機決策與執行管理措施時，自然在效率上也顯的緩慢許多。再者，非政府組織的成員背景複雜，包括專職人員、董事會成員，以及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因此，在處理

[36]Ram'ee, J. (1987). Corporate crisis: The aftermath. Management Solution, March,pp.19-22.

危機時，能否迅速形成共識，口徑一致處理當下的危機，亦是非政府組織在執行危機管理工作時的一大挑戰。足見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工作的繁瑣與複雜。

本文除以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的階段觀點，逐一論述、分析非政府組織在管理過中的實踐方法，並提出補強性的具體看法，以資參酌：

一、避免駝鳥心態，以正面的觀念與態度面對危機：

觀念永遠是行爲的起點，因此欲建立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必須首先克服觀念束縛這一關。對危機本身的性質、規律以及危機的管理原則形成一個清楚明確的認識和觀念，對於危機管理機制的建立，有著關鍵性的作用。

二、危機判斷標準系統：

構建完備的危機管理機制，首先必須制定一整套嚴密的危機事件處理的原則和標準，這樣，即使危機突然降臨，也可以依據事先確定的相關標準進行劃分和處理，做到有章可循，有條不紊。特別是非政府組織不以利潤爲經營良莠的標準，而危機的判準也就更爲困難。因此非政府組織危機判斷標準應該包括：

（一）對危機事件處理的最高原則標準，應以社會公益與組織使命的實踐爲主。

（二）對危機事件的定性判斷標準，應研判其來源是由組織內部或外部，才能了解危機的性質爲何。

（三）非政府組織對危機破壞程度的定量判斷標準，應清楚的分層，並了解、劃清其範圍，以便控管其危害的程度。

三、危機管理機制的核心是資訊的公開透明：

英國危機公關專家李傑斯特（Michael Regester）曾提出著名的危機溝通「3T」原則：第一，以我爲主提供情況（Tell your own tale）；第二，提供全部情況（Tell it all）；第三，儘快提供情況（Tell it fast）。[37]爲什麼要實行「3T」？也就是說，沒有你的聲音，就會有別人的聲音。以組織爲提供危機情況的主體，組織成爲了資訊流動方向的主導者，社會公衆自然就會以組織的發放的訊息爲主要的資訊來源，其他不利於組織的聲音或謠言，就無足輕重了；重點是，在第一時間很快提供了清楚；完整的訊息，就能站在主導全局的置高點，反守爲攻，而不會掉入被不利、不實資訊追著打的窘境。

---

[37] 賈斌昌，論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建立與完善，參考網址：http://www.xslx.com/htm/jjlc/glkx/2006-03-31-19875.htm。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13 日。

四、策略性思考與作為：

策略性思考是危機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對於非政府組織而言，進行危機管理最主要的目的，不外乎是重拾組織的信譽，挽救組織經營頹勢，但同時也可利用策略性思考，化危機爲轉機。例如，運用成爲媒體焦點的機會，向大眾公開清楚說明組織的使命、任務與價值，並藉機將組織的運作透明化，讓組織的公眾形象得以重塑。此外，董事會、執行長等管理階層，必須考慮哪些基本目標與價值觀，可能在危機中被扭曲，做好危機管理中的「意識鞏固」工作等，都是危機管理過程中，非政府組織必須發揮的略性思考與作爲。

五、注重媒體、重視公關工作：

發生嚴重意外事件，組織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媒體的輿論撻伐，特別是擁有高度社會期待與公益性質的非政府組織。因此在處理危機時，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弭平媒體的雜音，以維護組織的公共形象。危機發生時，經常會有資訊流通窒礙的狀況發生，如何防止不良輿論的產生，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即做清楚、明確的回應。如果對媒體、輿論的處置得宜，組織形象的折損可降低許多。而這些工作，都必須仰賴良好的公關，因此，在危機管理的過程中，公關也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

六、組織內部溝通[38]

組織（organization）最大的特徵是由各有所司的單位與人員所構成，而非政府組織的成員的背景更是顯得多元，其中包含的董事會成員、專職人員，以及來自不同工作領域的志工，這些不同的構成份子卻要爲共同目標而努力，特別是在危機發生時，這些成員如何降低本位主義，使組織成員能協同一致，化解危機，主要還是得仰賴組織內部溝通功能的發揮。

七、網路科技的應用：

利用網際網路於危機管理工作中是近期在此領域中相當大的革新，其對危機管理應有兩大助益：1、協助組織監控環境，預防危機；2、協助組織在危機處理

[38]鄭錫鍇，溝通功能與政府危機管理，參考網址：http://www.css.nccu.edu.tw/mepa/mepa_course/2005/jam/060508_2.doc。瀏覽日期：2006 年 6 月 7 日。

過程快速地與利益關係人、民眾進行互動溝通。[39]Neil 認爲網路是危機管理中的新興重要工具，因爲最新趨勢是當危機發生時，媒體常會在第一時間查詢該機關網站，藉此獲得危機或危機處理的相關資訊。Holtz（1999：218-222，轉引自卜正珉，2003）認爲應用網路處理危機處理的原則有：[40]

1、利用網站將即時（timely）、正確（accurate）與最新的資訊（up-tp-date）傳達出去，把不確定狀況降低。

2、透過網路傳播，盡力維持社會大眾對組織的正面認知，包括讓民眾知道組織如何因應危機、危機被控制的程度、組織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等。

3、密切監控網路社區內媒體及其他特定團體有關危機的相關訊息，如果發現有立場偏差、資料錯誤的情形，應立即要求更正澄清。

4、最後，運用電子郵件傳送必要或完整資訊給相關機關或意見領袖，避免因誤解而徒增危機處理的困擾。

傳統對於危機發生時的公關處理，都是透過新聞稿發布、記者會、刊物（fact sheets）等向社會大眾提出澄清或說明，但非政府組織普遍在財力與人力上均顯不足，因此，可藉由電腦資訊之便，以省時、省錢的手段將正確的資訊快速的傳遞出去。

---

[39]Perry. Daniel C. , Maureen Taylor & Marya L. Doerfel. 2003. "*Internet-Based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Management*." i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7(2): pp.206-232.

[40]卜正珉，〈網路科技之影響與運用〉，《公共關係：政府公共議題決策管理》（台北：揚智，2003 年），頁 56。

參考文獻

中文資料

卜正珉，〈第十一章：網路科技之影響與運用〉，《公共關係：政府公共議題決策管理》，台北：楊智，2003 年，頁 56。

上官譯，閔茲伯格著，《閔茲伯格談管理：探索組織世界的奧秘》，台北：中天出版社，2000 年 10 月，頁 430-433。

江明修審定，Burton A. Weisbrod 著，《非營利產業－To Profit or Not to Profit: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台北：智勝文化，2003 年 10 月。

余佩珊譯，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ker）著，《使命與領導：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台北：遠流出版，2002 年 6 月 1 日，頁 4-9。

邱　毅，〈面對危機的因應和對策〉，《人力發展》，第 54 期，1998 年，頁 1-6。

孫　煒，〈非營利管理的責任問題—政治經濟研究途徑〉，《政治科學論叢》，第 20 期，2004 年 6 月，頁 141-166。

孫本初，〈危機管理策略之探討〉，《人事月刊》，第 22 卷第 6 期，1996 年，頁 17-29。

詹中原，《危機管理─理論架構》，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160。

戴維・貝贊可、戴維・德雷諾夫、馬克・尚利，《公司戰略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89。

英文資料

Dees, J. G.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 1998, pp.55-67.

Gallagher, K., & Weinberg, C. B. Coping with success: New challenges for nonprofit marketing.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Fall, 1991, pp.27-42.

Hermann, Charles F.，Som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in Charles F. Hermann, International Crisis: Insight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Free Press., 1972.

Herzlinger, Regina E. “Can Public Trust in Nonprofits and Governments be Restore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4（2）, 1996, pp.97-107.

Ian I. Mitroff.,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Vol. 1, No. 3, 1987, p.285.

Mitroff, Ian I. & Christine M. Pearson.，”From Crisis Prone to Crisis Prepared: a framework for crisis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Vol.7, No.1, 1993,pp.48~59.

Nunamaker, Jay f. JR., Weber, E. Sue, and Chen, Minder，”Organiz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Systems: Planning for Intelligent Ac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Vol.5, No.4, 1989, pp.7-32.,.

Perry. Daniel C.Maureen Taylor & Marya L. Doerfel. “Internet-Based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Management. “ i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7（2）, 2003, pp.206-232.。

Ram'ee, J. Corporate crisis: The aftermath. Management Solution, March, 1987,pp.19-22.

Richardson, B. Paradox management for crisis avoidance.Management Decision, 33（1）,1995, pp5-18.

Zachary Sheaffer, Bill Richardson and Zehava Rosenblatt.（ Mar1998 ）, "Early-Warning-Signals Management:A Lesson from the Barings Crisis."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 crisis management, Vol. 6, Issue 1, pp.7-8.

網路資料

王振軒，〈軍隊危機管理之研究─從公共事務途徑探討〉，參考網址：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RudAKLX6pHIJ:military.fhk.edu.tw/military/research/seminar%E5%AD%B8%E8%A1%93%E7%A0%94%E8%A8%8E%E6%9C%83mpag%E6%AA%94/sec_mili/papers/military13.htm+%E8%BB%8D%E9%9A%8A%E5%8D%B1%E6%A9%9F%E7%AE%A1%E7%90%86%E4%B9%8B%E7%A0%94%E7%A9%B6%E2%94%80%E5%BE%9E%E5%85%AC%E5%85%B1%E4%BA%8B%E5%8B%99%E9%80%94%E5%BE%91%E6%8E%A2%E8%A8%8E&hl=zh-TW&gl=tw&ct=clnk&cd=1

邱志淳，〈危機管理與應變機制〉，頁 2。參考網址：http://www.life.fcu.edu.tw/safe/documents/pd03.doc。

高永興，〈募款倫理與責信─國外個案研究〉，台灣公益資訊中心：npo 學習網，參考網址：http://www.npo.org.tw/StudyOnline/ShowSOL.asp?SOLID=35

陳韋聿，〈低估非營利治理的力量〉，台灣非營利組織研究網，2004 年 6 月 24 日。參考網址：http://npo.nccu.edu.tw/content/section04/item02/2004_07_22.php

賈斌昌，〈論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建立與完善〉，參考網址：http://www.xslx.com/htm/jjlc/glkx/2006-03-31-19875.htm

廖錦桂等，審議民主國際研討會活動報導，財團法人台灣智庫，2005 年 9 月 29 日。參考網址：http://taiwanthinktank.org/ttt/servlet/OpenBlock?Template=Article&category_id=34&article_id=510&lan=tc

鄭錫鍇，〈溝通功能與政府危機管理〉，參考網址：
http://www.css.nccu.edu.tw/mepa/mepa_course/2005/jam/060508_2.doc
謝慶奎，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危機管理演講提綱〉，2004 年 12 月。參考網址：http://politics.soc.ntu.edu.tw/news/940105.pdf　流覽日期：2006 年 6 月 9 日。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311-338 , No.13 Dec. 2006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Crisis Management

Chen-Shiuen Wang[*]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ith non-profit and philanthropic characteristics are stiffly considered as the silent group which quietly makes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In terms of th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yp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hat they are equal t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many issues of NGO management are seldom explored and even discussed by industries and academic circle. Nevertheless, since the rise of plural and civil society concepts, the development of NGO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one hand, this impact brings NGO a quick increase in quant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rol of quality has thus been worried, especially in the emerging, broadened, and chaotic philanthropic market. It has been curious and worth of discussion that the NGOs will either grow steadily, or move toward the end of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 and finally die out?

From the angle of crisis management and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seeks to discuss that how NGOs establish the exclusive capability of crisis managemen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fast changing and variable market environment. Also, a quick and effective response will be made in order to make organization transcend a new-typ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risis Management, Crisis Detection, Public Accountabil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ROC

編後語

本學報屬於開放的學術刊物，刊登未曾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為求嚴謹，來稿經由編輯委員會推薦後，均送請至少兩位以上相關學術領域的學者專家進行審查。

本學報所涵蓋的領域相當開闊，包括中國文學、考古學、哲學、歷史學、外國文學、語言學、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體育學及藝術學等。我們不僅藉此帶動本校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風氣，而且也期望與國內外學術機構交流互動。

本期自 2006 年 9 月截稿共接獲二十一篇來稿，經公正審查後，決定採用其中十二篇論文，按學術領域共分中國文學、哲學、歷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五大類。

本期能順利出版，除了感謝人文社會學院各單位主管及編輯委員的鼎力相助，也特別感謝院長室曹文琦、周健麗兩位小姐的行政支援、人文社會學院各單位助理細心編校文稿，由於他們的通力配合，第十三期方得如期出刊。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謹誌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第十四期徵稿啟事

一、本學報為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發行之學術刊物，每年刊行二期。

二、本刊以發表人文及社會科學之理論與實證研究為主，文獻評論為輔。本刊不接受任何翻譯作品及已刊登之論文，來稿請勿再投寄其他刊物。

三、論文中牽涉著作權部份(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書，本學報不負著作權責任。

四、來稿務請以 Word 編輯排版，一式三份文稿並附電腦磁片或 e-mail 傳送，內容以五千至三萬字為原則。

五、來稿請依「《逢甲人文社會學報》撰稿體例」撰寫，並請檢附「逢甲人文社會學報投稿論文作者資料表」。

六、本學報接受簡體投稿（繁體送審），但以繁體刊出；如因字型轉換造成編輯困難，將影響刊出之優先順序。

七、博士生投稿請同時檢附指導教授推薦函乙封。

八、來稿均須經匿名評審通過後，方予刊登。來稿經本刊收錄後，作者須同意非專屬授權予「逢甲大學」做下述利用：

(1)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2)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4)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九、論文被接受後，須按本刊之編排格式排版，並將論文檔案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寄回。

十、來稿一經刊登，致贈本學報 1 本及抽印本 30 份。

十一、本刊隨時接受來稿。刊登時間依評審進度及本刊出版時間而定。

十二、本學院提供論文格式電腦檔案、請選擇以 E-mail 方式傳送或從本學院網站（http://www.cohss.fcu.edu.tw/paper12.htm）自行下載。

十三、來稿請寄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收。

電話：(04)24517250 轉 5505，傳真：(04)24513797

E-mail 帳號：jljon@fcu.edu.tw。

十四、第十四期截止收稿日期為 2007 年 3 月 15 日。

出版者：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編輯者：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2007 年 6 月出版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ubmission Guidelines for Issue 14

1. This academic journal is published by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wo issues are published every year.
2. This journal accepts theoretical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es, as well as critical studies, in the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ed works or already published articles will not be accepted. Papers submitted to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submitted elsewhere at the same time.
3. If papers submitted contain pictures or long quotations that involve copyright, the authors should get a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original authors or publishers. This journal is not responsible for obtaining a copyright permission.
4. Each paper should be processed in Word in the length of 5,000-30,000 words and submitted in triplicate together with a disk copy or a copy sent through e-mail.
5. All papers submitted should follow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o each paper a publication submission form should be attached.
6. Papers in the simplified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cceptable for anonymous reviewing. But upon publication, only the full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adopted. I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has difficulty transforming the simplified form into the full form, then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papers may be postponed.
7. If the author is a Ph.D. candidate,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a reference letter of his/her supervisor to the paper submitted.
8. Papers will only be published after passing an anonymous reviewing process. As soon as an article is accepted, the author must grant a non-exclusive license to Feng Chia University to
   (1) publish it in paper or digital form;
   (2) make it an e-paper and a digital archive of the FCU Main Library;
   (3) reproduce it and publish it on the Internet, and then authorize users to download, print, or browse it;
   (4) sublicense it to other database providers to collect it in their own databases in order to offer more database services;
   (5) change its forma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ach database.
9. After publication, each author will receive one copy of the journal and 30 off-prints of his/her own article.
10. Papers can be submitted any time.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depends on the committee's reviewing process.
11. A computer template can be downloaded at the University's website (http://www.jljon.fcu.edu.tw/paper.htm) or sent through e-mail.
12. Submission address: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100 Wenhwa Rd.
    Seatwen, Taichung
    Taiwan 40724, R.O.C.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Telephone: (04) 2451-7250, Ext. 5505 Fax: (04) 2451-3797
    E-mail: jljon@fcu.edu.tw
13. Submission deadline for Issue 14: March 15, 2007
    Publisher: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Editor: Committee for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June 2007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撰稿體例

一、橫式寫作。

二、版面設定：

（一）邊界：上、下、左、右均為 3.17cm

（二）與頁緣距離：頁首－2.3cm；頁尾－1.75cm

（三）紙張大小：A4

（四）版面配置：勾選「奇偶頁不同」及「首頁不同」

（五）工具/選項/相容/（建議選項設定於）Microsoft Word (亞洲)版本 97

（六）版面設定/文件格線/指定每頁的行數/每頁行數：36，行距：18

三、內容包括：

（一）中文題目

（二）作者

（三）作者職稱及最高學歷（採註腳方式，須註明服務單位，專、兼任及職稱）

（四）中文摘要（500 字以內）

（五）中文關鍵詞（至多五個，以頓號“、”區分）

（六）本文

（七）註釋

（八）參考文獻

（九）英文題目

（十）作者英文名字（格式如 *Da-Ming Lee*，斜體）

（十一）作者英文職稱（採註腳方式，須註明職稱, 服務單位, 校名）

（十二）英文摘要（300 字以內）

（十三）英文關鍵詞（至多五個，以逗點“ , ”區分）

四、標題及分項方式

（一）中、日文標題以「壹、一、(一)、1、(1)、a、(a)」為序

（二）英文標題以「I.　A.　(A)　1.　(1)　a.　(a) 」為序

五、正文及註釋

（一）中文部分引號請用「」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及碩、博士論文用〈〉標示；**英文**部分引號請用“ ”，書名、期刊請以***斜體***表示。

（二）數字部分（含年月日、頁數、註釋號碼、編號...）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半形字）。

（三）註釋採隨頁註。

（四）註釋引用之格式：

1.中文書籍：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頁數（如頁 10-13）。

2.中文期刊：作者姓名，〈篇名〉，《期刊名》，卷、期（如第 2 卷第 3 期）（出版年月），頁數（如頁 10-13）。

3.英文書籍：Author’s Last name. First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p.10-13.

4.英文期刊：Author’s Last name.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1, No. 1 (Date), pp.10-13.

六、引文

（一）原文直接引入文句中者，於其前後附加引號，若引文內別有引文，則使用『』表明。引文原文有誤時，應附加（原誤）。

（二）獨立引文，不加引號，前後各縮排 1cm。若為節錄整段文章，則每段起頭內縮二字；若從段落中節錄，則起頭不內縮。

（三）引文有節略而必須表明時，均以節略號六點……表示，如「×××……××」；英文引文則為句中三點…，句末四點‥‥。

七、參考文獻

（一）全篇論文後須詳列引用文獻。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中、日文書目，請依作者姓名筆畫排序；西文書目依字母次序排序。同一作者有兩本（篇）以上著作時，則依著作之出版先後排列。

（二）參考文獻書寫格式：

1.中文書籍：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

2.中文期刊：作者姓名，〈篇名〉，《期刊名》，卷期數，出版年月，頁碼。

3.英文書籍：Author’s Last name. First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4.英文期刊：Author’s Last name.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1,No. 1 (Date), pp.10-13.

（三）參考文獻不須編碼。

八、照片及圖表

（一）圖表均需加以編號。

（二）表名列於表上方，表註列於表下方；圖名、圖註列於圖下方。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第 13 期

總召集人　李威熊
執行主編　胡志佳
編輯者　王　謙、文庭澍、汪敬三、梁煌儀
馬彥彬、陳哲三、陳鳳如、張宜正
張志相、彭芳美、斐克禮、鄧鈞文
劉靜敏、劉森堯、謝海平（依筆劃序）
黃忠慎、黃秀政（校外委員）
出版者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407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電話：(04) 24517250 轉 5505
傳真：(04) 24513797
E-mail：jljon@fcu.edu.tw
排版者　周健麗、曹文琦、黃心屏、廖盈宣
謝夏瑩（依筆劃序）
排版印刷者　逢甲電腦排版事業有限公司
407 台中市逢甲路十九巷五號一樓
電話：(04) 24518187
定價　每冊新台幣參佰元整
本刊網址　http://www.cohss.fcu.edu.tw/paper.htm

2006 年 12 月出版

ISSN 1682-587N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sue 13

Chair	Wei-Hsiung Lee		
Executive Editor	Chih-Chia Hu		
Editorial Committee	Chian Wang	Ting-Shu Wen	Chin-Shan Wang
	Huang-Yi Liang	Yahn-Bin Maa	Che-San Chen
	Feng-Ru Chen	Yi-Cheng Chang	Chi-Shiang Chang
	Fang-may Peng	Kris Vicca	Chun-Wen Teng
	Ching-Ming Liu	Sen-Yao Liu	Hai-Ping Hsieh
	Chung-Shen Huang	Hsiu-Cheng Huang（Off-Campus）	
Publisher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100 Wenhwa Rd., Seatwen, Taichung, Taiwan, R.O.C. Tel.：886-4-24517250 ext. 5505 Fax：886-4-24513797 E-mail：jljon@fcu.edu.tw		
Executive Editors	Chien-Li Chou	Wen-Chyi Tsao	Hsin-Pin Huang
	Ying-Hsuan Liao	Shiah-Ying Shieh	
Price	NT$300 / per		
Website	http://www.cohss.fcu.edu.tw/paper.htm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06

ISSN 1682-587N
All rights reserved.